

ERICO
VERISSI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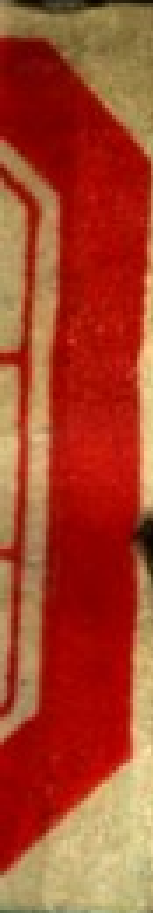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O
SENHOR
EMBAIXA-
DOR

大使先生

大使先生
大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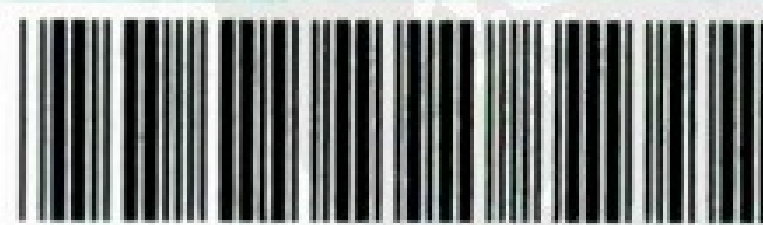
1777.45

1:2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译



大使先生



Z018371

067024

Erico Verissimo
O SENHOR EMBAIXADOR

根据巴西 Globo, Porto Alegre 1980年第13版译出

大 使 先 生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著

范 维 信 译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5 字数：36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222-00216-2/I·54 定价：3.85 元

前 言

作为巴西小说名篇《大使先生》中译本的第一名读者，我欣然地接受了我的朋友、译者范维信同志的要求：向后来的读者简要地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说起来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有两位熟悉巴西文学的朋友先后向我介绍了《大使先生》这部书和它的作者。最初给我的印象似乎这是一部故事情节曲折、文笔优美流畅、可读性强的畅销书，出版后一再缺货以致洛阳纸贵。而有一个时期，凡提到畅销书，人们的印象似乎总是将其与什么侠、什么案、什么女之类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认为太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自那以后，我倒是一直记着有这么一部书。去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决定与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合作出版一套拉美文学丛书。在议论翻译书目的时候，这部书自然就被列进去了。事有凑巧，当译作脱稿的时候，我又有幸先睹为快。我几乎是一鼓作气读完全书的，原先的印象很快就完全消失了。在意犹未尽之中，我又认真地细读了一遍，于是有了较为清晰的明确的看法：这是一部拉美

文学佳作，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谁要想了解巴西（这是一个幅员比美国还要广大的国家）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它属于我们常说的第三世界），谁就应当读一读这部小说。

对于巴西文学，说来惭愧，我所知甚少。据材料介绍，早在14世纪，巴西就已有文学作品。整个巴西文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殖民地文学时期和民族文学时期两大阶段，1822年，巴西宣告独立，标志着殖民地文学时期的结束和民族文学时期的开始。之后，经过了一百年漫长的岁月，巴西文学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22年2月，在巴西圣保罗大剧院举行了一次“现代艺术周”，巴西各重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文学史家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巴西现代文学的起点。而在巴西现当代文学中，小说创作的成就被认为是最为突出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巴西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要比其他拉美国家为早。“这些小说，无论写的是腹地还是加乌乔人的生活，或者是神秘而可怕的热带丛林还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斗争，都成了拉丁美洲文学史中也许是最杰出的最真诚的贡献。”这是文学史家对巴西现当代小说的评价。

谈到文学的成就，自然不能不提到作家。在论及巴西现当代卓有成就的小说家的时候，最先被提起的常常是这样两位：若热·亚马多（1912—）和埃里科·维利希莫（1905—1977）。他们被认为是巴西现当代最负盛名的小说家。由于他们各自作品的总印数都在二、三百万册以上，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百万书翁”。亚马多的名字，我国的文学爱好者们恐怕是早有印象的了，因为远在1953年，他的作品就已开

始被介绍过来，他本人不久前还偕夫人子女再度访华。而埃里科·维利希莫作品中译本的出现则是前几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对于这一位“百万书翁”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做得是实在太少了。这是一个空白，我们应该、也是有能力加以填补的。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里，拉美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和至今仍在进行着不屈的斗争。这中间频繁的军事政变和不断出现的独裁政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美地区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很好解决。

文学创作的使命无疑是忠实地反映生活。尽管小说与报告文学不同，一般不要求小说也迅速、同步地反映现实，特别是长篇小说。然而，终究是要反映出来的，这是规律，也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于是，在当代拉美文学史上，由于各国作家的努力，一批反映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反独裁小说陆续问世了。这些小说一出来就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其中不乏成功之作。1964年3月31日，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府被推翻，议会解散，许多进步人士遭到逮捕、监禁。1965年，埃里科·维利希莫以其多年的外交生涯积累的素材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大使先生》，对军事独裁政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从时间上看，军政权的上台与小说的发表仅相隔一年多时间，尽管小说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讲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加勒比海岛国——萨克拉门托共和国里发生的事情，但是人们很难相信，作家发表这部作品完全是无的放矢。《大使先生》很快在巴西流传开来。据统计，仅在作家的故乡——南里约格朗德州府阿雷

格里港一地，从1965到1980年，就发行了十三版，而且仍告缺货。其间，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军政府曾一度明令禁止此书流行。可惜无济于事，《大使先生》不久又传到了国外，在拉美其他国家，在葡萄牙、西班牙、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出版。

事实上，对于这个时候的巴西以及拉美各国的读者来说，埃里科·维利希莫已并非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早在25年前，他就蜚声文坛了。那么，在《大使先生》出版前作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905年，埃里科·维利希莫出生在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一个叫上克鲁斯的小城。由于家境贫寒，中学未毕业就开始独立谋生。他先后当过杂货店的伙计，银行职员，还经营过药店。之后，他来到了州府的所在地——巴西南部最大的港口阿雷格里港。生活的坎坷未能影响他对文学的爱好。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英国的赫胥利，美国的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等都是他所喜爱的作家，他还曾把赫胥利的小说《对比》译成葡文介绍给巴西读者。1930年，他开始在阿雷格里港的《环球》杂志编辑部工作，担任秘书和编辑，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偷牛贼》就是这一年在《环球》杂志上发表的。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文学创作，热情高涨，文思喷涌。从1933年到1943年间，维利希莫以充沛的精力陆续写出了《克拉丽萨》（1933），《十字路口》（1935），《远方的音乐》（1935），《太阳下的一处地方》（1936），《传说》（1940），《余下的是沉默》（1943）等一系列以南里约格朗德州为背景的城市生

活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声誉鹊起，名噪全国。真实地反映巴西南部都市生活的风貌，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以及精彩流畅的文笔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等是他的小说深受欢迎的原因。他成了巴西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1949年至1961年，他的《时间与风》三部曲：《大陆》，《肖像》和《群岛》先后付梓。在这一描写巴西南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的三部曲中，以第一部《大陆》最受推崇，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这部长达670页的小说是以联邦党和共和党在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一个叫圣菲的小城进行的一场为期仅四天的攻防战斗为线索，利用时间和空间上大幅度跳跃的手法，描写了两个家族五代人在一百五十年间（1745—1895）的斗争和他们的兴衰沉浮。而在这一小城中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整个州乃至整个巴西那一时期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1965年《大使先生》问世，此后出版的维利希莫的作品还有小说《安德列斯事件》（1971）和回忆录《单簧管的独奏》的第一卷（1975）等。除小说外，他还著有游记《雪地上的黑猫》（1941），《黑猫归来》（1946），《墨西哥》（1957）以及儿童文学作品《蒂比库埃拉历险记》和《大象巴西利奥生平》等。鉴于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从1953年至1956年，经巴西外交部的提名，他曾担任过三年的美洲国家组织文化部主任，这一阶段的外交活动，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自然不无裨益。据统计，维利希莫一生发表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就有三十多部。从他193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算起，到1977年逝世，中间不过40多年，他几乎是每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可以说，他为巴西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活了72岁，死于心肌梗塞。

《大使先生》全书共分四章：“递交国书”、“招待会”、“外交圈”和“山上”。前三章讲的都是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使馆里发生的事情，第四章故事的主要人物纷纷回国，斗争的地点移到了国内。整个小说是以萨克拉门托共和国——这一实际并不存在的国家的驻美大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上任一年间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以一等秘书巴勃罗·奥尔特加的活动为副线，以大使馆为主要舞台渐次展开的。通过对大使、武官、参赞、秘书、美籍雇员和他们的夫人、情妇间关系的描述和后来发生的游击队进军首都夺取政权的全过程的介绍，让人们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外交圈内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斗争，看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浸润着的虚伪与可怕，进而认识到这一加勒比岛国里各派政治力量间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的实质，并深深为被漂亮的革命口号所蒙骗了的人们悲哀。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在拉美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军事独裁政权和游击队及其领导人种种表现的实例，作了鞭辟入里、令人叹服的分析，即凡是独裁的军政府往往总是得到某个大国和某些跨国公司及垄断财团的公开或暗中的支持的，所谓的解放者和游击队的领袖人物一般都是在蛊惑人心的甚至是革命的口号下，“推翻了独夫民贼，自己也成了独夫民贼”，常常是“革命”尚未成功，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就已开始，作家指出这是“拉丁美洲可悲的普遍规律”。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跌宕起伏，每每出人意料，人物心理的描述细致入微，喜怒哀乐各不相同，个性鲜明。不少段落里面还有整页整页的关于岛国历史的回顾和上流社会人士与知识分子在

科学、艺术、哲学、政治、道德等问题方面的针锋相对的谈话，观点清晰，语意深刻，充满哲理，读后使人难以忘怀。

《大使先生》的故事是从大使先生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递交国书的那个上午写起的。尽管书中出现的人物有几十个，但通过这一天的活动，我们很快就对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如，卡雷拉：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独裁者；比万科：大使馆领事，其妻罗萨莉亚是大使的情妇；莫利纳：在信仰危机中苦斗的公使衔参赞；乌加特：大使馆武官，曾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残酷的警察头目；格里斯：一位正在和几个同胞策划推翻独裁政权的教授、政治流亡者；奥吉薇：大使馆的美籍雇员，是对大使馆的历史和历任大使的劣迹了如指掌的不可多得的人物；比尔·戈德金：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一位极为活跃的拉美问题专家，等等。而在这个名符其实的外交圈里，最为主要的人物当推两位：一位是大使先生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他忠于独裁政权，曾“为共和国作出杰出的贡献”，这位踌躇满志、官运亨通的外交官那时正处于飞黄腾达的事业的峰巅，他虽已年过半百，仍然保持着年青人的体形，肌肉结实，腹部平坦。但是，只要再往下看几页，人们就会发现他原是一位典型的面善心毒、口蜜腹剑、无恶不作的政客。他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居心叵测，期望着有一天能成为华盛顿一样的人物。可惜，好景不长，他所依附的独裁政权很快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他完全有机会逃到他乡去颐养天年，可是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使他不得不决定回国参战，最后落得或被“革命”政权处决的悲惨下场。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巴勃罗·奥尔特加，他是一个有着民主

和自由思想的热情的青年。他厌恶这充满虚情假意的外交圈，不愿待在这个使馆里为独裁政权卖命，以致最后辞去了使馆里的职务。在一连串义无反顾的告别活动之后，他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参加了游击队，投入了推翻独裁政权的战斗。可是，没有多久，游击队内部特别是那几位领导人在攻占首都前后的某些带有极左色彩的表现使他对未来感到忧虑，他的幻想开始破灭了。但是他仍然发誓一定要迫使“革命”的领导人履行自己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实现社会公正，组成民主政府，让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他悲愤地说，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不能，也不应再次受骗。”然而可以想见，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实现这些理想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小说结束的时候，他已受到了掌权者派出的特务的盯梢，连他自己也不能再无所顾忌地行事，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加夫列尔·埃略罗多大使和一等秘书巴勃罗·奥尔特加是小说中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物，他们的相互交叉的活动贯穿全书始终。在使馆里，他们属于两派，后来当独裁政府岌岌可危，使馆人员作鸟兽散的时候，他们又分别回国加入了敌对的营垒。可是人生中的很多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书的结尾，他们又意外地相遇了，“大使先生”被游击队抓获，将在审判后被公开处决，“一等秘书”出于对建立大哄大嗡式的“人民法庭”这一做法的不满，决定出庭为“大使先生”辩护，因为他所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法制，一切应依法行事。然而，在那种狂热的“革命”气氛中，他个人再力挽狂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大使先生”和“一等秘书”，应当说是作者在本书中着墨最多、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两个人物。

从争取民主、反对军事独裁、拥护社会进步这样的角度

来看，《大使先生》确实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透过曲折的情节和这些情节所漫射出来的作家的渊博的知识，活跃思想和犀利的文笔，给读者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小说的结尾，尤可令人回味。因为这个新生政权的种种做法，不能不让人发出深深的叹息：这样的革命难道会成功、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吗？人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吗？……

如果光从小说的章节题目和最初的一些情节来判断，《大使先生》一书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部仅仅描写外交界世俗的讽刺喜剧。然而，当细细读下去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里面的情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势常常都是急转直下、难以预料，你会被人物的命运所紧紧地吸引住。正如本书葡语版内容提要上所引用的作家自己说的话一样：“这部小说可以比作一枚火箭，点燃之后是缓缓上升的。”但是，“很快便带着巨大的轰鸣声直冲天际，最后以在高空爆炸的悲剧结束……。”在经过了一阵令人心悸目眩的声光迷雾的冲击之后给读者留下的是一系列问号。

毫无疑问，读完《大使先生》这样一部有着相当深度和思辩力的小说，我们不能不对译者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在辛劳的本职工作之余为我们译了这部书，做了一件好事。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译者来做这样的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好事：把外国文学中的好的作品不断地介绍过来！

从窗外吹进来的清凉的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令人畅意。可是，有时候其中亦难免会夹杂着一些不为我们所欢迎的东西。在这部书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相类似的情况，在一些段落里作者所表露的明显的虚无主义的倾向就是一例。在另一些地方，如第四节《山上》中，他们所表述的对

于民主和革命的意见也是我们所无法同意的。此外，尽管在巴西文坛上，埃里科·维利希莫是一位公认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家，在这部书里仍然有几处对性关系的较为具体的描述，这在拉美的文学作品中是见惯不怪、也符合那里的实际情况的。但与我们国情和阅读欣赏习惯有差异，为此，译者作了适当的淡化处理，相信能为我们大家所理解。

·拉美文学·（包括巴西文学）中还有不少好的作品尚未介绍过来，从事西、葡语文学介绍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应当继续努力。

江 志 方

一九八七年七月于北京

本书简介

本书是当代巴西著名作家“百万书翁”埃里科·维利希莫的著名长篇小说。从1965年出版至今一直畅销不衰，仅在作家生活的城市就出了13版仍告售缺。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目，葡、西、德、意、苏等国都先后竞相翻译出版。

本书作者曾搞过三年外交工作，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这部反独裁政治讽刺小说。它以一个虚构的加勒比海岛国驻美国大使的经历为主线，以大使馆为主要舞台，通过总统、大使、武官、参赞、秘书及其夫人、情妇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活动，再以美国一位拉美问题专家、一位萨国政治流亡者和两位游击队领袖穿插其间，描绘了大使与总统的交往和勾结；妓女和儿童的悲惨生活；尔虞我诈的总统选举；轰轰烈烈的夺权战争；对革命领袖的犯颜直谏；大使同两个情人的纠葛；管不住妻子的使馆官员的苦恼等等色彩纷呈的拉美社会生活图景。

本书具有开阔、深沉而宏大的艺术视野。正如作家所言，它好比一枚火箭，点燃之后缓缓上升，但很快便带着巨大的轰鸣直冲天际，最后以在高空爆炸的悲剧结束。

本书从葡文原版译出。

R 3P / 02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家简介

埃里科·维利希莫(1905—1977)是巴西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在巴西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被誉为“百万书翁”，其影响可与若热·亚马多媲美。

维利希莫年轻时曾在出生地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上克鲁斯城做过杂品店店员、银行职员、小药店店主，后移居州府所在地阿雷格里港。从1930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偷牛贼》起，到1977年11月因心肌梗塞逝世的40多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游记、回忆录和儿童文学等，仅长篇小说就有30多部，几乎每年一部，如《时间与风》三部曲(《大陆》、《肖像》、《群岛》)、《远方的音乐》、《请看原野上的百合花》、《交叉之路》、《安塔列斯事件》、《大使先生》等。其中不少著作已译成英、德、意、俄、罗马尼亚、荷兰、挪威和西班牙等文字在各国广泛流传。

埃里科·维利希莫为人乐善不倦、始终如一，从早期反法西斯斗争起，政治上也始终如一，他的全部作品都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始终如一的原则。

他的儿子路·费·维利希莫是巴西著名中年多产作家。

目 录

前 言	江 志 方	1
第一部分	递交国书	1
第二部分	招 待 会	137
第三部分	外 交 圈	211
第四部分	山 上	389

第一部分

递交国书

威廉·比尔·戈德金在联合通讯社担任记者兼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已经三十年了。在他任职满三十年的那天，同事们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为他举行了午宴。席间，一个小伙子致了贺词，语调幽默而又带几分情感地讲述了威廉·比尔的简历，回忆了他那漫长的记者生涯中的种种事件——一些轰轰烈烈，威武雄壮，另一些则滑稽可笑，令人捧腹。小伙子说：“比尔，在我们眼里，你远不只是位知心朋友和忠诚的同事。你还是一个象征——难道不是吗？——是一座纪念碑。”

致词结束时，他代表联合通讯社的年轻人赠给戈德金两件礼品：一块瑞士手表，一个英国烟斗。

比尔·戈德金原来以为，对周围二十几位朋友打一个手势，都招呼到了，再对大家说声“非常感谢”就可以完事大吉。对于任何演讲，尤其是宴席上的老生常谈，他一向是打心眼里讨厌。不过，此时餐桌四周总有人在喊：“讲讲嘛，比尔！快点！讲讲嘛！”他无计可施，只得站起身来。

他既没有放下手里还燃着的烟斗，也没有改变以往那种慢条斯理、平缓单调、缺乏抑扬顿挫的语气。即令不叼着烟斗，平日间说话他的吐字也总是含混不清，因为他的嘴唇几乎是不动的。

他不曾打算说得这样多，可一说却把本该藏在心底里的情感全都抖落出来了。他用烟斗指着刚才致词的小伙子说：

“我像他这样年轻的时候，常常以具有新闻记者必备的品质自诩：只报道事实。今天，进入了暮年（你们不会不知道，我正在无可奈何地走通往六十岁的最后一英里路），才开始怀疑……”他停下来，抽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难道不是一种类似冰山一样的玩意儿吗？我是说，它的可见部分只不过是整体的十分之一，因为其不可见部分隐藏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民族的和个人的自私与贪心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且不说那些比汪洋大海还深得多的人类的奥妙的本能和其他原因了。”

他叼起了烟斗，一边抽一边说，口齿更加含混不清。

“本世纪的科学家在分裂原子的同时，也分裂了语义学和伦理学。今天，谁能对我们常常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的诸如自由、和平、权利和正义等词汇的含意作出正确无误的解释呢？至于‘真理’这个诱人的字眼……它是个什么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类的真理？就我所知，数不胜数……有白宫的真理，克里姆林宫的真理，梵蒂冈的真理，华尔街的真理，百老汇大街的真理，美国钢铁公司的真理，劳联^①的真理。确实如此。还不该忘记麦迪逊大街^②的真理

① 即美国劳工联合会。（译者注，下同）

② 美国广告业中心。

——也许它比任何真理更神奇。”

他咳嗽了一阵，吐了口痰，随后恢复了常态，接着说：

“刚才，年轻的演说家称我为象征……是象征什么呢？或许象征着一代记者正在消亡。我是属于记者们习惯于按照发生的事实撰写报道的时代。你们这些现代记者则总想与我主上帝较量，不仅在今天就发出明天的消息，而且自认为有权在没有新闻的情况下制造新闻，然后加以报道！”

他停了一会儿，死死盯着桌布，仿佛演讲稿就写在桌布上。

“至于说我是一座纪念碑，嗯，或许这位可爱的同事想说，我已经是我本人的一尊蜡像，随时有可能被收进市立新闻博物馆某个积满尘土的角落。”

听众们七嘴八舌地喊：“不同意！”“你怎么啦，伙计？”“不同意！”。威廉·比尔·戈德金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无论如何，请不要以为这是我不喜欢你们的表示……这顿午饭，还有演说者的贺词，漂亮的礼品……好，我就说到这里吧，免得再说出更多的蠢话来。谢谢，小伙子们！”

他在掌声中坐下了，心里对自己颇为不满。站起身来的时候他本想根据这种场合简短地说几句皆大欢喜的话，不想竟讲得这么严肃认真，更糟糕的是作了一场自怜自叹的可笑表演。他没好气地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因为用力过大，险些把烟灰缸敲破。

他回到联合通讯社的办公室里，坐到办公桌前，漫无目的地翻弄着桌子上的文件，目光茫然。随后抬头望了望对面

墙上的挂历。四月六日，星期一。只有一件正经事可干——就这样决定了。他喊了一声，女秘书凯瑟林小姐应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速记本，一支黄色的铅笔别在耳朵上边染过的头发上。这个娇小的女人的年龄难以判定，她长着两只灰色的眼睛，样子机敏、利落。

“有什么重要消息吗？”

“没有，戈德金先生。”

“很好。告诉小伙子们，我走了，今天不回来了。”

“好的，戈德金先生。”

好一个凯瑟林小姐！准确得像块怀表，效率不亚于一台机器。工作时间内，从不会有任何带有个人色彩的话语或举动。

“我刚刚有个伟大的发现……”老记者一边穿外衣，拿帽子，一边咕咕哝哝地说。

“是吗，戈德金先生？”

“华盛顿最重要的既非白宫，也不是国务院、财政部、联邦调查局和史密森氏学会。”

女秘书垂手站立，脸上毫无表情。比尔走到门口，才说清自己的想法：

“是波托马克公园里四月头一个星期的樱花树！要是报纸没有撒谎，今天这些树该是繁花满枝了。”

点燃烟斗的时候，他偷偷望了女秘书一眼，指望从她脸上发现一丝笑容或者别的什么带有人情味的表情。可是，凯瑟林小姐仍然垂手站立，一本正经，保持着机器的金属般的冷漠，不肯开半句玩笑。是啊，电传打字机难道会因为收到或发出的消息而欢快或气愤地颤抖吗？

“明天见，凯瑟林小姐。”

“明天见，戈德金先生。”

街上，比尔·戈德金感到温凉参半的春风带着远方万木秀发的清新空气迎面扑来。他决定到滨湖盆地走走。他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朝南拐，进了第十六大街^①，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朋友、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勃罗·奥尔特加。有一天，也是这样天空清澈明亮、阳光灿烂，小伙子曾举目远望，大声感叹：“我敢打赌，今天上帝打发天使染蓝了天空，因为只有他才了解这纯正蓝色的奥秘。”奇怪的是——比尔想——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越发感到揪心的孤独。他没有子女，两年以前，妻子患白血病去世……现在，死者在他心里有如一帧日渐褪色的水彩画。但他从不抱怨，永远不肯失去生的兴趣与希望。“上帝无所不知。”这是她的口头禅，“懂得创世主象征性语言的人才称得上真正老练。”

他一面思念亡妻，一面走近了拉菲耶特广场。从广场这边望去，白宫历历在目。在他看来，白宫是华盛顿最漂亮的建筑，庄严而又优美，线条简朴，色调和谐。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②总统或许正坐在其中的一间大厅里大伤脑筋；古巴革命何去何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③身罹肠癌，住院治

① 华盛顿的国会山像是车轮的车轴，辐条状的大道从这个中心射出，每条以一个州名命名。东西向横贯22条街，以英文字母排列命名。南北纵贯22条街，以阿拉伯数字排列命名。

②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1953—1960）。

③ 杜勒斯（1888—1959）：美国国务卿（1953—1959）。

疗，生命危在旦夕——这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比尔准备横穿H街，露丝的幽灵连同她的声音一同浮现在脑海：“亲爱的，横穿马路以前，必须先看看两边来往的车辆，记住了吗？”他听从了亡妻的劝告，但仅仅机械地听从了，因为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是否能安全地穿过去。像往常一样，他步履缓慢，但看到右边很近的地方驰来一辆黑色凯迪拉克牌轿车，他不得不加快脚步。万幸，总算来到了马路这边的人行道上！（就是一辆这样的汽车把露丝的遗体拉到墓地的……）。广场中心矗立着杰克逊^①骑在马上雕像，马的前蹄腾空，骑士抬起右臂，手里举着两角帽……据行家们说，马持这种姿态，重力全部落到两条后腿上，是个颇费心思的力学问题，但艺术家出色地解决了（比尔的巴西朋友奥尔兰多·贡萨加有一次对他说：“你们美国人把艺术与工艺融为一体。”）。

戈德金对首都的雕塑毫无兴趣，它们大都显得平庸，既无雄伟的气势又缺乏美感。华盛顿最令人赞叹的纪念碑是树木与公园——他走到杰克逊纪念馆旁边人行道上一棵榆树的树荫下面。这些树木高耸挺拔，酷似威风凛凛的林肯^②。

比尔停住脚步，望了望在一株玉兰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一群欧椋鸟。这种黄嘴鸟翅膀黝黑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彩。露丝生前常说，树木、花卉、飞鸟、儿童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统统都是上帝反复向人类传达的信息当中的单个词句，是这个残忍、肮脏而又荒谬的世界的一线希望。肮脏而又荒谬……戈德金还记得，几年以前（五年？六年？也许是

① 杰克逊：1767—1845年任美国总统。

② 林肯：1861—1865年任美国总统。

七年以前)八月的一天凌晨,潮湿闷热,他在联合通讯社办公室里憋得喘不过气来,熬过了夜班之后来到广场散心,就在这棵树下站了一会儿。玉兰花甜滋滋的香味在停滞的空气中淤散,仿佛是个使人心旷神怡的活生生的精灵。比尔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夜里在这儿发生的一桩怪事。一个同性恋者走过来和他搭讪,直言不讳地建议去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只是飞快地瞥了陌生人一眼,既不回答对方的邀请又没有生气,仅仅为眼前那个可怜虫感到难堪和怜悯。但是,对方死皮赖脸地跟着他,一再唠唠叨叨地重复着刚才的建议,气喘吁吁,声音低沉,显得既痛苦又粗俗可笑,最后竟然伸手抓住比尔的胳膊。比尔猛地挣脱出来,把那家伙推了个趔趄,还威胁说要狠狠揍他一顿。同性恋者后退了两步,站住脚,大声说:“这种时候你到这儿来蹓跶,肯定有什么欲望,只不过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比尔·戈德金弄不明白,华盛顿的同性恋者出于什么理由——如果这类勾当还有理由可言的话——选择离总统官邸近在咫尺的这个广场进行幽会。

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已经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街。等白宫大门口前边的信号灯变成绿色,他才穿过街道,沿着古旧骨头色的巨大建筑物继续朝前走。从前,这座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曾是国务院的办公处。他又想起了杜勒斯。这位国务卿勇敢、正直,可惜被加尔文教派的世界观蒙住了眼睛。一个清教徒式的国务活动家怎能理解得了拉丁美洲呢?现在,古巴还将发生什么事件?为惩罚巴蒂斯塔^①及

^① 巴蒂斯塔:1952—1959任古巴总统,独裁者。

其同党们的残暴罪行处决仍在继续。革命政府“临时”夺取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分支——古巴电话电报公司的控制权。对其他美国企业的国有化——戈德金想——迟早会接踵而来。在这些事件面前美国政府将如何行动？比尔知道，也许这个或者那个议员要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援引人权抗议哈瓦那的一系列处决。但是，只有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没收美国公民在古巴的财产时国家的栋梁们才会真正大动肝火。比尔·戈德金停下来，在鞋底上磕磕已经熄灭了的烟斗，重新装上烟丝，划着火柴。他记得，马基亚维尔曾经劝亲王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差人杀死臣民，但不要触动他们的产业，因为人们忘记父亲被害比忘记失去财富来得更容易……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人怎能产生这等卑鄙的念头呢？戈德金斜穿过埃利普斯广场，朝华盛顿纪念碑走去的时候这样地扪心自问。空气中飘游着一种空幻的、熠熠闪光的节日气氛。数以百计的人（或者数以千计？）在草坪和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混杂一起色彩纷呈，愧若勃鲁盖尔^①的《农民婚礼》那幅现代仿制品出现在比尔眼前。他和露丝在维也纳一座博物馆欣赏过这幅名画。（可怜的露丝！虽然知道仅仅能再活一年，却还像个孩子似地高高兴兴享受了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欧洲旅行！）所有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去波托马克河边赏樱花的。猎犬汽车公司的蓝色和黑色条纹相间的大轿车上插着小旗，坐满乘客，在宪法大街疾驰。车水马龙。总统官邸南大街的人行道上，很多人

① 勃鲁盖尔（1525—1569）：尼德兰画家。

在照相，或者透过铁栏杆朝白宫的花园和南大门张望。

嫩草的气味漾进比尔的鼻孔，童年时期的景象浮现在脑海：堪萨斯州四月的草原。他叼着烟斗哼起常常使人联想到休息和假日的小曲来。三只松鼠跳过来，两只灰色的，一只黑的，比尔从口袋里掏出面包屑扔给它们。在新闻俱乐部的午宴上，他曾特意把几片面包塞进口袋，准备留给这些小“客人”的。

纪念碑矗立在小山丘上，四周一面面国旗迎风招展。他望了望碑身，奥尔兰多·贡萨加的声音又在头脑里响起来：

“纪念碑？这个联邦选区当然需要一个雄伟的石头阴茎，以弥补其被阉割的缺欠。”比尔对朋友的想法付之一笑，问道：“为什么说阉割了呢？”对方马上回答说：“当然。首先，在这个藏污纳垢而又无能的首都，麋集着公职人员和外交官（其中一些人性别难定）以及老态龙钟的退休者。其次是那些亲爱的朋友，他们夹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这块飞地甚至连选举权都没有。”

比尔慢悠悠地朝纪念碑的山岗爬去，心里却在和巴西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进行着一场对话：“请你仔细想想，贡萨加。每年四月，这些日本树木开花的时候，总是吸引本市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赏。怎能说我们美国人是仅仅关心美元的实利主义者呢？”

爬到半山腰，比尔·戈德金望见了浪湖盆地四周的樱花林。他停住脚步，气喘吁吁，不知道是因为爬山坡太吃力，还是仅仅因为眼前的景致使他震惊。多么美丽的画面啊，娇柔得教人们不忍心用言辞描述，仿佛把它画下来或者拍摄下来的意图本身就可能破坏它的魅力……他觉得，应当小心翼翼

翼，蹑手蹑脚，屏住呼吸，才能靠近繁花满枝的樱树。

他又想起了亡妻，悲伤模糊了视线。可怜的露丝！你说得对，上帝是位诗人，是最伟大的诗人。可叹的是，世人都感觉迟钝，目不识丁，看不懂造物主写下的诗章。“感觉迟钝，目不识丁，”比尔一面朝樱树林走去，一边嘟嘟囔囔地说，“人人都一样！包括我在内。尤其是我！”

2

几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康涅狄格大街一座小酒馆，事先约好和几位外交官朋友在这里见面。奥尔兰多·贡萨加已经到了，仍然坐在往常那张桌子上，背向里边的墙壁。这位巴西人常说，他像他的外祖父一样——外祖父是米纳斯热赖斯州一位炙手可热的政治领袖，拥有大片土地，同时也树立了无数仇人——此人从来不肯靠门窗站立，他认为有坚固的墙壁保护脊背才感到安全。

“比尔 我的老朋友！”贡萨加握着记者的手大声欢呼，“你迟到了，让我等了几乎半个小时。就是大名鼎鼎的戈德特也不会如此姗姗来迟！”

比尔既不是剧院的常客，也不是文学爱好者，没有听懂对方的讽喻，又无心打听，于是就随便坐下来，告诉朋友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樱花！”巴西外交官皱皱鼻子，高声说，“华盛顿人竟然都高谈阔论起植物学来了！”

“请不要自视清高！我不相信你超凡脱俗，不喜欢那迷

人的景色。”

贡萨加笑了：

“喝点什么？”

“来一杯凯伯利香槟。”

“低声点！否则有人要到国会告发你进行反美活动了。再也不喝美国烈性威士忌了？”

“一杯凯伯利香槟。”记者点上烟斗，松了松胆汁绿色的领带。他的同事们总是说，这条领带的颜色太难看。

贡萨加喝完了第二杯马丁尼鸡尾酒，叫来侍者，告诉他比尔要喝什么。

“如果我神志清醒的话，”戈德金低声说，“真的要喝杯毒芹碱了。”

“为什么，我的苏格拉底^①？”

“今天，我得出结论，任何人都应当承认自己的衰老。刚才我把一年一度怒放的樱花与本人血管的不可抗拒的渐渐硬化比较了一番。”

“胡扯。我才不相信你这番话呢。你是个‘结实的公民’。”

“今天我感到自己已是老朽了……”。比尔说，“真的老朽了。”

侍者把凯伯利香槟放到他面前。戈德金举起酒杯：

“像你们巴西人所说的，为我们的优秀品质干杯！”

“……优秀品质还不少呢！”巴西人也举起酒杯，补充了一句。

① 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戈德金发现，朋友的两眼死死盯着酒馆另一端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或许是个女人——目光中充满淫秽的情欲，仿佛在空中划出一道黏糊的痕迹。

他没有扭头朝那边看一看，而是以记者的眼光审视着朋友。奥尔兰多·贡萨加的脸胖得近乎臃肿，双眼皮，褐色的眼珠有点暴突，与头发同样黑的唇髭修剪得整整齐齐，像给线条工整的嘴唇戴上了一顶皇冠。他声音低沉、柔美而富于感染力，像是在半明不暗的卧室里说话。这位巴西外交官中等身材，在戈德金看来，有一种柔道运动员的气质。他衣着讲究（灰和蓝是他喜欢的色调），连衬衣也是订做的，尤其爱穿意大利皮鞋和英国西服，打意大利领带。在这位穿戴高雅、注重发式的朋友面前，比尔·戈德金更感到自己的疏懒和不修边幅。不久以前在同事们举办的一次开玩笑竞赛中，他的名字列在华盛顿最邋遢的十个新闻记者当中。头天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第二天就像是半旧了；裤线没有了，上衣也皱皱巴巴，口袋里鼓鼓囊囊得像个孕妇，里面装着纸张文件，面包屑、邮票、铜钱镍币、铅笔头、书籍，甚至有时还装着整张的报纸。

“我们的巴勃罗在哪儿？”比尔问。

贡萨加两眼不离开他的“美景”，回答说：

“刚才打来电话，说是不能来了。大使明天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国书，他正围着大使忙呢。”

“可怜的小伙子！我可不愿意落到他这般地步！”

“我也一样。这些大使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总统的心腹，真让人伤脑筋……比尔，不谈这些了，你偷偷看一看里边那个姑娘……我盯了她几个小时了，就是没办法让小姐儿

看看我。”

戈德金微微一笑，几秒钟以后回头一看，发现那边有个迷人的姑娘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向墙壁，正在独自抽烟、喝酒。

“怎么样？”

“漂亮，像星期日晚邮报连载小说上的彩色插图一样鲜艳而又显得不真实。”

“正确！完全正确！你给这个国家的漂亮女人下了个绝妙的定义。其鲜艳世所罕见……因为每天洗澡又爱施除臭剂而没有气味……就像美国饭一样，味同嚼蜡……”

“味同嚼蜡？”

“听我说，比尔。请翻翻时下的杂志，上面的菜肴印得精雅绝伦……色彩多么鲜艳！多么漂亮！多么栩栩如生！真让我们垂涎欲滴。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印着彩色广告的那几页吞下去，因为菜肴本身与印着它的广告的诗吃起来滋味完全相同。”

“我不相信在床上搂着美国女人和抱着她的彩色照片是一回事……”

“差不多。”

“言过其实！”

黄萨加眉头一皱：

“比尔，你不用回头看，让我来给你描绘一番这位美女在干什么。刚刚来了一个身高两米的家伙，金黄色的头发，呆头呆脑，像个足球后卫，或许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他躬下身，吻了吻姑娘的脸，混帐！姑娘笑了，他坐在了姑娘旁边。两个人在交谈。是一对夫妇吗？从接吻的样子看来

像是夫妇……假设是一对吧。大概每月性交一次，因为那男子，一家兴隆发达的公司的资历尚浅的行政管理人员，更注意其社会地位和商业盈亏，对履行丈夫的义务漫不经心。”

戈德金抽着烟斗，面带微笑地听着。贡萨加把头伏在桌面上，仿佛要披露一桩国家机密：

“你们美国人占领了西部以后，又开始寻找新的疆土，跋山涉水，不断在地面和空中创造新速度的纪录，从事最危险、最令人目眩心惊的运动，目的是向自己和整个世界表明，你们不愧为能干而生气勃勃的开拓者。然而，你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国家内部最重要的疆土还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我指的是美国女人，比尔！我劝你们暂时丢下电子玩具，丢下垒球棒，无所畏惧地投入伟大的开拓吧！”

“你们拉丁语系的人无所不知，对吧？”

“听我说，亲爱的朋友，至少我们懂得大胆地使用自己的肉体……等一等！足球后卫在向侍者付钱……女神站起来了。嚯！她的臀部太美了。”

像他认识的其他巴西人一样——戈德金想——贡萨加似乎对女人肉体的这一部分特别着迷。

“再来一杯凯伯利香槟？”

“不要了。中午喝了葡萄酒。我很少喝酒。”

“啊！庆祝宴会开得怎么样！”

“嗯……一般。开玩笑，胡诌瞎扯地发表了一通演说……”

比尔环视酒馆。烛光幽暗，使人仿佛置身于晚霞之中，倍感亲切。空气中梔子花的芳香（莫非来自邻桌那个胖胖的

金发女郎？）夹和着威士忌的气味。一个看不见的音箱正播放一首慢四步爵士舞曲，甜美而又凄凉，瓮声瓮气，像是患了鼻疽症。

“戈德金先生，你算得上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三十五年！比我在这个愁泉泪谷的世界上生活的时间还多一年呢。”

“你以为我今天感到心满意足吗？刚才，我坐在浪潮盆地边一把椅子上对我的一生作了个总结。·我很快就六十岁了，既不腰缠万贯，又不闻名遐迩。按照美国的标准，应当承认是个一事无成的人。”

“让那些标准见鬼去吧，比尔。建立绝对标准的美国人是些什么东西？超人吗？上帝吗？”

“不知道、但是，即便如此……”

贡萨加靠在皮椅背上，茫然地望着眼前的第三杯马丁尼鸡尾酒，这是他打了个手势让侍者端来的。

“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是怎样落入联合通讯社的魔爪的。”

“真想了解吗？”

“当然想知道，伙计！”

比尔将信将疑地望了望巴西外交官，怀疑对方确实有兴趣。他知道，贡萨加像大多数拉丁语系的人一样，是个顶糟糕的交谈者，喜欢高谈阔论而不善于侧耳细听。

“我在纽约商业金融学院写的屈指可数的论文当中，最著名的要算那篇题为《拉丁美洲独裁政权透视》的夸夸其谈的文章了。”

“为什么说是夸夸其谈呢？”

“是啊，当时我才是个不满二十四岁的愣头小伙子，从来不曾踏上过拉丁美洲的土地，粗懂一点西班牙文，对玻利瓦尔^①、萨巴塔^②、胡亚雷斯^③等人物怀着浪漫主义的崇拜……在国立图书馆生吞活剥地读了几十本关于西属拉丁美洲的书籍。你看，我的爱克斯透视机只不过是架二手货的望远镜……”

“普列斯科特不曾到过墨西哥，却写出了著名的《征服墨西哥》。”

比尔微微一笑，露出了两排发黄的牙齿：

“不知道联合通讯社的一位董事为什么读了我的那篇论文，觉得我有记者的天赋，请我到通讯社工作。我同意了，很快被派到中美洲一个小小的共和国采访，那里正值大选前夕，可能还会发生骚乱……在那个热带地狱熬过了一个月艰苦异常的时光。另一个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在旅馆和我住同一个房间，同样受到蚊虫叮咬，染上了疟疾。我运气不错，只是在冒险完毕以后患了阿米巴结肠炎，拖了五年的时间才治好……”

“革命爆发了吗？”

“没有，连选举也没有举行。这种事屡见不鲜。可是……”

他发现贡萨加不再注意听，就停住口。

“比尔，我的老伙计，刚刚进来一个黑白混血姑娘，搅

① 玻利瓦尔（1783—1830），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领袖，被称为“解放者”。

② 萨巴塔，又译查巴塔，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期南方农民运动领袖。

③ 胡亚雷斯（1806—1872），墨西哥民族英雄。

得人心神不宁。大概是拉丁语系的娘儿们。啊，我知道她是谁！萨尔瓦多大使的女儿。伙计，那双眼睛真漂亮！接着讲，比尔，接着讲……”

“这姑娘我认识，贡萨加。她是个有夫之妇，生活严肃，你死了这份心吧！”

“我知道。可是，看一看算得上什么罪孽？接着讲吧，比尔，不要嫉妒。我的眼睛可以瞧着那混血女人，可耳朵还在听你讲呢。”

“算了，不说了。”

“好吧，既然你坚持，我就看着你，尽管这满是紫色老人斑的脸不是我所喜欢看的。侍者！再来些橄榄！比尔，继续讲吧。”

“我最伟大的机遇在1925年年底出现了。在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的独裁统治持续了几乎二十五年的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年轻的中尉胡韦蒂诺·卡雷拉发动一营军队在普拉塔诺斯城的兵营起事，随后率领士兵退到卡拉维拉山，开始同联邦军展开殊死的游击战争。”

比尔·戈德金把熄灭了的烟斗放到烟灰缸上，呷了一口凯伯利香槟，接着说：

“有一天，我决定亲自采访卡雷拉中尉，地点在他的巢穴或者吸鹰窝里。通讯社社长觉得我的主意有点古怪。萨克拉门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人们都以为年轻的革命者的事业已经告吹。萨克拉门托人民禁若寒蝉。帮助革命队伍的农民正在被就地处决。况且，加勒比胡狼（独裁者的政敌们这样称呼他）得到萨克拉门托大主教埃米尼奥·奥马萨瓦尔的道义支持。”

“也许还得到联合种植公司的保护。”

“对，并且有加勒比糖业中心撑腰。总之，查莫罗政府似乎像安第斯山一样坚不可摧。然而，谁也无法打消我的念头，因为我同情起义者的事业，并且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平原的人来说，山岭总是充满魅力的。就这样，我开始和美国驻塞罗埃莫索大使馆交涉。虽说美国大使企图劝我放弃这个打算，但还是满心不情愿地运用种种手段让查莫罗政府同意了我的要求。长话短说吧，我终于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向萨克拉门托当局发誓不利用这一机会为革命者提供任何帮助，答应我采访的报道发表之前可交由独裁政权审查。”

现在，巴西人似乎真的对他讲的故事产生了兴趣。

“贡萨加，你没有到过萨克拉门托。卡拉维拉山位于横贯这个岛国东西的印第安山脉的东端。”比尔从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在餐纸上勾出一幅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草图，
“你看，这儿是索莱达德马尔镇，离山的支脉二十余公里，我就是从这里开始上山的……你无法估量，找一个当地人作向导带我去卡雷拉的藏身之地费了多少周折……”

“当然，人人都怀疑你。”

“也难怪。当局怕我给叛军带着什么情报，而农民则怀疑我是独裁政权派去刺杀卡雷拉的密探。最后，索莱达德马尔镇的教区长卡塔里诺神父救了我的驾，他可称得上人类的精华。据人们私下说，他因为‘安顿’革命者曾几次遭到大主教的申斥。就这样，神父秘密替我找了个可靠的牧民，此人答应把我带到卡雷拉的头一个哨兵那里。于是，我骑着一头驴，斜挎着照相机开始登山。”

“那个胡韦蒂诺·卡雷拉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外表看，酷似西蒙·玻利瓦尔。他自己心里明白，也利用了这一点。”

“上山的时候，你该冒着两边挨子弹的危险……”

“自由主义者的处境不是永远如此吗？腹背受敌……”

“下山以后，肯定遭到了查莫罗的心腹们的审问……”

“是啊，不光审问，而且搜身，噢……我特地胡乱杜撰了一篇报道给萨克拉门托当局看，把革命者们描写成一群冒险家的乌合之众，武器低劣，弹药缺乏，士气低落，濒于彻底完蛋，而把为游击队员拍的一卷照片隐藏起来，并且用脑子记下了同卡雷拉的谈话。回到华盛顿以后，我发表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文章，每一篇都为革命者张目，抨击查莫罗独裁政权。”

“这些文章在全世界传播以后，自然会对造反者们的事业有所帮助。”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

“应该授予你1925年度普利策新闻奖^①。”贡萨加一面嚼着橄榄，一面从朋友的肩膀上边向黑白混血女人投去淫荡的目光。

戈德金摇摇头，拿起烟斗，装上烟丝。

“哪能呢！那些文章客观地描述了事实，这我不否认，但缺乏批评家们称之为‘文采’的东西。我了解自己的不足，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有才华的作家。通讯社的头头们认为我是个‘称职的记者’。同事们常说我有一双蟾蜍的分光眼……对于记者来说，这不失为一个长处。我知道自己具有像照

^① 普利策奖：美国在文学、音乐、新闻界颁发的一种奖，每年一次。

相机似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用烟斗敲了敲前额，“可是，这架相机只能拍黑白片。请相信，贡萨加，我是个充满幻觉、善于想象的可怜虫。”

“可是……后来呢？文章发表以后怎么样？”

我在联合通讯社的景况青云直上。1926年，卡雷拉推翻了独裁者，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正式邀请我出席他的就职庆典，并且按‘在上边’答应过的那样，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

“那么，头头们该对你另眼相看，尊敬有加了。”

“比这更加糟糕。从那时候起，他们称我‘拉美问题专家’。1928年，任命我为巡回记者，活动基地先是在墨西哥城，后来迁到了里约热内卢。瓦加斯^①在1930年10月率领革命军从南方直逼首都，最后夺取政权以后，我是最先采访他的头几个外国记者之一。”

“那时候（让我算一算……），那一年我刚进幼儿园……”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将军^②被谋杀前几个星期我采访了他。大概我是他会见的最后一个记者。”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官方报刊把桑地诺说成土匪。但是，这位采矿工程师和农业专家是位爱国分子，自由主义者。他拿起武器反对独裁政权，战斗了整整六年，不仅要对付政府军，而且要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从来没有被俘过。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

① 瓦加斯（1883—1954）：在1930—1945两度任巴西总统。

② 桑地诺（1893—1934）：尼加拉瓜反美游击战争的领袖，1933年迫使美军撤离尼加拉瓜，后被反革命分子谋杀。

尼加拉瓜以后，他同意放下武器，和平地从事一项农业合作社计划……有一天，他去会见蒙卡达总统，从总统府出来的时候，一个卫兵残酷地杀害了他……”

“我们美洲的历史上是有些肮脏的篇章的。对吧，比尔？”

“说起肮脏的篇章，我倒想起来了。1935年初，联合通讯社派我到查科波雷阿尔采访一场历史上最愚昧的战争。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巴拉圭人和玻利维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和混血儿——一年复一年地互相残杀，说是‘为了祖国’……”

“实际上是为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利益。”

“完全正确。联合通讯社的编辑们往往把我发的电讯中提到这家美国公司的词句统统删掉。我跟随巴拉圭军队行动，有机会看到他们从玻利维亚人手里缴获的武器：全是美国制造的，并且有一切迹象表明，是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

比尔略微停了一会儿，默默地抽烟，喝酒，接着又笑起来。这笑听不见，却看得出，因为两肩颤动，脸上肌肉收缩，煞是可笑，

“有一次，”他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挨了一顿揍，险些丢了性命，令人难忘……”

“你从来不曾对我讲过！”

“1943年，联合通讯社派我到阿根廷采写一系列关于当地政局的文章。卡斯蒂略总统已经被军官联合集团发动的政变推翻。你大概还记得，这个集团的灵魂是胡安·庇隆上校。在头一篇文章中，我揭露了这伙人同纳粹间谍的联系。在第二

篇中，我指出我国国务院不应当承认佩德罗·拉米雷斯的革命政府，因为此人有希特勒主义倾向，必将破坏本半球的防御计划。当地报纸“民族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民族主义报纸自然对我恨之入骨，破口大骂，并要求政府立即把我驱逐出境……”

戈德金停住嘴，用钢笔在餐纸上一个接一个地划着同心圆。

“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他接着说，“我正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馆，突然有三个陌生人走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拖到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啊，贡萨加，为什么会羞于呼救呢？我本来可以大声喊叫。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双唇紧闭，准备遭到最坏的结果。”

巴西人笑了：

“肯定是你认为罪有应得。”

“不知道。头一拳便打断了我的鼻骨……你看，使我成了这副退休拳击家的模样。我起而反击，一拳打在对方的下巴上。这时，另一条汉子过来掐住我的脖子，第三个拧住我的胳膊，于是头一个就随心所欲地打了……从体型和拳打的力气，我觉得此人必定是个运动员。一拳打在胸口，我立刻喘不过气来。一脚踢在我身体那个更敏感的部位，我疼得昏迷过去。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躺了多长时间），他们又踩我的脸、胸部和肾部……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美国大使坐在旁边。几颗牙齿打掉了，几根肋骨打断了，遍体鳞伤，眼睛周围血肿……总之，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疼，一连几天靠镇静剂维持。”

“警察呢，没有采取措施吗？”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假惺惺地调查了一番，最后说我遭到抢劫，凶手不明。其实明显得很，是民族主义分子干的。出院以后，拉米雷斯政府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我离境。”

“太荣幸了，比尔！”

“回到华盛顿，联合通讯社给了我一笔奖金，并且让我到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免费度假。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妻子，1944年我们结了婚……”他停了一下，然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楚神情补充了一句：“两年以前，我失去了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干什么了？”

戈德金本想告诉他，除了记者工作以外，还为联邦调查局干了点差事，但话到嘴边，觉得还是保守秘密为好。

“嗯……”他吐出一口烟，烟环缭绕，“东跑西颠……1945年巴西将军们推翻热杜里奥·瓦加斯的时候，我正在里约热内卢。1948年在波哥大的冒险说起来话长，就不讲了……作为这部斗篷匕首式的小说的结尾，1952年通讯社的头头把我召去，通知我被提升（请注意，是‘提升’！）把我拴在华盛顿的一张办公桌上，职务倒是很显赫：拉丁美洲部主任！你明白，这就结束了我的记者生涯……”

贡萨加怜爱地望了朋友一眼：

“可是……再谈谈胡韦蒂诺·卡雷拉。这位卡拉维拉山上的英雄后来也一塌糊涂呀！”

比尔耸耸肩膀：

“沿袭了拉丁美洲可悲的普遍规律。推翻了独夫民贼，自己也成了独夫民贼。你知道他进入政府大厦以后干的头一件事是什么吗？签署了一项法令，学着特鲁希略的样子把自

已提升为大元帅！后来，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干亲家和盟友。像多米尼加独裁者一样，他也想得到个什么称号，当然不乏趋炎附势的文人尊他为‘解放者’。这个名字很快便传开了。”

“再来一杯凯伯利香槟？”

“不喝了，谢谢。”

“毒芹碱呢？”

“毒芹碱也不喝。现在我觉得好多了。看来，回忆回忆这些往事对身体有好处……”

“参加卡雷拉的就职典礼之后，你自然又见过他几次……”

“很多次。萨克拉门托一有风吹草动，联合新闻社就派我去塞罗埃莫索。”

“你大概认识大元帅刚刚派来的这位新任大使吧？”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当然认识！我头一次见到他是在卡拉维拉山上，他就站在胡韦蒂诺·卡雷拉身边，是他最勇敢、最年轻的伙伴。那时最多有二十一岁……”

“他属于哪类人？”

“你问外表？身高一米九十左右……紫红面皮，线条类似玛雅人的雕像。两个黑眼珠炯炯有神，闪烁着一种令人心醉神迷而又危险的光芒。我在山上认识的卡雷拉身边所有的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了。他的姓是后加上的，不过听起来挺顺耳……”

奥尔兰多·贡萨加从身边的凳子上拿起报纸，在桌子上摊开：

“《新闻报》今天刊登了一条关于你那位‘玛雅雕像’的消息，并附有照片。你看这一栏……这傢伙长得还真有点魅力。照片下面的简历说他出生于1903年……那么今年应当五十六岁了。这照片大概是以以前拍的，看起来最多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比尔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在鼻子上放好，俯在报纸上：

“不！是最近拍的。从脸上看不出这些印第安人的真实年龄。”

“报纸上还讲了个威武雄壮的故事，依我看是我们那位妙不可言的朋友蒂蒂托·比拉巴心血来潮编造出来的，为的是给新大使扬名……大概早已经对新大使垂涎欲滴了。”

比尔·戈德金微微一笑：

“是指的手榴弹事件吧？我向你担保，贡萨加，确有其事。还是我在1925年写的报道里头一个传播出去的呢，而我是从胡韦蒂诺·卡雷拉本人嘴里听来的。事情发生在战争初期。有一天，革命军为了逃出敌人的埋伏，不得不藏进山洞。联邦军士兵把一枚手榴弹扔进了他们的隐身之地，而且正好落在卡雷拉脚下。我们这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犹豫了一秒钟，马上抓起手榴弹朝洞口飞奔，朝敌人方向扔过去。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一个弹片伤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前额。从这张照片上还可以清楚地看见电火花形的疤痕。”

“好一头猛兽！”

“这就是卡雷拉稳坐政府大厦之后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百般照顾的原因。他们成了密友、干亲家……同伙。不论当政还是理财，我们这位英雄都干得呱呱叫，现在又来充当他的国家驻白宫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了。”

“妙极了！巴勃罗告诉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连中学都没有上完。”

“可是，‘解放者’相信他的干亲家与美国政府交涉微妙问题的才能并能赢得他们的好感。你大概还记得，尼克松副总统去年曾访问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在塞罗埃莫索大街上遭到市民和学生的一片嘘声。他们朝他乘坐的官方汽车扔石块、西红柿和臭鸡蛋。嗯，一个臭鸡蛋正好打中了尼克松先生，在他的胸前开了花……”

贡萨加咯咯笑了几声：

“现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要设法用自己的个人魅力之水来洗刷尼克松先生和美国国旗上臭鸡蛋的污渍了……”

“是啊。可以预料，他还负有说服山姆大叔、再争取一大笔贷款的使命……”

贡萨加又看了看报纸上的照片：

“不可否认，这家伙样子挺和气。”

“也许是个不错的大使。”

“他是纯印第安人吗？”

“从母亲方面说，毫无疑问……”

“从父亲方面呢？”

记者耸耸肩膀：

“只有上帝知道。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母亲从来不曾有过丈夫，是个妓女。”

3

为什么山上这样热呢？肯定是离太阳太近的缘故。可是，为什么一切都如此安静，如此空旷？啊，战争已经结束……他心花怒放，要去拜见西班牙国王。和神父打了赌，说一定能上到卡拉维拉山顶。眼前混混沌沌，只好摸索着往上爬。太阳在哪里？也许是夜间。对，是夜间。觐见国王，不能迟到。路上把手表丢了。天太黑，躲不开山坡上横七竖八的死尸。光着脚，踩在从尸体里流出的内脏上，粘乎乎的。不明白……已经下达命令，让士兵们掩埋敌我双方的死尸，可是阵亡者的躯体仍然在这里腐烂，臭气熏天。赌是赢了，可身上带着这股气味怎能见国王呢？突然感到浑身一丝不挂，人血和粪便顺着两条腿往下流。伙伴们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独独丢下了他？他摸摸腰间：既没有腰带，也没有手枪，连枪套也不见了。手无寸铁地来到山上。方向对吗？指北针摔碎了。但是，还在继续往上爬，用脚根“看”路，踩着头骨、肌骨、内脏和睾丸……身上肮脏得一塌糊涂，应该洗个澡，不能以这副模样出现在伟人跟前。要见的

是哪任国王？菲力蒲？费尔南多？卡洛斯？反正是教区长讲的历史书上那许许多多君主之一。必须尽快洗个澡，找到一条河……越来越热。就要见到君主了，多么荣幸！可还赤条条的。不明白……记得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看到他，国王会怎么想？“国王陛下，我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大使，前来向陛下献上我的睾丸。”宫廷的人会嘲笑他，交头接耳地说印第安人走路不穿鞋。真丢人！突然，他预感到有什么危险，原来是遭到了伏击。现在明白了！敌人要向他猛扑过来，砍他的脊背……他大吼一声，飞快地转身抵挡……

首先清醒过来的是游击队员。他半直起身子，瞪大眼睛，昏头胀脑地朝忽明忽暗的鬼火张望，同时两只手机械地在地面摸索，寻找总是放在身边的武器。然而，几秒钟以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辨明了所处的空间和时间：革命者的幽灵返回了梦境的疆土，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派驻白宫的大使开始为自己的惊恐感到开心，咯咯地笑出了声。梦境消散，头脑中只剩下一点感到经历了危险的朦胧阴影和回到青年时代、重新在空旷的山坡上游荡的模糊记忆。

他从床上跳下来，顺手打开最近的一盏灯，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表：凌晨五点整。“5”这个数目字屡屡在他一生中出现。出生在一月五日凌晨五点。1915年一天的凌晨五点，驻扎在索莱达德马尔的第五步兵团的一排士兵处决了他所敬仰的革命首领胡安·巴尔萨，据说有五颗子弹射进了英雄的胸膛。

卧室里又闷又热，他烦躁不安。只穿着睡裤，大粒的汗珠顺着赤裸的上身往下流。在那些温度高得出奇的屋子里，

美国人怎么忍受得了呢？

他开始在卧室里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顺手打开遇到的电灯开关，最后走到定温器旁边，眯起眼睛仔细看，却没有看清定在多少度上。没有关系，反正还没有学会摆弄这鬼机器……

自从四五天前头一次在这里睡觉开始，他就讨厌这卧室的布置。他的二等秘书埃内斯托·比拉巴解释说，大使先生房间的所有家俱都是纯正的帝国时代样式。“我敢担保，阁下，这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床的复制品。像得可以乱真。”

“可是，蒂蒂托，你该明白，拿破仑是个侏儒，而我身高一米九十？”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仇视地望着这张床，觉得它难看、豪华而别扭，不适于干某类活动……这一点就在今天晚上、几个小时以前已经得到证实。毫无疑问，罗萨莉娅一丝不挂地躺在这拿破仑式的床上显得非常漂亮，可是两个人最后还是滚到白熊皮地毯上才干那种事。唯一的办法是搬到贵宾房间去住……

他走进洗澡间，撒了泡尿，打开水龙头，用手捧着喝了几口水——在山上的时候，到了小溪旁或瀑布下这样喝过不知道多少次。返回卧室，把朝大街的窗子打开，他立刻被漾进屋子里的冷空气包围了。透过浓重的黑暗，隐约看见大使馆花园里的树木。在雾气当中，电灯像是一只肿胀的眼睛。他伸开手掌，一面摸着胸脯，一面望着夜色。一辆出租汽车孤零零地沿着马萨诸塞大街开来，在英国大使馆前驰过。英国大使馆是座灰砖建筑，像大英帝国本身一样牢固、严峻。此时此刻，在使馆里边——加夫列尔想象着——英国大使，一位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先生，正毕恭毕敬地睡在他那位

不知道叫什么“夫人”的结发妻子身边。在华盛顿，有多少大使和他——卡夫列尔·埃略多罗——一样，有个长得漂亮迷人、胸脯高耸、臀部丰满、年方二十五岁的情妇呢？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一个女人怎么竟然嫁给了让人恶心的油乎乎的矮胖子潘乔·比万科……

他猛然打了个冷战。从某个像梦境一样遥远而又虚幻的地区飞来一个声音：“把窗户关上，小埃略多罗！不然会得肺炎的！”有一段时间，他母亲的眼睛也脓肿不消。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埋在了哪里？或者被凶禽啄食了？他多次离开索莱达德马尔镇，在其中一次母亲死去了。坟墓始终没有找到（他也没有认真寻找）。有人说，尸体扔到了乱葬坑里，也有人说在田野上暴尸数日，被秃鹫剥吃了……加夫列尔关上窗户，把母亲的幽灵挡在了外面。

他又踱了几步。现在觉得有点冷了，于是来到写字台旁边，叉起双臂暖着胸脯，两眼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脚指头。耳边又响起蒂蒂托那奸诈的声音：“阁下，这张写字台是上世纪初法国镶嵌画的杰作。”卡夫列尔·埃略多罗笑了。一般来说，半男半女的家伙们精通艺术之道。

他看见了在罗萨莉娅离开大使馆以后开始写的信仍然摊在写字台上，旁边放着眼镜。他拿起信闻了闻，看情妇的脂粉香味是否通过他的手传到了信纸上，接着又戴上眼镜，爱怜地看了看自己的字体，重又把信读了一遍：

“我亲爱的弗朗西斯基塔^①：大使馆里一切顺利。这巨

^① 弗朗西斯卡的爱称。

大的建筑物里豪华、舒适，佣人简直有一个营之多，每个人都对我毕恭毕敬。下星期五我要举行盛大的招待会，邀请各国使团以及本国和外国新闻界代表参加。可惜你不在这里，不能作为女主人迎接宾客。从另一方面说，你暂时留在塞罗埃莫索跟我们的女儿和外孙们在一起，我认为非常正确，因为都说华盛顿的夏季可怕极了。我清楚地知道，在如此炎热潮湿的天气里你该多么痛苦！我只得忍受对你的思念，等到九月或者十月你就能来担负起大使夫人的职务了。不用担心，因为……”

他想起了妻子。即便在二十岁的时候，妻子也不曾有过青春，不曾漂亮、可爱过。弗朗西斯基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大主教的干女儿。她深信上帝发明性交仅仅是为了让人类繁衍生息，传宗接代。闭经之后，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作用已经消亡，仿佛在她的阴部打上了印记：“任务已完成”。

可怜的弗朗西斯基塔！妻子们的楷模，伟大的灵魂。想到穷苦人，她总是眼泪汪汪。心地善良的太太，名不虚传，每次慈善机构募捐，都走在前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色地哺育了子女，还是个做甜食的能手，并且会在瓷器坯上绘画，甚至能说点法语。

一边走一边顺手把灯一盏一盏地关掉，屋里又暗下来。他躺到床上。必须多睡一会儿，明天上午脸上才不带倦容。枕头和床单上还残留着罗萨莉娅身体的余香。他翻过身，躺在床上，回味着情妇带给他的欢快，突然间笑出了声。原来是想起从前读到的一个关于拿破仑的故事：阳具的萎缩导致了

他情场上的失意和战场上的溃败。他想：“应当感谢上帝在这方面对我的恩宠与慷慨。”像每天晚上一样，临睡前吻了吻用一根银练系在脖子上的小铜牌，铜牌上有索莱达德马尔镇的守护女神像。

第二天，他被大使馆总管兼随身男仆米·米歇尔叫醒了。这位法国人身穿一身不冷不热时的灰色西装，整齐得无可挑剔。他站在床边，既不敢大声说话又不敢唤醒新主人，只好隔一会儿就怯生生地咳嗽一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终于睁开了眼睛，盯着佇立在床下边的“陌生人”，皱皱眉头，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脸上显出疑问、惊异的表情。

“早安，大使先生。现在上午八点。阁下吩咐过让这个时间来叫醒您。”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坐起来，两只胳膊抱着膝盖，一动不动，眨眨眼睛，打个哈欠。突然，他站起来，像美洲狮一样轻捷地一下子蹦到地毯上，把米歇尔吓了一跳。伟大的一天开始了！一种年轻人的欢乐流遍了全身。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早晨的阳光照到脸上，花园里的树木似乎向他道了个翠绿的早安。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又开始踱来踱去，不时伸伸胳膊，搔搔胸脯，响亮的哈欠像是为这些动作伴奏。走到离使馆总管两步远的地方，他忽然停下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米歇尔·米歇尔。”

“为什么两个米歇尔？一个还不够吗？”

对方上身微微前倾，两只胳膊做了个请求宽恕的姿势：

“大使先生，因为……”

此人年龄难以断定，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他的头呈椭圆形，脸上棱角分明，尖尖的鼻子，酷似弗朗西斯科一世。有人谣传，他是弗朗西斯科家族的私生子。那张嘴很小，又总是非常湿润，使人联想起带着露水的玫瑰花蕾。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继续好奇地观察他的总管，像是在欣赏一只珍禽异兽。渐渐地，埃内斯托·比拉巴所说的关于此人的情况又浮现在脑际。米歇尔·米歇尔出生在法国阿维尼翁，1931年阿丰索·布斯塔曼特从巴黎调任华盛顿时来到这里，工作一向勤勤恳恳。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从头一天起就觉得这位法国人的脸长得滑稽可笑。“那酸腐的样子像是整天价嚼食柠檬。”他对巴勃罗·奥尔特加说。这位一等秘书回答说，米歇尔有文学才华，如饥似渴地读书，看过加缪和萨特的作品，能把兰博的《醉船》倒背如流。据说，阿丰索大使常常一连几小时和他的随身男仆讨论西班牙和法国文学。

“阁下要我准备温水洗澡吗？要么冲淋浴？”

“不要以为我也需要你帮助洗澡。”大使脱下睡裤，一脚踢到老远的地方。

米歇尔·米歇尔干咳了一声，引用了一句塞万提斯的话，他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但口音很重，卷舌音发得过长，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想起了埃斯梅拉达港妓院里的法国妓女。

“阁下，早点想吃什么？”

“浓咖啡和烤面包片，绝不要美国佬们吃的什么鸡蛋、小泥肠，火腿肉……听见了吗？啊！来一大杯桔子汁，不加糖。”

“是，大使先生。”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钻进浴室，在洗手池上面的镜子上照了照，发现自己两眼清澈，以往深深的黑眼圈也不见了。现在开始刷牙，像以前一样动作兴奋，刷得牙龈上出了点血。接着又咕嘟咕嘟嗽了一阵子口。与其说嗽口，倒不如说更像是练声。然后，拿起电刮胡刀，又没有刮成（这不是刮男子汉胡须的玩艺！），只好往脸上抹上香皂，安好刀片架。刮完胡子，他来到喷头下面，随着凉水浇到身上，吼叫了一声。“How do you do, Mr. Presiclent?”^①握住那伟大人物的手，微微一笑，头一分钟就要设法征服他。可惜不会说英文……

他使劲往身上打香皂。腰很细，肌肉结实，他为此而自鸣得意。接着摸了摸平平的腹部，也为它而骄傲。最让他高兴的是手上没有老年人那种黑紫色的斑点。“Jau do iu du, Mister Président?”^②现在，那低沉的声音又在浴室里回响。随后，他歇斯底里地用浴巾搓身，撒花露水，打发蜡，梳头……

回到卧室，发现米歇尔还站在那里，每次咳嗽都文雅地用手捂住嘴。

“有什么事，伙计？”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像土耳其人似的把浴巾缠在腰上，“说呀！”

“大使先生，”总管稍稍犹豫了一下才说，“如果您允许，我劝您穿条纹裤子，黑色长外衣，打灰色缎子领带。”

① 英文：“你好，总统先生！”

② 前注的西班牙文拼音。

“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一时性起，我会穿着睡衣去白宫。或者干脆光着屁股去。”

“是，大使先生。”

“喂，米歇尔！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穿海蓝色西装，白衬衫，打深色领带……当然，穿黑皮鞋。怎么，不合礼仪吗？”

米歇尔稍稍把上身一躬，点缀在脸上的那个玫瑰花蕾被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催得半开了：

“不，大使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可能和您穿得一模一样。”

“好啦，没有问题，我的朋友！”

过了一会儿，大使穿好内衣，坐到床上去穿袜子：

“你大概很怀念阿丰索先生……”

“阿丰索·布斯塔曼特博士是位无可挑剔的绅士。”

“我不是吧，米歇尔。嗯？”

“我没有这样暗示的意思，大使先生。”

“我不是，这我心里明白。我不是职业外交官，不会吻夫人们的手，而是吻她们身上的其他部位（当然，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不懂什么文学，把礼仪之类的东西看得一文不值。”

米歇尔一直垂着眼睛，耳朵红得成了鸡冠。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穿上裤子：

“你在这里伺候过几任大使？”

“阁下是第五位。”

五！又是这个神奇的数字！

“你信神吧，米歇尔？”

“我是个怀疑主义者，阁下。”

“我忘记了，怀疑主义是法国的民族体育运动。可是……话又说回来，所有的大使都有点难伺候，对吧？”

“请阁下原谅，我不便评论。”

“说得好。你是个绅士。既然如此，我希望你没有看见昨天晚上八点来到使馆、半夜才离去的姑娘。”

“我什么也记不得，阁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对着镜子系紧了领带。从镜子里还看得见总管的影象，只见他两手举着灰西服上衣，像是斗牛士举着用来挑斗公牛的红布。

“我猜想，退休以后，你要返回法国……”

“这正是我的愿望，阁下。”

“自然要写回忆录……”

“可能。”

“这狗东西在讽刺我。”胡韦蒂诺·卡雷拉的干亲家后退了几步，以便照得更清楚。总管走过来。

“我倒想知道，在你的回忆录里，我被写成什么模样？”大使一边穿上衣，一边戏谑地问。

“最严格地尊重事实。”米歇尔低声回答，并且轻轻咳嗽了一声，仿佛为这句大胆顶撞的话请求原谅。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脸转向总管：

“事实？可是，什么是事实呢？用感情去写你的书吧，因为感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实！”

现在加夫列尔·埃列多罗正在喝意大利机器磨的哥伦比

亚咖啡。这里是本大使馆最宜人的小厅之一。简朴的家俱、浅色的墙壁和绿色的地毯，以及出自萨克拉门托当地画家之手的色彩艳丽的油画，屋里显得热烈、蓬勃，上午的阳光更增加了活跃的气氛。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端来早点的佣人打发走，独自一个人吃着，因为他讨厌在别人目光注视下进餐。

从他所在的位置，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花园的一角。榲桲树和菩提树枝繁叶茂，高欲参天，下面的水蜡树和樱桃树繁花满枝。远处，就是诺尔曼石头公园小瀑布的丛林了。这座巨大建筑物四周的树木当中，大使最喜爱的（“头一眼就爱上了，巴勃罗！”）要数瀑布下边的日本红枫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植物：与其说是真正的树木，倒不如说更像精致的铜雕。他一面漫不经心地嚼烤面包片、喝咖啡，一面长时间地望着日本红枫。

米歇尔像个幽灵，轻捷无声地飘进屋里，寓意深刻地干咳了一声，把一张折着的报纸放到主人的桌子上。

“大使先生，比拉巴先生请您读读这份报纸划了记号的那一版。”

说完，米歇尔装着露出一丝笑容，几乎像军人似地向后转身，离开了小厅。

加夫列尔不懂英文，只是看着美国报章杂志“眼熟”。在报纸的第六版上发现了自己的照片，下面有一段用蓝色铅笔框起来的文字。一开始，大使只顾得看照片，过了一会儿这甜滋滋的欣赏才被想了解报纸上怎样描写他的好奇心所打断（栏目的标题是：《外交圈》。作者：波托马克小姐）。细心的蒂蒂托·比拉巴把译文用钉书机钉在报纸的同一版

上：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派来了新任驻华盛顿大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先生。今天他将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国书。虽然几天之前刚刚到任，但似乎已经交了不少朋友。这位阁下身材高大，皮肤微黑，和蔼可亲，是个英俊的男子汉。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大使先生性格极为率直，是萨克拉门托总统的私交，曾在1925年的革命中在他身边英勇战斗，把祖国从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独裁政权下解放出来。据称，阿尔瓦拉多大使先生阁下非常崇拜林肯，像他这样了解这位美国前总统一生的人尚不多见。欢迎您，大使先生！欢迎您加入‘外交圈’！”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刚刚看完译文，米歇尔又走进来，这一次手里拿着电话机：

“阁下的电话。”

“谁打来的？”

“比拉巴先生。”

“这不男不女的家伙有什么事？”

“回绝他吗，大使先生？”

“不！把那东西拿过来！”

他抓起听筒，放到耳边：

“说话！”

电话里传来埃内斯托·比拉巴嗔里嗔气的声音：

“早安，大使先生！”

“啊！蒂蒂托，怎么啦？”

“我特地打电话向您祝贺！”

“祝贺什么呀，伙计？”

“这么说您还没有看我派人送去的报纸，我在其中一版

上画了记号。”

“看过了。可是，那有什么？”

“阁下也许还不了解，您的名字只要在波托马克小姐的专栏里出现就能被这个国家的五千万人读到。这是即将在社交界获得成功的明白无误的迹象……在她的‘外交圈’专栏里十几行——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简直是巨大的荣耀。祝贺您！”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知道怎样打断他的二等秘书的话。这不男不女的家伙是在嘲笑他呢……还是真的看得如此重要？

“那个什么波托马克小姐是谁呀？”

“大使先生，是华盛顿一位“神圣母牛”的笔名。她是这个国家最受崇拜、最受尊敬的女人之一。”

“长得漂亮吗？”

“哪里话，大使！六十岁了，丑得像粪堆，比河马还肥胖。”

“那么，把这个母妖怪给我扔到和她同名的河里去吧！喂，蒂蒂托，说正经话，你们给这个美国母牛发请帖，请她参加我的招待会了吗？”

“阁下，她的名字是在我们写的头一个信封里发出去的。”

“好。告诉巴勃罗，不要来晚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十一点整等我。”

4

1930年，萨克拉门托驻华盛顿使团升格为大使馆，胡韦蒂诺·卡雷拉大元帅的政府授权其外交部长在马萨诸塞大街英国使馆斜对面购买了属于弗吉尼亚州一家农村贵族的宅邸作为馆址。（二十年后，反对派候选人胡里奥·莫雷诺博士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解放者”逃往多米尼加避难。据新政府所作的调查，这笔肮脏交易使军阀和他的部长个人获得近十万美元的非法收入。）

这座格鲁吉亚式的两层建筑稍带殖民时代的优雅风格，耸立在长着菩提树、白蜡树、紫杉和枫树的花园中间。它的血块似的砖墙显得过分严峻了一些，但许多又高又窄的窗户框却是统统漆成白色的，对称地排列在四面，玻璃能上下开启，总算给它增添了一点活气。

建筑物的正面，中间的大门也呈浅色，四根陶立克式的立柱顶着突出的廊檐。这样，萨克拉门托大使馆就酷似乔治敦具有历史意义的敦巴顿大厦了。

有一段时间，大使官邸是在第三十街一座租来的房子里。后来，阿丰索·布斯塔曼特博士——胡韦蒂诺·卡雷拉

挑选的首任驻白宫大使——受命设计并监督建造一座专门用于大使官邸的楼房。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解放者”让他放开手脚，于是这位老资格外交官、受过欧洲教育的人文主义者、热衷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学究就毫不犹豫地原来的住宅旁边建造了现在的大使官邸。直至今天，埃内斯托·比拉巴还常常撇着嘴说它是某些意大利会堂蹩脚的仿制品。这座浅色花岗岩的建筑有两层。第一层风格粗犷，像个严阵以待的堡垒，幸亏有伊粤尼亚风格的半露式壁柱及它们支撑的两个拱门在中间形成的凉廊稍稍减轻了一点肃穆的气氛。第二层正面有十五扇窗户，窗户之间的装饰图案与壁柱相同，可以明显地看出佛罗伦萨露塞莱宫的痕迹。年轻的时候，阿丰索博士曾任萨克拉门托驻佛罗伦萨领事。

一个五层的花岗岩台阶从马萨诸塞大街的人行道直通大使官邸的凉廊。两个拱门中间那根壁柱上方嵌着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国徽。国徽上部、半圆形镶边的下面，红色衬底上有个金色美洲狮神气活现地拿一柄古剑。古剑把国徽一分为二。一半是初升的太阳，象征白天，一半是星星，代表黑夜。下部以金字镌刻着共和国的铭文：“自由与尊严”。

走进大使官邸的前厅，首先会受到一位寡言少语、难以确定其国籍和口音的人接待。他一般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放一架白色电话机。底层是图书馆、档案室、总务室和女打字员及其他低级人员的办公房间。上层中间是大使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一边是会客室。另一边的房间稍大一些，里边放一张桃花心木桌子，周围有十把椅子。这一层的其他房间分别由公使衔参赞、秘书、武官及其助手们占用。

根据大使馆的口头传说，萨克拉门托驻华盛顿代表机构

中最重要的角色从来不是大使——不论谁任大使——而是女雇员、美国公民克莱尔·奥吉薇小姐。大使上任以后签署文件、发表演说、举行会谈、接见记者、神气活现地参加一次又一次的晚宴、喝无数瓶鸡尾酒，但总有一天会调任他职，终究要走……而奥吉薇小姐却永远不动。从来没有人发现一个名称能囊括她所担负的种种职务，因为这位美国女人兼任着大使私人秘书和翻译——把文件、公文及信函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或从英文译为西班牙文。她还负责为大使、公使衔参赞和秘书们准备或修改用他们的母语写的讲话稿。她并且照顾上司。避免他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被打搅。在大使馆里人们常说，谁要想见到大使，必须踩着他的女秘书的尸体走过去才行。

克莱尔是部活的百科全书，照像机似的脑子里储存着五花八门的信息：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大使馆、礼仪、工业专利、关税、所得税……她能背诵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章程和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宪法。火车、公共汽车和飞机时刻表？埃佛勒斯峰^①的高度？某个在什么场合说过什么话的历史人物叫什么名字？目前英镑的兑换率？啊，请去问奥吉薇小姐好了！

每当有人把这个美国女天才称为电子计算机时，总是有人赶紧补充说：“但是她有灵魂！”因为克莱尔·奥吉薇小姐还兼任着工作档案中没有记载的职务：倾听抱怨者和银行代办所。同事中谁有什么个人问题（有伤心事要讲，有牢骚要发），总是伏在这位美国女友的肩头哭诉。而奥吉薇小

① 即珠穆朗玛峰。

姐则总是带着父亲般、有时是母亲般的耐心倾听。她在一阵喟叹之后再低声说：“这算不了什么，孩子。事情本来还可能更糟。”接着又是规劝，又是安慰。如果对方的问题是钱财方面的，那么克莱尔·奥吉薇便慷慨地打开钱包，出借她的美元，并且既无期限，也不计利息。

这位老处女个子很高（光脚测量一米七十五），消瘦而结实，态度和蔼，性格外向，使馆的头目和同事们都亲切地叫她“奥吉薇塔”。她为人诚实得可爱，可爱得甚至有点魅力。那大而突出的牙齿使她的长脸和马有点相像。她的嘴很大，厚厚的嘴唇里仿佛由有弹性的粘土制成。那双冷冰冰的眼睛没有表现出她的热心肠——何止如此，甚至否定她有副热心肠。她嗓音低沉，有点沙哑，常常发出真诚自然的笑声，而且往往以一阵肺炎或烟草中毒患者似的咳嗽结束。“奥吉薇塔”总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人们每逢碰到她，总是见她嘴角叼着烟在吞云吐雾。

对她以前的经历，人们了解甚少，只知道她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富裕的家庭，在1929年的经济萧条中破了产。1930年在瓦萨学院毕业以后马上在萨克拉门托驻美国使团谋到了职业。一般来说，与她过从密切的人把她的到来当成上帝的恩赐，似乎以为要解释她的存在靠查阅履历远远不够，还必须研究宇宙起源学。

“我最初的工资少得可怜，”她常常开心地说，“还不够把我的肉体 and 灵魂捏在一起呢。直到今天，近二十年过去了，也还没有把我本人的这两部分粘合起来……”

每当回忆往事，“奥吉薇塔”总是说，虽然萨克拉门托经历了数以十计的危机、一次革命和一次政变，虽然大使馆

换了四任大使和众多的参赞和秘书，她却牢牢地在自己的职位上幸存下来。谈到大使官邸里的事情，她一般只讲好话。但是，偶尔在密友圈里也吐吐真言，特别是在喝完头一杯威士忌之后。“总有一天我要公布我的白皮书。”某个晚上，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她宣布说，“不过可以提前向你们透露几章。我被接纳为萨克拉门托大使馆职员时还是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刚刚从学院毕业。交给我的头一项工作是在打字机上誊写几封奇怪而又奥妙的信件，收信人是位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先生，从名字上看是意大利人。信中提到某件东西总是用“货物”代替，猜不透到底指的什么。他们讨价还价，争论交货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发生在禁运时期，罗斯福当选总统前不久。好，朋友们，我接着讲。有一天，美国当局发现了整个阴谋，丑闻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原来，签署（当然用假名）我誊写的那些信件的秘书利用外交特权从他的国家成批进口朗姆酒卖给在华盛顿及其郊区活动的酒贩子。多亏国务院好心帮忙，萨克拉门托使馆临时代办得以平息这场丑闻，把走私的秘书打发回塞罗埃莫索。至于我，朋友们，逃出了联邦特工人员的魔爪完全是个奇迹。你们想想，我照自己的习惯在这些惹起麻烦的每封信上都骄傲地打上了我的名字的缩写字母！”

“奥吉薇塔”大笑了一阵。又是一轮威士忌。她接着说：

“我伺候的头一位大使是在1931年来到华盛顿的。阿丰索·布斯塔曼特先生是个有钱的老头，长得又矮又胖，死了妻子，总是愁眉苦脸，样子像个家养的美洲獾。他喜欢读书，懂得欣赏艺术，算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每逢

从他的上司——外交部长——接到他认为荒唐的指示，就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嘴里嘟嘟囔囔：“我要请求辞职，不执行这种小学水平的指示。我是个文明人，是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个佛罗伦萨人！”然而，他并不真的辞职，因为他喜欢这个职务。另外，他爱荣誉头衔和勋章爱得发疯。每次接受什么称号必须听别人讲话、自己又要发表演说的时候，他都感到头晕目眩，胸部疼痛，心跳加快……集会结束之后，小老头就一头扑到床上，赶紧请医生来看病。

一阵咳嗽打断了“奥吉薇塔”的话。她喝了一口威士忌，恢复了常态，又接着说：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大使继续希望得到甚至千方百计地争取更多的勋章。可怜的阿丰索先生！在这个‘联邦村庄’里呆了整整十年，在他那佛罗伦萨人的灵魂最讨厌的这个地方呆了整整十年，所做的无非是从这个聚会跑到那个聚会，抱怨患了鼻窦炎（你们知道，鼻窦炎是华盛顿的官方病症），希望有一天能出任他的国家驻罗马大使——他把罗马称为不朽的城市。”

克莱尔·奥吉薇看到朋友们在开心地听，就在结束头一任大使的故事之前有意停顿了一下，以产生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1941年12月7日，阿丰索先生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消息以后面色苍白，钻进了浴室。随身男仆米歇尔发现大使关在浴室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把门撞开，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因心脏病发作身亡，尸体仍然坐在马桶上。愿上帝赐福给他的灵魂！你们看，对于一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崇拜者来说，他死得不够光彩……”

二五二二

“再来一杯威士忌吗，克莱尔？”

“来一杯！”她感到驾驭了整个聚会，提高了嗓门，同时晃动手中的酒杯，听着里边冰块互相撞击产生的悦耳的声响。看到朋友们个个默口缄言，目光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于是又开始讲第二任大使的故事。第二任大使是卡雷拉总统的姻兄弟，一个无可救药的妄想症患者。他整天关在办公室里高声和想像中的对话者争辩（对话中都是重要人物，无一例外），用西班牙语里最肮脏的字眼咒骂对方。“奥吉薇塔”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冬天那个灰蒙蒙的下午。她听见上司在办公室里声嘶力竭地吼叫：“赫尔^①先生！我召见你是为了向你提出抗议。我的政府不希望看到埃斯梅拉达港成为美国的海军基地。混帐东西，你应当懂得，我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杂种，你应当懂得，我们是个自由的主权国家！念念我们共和国的铭文吧：自由与尊严。去告诉罗斯福总统那个……”说到这里，克莱尔·奥吉薇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脏字，不过她心里明白，听众们知道她想说什么。

第四轮威士忌引出了第三任大使的故事。

“这一位是在胡里奥·莫雷诺博士当政时期任职的。他是个干瘪的光棍汉，皮肤呈郁金花色，患有胃溃疡，常戴墨镜，为的是掩饰内心的怯懦。此人有文化素养，性格内向，非常审慎，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决定。他沉默寡言，练瑜珈功，对东方哲学了解深刻并且非常钦佩。他任职时间不长，在莫雷诺博士被废黜之后便向美国政府申请避难，到迈阿密隐居，两年之后因思乡怀故导致胃溃疡恶化、穿孔而死。”

① 赫尔：即戈德华·赫尔，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克莱尔·奥吉薇感情激动地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是这位大使授予我银狮勋章的（金狮勋章只授予外国国务活动家和本国民族英雄）。他还授予我萨克拉门托荣誉公民的称号……”

“第四任大使呢？”

“是个色情狂。虽然已经六十岁，但总是追逐女打字员们。不折不扣的畜牲！一天，那老色鬼居然在我臂部拍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坦然！你们爱信不信。尽管如此，本地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却授予他法学博士的荣誉头衔。”

假若有一天谁问起克莱尔·奥吉薇对她现在的同事的人品和习惯有何看法，她一定会双唇紧闭，一言不发，下巴前伸，显出固执而又愠怒的拒绝表情。对这类秘密她讳莫如深，其谨慎态度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当然，她头脑中有一整套供自己使用的档案材料，记录着对上司和同事们的印象——这些印象是通过和他们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而观察到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听来的故事得出的。在这方面，从不甘寂寞而又多嘴多舌的蒂蒂托·比拉巴那里收获最多。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印象说出来，可能是下面这段文字：

“乌戈·乌加特将军。武官。年近七十。矮粗身材的印第安人，罗圈腿，眼睛像鳄鱼一样，黏乎乎的，晦暗无光。据说他是萨克拉门托有史以来最残忍的警察头目。他用先进的办法拷打犯人，其中有些办法还是他本人的发明创造，赫赫有名的电针就是一种。他让警察局的一位医生把带电流的针刺进犯人的牙神经，往往能使受刑者招供根本不知道的事

情——当然是在没有疼得休克的情况下（但是，直到现在，这魔鬼每当约好时间在这里与他的医生见面，总是要先吃镇静剂）。今天在大使馆任武官是为卡雷拉总统效劳有功所得的奖赏。除了免除一切税收的三千美元月薪之外，他还在美国以优惠价格购买电冰箱、收音机和其他电器，然后运到萨克拉门托转卖，利润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大发横财。货物通过埃斯梅拉达港进入国内，无须付任何关税，因为海关的头目们都是他的同伙。”

“据蒂蒂托说，乌加特‘当年’纵欲无度，而且专门勾引上学年龄的姑娘。我给这家伙的头衔是‘加勒比性欲狂’。他轻轻笑起来像劈竹子的声音一样。见到他就如同看见一只嘴里流着毒液的大癞蛤蟆，我从心里厌烦。

“乌加特夫人。尼珐太太已年过四十，是将军的第二个妻子。从外表上看，她极像国家艺术馆保存的、出自马蒂斯^①手笔的油画上那个土耳其后妃，身体肥胖，皮肤呈棕色，眼睛像阿拉伯人。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拉美女人一样，她也患有购买疯狂症，并且嘴馋，尤其爱吃巧克力糖、甜糕、甜奶酪……总之，爱吃一切增肥的食品。打从认识她的那天起，我就听她说要从‘下星期一’开始节制饮食。她对大使馆年轻的意大利籍司机阿尔多·博雷里的兴趣非常惹人注目。”

“潘乔·比万科。可怜的男人，妻子是新任大使的情妇。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到华盛顿前一个月（据“蒂蒂托通讯社”消息），请求总统把比万科调到本大使馆担任领事。

①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

可悲的人物！难怪他患了神经官能症，浑身都是可笑的习惯，而且不停地痉挛。有一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一个纸叠的鸟朝我飞来，正好撞在我的鼻子上。领事的爱好之一是放纸鸟。由于缺乏自信，他习惯于把一美元的新钞票放在手指间卷成比香烟还细的圆柱形：一种心里上的拐杖。我很可怜这个委琐的人物，也想对他好一些。我感到他也有意接近我，向我倾吐心曲，但总是在最后一刻退缩了。在大使馆里，这个三角爱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比万科夫人。哈哈！罗萨莉娅二十刚刚出头像是正在蓝色大海里游弋的女郎。或许更正确的说法是正在飞翔，因为她那对硬硬的流线型乳房很像一架飞机的双引擎。这姑娘出身低下。跟潘乔结婚大概是为了钱。男人们见了她那张脸和她那身段不可能产生纯净的念头。蒂蒂托常说：‘她太漂亮了，我要不是个女人非爱上她不可’。”

“埃内斯托·比拉巴。这位人称蒂蒂托的家伙是个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是我所能给予他的最委婉的评价。喜欢穿松蓝色衬衫、紧身裤，了解艺术，确实懂得欣赏。这位使馆二等秘书曾在雅典和安卡拉供职，在那里闹得声名狼藉。他认为土耳其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度，因为据他说那里同性恋是正常现象。蒂蒂托没有一天不来向我嘀咕同事们和华盛顿的‘神圣母牛’们。年龄？他从不肯说，大概四十来岁。有时候看到他的脸，倒觉得他像个突然枯萎了的男孩。他个子矮小、纤细，样子很精明。我喜欢他，觉得他也尊重我。”

“豪尔赫·莫利纳博士。公使衔参赞，他是已经望见了五十岁那灰色的大门的人。对这尊狮身人面像我还捉摸不透。此人孤独怪僻，寡言少语，性格内向，走路目不旁视。

对于喜欢这类长相的人来说，他甚至算得上漂亮。可是，究竟是哪一类？嗯，就像某些西班牙古代绘画上的苦行僧似的禁欲主义者：脸又长又瘦，胡子即便梳理以后也乱蓬蓬的，薄嘴唇，高额头，眼睛又黑又亮。他在巴拉莫神学院读了几年书，但没等到毕业就辍了学。不知道原因何在，也许连上帝也不清楚。在公使衙参赞面前，没有一个人有越轨的言谈举止。他温文尔雅，从来不对别人大声说话，读书很多，知识丰富。然而，他是个大门紧闭的花园，依我看花园里寸草不生。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他讨厌乌加特。我也不相信他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有什么友情。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他是个单身汉，离群索居，人们不曾发现他和女人有交往。蒂蒂托肯定地说此人没有性欲，但马上又狡黠地笑着补充了一句：也许是阉割了。”

“梅塞德斯·巴蒂斯塔。梅塞迪塔（女打字员）活像个猫头鹰，这倒不仅因为戴一副大眼镜和她那阴郁的样子，而且由于那颗脑袋的形状：上头宽，下巴细，鼻子尖。他又矮又胖，表情凄凉，总是怨叹受人欺侮，动辄哭天抹泪，像大多数萨克拉门托人一样说西班牙文柔声细气，带着气腔。可以说她是罗萨莉娅丈夫的出气筒，似乎潘乔·比万科以让她遭受痛苦取乐或排遣苦闷。梅塞迪塔最爱向我说心里话。”

“巴勃罗·奥尔特加。他可是我最喜欢的人！年纪不到三十岁，微黑的面庞特别引人注目，线条清晰的嘴上带着温柔和刚毅浑然一体的表情。与几乎所有的同胞相反，他不喜欢用发蜡。一位知识分子，虽然本人不喜欢让别人这样看他。出版过一本诗集和一本论文集，但对两本书都不满意，

自认为是个功不成、名未就的失意作者。爱绘画，却又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他还是个单身汉，我发现女人们很容易对他倾心。随便你们怎么说，我也是个女人。蒂蒂托认为，论年龄，我可以做巴勃罗的母亲，所以从情感上讲属于伊俄卡斯达^①式的人物。在华盛顿，奥尔特加断断续续有过几桩风流韵事，只是他对这类勾当过分认真，难以得到满足。此人属于保守型，不肯主动向我吐露隐私，我只好逼迫他张口。他出生在萨克拉门托一个极为显赫的家庭，父母是有名的奥尔特加·伊穆拉特，拥有大片的土地、庄园和几座糖厂。小伙子似乎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到来只能进一步加深这一危机。他整天心烦意乱，由于为一个他认为腐败的政府效力而受着感情上的折磨。

“大使馆的其他人员？啊，统统都是些苍白的小职员——如果了解得深一些，会发现他们心地善良，甚至各有风趣；要是仅仅在这些办公室和楼道里看到他们从事各自的日常事务，就会觉得个个都是二维空间的模糊形象。

“对，还有武官的助手们。一个上校消化不良；一个少校迷恋于赌博；一个上尉专门集邮；三个中尉都拼命往漆黑的头发上抹发蜡。他们无所事事，总是在楼道里吸烟、谈天，要么就坐在办公桌上翻看过期的《花花公子》杂志上的裸体女人照片。乌加特这些助手几乎人人都有豪华的汽车，看样子他们个个都到处寻花问柳——究竟是否真的如此，无须考证。

“新任大使？现在发表意见还为时过早。我只能斗胆预

^① 伊俄卡斯达：据古希腊神话，是俄狄浦斯的母亲和妻子。

言。此人非同小可，具有一种危险的兽性吸引力。如果说额上的伤疤使他具有毫不令人尊敬的江洋大盗的野气，那么毕竟可以算得上一种能增加女人们性欲与好奇心的调料。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其中一些恐怖骇人——每一个都妙趣横生。难怪罗萨莉娅乐于跟这种人上床呢。谈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时候，蒂蒂托说了句粗俗得难以出口的话：

‘啊，克莱尔！他裤裆里那玩艺儿大概是黑曜石做成的！’。”

5

四月份的那个上午，克莱尔·奥吉薇百事缠身，但最关心的是让新任大使按时到达白宫。刚才米歇尔打电话告诉她，主人希望十点半准时离开寓所。

女秘书看了看手表，决定去找巴勃罗·奥尔特加。临走以前，先在脸上施点扑粉，把嘴唇染得更红一些，然后掏出小镜子照了照。她穿一件黑、白、灰三色格子毛料外衣，外衣左边与乳房等高的地方别一个银制饰针，这是一位秘鲁朋友送给她的礼品，代表着印加禅教。接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片阿斯匹林，带着一种近乎痛苦的表情往纸杯里倒满水，就像给弥留之际的人送去圣餐一样——圣饼和葡萄酒是上帝的血肉——最后才沿着充满“好时光”牌香水味的楼道走过去。

像往常一样，她没有敲门就闯进巴勃罗·奥尔特加的办公室，发现朋友正坐在办公桌上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的文件。

“一等秘书，今天感觉怎么样？”

“糟糕极了。头痛得都要爆裂了。”

“我早就想到了。吃药吧。”

她把药片塞进一等秘书嘴里，随后把纸杯递过去。巴勃罗喝了一大口水把药吃了下去。克莱尔后退两步：

“你穿这件海蓝色西服漂亮极了。灰色的也不错。千万不要再穿绿色或棕褐色的衣服，与你微黑的皮肤不相配。”

奥尔特加感到嘴里有阿斯匹林的苦味，因为在咽下去之前把药片嚼碎了。

“我在为莫利纳博士担心。”

“为什么？”

“你像我一样清楚，应该由他而不是我陪大使去白宫。公使衔参赞虚荣心强得很呢。”

“既然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愿意让你当翻译，孩子，那么过错就不在你身上。”

“我非常了解莫利纳博士，他虚荣心太强，在官衔高低问题上寸步不让。”

克莱尔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了看桌子上当天来往的函件，拿起一个空信封，闻了闻：茉莉花香水味。

“又是一首俳句？”她问。

巴勃罗点点头。

“这爱情故事如何收场？”

“算不上什么爱情。”

“怎能算不上呢？有一天，你在招待会上被介绍给日本大使馆的女职员、这位广田喜美子小姐，两个人坐到大厅一角，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诗人啦，日本武士啦，蝴蝶啦，绢画啦，插花艺术啦……最后，你们发现两个人是一对孪生的

灵魂，交上了朋友，她每周送给你一首俳句，你也写一首回赠。这不算爱情算什么？”

“克莱尔，对喜美子小姐存性欲的念头就像愿意跟瓷娃娃睡觉一样荒唐。”

“你不要忘了，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小巧玲珑，可用起来和任何西方产品不相上下……”

巴勃罗笑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精神方面的。”

克莱尔作了个不肯相信的鬼脸。

“从根本上说，你是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分子。”巴勃罗说。

“我是种族主义分子？真是这样的话，我就连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你们这些萨克拉门托的印第安人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以和解的口吻问：“今天她写的什么俳句？”

巴勃罗拿起一张枯树叶色的信纸，开始念喜美子小姐用中学生那种圆圆的幼稚的字体写在信纸上的俳句：

春 日

怎会是蜻蜓？

分明樱花朵朵红，

笑迎四月风。

克莱尔歪着头，眯着眼，不知道该不该喜欢这首小诗。

“回赠了吗？”

“没有。今天我感到与其写俳句，倒不如剖腹自杀。”

女秘书笑出了声。两个人都点上香烟，一连几秒钟里，仿佛在用喷出的烟团交谈。

“那东西写得不好吗？”

她指的是题为《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论文的初稿。作者是乔治敦大学的女学生格伦达·多列玛斯。两个星期以前她来大使馆找到巴勃罗，请他读一读并提出批评意见。

“作者比论文本身要有趣得多。”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巴勃罗，你看上了那姑娘。我敢担保，对你的拉丁语系人特有的魅力，她并不无动于衷。”

巴勃罗皱了皱眉头：

“你以为是这样吗？”

“我的下意识从来不会有错。刚才对你说的关于日本小姐儿的那番话纯粹是开开玩笑。不过，孩子，这美国姑娘给我敲起了警钟。你在当面撒谎！”

“这是嫉妒吗，克莱尔？”

她双臂交叉，望着眼前的朋友说：

“我要是年轻二十五岁，非参加这场竞争不可。”

“没有任何竞争可言。”

克莱尔转了话题：

“快准备一下去当牺牲品吧。上司在等着……”

“让上司大发雷霆去吧！”

“巴勃罗，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喜欢你，他昨天亲口对我说过，还对你赞不绝口呢。你知道吗，巴勃罗？对他来说，你代表着上帝不肯给予他的儿子。他生了一窝雌崽（我记得一共五个），没有一个雄的。我非常遗憾。但是，愿意

也好，不愿意也罢，你得到了第二个父亲。”

“有一个父亲就够了。有时候一个也嫌太多。”

克莱尔伸出食指，指着躺在信函匣里一个带有红黄两色斜线饰边的信封说：

“你怎么啦，孩子？两天以前我就把你母亲这封信拿来了，可直到现在连拆都没有拆开……”

巴勃罗犹豫了片刻：

“我逆光看了看，从里边的阴影看像是张支票。”

“啊！”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两手插进裤子口袋里，眼睛望着外边。

“克莱尔，对这场闹剧、这场假面具舞会，我已经厌倦了。厌倦了向乌加特这类无赖陪笑脸，佯装不知道他是个流氓、刽子手、小偷；厌倦了看着几位军官那趾高气扬的神气，他们以为‘军装’不是普通名词，而是个带褒意的形容词；厌倦了日复一日地字斟句酌，稍有不慎就可能碰到公使衙参赞那敏感的神经或者可怜的比万科流血的伤口。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你清楚，克莱尔！）要数在俱乐部和大学作报告，被迫说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彻头彻尾的谎言以维持我国是个民主国家的神话。在我看来，这一切都降低我的身份，辱没我的人格。”

奥吉薇塔坐下来，叉起两条又圆又粗、和躯体其他部分不成比例的腿。奥尔特加把脸转向她：

“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

“你从来没有向我提供问题的全部资料，我岂能知道该怎么办呢？”

他一把抓起钢制保险柜上的《华盛顿邮报》，在克莱尔眼前摇晃着说：

“你读过这张报纸今天刊登的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的公开信吗？”

她点了点头。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曾在胡里奥·莫雷诺政府任教育部长。自从两年前到华盛顿避难以来，不仅在学校和俱乐部作报告抨击萨克拉门托政府，而且给各主要报社社长写信揭露胡韦蒂诺·卡雷拉是个残忍而又腐败的独夫民贼。今天发表的公开信是直接攻击加夫列尔·埃列多罗·阿尔瓦拉多的，指责这位新任大使是“独裁者的干亲家，他一切罪行中的同谋犯”。

“好吧，我讲个故事，从中你会明白为什么我在这座迷宫里不知如何是好，找不到出路……”

女秘书那双明亮的眼睛盯着他，像每次感情冲动时一样，呼吸急促，嘴和鼻子都歪向一边。

“1951年底，”巴勃罗·奥尔特加说，“胡韦蒂诺·卡雷拉的雇佣军占领塞罗埃莫索、攻进政府大厦的那一天，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是留在莫雷诺博士身边坚持到底的唯一的一位部长，当然还有为数不多的忠诚士兵和学生。你不会不知道，当时正是这个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亲自指挥着进攻政府大厦的部队……那出悲剧是怎么终场的你已经了解。莫雷诺博士为了不落到敌人手中，选择了自杀。格里斯博士得以逃往国外……”

“你们国家的历史我非常熟悉，巴勃罗。”

“但是，有一个细节你不知道。你想过吗，在那个有名的悲剧之夜，格里斯从哪儿找到避难所的？告诉你吧，在我

家里。当时，我的父母到索莱达德马尔镇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你不要忘记，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曾是我大学里的老师，我对他非常崇敬（现在仍然非常崇敬）。他逃到我家里。我知道，如果被造反军俘获，他必定被枪毙。”

克莱尔·奥吉薇焦急地听着，现在坐在椅子边上。

“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必须搭救朋友，让他逃往某个大使馆避难。我们决定去墨西哥使馆。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枪声和爆炸声从城市的四面八方传来。入侵者和投降了叛军的政府部队士兵开始屠杀、掠夺、抢劫。我把他藏进汽车的后背箱里，朝墨西哥使馆开去。街上噼噼啪啪的射击声不断。叛军正在追捕莫雷诺的同党，像猎手追赶野兽一样……很多前政府部长的住宅成了一片火海。我不得不绕来绕去，躲过有巡逻队把守的交叉路口。在一个拐弯处，前面突然出现了三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打着手势命令停车。‘车一停，我们就完蛋了。’我想。于是，我咬紧牙关，低下头，用力把加速踏板一踩。匪徒们嚷着，比划着让开一条路，随后朝我们开了火……一颗子弹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打碎了挡风玻璃，还有几枪打在汽车的后尾部。长话短说，我开着汽车斜穿过一个广场，绕过广场上的花坛、长凳和树木。惊心动魄的几分钟过后，处于郊区住宅群里的墨西哥大使馆已经隐约可见。大使馆周围的街道空无一人，像坟墓般寂静。我跳下汽车，想打开大门。大门上了锁！我打开汽车后背箱，扶着格里斯博士爬出来，对他说：‘必须爬栏杆了，老师！没有别的办法。快！’事情没有我想得那么困难，格里斯的力气和灵巧让我吃惊。两个人正穿过大使馆的花园，一辆汽车的远光灯突然照到我们身上。听见有人在喊叫。汽车停在、

了我们的汽车旁边。我们俩靠着大树和灌木阴影的掩护，连滚带爬地绕过大楼，去敲后面的一扇窗户。几句焦急的对话以后，大使馆总管把门打开了。我们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一口气钻了进去。格里斯要求立刻见大使，因为大使是他的私交。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扑到一把椅子上，浑身大汗淋漓，满身泥土，嘴里发干，心脏咚咚跳得飞快……避难的请求很快批准了。墨西哥大使认为，我如果离去必将冒很大风险，请我在大使馆休息。我同意了，但是，听着远方断断续续的枪声、口哨声和吆喝声，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傍晚，我的父母来到使馆。老头儿指责我犯了罪。我立刻气愤地反驳，说我绝不后悔……母亲把我叫到一边：‘你想要你可怜的父亲的老命吗？不知道他心脏有病？’我无话可说了。这是他们对付我的惯用的讹诈，从我小时候就使用这一战术：父亲患心脏病。你知道，我是独生子，享有‘特权’……”

巴勃罗在烟灰缸底上捻灭了烟头。

“迪奥尼西奥·奥尔特加·伊穆拉特，我的父亲，和墨西哥大使在另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密谈了一阵子，然后回来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你的汽车被认出来了，不过我设法让各报对你的行为只字不提。你的作法性质严重，而你偏偏不肯理解。今天下午，我和大主教先生会见了大元帅，他说愿意宽恕你，但认为你最好离开本国避避风头，等新政权地位巩固、事件被遗忘以后再说。’”

巴勃罗把手伸进口袋，又掏出一片阿斯匹林，放进嘴里，嚼碎，像是在发泄心中的恼恨。

“几天以后，把我送到了巴黎。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总算得到了前往墨西哥城的通行证。

又过了很久，才迁到这里。”奥尔特加把纸杯里剩下的水喝干，“你可以想象，一个爱好艺术和文学的小伙子，刚满二十三岁，每月有丰厚的生活费用，在巴黎是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的。我毫无顾忌地使用父母寄来的支票。巴黎使人头晕目眩。我出入于塞纳河西岸的咖啡馆，与著名人物交往，在巴黎圣母院小广场上绘画，在巴黎大学听讲演，参观卢浮宫，写诗。当然，也有些风流韵事。有一天（那是在1955年），收到一封母亲写去的信。她说，‘事件’已被遗忘。由于大主教出面说情，大元帅‘慷慨’地任命我为‘他们’驻巴黎大使馆秘书。你想想，这太过分了！我拒绝担任这项职务。可是，信又来了：‘自从去年患了心肌梗塞之后，你父亲的心脏一直不好。他希望你接受大使馆的职务，因为这是你将来回塞罗埃莫索最安全、最正确的途径。答应你父亲的要求吧。这是为了你好，孩子。你好好想想吧，创造你生命的人的健康完全掌握在你的手里！’”

巴勃罗坐到桌子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看，克莱尔，照我母亲的说法，我的手里掌握着‘创造我生命的人’的生杀予夺大权。讹诈仍在继续。我接受了大使馆的职务。我不否认，后来对新的环境也处之泰然了。在我任驻巴黎大使馆秘书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父母去探望过两次。他们每次去巴黎，我们三个人就像是度蜜月一样，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看歌剧，在最好的餐厅吃饭，一面沿塞纳河散步，一面购买些书籍和绘画。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休息，因为迪奥尼西奥心脏不好。从来没有提到过那个‘事件’。父亲偶尔谨慎地说起‘解放者’，说他正在使政府变得越来越温和，不久依法选出了议会，制定了一部自由

宪法。可怜的人儿！他那竭力使自己相信自己说的话的窘相既使人感动又让人尴尬！”

克莱尔·奥吉薇听着朋友说话，不时看看手表上走动的指针。

“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我绝不怀疑他们的虔诚……一天晚上我们去圣·查庇教堂听音乐会。潘普洛纳区合唱团表演了一个宗教内容的古老音乐节目。在观看演出的大部分时间里，迪奥尼西奥低着头，双臂交叉，仿佛在祷告。好像优美动人的歌声和镶着各色玻璃的古老教堂的出奇的美丽还不够，演出间隔中走进来一伙人，教庭大使后面紧跟着波旁王朝的王子、法国大总督以及长眠在圣公墓里的其他位尊望重的绅士和贵夫人，个个身穿当年的传统服装。王子没有血色的手里捧着法王圣·路易九世从圣地带来的救世主的冠冕……克莱尔，看到这件文物，我父亲热泪盈眶，脸也变形了。从教堂出来的时候，他怜爱地挽起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像是在发泄心中的苦闷：‘莫非还需要对你说吗？我不得不接近大元帅的时候，脸羞得通红，恨不得捂上鼻子。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幼稚或者寡廉鲜耻到把那个人看作理想的总统而从政治上支持他的进步。孩子，希望你明白，我之所以容忍他是因为在目前看来，他是两种灾祸中较小的一种。不幸的是，替代萨克拉门托当前局面的只能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意味着我们所信奉的精神价值的终结，意味着无神论政权把神父驱逐出境，意味着剥夺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教育我们子孙成为善良的教徒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们将成为为极权国家效劳的没有灵魂的机器人。’迪奥尼西奥意味深长地停顿一下，补充说：‘那么，

祖上从十七世纪以来用血汗挣得的土地就要在我们手中丧失。’”

克莱尔·奥吉薇站起身，瞥了一眼手表。

“那次探望以后不到一年，”巴勃罗接着说，“我接到通知，调到本大使馆。在这里，依然要靠被窃贼和匪徒辅佐的那个独裁者豢养，演出这出外交喜剧。看来父母以为一千美元的月薪不够我花销，还偶尔慷慨地寄来支票。每当我想冲破罗网，一走了之（我也说不清怎样冲破，到哪里去），总是收到伊莎贝尔太太的来信，信中又总是提出那个一成不变的问题：‘你想要你可怜的父亲这条老命吗？’”

“老头儿的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为阻拦你而佯装的呢？”

“一位可靠的医生对我说过。父亲的健康状况确实不佳，两次心肌梗塞相当严重。他是个满是裂纹的花瓶，必须分外小心。”

奥尔特加指了指尚未启封的信：

“信里写的什么，我想象得出来……父母并非不知道我常常和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见面。在上一封信里，伊莎贝尔太太说：‘我恳求你不要继续保持这危险的友情了。你迟早会被发现，被告发，上一次事件又要重提，你会失去现在的职位。更可怕的是你将永远不能回国。’”

克莱尔走到朋友跟前，替他紧了紧领带结：

“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处境确实不妙，不过事情本来还可能更糟。不管怎样吧，你现在必须陪萨克拉门托大使阁下去拜访白宫。走吧，时间到了。”

巴勃罗吻了吻女友的脸，朝门口走去。

“上帝保佑你，孩子！”她大声说。

巴勃罗到了楼道里，“奥吉薇塔”揉了揉眼睛，掏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又点上了一支香烟。

6

米歇尔给巴勃罗打开大使寓所的门，低声说阁下在图书馆等他。

卡夫列尔·埃略多罗张开双臂欢迎一等秘书：

“巴勃罗，伙计！”

说完，用他那肌肉发达的胳膊把他搂在胸前。一股浓烈的熏衣草香味钻进奥尔特加的鼻孔。

“看我怎么样？”大使以脚为轴转了一圈，问道。

“很好。但香水施得太多了。”

卡夫列尔·埃略多罗闻了闻自己的手、衣领和手绢：

“真的？”

“真的。在这个国家，男人们不习惯用香水。”

“可我不是这个国家的！我是索莱达德马尔镇的印第安人。”独裁者的干亲家调皮而又自鸣得意地高声说。

“索莱达德马尔镇的印第安人浑身尿臊味。”一等秘书心里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知道：流氓加叛徒，像我一样……”

“我们马上走，巴勃罗。”

“从这里到白宫只要十分钟。还有半个小时呢。”

“啊！见艾森豪威尔以前，还约好拜会另一位总统。”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泛起春光般的喜气，“瞻仰林肯纪念碑，了却我小时候的心愿。”

“装模作样！”巴勃罗心里骂了一句。

“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林肯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除了索莱达德马尔的守护女神就数他了。”

装模作样！装模作样！不管巴勃罗怎样想恨大使先生，但总也恨不起来。

卡夫列尔·埃略多罗挺胸腆肚，朝奥尔特加迈了三步，伸出右手，上身微微一躬。一等秘书只好拘束地和他握手，配合他演出这幕喜剧。

“How do you do, Mr. President? 哈哈！怎么样？”

“好。不过‘President’的重音应该在倒数第三音阶，而不是倒数第二音阶。顺便说一声，免得一会儿忘了，美国首都是‘华盛顿’，不要念成‘瓜盛顿’。”

“仪式怎样举行？”

“非常简短，五分钟稍多一点。递交国书纯粹是履行个手续，没有必要特别说些什么，仅仅表示一下你很乐于担任这一职务、希望我们两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就够了……不用担心，到时候由我把一切都翻译给他听。”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看了看手表：

“走吧！”

在前厅，米歇尔递给他一个香水较少的手绢，又帮他穿上外衣。大使对着镜子正了正头上的软帽。

“祝你成功，大使先生！”总管用法语说。

身材高大的阿尔多·博雷里着海蓝色制服，笔直地站在黑色梅塞德斯—奔驰轿车旁边，手扶着打开的车门。他是罗马人，二十多岁，脸上表情狡黠。

“你好，大使先生。”

“你好，阿尔多。先到林肯纪念碑。”

两位外交官在后排座位坐好，阿尔多启动汽车以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突然纵声大笑起来，笑得浑身颤抖。巴勃罗心里想：“如果他以为我会问他为什么发笑，那是白费心机。”不过，大使立刻解释说：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吗？191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应独裁查莫罗的请求在萨克拉门托登陆，追捕胡安·巴尔萨和他的游击队员。当时我才十二岁，往美国国旗上吐过唾沫，躲在树木后面朝鬼子巡逻队扔过石块，这双手曾用木炭在无数堵墙上写过标语：‘美国佬，狗东西！’。而现在，巴勃罗，我又作为我国大使前往白宫。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奥尔特加只是稍稍把头一点表示同意。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斜睨了他一眼。这小子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莫非看我不顺眼？等着瞧吧，不出两个星期就叫你服服贴贴，否则我就不是父亲的儿子。

然而，父亲是谁呢？他痛楚地想。突然间，母亲的形象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脑际。一片阴云在他脸上飘过。

汽车在马萨诸塞大街上飞驰。在巴西大使馆前面经过的时候，巴勃罗想起了他的朋友奥尔兰多·贡萨加，想起了下午要是去康涅狄格大街酒馆会有多少事情要讲给他听。可以肯定，比尔·戈德金也会在那儿，他同样对递交国书仪式的

进行情况感兴趣。

“那是座什么塔？”汽车穿过波托马克林荫道上的大桥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问道。

“伊斯兰清真寺的尖塔，阁下。”阿尔多·博雷里赶紧用他带意大利口音的西班牙语回答说。

“伊斯兰？”大使觉得奇怪，看了看巴勃罗，见他点了点头。

梅塞德斯一奔驰汽车进入小石河公园。给公园命名的小石河两边，水蜡树和樱桃树繁花满枝。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看见河对岸黑油油的坡上有一片竖着灰色或褐色小石碑的坟墓，鳞次栉比地伸向山岗的顶端。

“那是栎树山公墓。”巴勃罗说。

“和我们的公墓太不一样了！这些小小的墓碑倒像公路上的里程碑。坟头太矮，没有天使雕像。巴勃罗，我更喜欢我们的公墓，喜欢一千倍！甚至这个国家的‘死’也不如我们国家悲伤。”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脑海里浮现出故乡落座在山丘上的公墓。从一片翠绿的山顶上可以俯瞰大海。他把头转向一等秘书，亲昵地敲了敲他的膝盖：

“小伙子，我敢打赌，我下面要讲的事情你绝对没有在课本上学过。1913年是作为‘悲惨年’而进入史册的。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那个暴君以铁的手腕统治着萨克拉门托。为了把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胡安·巴尔萨带领游击队在山上坚持斗争。那年夏季的一天凌晨，革命队伍突然下山袭击索莱达德马尔镇，消灭了一队正在街头巡逻的联邦军，然后兵分两路，一半人包围了在军营顽抗的陆军第五团，另一

半则在街上征集粮草、药品、武器、弹药，招募志愿者……”

低级趣味。巴勃罗·奥尔特加竟然被他的故事吸引住了。大使口齿伶俐，嗓音就像敲击金属那样悦耳动听。

“天亮以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接着说，“游击队返回山里，索莱达德马尔镇家家关门闭户，街上只有在战斗中倒下的尸体。就这样……联邦卫戍部队司令走出军营，数了数伤亡的士兵。游击队打死了十名联邦军，打伤三十来个。你知道那个猪猡司令是怎么干的吗？当时就从镇上的居民中挑出五十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说是要把他们统统枪毙。他逼迫全镇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爬到山丘公墓参观处决。”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瞥了巴勃罗一眼，看看这故事产生了什么效果，然后接着说：

“我还记得那一天，就像昨天一样清楚。当时我十来岁，光着脚，穿一身旧得泛黄的棉布衣服，头上戴一顶草帽。胡安·巴尔萨是我崇拜的偶像，我自然仇恨联邦军。”

巴勃罗发现，阿尔多·博雷里也在倾听主人的讲述。

“司令命令被判处死刑的人们首先埋葬政府军士兵的尸体，然后让可怜虫们在公墓围墙外面挖了一条沟，把阵亡的巴尔萨游击队队员扔到里面。处决是在上午十一点稍过开始的。那一天雾气弥漫，天空像蒙上一层灰烬的炭火。我爬到一棵树上，难过得不停地抽泣，愤怒得咬紧牙关，看着、听着……被判死刑的人四个为一组，面向墓墙，反剪捆住双手。行刑队开火了……哒、哒、哒、哒！四个人一齐倒下了，鲜血、碎骨和脑浆溅到墙上。哒、哒、哒、哒！镇上的鞋匠临死前高呼：‘胡安·巴尔萨万岁！暴君该死！’有个印第安

人倒下的时候还面带笑容。另外一个，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大哭起来，扑到地上蜷缩成一团，浑身颤抖，两条腿弯着，膝盖紧紧顶着胸口，活像个在母亲肚子上的胎儿，指挥行刑队的中尉没有办法，只有朝他的耳朵开了一枪。只见他先是手脚乱舞，最后像个木头似地挺直了。土地吮吸了他的鲜血。最可怕的是目睹这场屠杀的那些可怜的人们那震天动地的哭喊声。圣母啊！即便我再活上一千年，也绝不会忘记那天的场面。女人们身穿丧服，一边哭一边祷告。有的昏死过去，有的歇斯底里发作，有的呻吟着在地上打滚。太阳出来了，热得能溶化基督教徒的脑浆。汗水和泪水在脸上混合在一起，流进嘴里，有一种腌生鱼的滋味。我不想看却又非看不可。乱葬沟里，尸体开始发臭。秃鹰飞过来朝下俯冲，士兵们先是扔石块驱赶，后来开了枪。小伙子，你知道什么最让我激动吗？是那些忍气吞声、即将默默死去的人们的眼睛！他们盯着远方，似乎看到了什么前景。卡塔里诺神父陪着他们，不停地抽泣。临死以前，他们都吻了吻教区长手里的十字架。就这样，巴勃罗，我亲眼看着我的朋友、熟人和尊敬的人们四个四个地倒下了……令人胆寒的鲜血染红了墓墙，染红了土地。一连几天，我摆脱不了那腐烂的人肉、热血、火药和尘土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这些事情能为男子汉的一生打上烙印。”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沉默下来。那灾难的一天的最后一幕他不愿意讲。晚上回到家里，发现母亲正和陆军团的一个上士在卧室里。另一间屋子里，几个士兵一边打牌、吸烟，一边等着轮流跟女主人睡觉。不论是谁，只要付两个卢纳就能享用她的肉体。

他心慌意乱，跑到街上，钻进教堂，请求索莱达德马尔镇保护女神给他以安慰，然后像个梦游症患者似地跌跌撞撞在街道和附近的田野上奔走，直到第二天天亮。回到家里，太阳已经当顶，不知道谁在他家门口用刷子写上了几个大字：“陆区团撒尿处”。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陷入悲凉的沉默。汽车驰出公园。奥尔特加远远望见了波托马河的河水和乔治敦大学灰色的屋顶。他想起了格伦达·多列玛斯小姐。纪念桥的浅色拱架使他回忆起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座桥樑。

奥尔特加看了看大使。他正闭着眼，塌着肩，仿佛仍然笼罩在他刚才讲的故事那种阴霾的气氛之中。

“哪儿不舒服吗？”话一出口，他就为对上司如此殷勤而感到自己庸俗可悲。

大使睁开眼睛，挺直身子，微微一笑：

“不。我回想起一些令人悲伤的往事……”

几分钟以后，梅塞德斯一奔驰汽车停在纪念碑前。

“我在这儿等你，大使先生。”巴勃罗低声说。

“好。我不会耽搁很久。”

阿尔多·博雷里打开车门。大使跳下车，深深吸了一口上午的空气，把手插进外衣口袋。抬头一望，看见两根石柱中间的林肯雕像，他笑了。美国国父坐在椅子上，两只砍柴人的高贵的大手搭在扶手上，使人觉得他要站起来迎接前来拜访的客人。

加夫列尔开始上台阶。他走得很慢，以便更好地享受这个时刻。我来了，林肯先生！我就是索莱达德马尔镇那个肮脏的印第安小孩，还记得吗？在白宫，美国总统正在等着我

呢！我要向所有这些婊子养的表明，我有种！
他继续上台阶，朝光辉的雕像走去。

7

从上午十点起，潘乔·比万科就不时走到办公室朝花园的窗户跟前。他不愿意错过观看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离开住处前往白宫的机会。看到奔驰牌汽车停在门前，他脉搏加快，浑身凉彻骨髓，像是个杀人凶手埋伏起来等待被害者到来。冷汗浸湿了双手和额头。是啊，要是手握一支带望远瞄准器的卡宾枪，从他的窗户里可以一枪击中大使。他玩味着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这是个惬意而又不可能的主意——像个孩子作游戏扮成西部牛仔，正等待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落入他设下的圈套。当魁梧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身穿黑色外套在大门口出现的时候，潘乔·比万科激动得浑身抖成一团——他希望这激动仅仅出于仇恨——把前额贴在玻璃上望着妻子的情夫。他知道，大使馆的同事们对这桩风流韵事了若指掌。他们也不会不了解，他，比万科，也知道自己的妻子与他人私通。怎能指望别人尊重他呢？人们至多能对他鄙视和怜悯。

上汽车之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门廊停了片刻。潘

乔觉得手里有支卡宾枪，瞄准，嘣！那傢伙倒在旁边的石阶上……于是他立刻向公使衙参赞投案：“莫利纳博士，我刚才暗杀了大使。”他将在塞罗埃莫索受审。不能以情绪混乱为由请求赦免。检察官会一口咬定是谋杀。三十年徒刑。

梅塞德斯一奔驰汽车绕过花园，开上大街，在大使馆前缓缓走过。

潘乔·比万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望着眼前的护照、信函和发票。今天上午必须处理……有一天，克莱尔·奥吉薇小姐对他说：“比万科，你具有官员的气质。”实际上，摆弄文件，审核，签字，盖章，登记，查找资料，给文件分门别类——这一切都是令他心醉神迷的消遣。抚摸纸张文件是一种情欲甚至近乎肉欲的享乐。就工作而言，他主张尽善尽美，无可挑剔。见到文件上有涂抹、墨渍或任何污痕他都大惊小怪。他的字写得很小，但十分清晰，是一笔一笔精心画出来的。最使他尴尬的莫过于被人发现他的笔下有什么差错，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差错。

他看看玻璃板下压着的妻子的照片。罗萨莉娅！罗萨莉娅！妻子从来没有对他温情脉脉过，就连度蜜月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开始她至少还顺从，耐心。现在，自从来到华盛顿以后，罗萨莉娅好像越来越厌恶他。有几天晚上，妻子躲进卧室，上了锁，不让他进去，说是太疲倦，偏头痛。他只好忍着心中熊熊的欲火独身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过夜。

比万科又望望摆在眼前的文件，突然感到颓唐、抑郁。这种奇特的感觉每天上午照例出现，他本人也莫明其妙。为了振作起来开始工作，不得不举行每日的“典礼”。他拿起一张白纸，用灵巧的手指折成鸟形（他是一位天才的魔术

师，参加同事们的家庭聚会时经常在客厅里表演），以两手的食指为掷弹器扔到空中，然后开心地看着“鸟儿”落地之前在空中划条曲线……同时头脑里响起海鸥的叫声。

啊！他在埃斯梅拉达港那家旅馆度过的蜜月多么惬意！吃晚饭的凉台面向大海！有木琴和沙锤的乐队！虽然明知道罗萨莉娅并不真正爱他，却浑身充溢着幸福！穿过柏油马路就到海滩，两个人手挽手在白白的细沙上散步。有时候他故意放开妻子的手，跟在后面，欣赏她的造型，她那又粗又圆的大腿，她那漂亮的臀部，她那细细的腰，她那女神似的走路姿态……给她拍摄的彩色照片数以百计。他发现，别的男人们看到他的妻子走过，总是以贪婪的目光盯着，恨不得要把她吞下去……对这一切，他既不恼恨也没有醋意，反而因为是这个人人眼馋的女性的丈夫沾沾自喜。有时候，某个消夏的男子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以迷恋的目光把罗萨莉娅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他心里甚至愤愤不平。晚上，两个人交欢的时候，和风带着大海的涛声飞进来，他往往想起白天对他的妻子垂涎欲滴的男人们，觉得他们统统来到卧室参观他的交媾动作，并因为有这些人在场阳具就有一种奇特的快感。

比万科满怀惆怅地看着躺在绿色地毯上的纸鸟——漂在海面上的一只死海鸥。该开始办公了！他拿出眼镜，在两个镜片上哈哈气，用绸子手绢擦拭干净，架到鼻子上，心满意足地看了看桌子上的一整套文具：各种各样的钢笔、陶瓷笔筒里五颜六色的铅笔、铅笔刀、钉书机、塑料尺、放大镜、裁纸刀、记事本……这一切，都是他小时候想买而买不起的。对于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来说，美国简直是天堂！走在街上，比万科从来不会放过任何百货店或文具店，总要进去买点文

具，虽然明明知道绝不会用它。

然而，仪式尚未结束。领事打开抽屉，从数以十计的彩色蜡笔里拿出几支。一连几分钟，他不停地在带横格的黄色记事本上乱画。有趣的是，等把一整张纸画满了几何图形之后，觉得心中的苦闷减轻了，并且鼓起了开始办公的勇气。

他又掏出手绢，擦了擦脸。这时候，他想起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那双土褐色的手：又粗又壮，像猛兽的利爪，上面青筋暴突。就在昨天，大使签署文件的时候，他一直盯着那双手。头一天晚上，这双手肯定抚摸过罗萨莉娅的躯体。当时，他恨不得把那对爪子咬烂、撕碎……接着，又同样全神贯注地望着大使的脸：像一座砂岩雕像。他身上散发着香水和上等哈瓦那雪茄的气味。后来，他的目光又停留在上司的脖子上：“如果我们扭打起来，他会用那巨人般的双臂把我压倒，不过我可以咬断他的颈静脉……”他似乎看到大使双手捂着鲜血直流的脖子在地毯上打滚……这幻觉在头脑里一闪，只不过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十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能容纳多少事情啊！容得下整个生，容得下整个死！

比万科叹了口气，把铅笔放回抽屉，把记事本上画得满满的那一页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桌子旁边的字纸篓。接着，他拿起一份文件，脸上出现了一点儿庄重的神态，自我陶醉地轻轻打着口哨，几乎把刚才的烦恼忘到了脑后。原来手里拿的是一封信件，是他用西班牙文写好，由奥吉薇小姐译成英文，最后由梅塞德斯小姐打字的。突然，他内心的天空又布满了乌云，因为发现了一处蹩脚的涂改。他把电铃一按，梅塞德斯小姐很快在办公室门口出现了。潘乔·比万科

站起身，手里举着她打好的信件：

“这封信是怎么誉清的？像你的脸一样难看！给我重新打一遍！”

“请原谅，比万科先生……”姑娘带着哭声说。

“我不会原谅。办事应当非常专心，少想点男人。要用头脑而不是用子宫工作！”

梅塞迪塔接过信函，眼泪汪汪地离开了办公室。潘乔坐下来，搓了搓手，又拿起一份文件。

公使衙参赞的办公室与领事的办公室相毗连，但比后者更宽敞，布置得也不那样富气十足。皮沙发前面有一张小圆桌，克莱尔·奥吉薇常常在桌上的花瓶里插上几枝鲜花。豪尔赫·莫利纳博士几次劝她不要这样做，把花瓶拿走。泛白的玫瑰色墙壁上连一幅画也没有。要是与比万科的办公桌相比，豪尔赫·莫利纳博士的桌子就简朴得像修道院的家具了。

此时此刻，公使衙参赞正坐在桌子后面，两手拇指朝下，食指顶着鼻尖，看上去像是在祈祷。一连几分钟，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摊在桌子上的报纸。

这天上午，有两件事搅得他心神不宁。头一件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没有请他陪同前往白宫，他自然快快不乐。另一件是莱昂纳多·格里斯在“邮报”上发表的公开信。莫利纳博士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两件事都无关紧要，既不能改变他的内心世界，也不会深深刺伤他的感情，充其量是蹭破一点皮肤。不过，感到这些挑战本身足以使他耿耿于怀，说明他并不像所希望的那样超脱。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是个乡巴佬，对礼仪要么一窍不通，要么等闲视之。他，莫利纳，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习惯种种不顾常规惯例的作法。这类事情以后还会发生，并且可能更加荒唐，唯一的办法是不动声色，耐心等待。无论如何，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任职期间只有依靠他才能不出洋相，贻笑大方。

他看了看手表。此时，大使大概在上白宫门前的台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正等着接见他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元首将要和一个“玩偶国家”的“玩偶大使”握手——是啊，必须承认这个可悲而又可笑的事实，因为萨克拉门托是加勒比海一个小小的岛国，统治它的是个庸俗、无知并且狡诈的独裁者。“……你在为他效劳。”公使衔参赞头脑中听见有人说。那是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的声音。

豪尔赫·莫利纳站起身，倒背着手踱来踱去。格里斯的形象如同人格化了的歉疚感一样无情地纠缠着他。确实，外交部长派他来华盛顿的目的之一就是监视莱昂纳多·格里斯，驳斥他对萨克拉门托政府的攻击——总之，把被取消国籍的流亡者在美国首都活动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莫利纳爱读柏拉图^①的著作，喜欢交谈，认为交谈是沟通思想、探讨看法最为简单明白的形式。他是个落落寡合的单身汉，往往和自己争论，有时说出声，有时只在心里进行。在想象中的对话者里，最受宠爱的要数大主教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先生了。莫利纳对这位担任神职的私交崇拜之至，现在正悉心为他撰写传记。不论看起来多么不可思

①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议，另一位经常在头脑里出现的幽灵是他大学的同窗、现在的政敌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

现在，在莫利纳的想象之中，白发盈头的格里斯坐在沙发上，两腿交叉，死死地盯着他——这锐利的目光常常使他手足无措。

格里斯点上一支香烟。莫利纳从来不吸烟，对一切能破坏毅力的嗜好他都深恶痛绝。

“今天的《邮报》刊登了你的公开信，我读过了。”公使衔参赞心里说。

他头脑里响起昔日的同窗、今天的政敌的声音：

“你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文章里没有半点虚假。”

“我承认没有‘谎言’，但不同意发表它的时机。我从伦理的角度谴责你的作法。家丑不可外扬嘛……”

“就伦理而言，豪尔赫，我与你也有严重的分歧。既然你原则上同意我对你的政府、你的总统和你的大使的批评，那么，你在这里为他们三位效力又作何解释呢？”

“等一等！”想到这些话，莫利纳在办公室中央停下来，看了看沙发，“我是在为我的国家效力，它在我死后仍将一世纪一世纪地存在下去；我在为我的教会效力，它永不消亡。”

公使衔参赞头脑中响起格里斯苍劲而又响亮的笑声。这有名的笑声狡黠而不具恶意，讥讽而又不失真诚，常常使萨克拉门托的大学生们为之倾倒。

“你的教会？豪尔赫，你怎么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因为你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而离开了神学院，这已经不是什么秘

密。你否认这一点吗？”

“不否认，但我们之间有微妙的差别。你是个无神论者并因此而高兴，我失去了上帝但为此而难过，而且一直在寻找上帝，希望有一天能重新找到。不仅如此！我‘爱’存在上帝的概念，而你却蔑视它，嘲笑它是幼稚而庸俗的想法。你想摧毁教会，而我却舍死忘生地保卫它。”

“谁要摧毁它呢？依我看，你是在向风车开战……”

“莱昂纳多，企图破坏它的是共产主义、唯物主义、失望、分裂、混乱……是你们这些人！”

“请你不要信口雌黄，把我当成共产党人。”

“不，你比他们更坏。不论我多么厌恶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不能不钦佩共产党人忠于一种思想意识并且始终遵循它而考虑问题、决定行动的作法。我最厌恶、最鄙夷的是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既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又缺乏理论支柱。不论是右的或者左的政府，你们一概批评，而又提不出建设性的行动纲领。你们反对你们轻浮地称之为‘黑暗’的教会，要求什么‘思想自由’。总之，你们是一群‘好小伙子’

（和我的学生巴勃罗·奥尔特加一样），沉湎于表面的人道主义和夸夸其谈。说到底，你们逃避一切义务，而不论是天主教徒、共产党人或是法西斯分子——对，甚至法西斯分子！——都明确地承担他们各自的义务。

“别让我笑掉大牙，豪尔赫。你的态度太虚幻、太荒谬了。既然你并不坚信上帝存在，保卫教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我爱教会。懂吗？我爱它的传统、它的雄伟建筑、它的仪式、它的圣者和牺牲者的故事……一句话，它神圣的本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与马克思主义

和虚无主义的唯物潮流抗衡呢？我们需要一种超然于蹩脚的哲学和胡乱解释历史之上的东西！”

莫利纳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希望有人来敲门。几秒钟之后，脚步声消失了。现在，格里斯站在窗前。当年的同学的幽灵站起身来，公使衔参赞感到某种快活，因为格里斯个子矮小，而他，莫利纳，身高近一米八十。

“我控告你，莱昂纳多·格里斯，犯有思想上和行为上的渎职或失职的罪行。担任教育和文化部长期间，你曾帮助共产主义在萨克拉门托泛滥。”

对方的脸色依然平静。那明净的目光看得莫利纳有点胆怯了。

“请指控得具体一点，不要泛泛而谈。”

“你命令从所有公立学校撤除十字架，禁止早祈祷，取消了宗教课，把一所古老的大学变成了自由思想家、共产党人和实用主义者们的巢穴。你不仅允许，并且鼓励甚至强迫在中学以至于小学教授进化论。你应当公正地承认，在莫雷诺政府时期，我曾经在报刊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反对过所有这些措施。”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得以那样做吗？因为在莫雷诺执政期间，全国都享有绝对思想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受到审查。”

莫利纳走到办公桌前，飞快地瞥了一眼刊载这位流亡者公开信的《邮报》：

“我马上写文章反击！”

“否认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是高利贷者和窃贼吗？否认他是他的干亲家卡雷拉一系列的肮脏交易中的同伙？指望让

美国人民相信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真的是个民主国家吗？”

“不。我要说明，你在担任内阁成员期间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这无关紧要！）搞的是左派那一套！你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类似危地马拉的阿本斯上校^①政权的政府。你们政府的土改计划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性质。总之，你们是付之于行动的不自觉者，或者说，比不自觉者更付之于行动！”

莫利纳按了按电铃。不一会儿，有人敲门。“进来！”梅塞迪塔应声走进来：

“是叫我吗，公使先生？”

莫利纳恨不得大声喝斥：“既然你桌子上的铃响了，二号灯亮了，当然是我在叫你！”不过他按捺住心中的火气，只是点了点头：

“请坐。我口授一封信件，然后你交给奥吉薇小姐，请她翻译成英文。”

他发现女秘书的眼睛又红又肿。

“怎么，哭了？”他问，但马上后悔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不喜欢干涉他人的私人生活，以免别人认为有权过问他的隐私。

“啊，公使先生，没什么……”

“又是比万科？”

她低下头，嘴里说了声几乎难以听到的肯定回答。莫利纳想把领事叫到跟前，打他几个耳光。那个卑鄙的小人没有胆量跟大使争吵，却拿大使馆里地位最低下的女秘书撒气！

^① 阿本斯（1913—1971）：危地马拉总统。任职期间公布土改法，改革劳工法，多次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一阵沉默。女秘书手里拿着铅笔和速记本等待着。豪尔赫·莫利纳飞快地斜睨了姑娘一眼。梅塞德斯·巴蒂斯塔长得确实丑陋。从躯干和头来看，她该生长成个高个子女人，但那两条短腿却粗暴地否定了这一假设。公使衙参赞为使馆有这么一个女秘书而暗自庆幸。别的女人——一个个漂亮、年轻、香水味十足、乳房隆起、过分描眉染唇——统统都是乌加特和他的助手们猎取的对象。偶尔其中一个走进办公室，莫利纳总是浑身不自在，这种感觉又逐渐转化为恐惧。他从来没有结过婚，跟女人打交道没有多少经验。离开神学院之后，仍然保持着贞洁的习惯。为什么？——有时候他扪心自问。莫非仍然是修道院的想法作怪，认为性欲是罪孽？厌恶？害怕男性器官不中用？他认为自己器官正常，时而身上有性欲出现，他经常用冷水澡或转移注意力的办法驱除，祈祷也帮助他度过那些魔鬼缠身的时刻。（“魔鬼？”格里斯问，“你既然不相信存在上帝，怎么承认有魔鬼呢？”）偶尔晚上遗精，但他从来没有——也不想——把这种现象与梦境联系起来。与女人打交道仅仅限于晚宴、招待会和会见等社交场合。（“事实是，”格里斯插嘴说，“每逢有女人看你，你就把目光挪开。”）胡扯！女人们从来不围着他转。他保持贞洁也许纯粹是为了清静，也许出于高傲，因为不纵欲而感到身强力壮。孤独是他的城堡，单身主义是他的盔甲。

“准备好了吗，小姐？”

“准备好了，公使先生。”

“写给《华盛顿邮报》总编辑。信的格式奥吉薇小姐知道。”

莫利纳像祈祷似的双手合十，拇指顶着干瘪的下巴，食指捏着鼻尖，开始一字一句地口授。

8

这时候，埃斯内托·比拉巴正在长长的楼道里走着，在公使衙参赞办公室门前经过。他穿一双鹿皮软鞋，步履轻盈得像个舞蹈演员，嘴里哼着小曲，走到一扇门前站住，轻轻敲了两下，听见里面传出瓮声瓮气的回答：“进来！”他走进乌戈·乌加特将军的办公室，像个演员上了舞台，站到武官面前，两个脚跟一碰，但没有发出声响，接着身子一躬，又举手行了个军礼：

“奉命来到，我的将军！”

乌加特坐在那一向光秃秃的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本像电话簿似的厚书，比拉巴发现将军正翻到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广告的最后部分。

“蒂蒂托，我请你来帮个忙，把这玩艺儿翻译成正经话。你看……”

秘书绕到老人背后，看了看他用关节突出的粗粗的食指指着的那一页。

“怎么，将军，你要买假发？”

“别胡说。先给我翻译出来。我还没有决定呢。”

蒂蒂托后退两步，望了望乌加特的秃顶。从后面看，恰似从黑鸡毛堆里冒出来的一个油光闪亮的大鸡蛋（将军的头发是染过的）。

“好。”秘书默念了一遍将军指着的文字，“广告是为美国一千五百万谢顶的人做的。”

“一千五百万？乖乖！”

“看到这张单页纸了吧？是用来量患者的脑袋的形状的。我的将军，你量好以后附上一绺头发寄去，让他们照你头发的颜色制做，分毫不差。一切都通过邮局办。如果我的将军不想用自己的名字，用我的好了。啊！广告上说，这家假发店品种齐全，仅发色就有十五种。哎呀，妙极了！”

乌加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类似乌鸦叫的嘎嘎声，靠到转椅上，抬起头看着站在眼前的秘书：

“要是我戴着假发出现在塞罗埃莫索，人们会怎么议论呢？”

“大出风头！”

“要是有人当面嘲笑呢？”

“朝他嘴里开一枪！”

乌戈·乌加特站起来，扯了扯夹到胖胖的屁股中间的裤子，打开旁边小桌子上的金属水瓶，往杯子里倒一点水，一口喝光，然后斜眼瞟着广告说：

“不，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尼珐会头一个笑话我。”

将军身着便装，铅灰色的衣服剪裁不当，过分紧身。他把蒂蒂托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番：

“这些天你跑到哪儿去了？”他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挑衅性的话，“找到新的男性情人了？”

“哎呀，将军，这话从何说起呢？你知道，我是夫妻忠诚的典范。”

乌加特允许蒂蒂托亲密无间地开玩笑，因为这不男不女的家伙在各种事情上都能为他效力，包括找女人在内。况且，秘书庸俗的幽默也使他开心。

“我的将军，现在我讲讲为什么不在。我专程去纽约买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场演出票了。你知道多少钱一张吗？一百五十美元！”

“不折不扣的疯子！看这些混帐共产党人跳舞，我五十美分也不肯付！我们国家帕拉莫一带的印第安人跳得比他们好，也便宜得多，只要付一轮烈酒的酒钱就足够了。”

说完，将军又坐到桌子后面：

“还有件事，蒂蒂托。替我给通用电器公司写封信，问问那些大电冰箱至多能优惠多少？……那些最大的，知道吗？如果价钱合适，我一次买十台，交现钱。”

埃内斯托·比拉巴拿过纸张记下来，然后看了看白金手表：

“这时候，我们大使大概正在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

武官的电话铃响起来，蒂蒂托赶快拿起话筒，听完大使馆女接线员的话之后，把话筒交给将军：

“你夫人的电话。”

“喂，亲爱的尼珐！怎么啦？”

“一切都好，乌戈。喂，我们约好一起吃午饭，可是买东西耽误了时间，来不及了。”

“你在哪儿？”

“在赫奇特商店，罗萨莉娅跟我在一起。”

“好，五点半在家里见面。不过，可别把赫奇特商店的库存都买空了……”

电话线那一头骂了一声，将军开心地笑起来。

尼珐·乌加特放下话筒，走出电话间，觉得马上要休克了。每次在封闭而燥热的地方呆较长的时间她都有这种感觉。几乎两个小时以来，她一直在这个大商场，从这个柜台转到那个柜台，用蹩脚的英文问“多少钱？”从最高一层开始，一层一层地乘传送带楼梯下来。每乘一次，她都像个乡巴佬似的大惊小怪。“多少钱？”用心算把美元转换成卢纳，累得头都痛了。现在，她昏头胀脑，就像在海上旅行一样，是头而不是胃感到恶心。眼前的商品琳琅满目，来来往往的顾客千姿百态，穿的衣服五光十色。为庆祝春天到来，商店布置得花花绿绿。霓虹灯闪闪烁烁。乐曲不绝于耳，伴奏的沙铎像钟表的秒针一样一成不变地响着。她始终弄不明白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又是给谁听的。最糟糕的是她穿一件毛衣，浑身又热又痒，像是着了火。我的上帝！

她停下来，闭上眼睛，用又短又胖的手掌捂住胸口。莫非是心悸吗？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罗萨莉娅到哪儿去了？在离传送带楼梯不远的地方，她看见了，朝女友走去。一面走一面还忍不住看着四面货架上的炊具，这些商品似乎都在喊：“太太，把我买回去吧！”

她在摆放着派热克斯硬玻璃盘的货架前停下来。对这种餐具，她特别喜欢。颜色各不相同：靛蓝、珊瑚玫瑰、红色……来到华盛顿之后，已经买了不止一打，件件都那么漂

亮。回国以后让萨克拉门托的女友们开开眼，他们会啧啧称赞……

商店的女店员走过来，笑着问她想买点什么。尼珐太太笑着用最常用的那句蹩脚英语回答说：“我在看。”姑娘离开了。这时候，将军的妻子突然产生了个绝妙的念头：为什么不买下许多打颜色不同、大小各异的派热克斯硬玻璃盘运到塞罗埃莫索转卖给熟人呢？每件可以赚一两个美元……乌戈经常往国内发运商品，可以让他把盘子一起运回萨克拉门托。两个美元的利润，也许能赚到三个，谁知道呢？……尼珐正沉思遐想，罗萨莉娅过来挽住了她的胳膊。

“啊！”尼珐大声说，“亲爱的，去吃点东西吧，十一点四十了，可我的胃已经敲过十二点了。最好早点找个餐馆，要不连坐位也找不到了。”

说着，又贪婪地望了望货架上的餐具：铝锅、铝壶、铜制和镍制器皿、盖盘子的绣花布（哎呀，真好看！），还有各式各样的餐刀——这些东西真能让人发疯！——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和女友朝楼梯走去。

“太太不觉得今天买的东西够多了吗？”潘乔·比万科的妻子问，“我的脚都走肿了。”

“先去填饱肚子，我的小妞儿，然后再到‘地下室’看看。”乌加特太太用了个新学的英语单词。

在餐馆找到座位以后就开始看菜单。女侍者——一个干净、漂亮、穿得花花绿绿的金发女郎——走过来，两个人都按编号点了一盘菜。

将军的妻子脱下鞋子，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终于坐下

了！她抓起眼前碎冰比水还多的杯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罗萨莉娅笑了。

“我们的牙都是真牙。”尼珐带着几分民族主义自豪感，“不像戏剧、电影和电视上的美国美人那样包一层人造材料的假牙。”

菜端上来了，乌加特夫人看了看罗萨莉娅的盘子，目光中充满羡慕，又稍稍带点恼恨：几片生菜叶、几片煮鸡蛋、葱头和甜菜、罐头杏子只有半个，一点点奶酪。仅仅这么一点！没有一样是增肥的！怪不得这小母狗能保持身体的线条呢——多美的线条，我的上帝！再看看自己的盘子：油花花的猪排在浓汁里游泳，四周是土豆泥筑成的山脉！

两个人开始吃饭。服装模特在桌子之间慢慢穿行，展示着春天的时新样式。个个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笑容可掬。耳边响着柔和的乐曲，尼珐却找不到扩音器藏在哪儿。空气中弥漫着苹果型花露水的香味。

将军夫人不时抬起眼睛看看女伴。罗萨莉娅吃饭像个小鸟，一小口一小口地啄食。长得也漂亮……像个小鸟？不，像个纯种叭儿狗。说起话来用舌尖和牙齿发出难以听见的摩擦声，与她那微微上翘的鼻子非常般配。褐色眼球上闪着彩虹似的奇特的光点，表面看起来温柔和善。性欲蕴藏在眼睛深处（起码四十岁的将军夫人这样估计），只有男人好生侍奉的时候才肯显露出来。

对于大使的情妇，尼珐怀有掺杂着仇恨的喜爱。就像情欲未泯的母亲见到已婚的女儿一样，从她身上既预感到当外祖母的威胁，又担心她成为引起男人们注意的竞争者。

罗萨莉娅也在偷偷打量将军夫人。对于尼珐，她的感情

矛盾重重。有时候，尼珐让她感到难以解释的不自在。这四十岁的女人武断得令人心烦。更可怕的是，自从相识以后，就以她的主人自居，事无巨细都要插手：“罗萨莉娅，不要买这个，买那个！”“你穿蓝色不好，挑件灰色的！”“今天你非跟我去买东西不可！”然而，她那心直口快、大胆泼辣的性格又使罗萨莉娅觉得和蔼可亲。她那粗壮的手指上戴满了戒指，肥胖的胸脯上别着各式各样的饰针。有时候，尼珐·乌加特戴的项链、纪念章和饰针太多，能使人联想起举行庆功宴会的戈林元帅。“比如现在，”罗萨莉娅一面嚼着一片葱头一面想，“肥厚的嘴唇上口红抹得太多，合着猪肉的油污流到了下巴上，画出一道道可笑的红印。”为什么她不拔掉唇上的绒毛呢？哎呀，上帝！罗萨莉娅突然想到，留着唇上的绒须，尼珐多么像米卡埃拉姨妈呀！姨妈给罗萨莉娅留下的印象再坏不过了。她性情粗暴，不懂得慈爱，常常提醒她——罗萨莉娅——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可怜的孤儿。（“你以为自己是个公主吗？想嫁给共和国总统的儿子？马上抓住这个比内科吧。他虽然算不上什么电影明星，可总是个正经小伙子，外交官，还有人说他要被派到巴黎去任职呢！”）

“亲爱的，”尼珐低声说，“我有点担心。”

“担心？为什么？”

“萨克拉门托情况不妙。今年是大选年，而宪法禁止大元帅再次竞选。”

“我不懂政治，尼珐太太。”

“这不算政治，孩子，是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大事。要是反对派当选，我们非让人家禽了不可。”

罗萨莉娅的脸涨得通红。尼珐心里想：这小婊子听到句

粗话就害羞，可往丈夫头上插犄角^①却满不在乎。

女侍者端上饭后水果（将军夫人要的苹果，姑娘则是葡萄果冻），两人之间的交谈转到潘乔·比万科的妻子最害怕的话题上。

“亲爱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尼珐那双不知羞耻的小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坦率从来不会对人有害。你跟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事我知道。”

“什么事？”她机械地自动辩护说。

“否认也否认不了。你们之间的秘密跟马戏团小丑所玩弄的一样，塞罗埃莫索人人都知道。当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妻子例外，弗朗西斯基塔^②夫人像是生活在别的星球。”

罗萨莉娅的嘴唇颤抖了一下，正往嘴边送的一勺玫瑰色葡萄冻也跟着颤抖了一下。

“不要着急。”女伴安抚她说，“我不怪你。我要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而你的丈夫狗屎不如。”

罗萨莉娅目光低垂，用餐勺把葡萄冻切成碎块，又研成泥糊，一口也没有吃。

“说呀！”女伴鼓励她，“我们是不是好朋友？昨天晚上潘乔打电话到我家，问你是不是‘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乌戈这只老猴精马上明白了一切，回答说你和我一块儿去看电影了。罗萨莉娅，你这个傻丫头，可以指望我们帮忙。我们

① 犄角：西方习俗，配偶与人私通，被欺骗的一方被称为“长犄角”，类似汉语的“当忘八”或“戴绿帽子”。

② 弗朗西斯基塔：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妻子弗朗西斯卡的爱称。

都站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边，站在你一边。”

罗萨莉娅仍然尴尬地看着盘子里紫红色的糊状物。

“喂，亲爱的，你还会多次需要那个……那个……那东西叫什么来着？在侦探电影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要证明某人被暗杀的时候他在别的地方，叫什么来着？‘不在罪犯现场’！”

“不在‘犯罪’现场。”罗萨莉娅低声纠正说。

“对。你还会多次需要证明‘不在犯罪现场’。从此以后，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大使一起吃晚饭，然后……等等……我打电话给潘乔，对他说我和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约好，请他派使馆的汽车到家里接我。当然，要让阿尔多开车。今天就可以开始……你跟你的男人取乐，我坐车到外边转转……到阿灵顿、芒特弗农、贝塞斯达……”她挤了挤一只眼睛，“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不在犯罪现场吗’？”

罗萨莉娅鼓了鼓勇气说：

“只咱们两个知道，对吧？”

尼珐轻声一笑：

“当然啦！你这姑娘倒挺聪明。咱们俩必须团结一致。人的生命不长，男人们都是些狗东西。统统都是。好，亲爱的，不说这件事了。你看那人穿的衣服有多标致！哎呀，我的上帝！罗萨莉娅，要是我有你的身材，非买一件不可……还要干更多更多的事……”

说完，向女侍者把手一招，要来帐单。

“今天由我付钱。”她说着，又挤了挤那只眼睛。

这个时刻，罗萨莉娅心里恨她，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9

这天下午，巴勃罗·奥尔特加觉得该见见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在公共电话亭里打了个电话：

“今天在乔治敦大街一家餐馆一起吃晚饭，你看怎么样？”

“倒是个好主意。”流亡者回答说，“不过，你认为不会给你惹出什么麻烦吗？”

“真心话吗，教授？”

听到朋友热烈而爽朗的笑声，他很高兴。

“好吧。我的问话当中有某些真心的成分，不过不算多。七点钟，在四轮马车酒家。”

“说定了！”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巴勃罗·奥尔特加就把汽车停在与威斯康星街交叉的一条小街道上，步行到四轮马车酒馆。奇怪，酒馆的门面漆成黑色，饰有殖民时代马车车灯，看上去像一家殡仪馆。

走进酒馆，很快就看到了他的朋友。主厅坐满了顾客，

莱昂纳多·格里斯教授就在一个角落的桌子上。

“真痛快！”巴勃罗坐下来，“总算有人可以谈一谈，吐吐胸中的闷气了……这一天过得糟糕极了，头痛得厉害。”

“仪式举行得如何？”

“好得出乎意料，大大出乎意料。说起来像是胡编乱造，我们的大使干得蛮漂亮，举止言谈完全比得上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他有扮演那种角色的气质，谁也无法否认。”

“远不止于此。他身上具有某种磁力。我毫不怀疑，艾森豪威尔喜欢这个乡巴佬。说来也难怪，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不招人喜欢的流氓呢！”

两个人喝完鸡尾酒，格里斯说：

“今天我问你是不是怕惹出麻烦，并非完全无的放矢。要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知道你仍然和一个叛国者保持关系，他会怎么想呢？”

“他大概早就知道了。”

格里斯缓慢地点了点头：

“可能，非常可能。最近两个星期，一个陌生人总是像影子似地跟着我，有时候我从住处的窗口朝外看，发现那家伙站在附近的路口……”

“有把握总是同一个人吗？”

“绝对不会错。我也敢肯定，过一会儿他会在这间主厅的门口出现，非让我看到他不可。从他执意让我注意到他这一点来看，差遣他跟着我的人的目的仅仅是恫吓。”

“好啊，但愿如此。不过，还是小心为妙。”巴勃罗嚼着一颗橄榄，“长得什么样子？拉丁人吗？”

“不。那人身材高大粗壮，一头金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像爱尔兰血统。好啦，谈点高兴的事吧。吃点什么？我建议要纽堡龙虾。”

“好极了。”

“葡萄酒？”

“由你挑选。不过请不要忘了，今天是我请客……”

“付钱的时候再争吵。”

乘教授在菜单上选酒的时候，巴勃罗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莱昂纳多·格里斯已经五十七岁，仍然保持着十年以前在塞罗埃莫索联邦大学教文学时那种健康的体格和灵活的头脑。他没有孩子，把学生们当亲生儿女看待，不仅给予他们知识，同时也给予他们父亲的慈爱。他那两只眼睛的表达能力令人吃惊，能交替地（或者同时？）表示温柔和强悍、严厉和戏谑、虔诚和怀疑。他的脸呈象牙色，像熟透了的麦田，皮肤光滑挺实，漆黑的眉毛与闪着丝丝银光的花白头发适成对照。他说话声音苍劲，富于抑扬顿挫，酷似一件定音精确的乐器，每当格里斯讲课或演说时总是弹奏得出神入化。“这个人呀，”巴勃罗想，“世界上难得找到。在他面前，我感到自由自在，恨不得打开心灵的龙头，让藏在里面的一切问题、疑虑和迷惘统统涌流出来……”

“昨天晚上，”几分钟以后，菜端上餐桌，格里斯说，“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了胡里奥·莫雷诺博士。我们在一条空无一人、半明不暗的街道上相遇。我跑过去要拥抱他，可是他扭头就走，越走越快，并且用头和手不停地向我暗示，拒绝跟我说话。醒来以后，我心里非常难过。仔细一分析，我认为做这种梦是由于内心有负疚感。”

“依我看，对于这位老战友，你没有理由感到内疚。莫非因为他死了，而你还活着吗？”

格里斯作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

“从理智上说，我没有什么过错……我本来打算和莫雷诺一起坚持到底，是他非让我逃走不可，而且是‘命令’我逃走。”

巴勃罗看着朋友盘子里的鲜红的龙虾皮，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未完成、仍然放在画架上的一张抽象派图画。

“那天晚上，在墨西哥使馆，”他一直盯着盘子里那块红乎乎的东西，“我们来不及细谈，还记得吧？避难请求获准以后，他们把你关在楼上，不准同外界接触……我承认，在华盛顿几次见面，我都想谈谈这件事，但有顾虑……”

“是这样吧？”格里斯笑了，“因为从心底里讲，你认为我不应该由于逃脱了‘悲剧之夜’那场劫难而感到骄傲。”

“现在谈吧，教授！当时，我仅仅是不愿意重新唤起凄楚的回忆而已。想让我坦率地说说对此事的看法吗？好。流亡在美国对你来说是件惬意的事。在这里，你的精神和物质条件非常优越，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尊重你。你生活相当舒适，经常去国会图书馆，参观美术展览，有机会听音乐会，看话剧……啊，这一切都使隐居在我们心灵洞穴深处的那个万恶的（或者值得赞叹的）幽灵在你的梦中出现，在你耳边嘀咕你和我都同样害怕的指责……是啊，因为根据‘神奇的句法’，修饰‘流亡’的形容词必定是‘痛苦’。”

“也许你说得对。”

一阵短暂的沉默。巴勃罗·奥尔特加用餐叉剥着龙虾

皮。一抬头，发现教授开始说话了：

“我相信，胡里奥·莫雷诺博士并非自杀身亡。”

“什么？”奥尔特加吃惊地皱起眉头。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莫雷诺。他非常珍视生命，不论他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他从来不曾使用过武器，那天晚上身边连一把水果刀都没有……当时，败局已定，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正指挥雇佣军向总统府进攻。我们一共有二百来人，准备以死相拼，坚持到底。莫雷诺把我们召到跟前，对我们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牺牲，讨厌无谓的死亡。请你们放下武器，自谋生路吧：投降或者逃走。现在，我宣布，你们对我的政府不负任何义务。谢谢。愿上帝保佑你们！’我提出异议，说他一旦被俘，必定被处决。莫雷诺回答说：‘不论死活，我都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格里斯呷了一口葡萄酒，朝酒馆门口望了一眼，转过脸接着对朋友说：

“总统府陷落以前十五分钟，我还在和莫雷诺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空空荡荡的大楼里。他脸色惨白，出着冷汗，呼吸困难。我执意留下来和他在一起，他却非要我走不可。最后，他终于用以下的理由说服了我：我可以在国外继续革命，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政府是一场‘白色革命’。‘我太老了，病得很厉害，不能和你一起干了。’他说。他简直是我推出空旷的总统府的。在那种情况下丢下朋友是我一生不得不做出的最困难的决定。几分钟以后，巴勃罗，我就去敲你的门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你都了解。”

“那么，为什么卡雷拉和他的匪徒们要编造自杀的神话呢？”

“莫雷诺在国内外都受人尊敬。要是让他活下来，他们就像手里捏着一块滚烫的土豆。如果明目张胆地处决，世界舆论会一致起来反对，对他们也极端不利。刽子手们制造自杀的谎言，一则能了却一桩心事，二则可以以此进行更恶毒的污蔑：造谣说莫雷诺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害怕审查他在执政期间为谋私利而进行的种种非法交易。现在明白了吧？”

奥尔特加迷惑不解：

“那么，胡里奥·莫雷诺博士也许是被暗杀……被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亲手暗杀的？”

格里斯耸耸肩膀：

“这一点我无法肯定。我想是先把他从总统府押解到城外某座监狱，后来才决定秘密处死的。没有一个本国记者，没有任何外国记者获准看他的尸体。萨克拉门托各报只是简短地报道了‘自杀’，没有刊载一张死者的照片。直至今天，谁也不知道他埋葬在何处。”

格里斯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相信，胡里奥·莫雷诺博士并非自杀身亡。”

教授发现所披露的情况引起了巴勃罗的不安，立刻转换了话题：

“迪奥尼西奥先生好吗？有消息没有？”

“两天前接到一封家信……可是还没有启封。僵局依然如故。”

“他会说，是我把你拉下水的！”格里斯亲昵地拍了拍巴勃罗的胳膊，“有时候我还想到那天晚上我们俩富有戏剧性的奔逃……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

“谈不到感谢，教授。我帮的这点忙恐怕是我一生中做

的最有意义、最荣耀的事了。”

“请相信，我的朋友，这个忙你并没有白帮。”格里斯机警地朝四周望望，压低了声音，“我们知道，卡雷拉不会允许遵照宪法在今年举行大选，他连个傀儡候选人也挑不出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对我们的事业是个巨大的帮助。我可以向你担保，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请不要说！”巴勃罗打断了他的话，“什么也不要对我讲！”

格里斯笑了：

“我对你绝对相信。”

“可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不管是事实还是名字。了解这一切会更增加我的烦恼……”

“不要以为我本人了解这场运动的所有细节。可是，我了解你的态度，巴勃罗。好吧，谈谈其他事情。一直在写文章吗？绘画吗？”

奥尔特加表情颓唐，慢腾腾地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有干，只感到空虚，整日里心神不定，对别人的话都心怀疑团。经常服阿斯匹林和镇静剂，仿佛它们能祛除我的心病。并且，还有一个精明过人的机械师——伊莎贝尔·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太太——仍在遥控我的一举一动。她使用的是‘生命’这架陈旧不堪但非常有效的机器：人的心脏，我生身父亲的心脏。”

“这么说，你像个卫星一样沿轨道转动？”

“更可悲的是，教授，我围绕着一个泼皮无赖太阳转动。这难道不算奇耻大辱吗？”

莱昂纳多·格里斯用食指敲了敲胸前心脏的部位：

“用个古老的雅语，你那高尚的心灵如何？”

“爱情？女人？没有一桩严肃的。今天找个半妓女，三四天以后再找一个……我的一切都在不热不凉的‘半’的范畴之内。我是半个诗人，半个画家，和半妓女睡觉，性欲得到一半满足。其中最可怕的是对整个处境感到‘半’羞耻……”

“我的影子来了！那个穿浅色雨衣的傢伙……”

巴勃罗转过脸寻找朋友所说的‘影子’：

“那个金黄头发，手里拿着帽子的？”

“就是他！你看，他正瞪着眼朝这边看呢……”

巴勃罗站起身，决心走过去质问陌生人，可是格里斯用力一拉他的前襟，让他重新坐下。这时，穿浅色雨衣的傢伙突然转过身朝街上走去。

“沉住气，巴勃罗。我相信他们只想恫吓我。我想装作没有发觉。今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关于今天在‘邮报’发表的那封公开信。你读过了？好。对方用丝毫不带口音的纯正英语说：‘你听着，老兄，要是还爱惜皮肉，就不要再给报纸写什么公开信。’好啦，说说别的吧。最近你至少该常听音乐吧？”

“对，经常听。正是因为有音乐我才免于坠入凡夫俗子的泥坑。巴尔托克^①的四重奏使我想起支离破碎的世界，看到了我们身在其中的迷宫的音乐形象。太逼真了，我没有勇气继续听下去，否则情况更糟。我倒爱听意大利的原始乐曲，它们描绘出一个福音的世界，虽然可能纯属虚构，但毕

① 巴尔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

竟美好。是啊，乐曲里总是有若奥·塞巴斯蒂安老人出现，他懂得上帝的语言。它们使我相信，生活和世界可以朴实无华，爱还可能存在。说到音乐，我想问一句，教授，你的大提琴怎么样？”

“不妙。在角落里发霉呢。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没有走近过它。”

“我忘不了那个夜晚，你为我和贡萨加拉了一曲巴赫的‘帕蒂塔’，还记得吧？那是在十月份，月亮正圆，窗户敞开着，客厅里朦朦胧胧。一切都那么美好。”

格里斯微微一笑，神色凄凉。巴勃罗想：“我倒愿意眼前的老人是我的父亲。”但转而又觉得这种想法太懦弱，不由地感到脸上和耳朵火辣辣的。他喝了一大口葡萄酒，动作机械、呆板。

咖啡端来了。格里斯问：

“一个人，如果正在筹划一场革命，考虑从哪里购买武器弹药，怎样偷运进萨克拉门托……怎样建立军事联络，哪些战略桥梁应当炸毁，等等，等等，你认为他能用大提琴演奏巴赫的乐曲吗……比如说他的巴沙加牙舞曲？还有，你认为这个人——尽管他反对暴力，其理想是躲到一个角落里读柏拉图的著作，写关于贡哥拉^①的论文——能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吗？”

巴勃罗犹豫片刻。

“可能，这也正是我吃惊之处。”他拣起一块面包，用手指揉成一团，想起了他的朋友比尔·戈德金——老记者口

^① 贡哥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以语言晦涩为特点，形成“贡哥拉派”。

袋里总是装着喂鸟儿和松鼠的食品。他又接着问：

“在你看来，格里斯博士，一个好的革命者应当怎样做呢？”

“正如安德烈·马尔罗^①笔下的人物所说，一个好的革命者应当像摩尼教徒一样崇尚行动”。

“作为革命者，先生对自己如何估价？”

“充其量是三等，巴勃罗。问题在于，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是最糟糕不过的实干家。斯大林憎恶这类人，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不信任绝对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不承认任何事物都黑白分明的概念，认为人们有各自的色调、各自的观念和问题。这些都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往往让真正的革命实干家们大为光火。还有，记得马尔罗笔下的一个人物曾说过，很多人企图从《圣经·新约启示录》上为各自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巴勃罗若有所思地摆弄着面包屑捏成的小球。格里斯说：

“来看看我的处境吧。我既非摩尼教徒又不崇尚行动，自认为是个旁观者。如果对故土的命运无动于衷，就要遭受良心的谴责；如果卷入革命密谋，那个‘拉大提琴、读柏拉图和贡哥拉著作的人’会对我投来狐疑的目光，以他特有的方式谴责我。在革命成功之日，我又很可能受到同志们的谴责。总之，知识分子是注定要受谴责的。”

“总该有个出路！”

“事已至此，我只能履行向死去的朋友许下的诺言，闭

^①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

上眼睛进入革命密谋，一直干到底！”

侍者走过来，刚要把帐单递给格里斯，奥尔特加不顾朋友不满，一把抢到手里。

离开酒馆，刚刚在街上走了几步，格里斯就望见穿浅色雨衣的人站在拐角处。奥尔特加也看到了，嘴里嘟囔了一句威胁的话。

“别理他。”教授说。

巴勃罗把朋友甩到后面，紧走几步，来到陌生人跟前，面对面地质问说：

“他是我的朋友，你打算干什么？”

对方倒退一步，似乎防备奥尔特加动手。

“你说什么呀？我不懂。”

奥尔特加攥着拳头，脸上肌肉绷紧，忍住心头怒火，尽管他知道与眼前的彪形大汉搏斗肯定要吃亏。

“你心里清楚！不过，那是枉费心机。回去告诉雇你来干这件肮脏勾当的人，格里斯博士吓不倒！”

“你疯了。”那人讪笑着低声说了一句，转身走开了。格里斯来到朋友跟前：

“巴勃罗，你险些挨一顿揍。那傢伙像个拳击手。”

奥尔特加怒不可遏，熄灭了的香烟还粘在嘴唇上。两个人默不作声地走了一阵。巴勃罗想着那人的相貌：脸色红润，下颌方正，嘴长得凶狠残忍。谁出钱雇他来的呢？乌加特？对，只能是这条警察老狗。他把烟头吐到地上。

格里斯挽起他当年的学生的胳膊，想驱除刚才的事件在他心上留下的阴影，

“五月份我应邀到阿美利加大学讲演，届时要谈谈我国政府的真相……”

“我一定参加，请你相信。”

“不，巴勃罗，请你不要去。那是无谓的冒险。”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来到Q街以后往东一拐，便是格里斯博士那套小小的房间所在的街区了，沙皇时代的俄国大使馆就坐落在这里。

“想上楼吗，巴勃罗？”

“当然。看着你安全到家、锁上门我才放心。”

教授的房间在四楼。巴勃罗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人藏在里面才决定离去。格里斯笑着说：

“你看见鬼了。有鬼也好，没有鬼也罢，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想喝杯香槟吗？要么听一曲巴赫或者威伐尔地？”

“不用了，今天太紧张了，得早点睡觉。”

两个人紧紧握了握手。巴勃罗来到人行道上，朝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影，才朝停汽车的地方走去。

Q街……Q街？他忽然想起来了。格伦达·多列玛斯就住在这条街上！姑娘把地址用蓝铅笔写在了她的论文的书夹皮上。Q街3050号。再走几步就能找到这个门牌。格伦达的房间在几层？不记得了……

他望着大楼上几个还亮着灯的窗户。

10

格伦达·多列玛斯没有脱衣服，光着脚，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望着电视屏幕上晃动的人影。但不管多么想集中精力，却始终看不清他们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在整整一天的工作中，她总算忘记了自己还有个胃。可是，刚一进家，那“饿痛”夹和着恶心的难受感觉立刻重新出现了。她曾怀疑是否患有胃溃疡或者更危险的病症，但不到一个星期前拍的X光照片证明消化系统没有任何异常。医生坚持说她的感觉来自心理方面，劝她去找心理学专家诊断。啊！不去，绝对不去！

今天晚上，她拒绝了泛美联盟一位同事请她共进晚餐的好意。想到饭就恶心。然而，她知道，只有吃点什么才能减轻胃部“疼痛的空虚”。

屏幕上，西部牧人正在进行枪战。格伦达站起身，关了电视，来到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倒进杯子里一点，战战兢兢地一口灌了下去。没有比牛奶的气味和味道更能唤起她对家庭的回忆了。她返回起居室，想起了父亲和母

亲，望着写字台上、花瓶旁边父母的相片，从抽屉里拿出当天上午收到的一封父亲写来的信，坐到软椅上重新读起来。

亲爱的女儿：你为什么不上回家来呢？我知道，樱花开放的季节华盛顿一定很漂亮，但是我们的亚特兰大也桃花满枝了。你母亲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至今你还没有决定学什么学科。去年是英文和文学，今年又要学什么拉丁美洲历史。学它有什么实际用途呢？

你母亲感觉仍然不好，患了脉管炎，卧床不起。我们都为你的健康担心。最近的暑假你没有来看望我们，现在又说也许不来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你母亲和我一样，非常伤心。你为什么如此仇恨南方呢？其实，华盛顿的黑人比白人还多。你在信里埋怨说在那里没有朋友，感到不幸福。那么，为什么又非住在那个你认为单调乏味的城市呢？回家来吧，孩子。依我看，你不该让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毁灭一生，对那些事情你是毫无过错的。如果说其中谁有过错的话，那只能是我。不过，上帝可以作证，我对所做的事情至今不悔。

格伦达猛地把信扯个粉碎，扔进字纸篓里。父亲没有权利谈起那桩事！

她又莫名其妙地感到想洗个澡。白天，这种想法屡次出现，工作时间里也不例外，往往突然产生一种幻觉（她承认，这种幻觉荒唐，但又无法克服），认为浑身肮脏，散发臭气，人们纷纷捂着鼻子躲避。这固执的念头使她变得落落寡合、疑窦重重，性情乖张，难以进行社会交往。

她走进浴室，脱下衣服。不过在洗澡之前先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摸一摸乳房、肚子和阴部——心里倒没有感到性欲或虚荣，而是出于一种临床的好奇，在身上寻找可能是恶性肿瘤迹象的硬块。她被固执的念头纠缠，认定将死于癌症，也许是子宫癌。她竭力唤醒理智，但无济于事。有时候甚至嘲笑自己的怪癖，但仍然摆脱不了。不祥的预感一直煎熬着她的思想，折磨着她的生命。

突然，她疑心此时有个隐身男人在窥视。一阵惊悸和羞耻涌上心头，赶紧用浴巾裹住身体，直到打开水龙头才把浴巾扔开。擦了很多香皂，浑身泡沫。洗澡太好了。她并不爱自己的躯体。恰恰相反，有些讨厌它。作个女人确实不易。每逢月经来潮，她都觉得熏得全城一片臭气，于是变得脾气急躁，粗鲁，恨不得躲藏起来，从地球表面消失。格伦达狂乱地搓着全身，指甲在胳膊、乳房和大腿上抓出一道道红印……

“必须想个办法。”她暗暗寻思，“不然会发疯的。”

喷头的水温降下来，她擦干身体，渐渐恢复了平静，回到卧室，觉得刚才举止太过分了。当然啦，孩子，这一切都是幽灵，必须学会控制神经。沉住气！

她穿上睡衣，回到起居室，坐在写字台旁边。写字台上放着本学年末要向大学递交的论文底稿。原以为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是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小国，进行一项解释性的研究并不困难，有时甚至认为论文很好，不承想怀疑倒比乐观的时候更多。她觉得写得肤浅，幼稚。也许当初攻读生物或社会学更好。要么什么也不学！

她拿起放在原稿旁边的信封，里面是一张萨克拉门托新

任大使星期五举行招待会招待外交界人士的请帖。请帖的下方有巴勃罗·奥尔特加手写的短信：“届时务必参加。论文已读，面谈。保证招待会不令你失望。”

格伦达又躺到沙发上，想起了巴勃罗。对他怎么看，本人也不清楚，不过已经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感情来——这倒使她有点忧虑。原来觉得小伙子富于魅力。至于魅力何在，确实难以看清。也许这个萨克拉门托人是她头一个感兴趣的男子……有一点兴趣。喜欢他那张严肃而刚毅的脸，喜欢他那像独弦琴一样干脆的嗓音——说起话来没有外交圈里那种装腔作势的通病。巴勃罗·奥尔特加与她认识的大部分拉丁人不同，既没有吃女人倒贴的家伙们那种派头，也不把她看作手到擒来的猎物。这确实也使她高兴。可恨肤色太深了一点。可是，肤色深浅有什么关系？她翻过身，趴在沙发上，用软垫挤压着胃部。

她又想起了请帖，巴勃罗的字体浮现在脑际：粗壮、坚定、清晰，仿佛表明书写者的慷慨、坦诚和男子汉的剽悍。是啊，可惜小伙子皮肤微黑，像个摩尔人……。

他如何看待我的论文呢？要是不喜欢，为什么不马上说？他以为仅仅保证招待会不让我失望就能把我吸引去吗？他如此相信有他的陪伴我一定会高兴吗？

可以在招待会上穿的衣服一件件在眼前闪过。衣服不多，或许塔夫绸黑色连衣裙最合适……可是，还没有决定出席呢。这类聚会她了解，人们麋集在一间大厅里，挤得摩肩擦臂，一面喝酒一面大声喊叫，个个昏头昏脑，谁也不知道在喝些什么，说些什么。其实没有谁能开心。不去！为什么非去不可呢？仅仅由于奥尔特加在下面写的那几句话吗？可

以另找机会讨论论文。她想从记忆中抹去巴勃罗的身影，但又抹不掉。

小伙子大概有什么心事，从他脸上就看得出来。一桩或许多心事。想到奥尔特加可能不幸福，她产生了某种帮助他、吸引他、迫使他倾吐心曲的愿望。也许奥尔特加正是她所需要的朋友。可是，莫非真的需要朋友吗？这个朋友必须是异性的吗？她害怕再惹出麻烦。每次同意和认识的男人晚上外出她都后悔不迭。十个当中有八个想吻她、五个企图强谋不轨！

她从睡衣口袋里摸出一片抗酸药，放到舌根下面溶化。巴勃罗·奥尔特加……还有什么？名字的后半部分想不起来了。他的血管里流的是什么血？印第安人的还是西班牙人的？他的长相既不像印地安人又不像黑人……摩尔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达几个世纪之久。巴勃罗大概是摩尔人血统。摩尔人属非洲……。可是，一个中美洲国家大使馆的秘书是什么血统与她有什么相干？所有的血都同样肮脏。所有的人都同样肮脏，不光肉体脏，心灵也脏。所有的男人，无一例外。啊，上帝！必须找点事干，填充这个夜晚。电视节目令人无法忍受。读书？现在仅仅出版内容乌七八糟的书：同性恋、种族暴力、懊丧、绝望。不是黑人写的，就是出自犹太人笔下；这两个种族都仇视美国白人。

格伦达也想到打电话给某个女友。有什么好说的呢？可以钻进汽车，沿着波托马克河边的公路漫无目标地奔驰，然后回到家里，吃一片丙二酰脲，睡上一觉……为什么不一次吃下五十片安眠药呢？

也许自杀能一了百了。可是，真心想轻生吗？不。只有

知道内脏有个癌瘤正像死亡之火一样生长的时候才肯自杀。

她紧紧抱住沙发垫，压住胃部。

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克莱尔·奥吉薇小姐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来。

“喂，谁在讲话？”小姐满心不高兴，因为正坐在电视机前看她最喜欢的节目。

“我是米歇尔。”

“有什么事？”

“奥吉薇小姐，”大使馆总管压低声音说，“是件秘密……”

“大声点，伙计！什么事？”

“我的处境非常困难，小姐。是关于星期五的招待会……请原谅，不过我觉得在大使馆内谈这种问题很危险。”克莱尔听见电话线另一端传来总管社交性的咳嗽声，“嗯，你知道，十年以来，总是由‘田园风光’饭店承办我们的酒席。这家公司有名望，头等食品，职员们个个殷勤。总之，所提供的服务无可挑剔……”

“我知道，米歇尔，知道。那么，有什么问题？”

“这一次出了件令人遗憾的事。乌加特将军越过了我的管界，把承包权给了派克——帕克饭店。”

“也许条件更加优惠吧。”克莱尔安慰说，其实连她本人也不相信，眼睛仍然盯着为接电话不得不调低音量的电视机。

“哪里话呀，奥吉薇小姐！贵百分之二十！不用我说，你知道，那可观的百分数要落到谁的腰包里……”

“别着急，米歇尔。吃亏的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国库。我非常遗憾，但无能为力……”

“可是，小姐，请考虑考虑我的处境。和往年一样，我已经答应了‘田园风光’饭店。简直是一场灾难！”

克莱尔急于接着看电视节目。她想象得出总管那副面孔：长长的鼻子几乎遮住了发紫的嘴唇，小眼睛一眨一眨，表情既唯唯诺诺又充满醋意。

“是啊，米歇尔，真糟糕！这一回你要损失百分之十的抽头了，嗯？”

“小姐！”

克莱尔·奥吉薇挂上了电话。

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萨克拉门托大使馆的汽车停在大使住宅门口。阿尔多·博雷里跳下车，打开车门，从车里走出了罗萨莉娅·比万科。她竖起大衣领子遮去半个脸，用一块头巾捂住头，在下巴下边绾了个结。她按按门铃，米歇尔立刻把门打开请她进去了。阿尔多回到司机座位，留在车里的贵妇命令说：“到小石河公园，慢慢开！”司机启动汽车，心里开始感到惊讶。从他近几个星期看到和听见的一切判断，把汽车后排座位塞得满满当当的这头肥胖母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她身上强烈的香水味使人作呕，钻进司机的鼻孔，仿佛是在淫荡地挑逗。我的妈呀！他只想和妻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攒下点钱把小弟弟从意大利接来……如果将军夫人年轻漂亮，除了冒或许被将军当场捉奸的风险之外，倒也凑合。

“夜色很美，阿尔多！”

“非常美，夫人。”

意大利籍司机从反光镜里瞄见了车上的女客。从外表上看，她很像某些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的女人，肥头大耳，唇上长着浓浓的绒毛。不过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女人对丈夫忠诚，讲究体面，有高度的荣誉感。在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为了名声，不惜鲜血淌流，不惜以命相抵。

公园里来往车辆很少。走到十字路口，阿尔多犹豫不决：

“往哪儿走，太太？”

“去看樱花，沿河朝前开，然后到杰斐逊纪念碑，到石碑下面。”

石碑，尖尖的石碑！尼珐·乌加特心猿意马，仿佛在抚摸尖石碑换来的同样形状的肉质器官。她现在确实冒着风险，但正因为有风险才富于刺激性。一位女友曾对她说过，追逐猎物比杀死它更令人动心……

“结婚了吗，阿尔多？”

“结婚了，太太。”

“妻子多大岁数？”

“二十八。”

“长得漂亮吗？”

“我认为漂亮，太太。”

“有孩子吗？”

“两个，太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尼珐看着意大利籍司机那年轻、健壮的后颈，魂飞魄荡。

几分钟以后，梅塞德斯—奔驰牌汽车经过杰斐逊纪念碑。尼珐夸奖华盛顿是个美丽的城市。阿尔多到过萨克拉门托吗？没有？太可惜了。应当去看看。塞罗埃莫索像一块宝

石，座落在绿色的河谷之中。那里气候温和，殖民时代古老的建筑到处可见。大教堂——啊，我的上帝！——纯正的普拉特^①风格（要是他追问什么叫普拉特风格，那我就倒霉了）。

汽车又驰到波托马克河边，司机问：

“现在呢，太太？”

“我们必须消磨时间。我答应十一点半去接女友。到弗吉尼亚！”

“臭女人！”阿尔多·博雷里心里骂了一句，“要是乌加特将军知道了，我非丢掉饭碗不可，甚至挨一顿揍……”

汽车穿过纪念桥，朝亚历山大方向开去。看到飞机场蓝色的灯光，尼珐命令说：

“把车停在那儿，紧靠河边。”

混帐老太婆！阿尔多把汽车开出沥青道，停在河沿上。飞机场中央，一道紫色光柱直冲天际。

尼珐在座位上艰难地移动肥胖的身躯，不时发出一声呻吟，最后打开门，下了车。对眼下可能出现的前景，阿尔多·博雷里已经心烦意乱……这一切不仅危险，而且可笑。他想到，今天晚上返回家里，要是向妻子安托尼埃塔说：“你想象得出来吗？将军的妻子让我把汽车停在荒无人烟的河边，然后……”思路突然被右面车门开启的响声打断……肥胖、热乎、散发着浓烈香水味的尼珐·乌加特坐到了他身边。“坐在前边好。”她说，“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飞机。”确实，机场不时有飞机起落，在水面上低空飞行。阿尔多·

① 普拉特：一种带复杂花形装饰的建筑风格，源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

博雷里用力握住方向盘，脸上肌肉紧绷着。

“像你这样标致的男子汉，阿尔多，”尼珐把肥大的手放到司机的膝盖上，喃喃地说，“不该满足于现在的职业。你甚至可以成为电影或电视演员。”

一架飞机带着刺耳的轰鸣朝机场方向飞去。

阿尔多·博雷里牙关紧咬，一言不发，死死盯着纷乱地映着河岸灯光的水面。尼珐呼吸急促，心脏越跳越快，像是要冲出胸膛。猛然间，她如同一个性欲似火的少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开了阿尔多·博雷里裤子上的拉锁。

比尔·戈德金从R街回到寓所已经十一点半左右了。上床以前，他想再抽一斗烟，于是坐在起居室里，看着屋里的陈设。“专打猛兽的猎手，”他想，“用老虎、豹、美洲豹和野猪头制成标本，挂在墙壁上……像我这样专门猎取人的猎手，则乐意保存‘猎物’的照片。”他的四壁挂满了三十年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知名人物的照片。其中，戈麦斯、桑地诺、卡德纳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瓦加斯、索摩查、桑托斯·杜蒙特、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等人的照片都有本人的亲笔签名。他站起身，带着特殊的兴趣就近仔细端详其中一张放大的照片。这是他一九二五年在卡拉维拉山上亲自给胡韦蒂诺·卡雷拉拍摄的，卡雷拉四周簇拥着他的参谋部人员。你看，这些蓄胡须的匪徒们个个带着宽沿帽，斜挎子弹袋，腰上别着大刀和手枪。他特别注意个子最高的那个人。虽然抓拍的照片因年深日久而泛黄，但仍然可以看出，一伙人当中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那张脸表情最为丰富。

比尔又坐下来。房屋的每个角落都保存着他访问过的拉

丁美洲国家的纪念品。壁炉旁边的博物架上放着从一位墨西哥印第安艺术家手里买来的“生命之树”。你看，它繁花满枝，花儿朵朵，颜色各异，小鸟，孩子和天使们在上面玩耍。摆在“生命之树”旁边的“独角仙”是比尔头一次采访阿亚·德拉托雷时那位秘鲁阿普拉党创始人送给他的礼品。猎兽绳索的仿制品是一位乌拉圭政治家赠予的。另外，起居室里还摆放着智利黑陶器、哥伦比亚的响葫芦、秘鲁、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地毯——每个物件都包含着一段历史。他现在坐着的软椅旁边，烟丝罐的下方，把和鞘都镂花的银剑是巴西瓦加斯总统的赠品，现在他用作裁纸刀。

抽完一斗烟，戈德金走进卧室，脱下衣服，穿上睡衣，来到浴室刷牙（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刷牙时左手叉腰……）。他尽量不看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可是，镜子里那个人却想和他交谈。别无他法，只好看上一眼。

“怎么样？”镜子里的人问。

“平淡无奇。”他心里回答，“绝对平淡无奇。生活依然如故，最好不要谈论这个题目。”

牙膏的泡沫从线条难看的大嘴嘴角流出来。戈德金对着镜子端详。假设上帝给他一张女人们喜欢的脸，比如像巴勃罗·奥尔特加……甚至像奥尔兰多·贡萨加，那么他以往走过的生活道路会有所不同吗？假设他像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样，身高一米九十，长一张玛雅印第安人的面孔，又将如何呢？说得更清楚一些：如果具有萨克拉门托新任大使那种激情、气魄和胆量，那么他，戈德金，今天会是个孤独的鳏夫、区区联合通讯社的拉美部主任吗？

他想起了过世的妻子。可怜的露丝！在加勒比海海滨旅

馆的阳台下，看中了他哪一点才答应了他不合时宜的、怯生生的求婚呢？可怜的姑娘！就其灵魂而言，简直是个女传教士。十字军的服装穿到她身上会很合适的。比尔笑了，他多次梦见露丝身穿这样的衣服在纽约西亚一面敲着手鼓一面唱圣歌……每次想到这里他都心酸。

他又对着镜子用挑剔的目光打量起自己的形象。土黄色的头发已经稀疏，略显玫瑰色的白皮肤上出现了老人斑。眼睛倒还清亮，只是像雕像似的毫无表情。说到雕像，记得有人说过，鼻骨折断以后他很像米开朗琪罗^①。和露丝一起到欧洲游历的时候——那次旅行以后露丝就告别了人世——两个人曾参观佛罗伦萨费约尔圣母教堂。面对米开朗琪罗的名画《哀悼基督》，一向对雕塑不大感兴趣的他也激动得不能自持，仿佛胸前挨了狠狠的一拳，一时间喘不过气来，两行热泪滚出眼帘。露丝温柔地挽着他的胳膊，凑到他耳边低声说：

“亲爱的，扶着死去的耶稣的那个人跟你多么相象！”鼻骨折断，反而像米开朗琪罗，令人舒心的安慰！

戈德金躺到床上，拿起晚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消息仍然充斥版面。多米尼加的独裁者向古巴革命政府发出含糊不清的威胁。杜勒斯已经奄奄一息，即将任命一名新国务卿。艾森豪威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宣称，各成员国应当准备长期与苏联紧张对抗。多么美好的世界！多么了不起的世界！

戈德金开始浏览非政治消息。有一条消息说，从南非到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加利福尼亚州，一种新式“体育运动”正在学生中流行，人们争相回答一个意义空前的问题：“一间电话亭里能挤进多少人？”加州圣玛里学院声称在小小的空间塞进了二十二名学生，摘取了世界冠军的桂冠。比尔轻轻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难道他们无事可干了吗？”

报纸的另一版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埃里诺尔·罗斯福先生在以色列花了七十七美元买了一头骆驼作为送给孙女的礼品，但美国农业部以可能带有鹅口疫病菌而禁止入境。

“好……”老记者心里想，“世界还没有彻底完蛋。”头一天晚上，六千万美国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在好莱坞一家电影院举行的1958年奥斯卡奖授奖仪式。“六千万！”比尔把报纸扔到地上，关了灯。六千万双眼睛盯着闪光的屏幕，看着幽灵派生出的幽灵，听着谎言制造出的谎言。六千万，这是最高的奖赏，是孩子游戏界的最伟大的胜利！在这愚蠢的表演幕后，总是有某个工厂要推销其产品。

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露丝。奇怪的是，随后又想到当天下午躺在樱花树下草地上的一个姑娘：穿一件鲜黄色紧身运动衫，胸脯平缓，两个乳房显得特别突出。她像一枚刚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水果。不！该是一朵黄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鲜花女神。戈德金望着她，目光中既有男人的欲望也有父亲的慈爱。是想要她作女儿还是当情妇呢？说不清楚。不论怎样，那鲜花女神使他更尖锐地感到，时间已经流逝，无可挽回。

11

豪尔赫·莫利纳博士热爱自己的孤独和寓所里的一切，有时候这种情感不仅来自精神，而且来自肉体。每当环视用作办公室的小房间——紧挨墙壁摆放着书架、油漆窄木木板拼成的地板不铺地毯，从亚历山大拍卖市场买来的宽大的老式桌子上放着镂有殖民时代花纹的油灯、各种字典、精装书籍、文件以及孩提时代在学校用过的那种廉价木杆鹅毛笔，每当用指尖摸摸羊皮封面珍本书的书脊或者打开闻一闻（散发着因年深日久而泛黄的气味），他都感到身上有一种干巴巴的、微小的情欲得到满足的欢娱。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坐在桌前整理为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大主教写传记的资料和计划。现在，似乎脊背疼痛，他站起来，双手叉在腰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按塞罗埃莫索一位医生的说法，他患有脊椎骨衰变。医生把x光照片给他看——上面还有脊柱后侧凸出的迹象——笑着说：“亲爱的，脊椎弯曲是我们为变成二足动物付出的代价。”天气潮湿的日子里，莫利纳总是感到上肢和肩部隐隐作痛，不过

尚能忍受。但是，一旦胳膊或者头部动作过猛，刺心的疼痛便从颈部传导到指尖，半分多钟的时间里使他无法支持。

公使衔参赞揉揉胳膊，挺直胸膛，从挂着一幅十八世纪萨克拉门托地图（真品）的墙壁走到对面挂着潘菲洛照片的墙壁，照片上有大主教语气亲切的题词。莫利纳寓所唯一的另一张照片是亲生母亲的，镶在银质镜框里，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

晚上，在寓所工作的时候，公使衔参赞往往不穿睡衣，而是穿一件方济各会修士服，脚上穿拖鞋。这样，他内心有一种难言的快感……他想，要是有人闯进来，看到他这副模样，一定会觉得荒唐可笑，以为他患了躁狂症，精神失常，甚至认定他品格堕落。这种危险由来已久，所以他从来不邀请任何人到他的寓所。熟人当中，包括大使馆的同事们在内，没有谁知道他的住址。他没有电话，也不想安装。一旦需要，可以打公用电话。

这天晚上，打从开始工作的时刻，他一直同潘菲洛大主教进行着一场想象中的对话。现在，头脑中响起莱昂纳多·格里斯的声音：“我再问一遍：你如何为他写传记？以朋友的激情还是用历史学家的冷静？”

这是个极为中肯的问题，他本人过去和现在一直扪心自问。萨克拉门托现任大主教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贬抑者们指责他执行一项狡诈的曲线政策，所以不论谁出任共和国总统，他都同样受宠。尽管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但在政治把戏需要的时候却能沉默不语——沉默得令人吃惊！

“喂，莱昂纳多，”公使衔参赞想，“我亲爱的朋友潘菲洛大主教的一句话足以揭开他的政治社会活动的全部秘

密。有一天他对我说：‘亲爱的莫利纳，为了保卫教会，有时候必须同魔鬼以及它们在人世间的代表作交易。’”耳边响起流亡者的笑声：“你这位朋友的政治神学太让我开心了。”

豪尔赫·莫利纳极力从头脑中抹掉政敌的影象，如同端坐禅室的和尚祛除妖精一样。他停下脚步，挺直胸膛，把头左右摇晃一阵，然后回到桌前翻弄起书籍文件来。有关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先生的材料应有尽有，眼前就是他的自传：“忏悔”，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写成。手边还有大主教几乎全部信函的影印件——从少年时代在寄宿学校写给父母的信到在神学院就读时文笔流畅的信（写得太妙了！简直是光彩熠熠的宝石！）最重要的要数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写给当时的大主教、他的朋友和忏悔神父埃米尼奥·奥马萨瓦尔的信了。为了搜集这些资料，莫利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现在才着手整理、分类。

他拿起写作计划——纸上写着章节次序，每一章的题目下面都列用索引（见某封信，见某书某页）——开始补充一些新的想法。半小时以后，他已经晒得眼皮发沉了。

他关上灯，走进卧室，准备睡觉。像往常一样，先跪在床前，开始背诵祷词：“神圣的天主，用神圣之光照亮我的心灵吧！”

他正在默念祷词，却感到格里斯出现在身边。他想向潘菲洛求救，又不见大主教到来。流亡者在他耳边低声说：

“难道没有发现，莫利纳，你发出的信息无处可去吗？”

他想起了一个欢快的场景：潘菲洛担任宗教仪式主持人的时候身穿教服，在祭坛上布道……声音变化无定，时而像洪钟，时而像木锤，时而又柔软得像天鹅绒；精工巧饰的教

堂，与袅袅上升的香火浑然一体，同样散发出怡人的气味。

“豪尔赫，圣母定期让人们忍受苦难。”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对自己的肉体感到羞耻？莫利纳茫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才接着祈祷：“对我主虔诚，赞颂我主美德。阿门！”

躺到床上，闭上眼睛。他想，如果恢复对上帝的信仰，一切都会尽善尽美。

1933年，萨克拉门托外交部授命阿丰索·布斯塔曼特按照他的喜好重新布置一直很寒酸又毫无特色的驻华盛顿大使馆。为了完成这项使命，颇有资财却无继承人的老外交官热情奔放，兢兢业业，最后甚至自掏腰包补充政府经费的不足。阿丰索先生通过马萨诸塞大街这座庭院的二十多个大厅和其他房间向几位法国路易斯国王表示了敬意，但也没有对他所敬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欠下情分，更不曾忘记履行对他的先人的祖国西班牙的文化义务。阿丰索先生非常崇拜伊萨伯拉^①，曾就这位大名鼎鼎的女王写过一本专著（非卖品，1942年版）。出于高雅的兴致，他指示按照纯正的伊萨伯拉风格布置大使馆的几个主要房间——几年后胡韦蒂诺·卡雷拉大元帅应弗兰克林·罗斯福邀请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美国时才启用。我们这位人文主义外交家常说，伊萨伯拉风格集各派之大成，有穆德哈尔式的激情、哥特式的神秘和文艺复兴式的精巧。

① 伊萨伯拉（1451—1540）：西班牙女王，实现了西班牙统一，支持哥伦布探索新航路。

现在，就在这张宽阔的伊萨伯拉式的大床上，躺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和罗萨莉娅·比万科，两个人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他们刚刚结束的云雨之欢足以使穆德哈尔式的激情逊色，让哥特式的神秘俯首，令文艺复兴式的精巧相形见绌。至少在此时此刻，两人同样心满意足，同样感到困倦，同样浑身无力。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喜欢开着所有的灯交欢，而罗萨莉娅却爱在黑暗中行事——她尚对自己赤裸的肉体感到害羞——于是只在屋子的一角点着一盏光线微弱的蓝色小灯。

大使仰面躺着，双腿稍稍叉开。罗萨莉娅趴在情夫身上，头偎在男人宽阔的胸脯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用左手梳理着女人的头发，右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从颈部一直摸到脊椎的底端，用余兴享受着女人柔软、温暖而富于弹性的肉体提供的欢娱。一连几分钟，两个人都一声不吭。从罗萨莉娅呼吸的节奏和他胸脯上感到的气息判断，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以为她已经睡着了。于是尽量控制呼吸，以免胸腔起伏过大把情妇惊醒。突然，她低声问：

“这一切会落个什么结果呢？”

他沉默了片刻，仿佛不曾听到情妇的话，后来才说：

“你年轻，漂亮，会有好结果，世界是属于你的。但是我预感到，我则不然，会在暴力中结束生命。”

“别这样说！”罗萨莉娅低声说着，飞快地在他胸脯上吻了一下。

“亲爱的，人必须以在暴力下死亡作为他崇尚暴力的代价。”

“并不全都这样。”

现在，她抚摸着埃略多罗的肩膀，闭着双眼，仿佛在摸索着雕刻情夫的身形。

“你的躯体像是刚刚四十岁。”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能也不想掩饰这句话给他带来的欢乐。

“我从小就爱自己的躯体，喜欢以河水、小溪或池塘当镜子看自己的脸……”

“你家没有镜子？”

他没有回答。记得母亲有一面从集市上买来的那种镶金色木框的廉价镜子。她常常对着它梳妆打扮。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多次看到男人们跟他母亲睡过觉以后站在那面陈旧的镜子前头紧紧领带、整整军服和军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恨那面镜子，有一天用石块把它打碎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皱了皱眉头。真的打碎了母亲的镜子还是那一切仅仅是个梦？最近以来，每逢回忆起往事，他常常分不清哪些确实发生过，哪些是梦中或纯属想象中的场面。

“你家没有镜子？”罗萨莉娅又问。

“记不得了。”他的语调仿佛是在讲述梦境，“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我的躯体。我从来不为它或者它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而感到害羞。我常常这样想：‘既然上帝给我一个躯体，就是为了让它好用，好好用它。为什么舍不得用呢？为了留给时间吃掉吗？为了喂土地里的蛆虫吗？’”

他停顿了一下，吻了吻罗萨莉娅的头发。

“你知道吗？人的聪明不在头脑中，而在躯体里。躯体

知道该干什么。人们必须学会躯体的语言。”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感到罗萨莉娅的乳房紧挨着他的胸脯，使他想起小时候在索莱达德马尔树林里吃的熟透了的芒果。两个乳房压在胸前，沉实而柔软，他用两只大手轻轻托住，闭上眼睛，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情感，回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回到了山上，正抚摸着 he 一生头一次交媾过的女人——美人鱼胡安娜。这绿色的回忆里散发着野草、炙热的土地、丛林和海风的气息……

“几点了？”罗萨莉娅问。

“用不着想钟表。”

“尼珐太太答应半夜以前来接我。”

“让她等着！”

可是，罗萨莉娅已经站在床边，身上裹着情夫的睡衣。

“忍耐点吧，亲爱的，我该准备走了。”

说着，躬下身，飞快地吻了吻情夫的嘴，光着脚跑进浴室。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已经为后半夜的孤单提前感到烦恼了。偌大的房间只有一个人，他又不爱早睡。那么，干什么呢？不懂英文，不会看电视节目。可以独自出去到附近一带走走。或者给弗朗西斯基塔写封信……也许最好是草拟一份关于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给大元帅的报告，然后随便拿一本书读读，唤来睡意……然而，真正惬意的是搂着罗萨莉娅朦胧入睡，一直睡到天亮……

再次占有她的欲望重新出现，并且来势极猛。耳边传来浴室里喷头的流水声。一个念头从他的躯体中产生，随后传导到头脑。他跳下床，跑进浴室，看见情妇站在喷头下边，

头戴橡胶护发套，水和香皂泡沫顺着她赤条条的身体往下流……

看到情夫进来，罗萨莉娅下意识地做了个害羞的手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走过去，把她紧紧搂在同样一丝不挂的躯体里。

“不行！”她嗫嚅了一声。

埃略多罗二话不说，把情妇按倒，就地再次占有了她。喷头里热气腾腾的水冲着大使先生的后背。

潘乔·比万科把汽车停在威斯康星与马萨诸塞两条大街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条小街道里。几乎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在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眼睛不离大使住宅。上层是卧室，不见一扇窗户里有灯光，但他相信，这时候罗萨莉娅躺在床上，躺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怀里。这种想法在他的胸部和头部引起了一阵肉体的痛苦，他感到呼吸困难，气喘吁吁，把手伸进外套口袋，用手指不停地摆弄起一美元纸币卷成的小圆柱。

神圣的上帝，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躲在花园里的一棵树后面等待着，连本人也不知道究竟等待着什么。有时候他曾想走进使馆，在前厅的台阶下面朝自己脑袋开一枪。想到罗萨莉娅的内疚，想到丑闻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华盛顿和萨克拉门托声名狼藉，潘乔·比万科感到一种病态的欢快。如果他——潘乔——自杀，一定要留下一封遗书，要求尸体运回塞罗埃莫索埋葬，那么罗萨莉娅就不得不随棺材一同回国了。身穿一身黑色丧服，虚伪的女人！不，不能这样说。她没有过错，可怜的姑娘。过错在他——潘乔。矮胖

身材，脸长得难看，皮肤总是油乎乎的。可是，为什么当初罗萨莉娅和他结了婚呢？自然，是她的姨妈米卡埃拉强迫的，为的是甩掉她。而她，罗萨莉娅，也想摆脱那个泼妇……

就在此时，也许情夫情妇正赤条条地搂抱着说他——比万科——的坏话，嘲笑他呢。她可能告诉大使，该睡觉的时候，自己反锁在卧室，不让丈夫沾身。听到这里，那印第安人大概会笑出声来。可能，非常可能罗萨莉娅还会向情夫披露一些别的隐私，辱没他——比万科——的男人人格！这条母狗！混帐女人！另一个不要脸的东西是尼珐·乌加特。她七点半到家里去接罗萨莉娅，说是一起去看电影，其实直接送到了大使的卧室。拉皮条的女人！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影象充满了潘乔·比万科的头脑。他想象着自己正在朝大使那雄伟的身躯开枪。五颗手枪子弹。一颗打在脸上，一颗穿进胸膛，另一颗穿透腹部，其余的两颗全部打他的生殖器……然而，他真有干这种事的胆量吗？不可能！还是应当自杀——他手指捏着纸卷，下定了决心。可是，最好能争取罗萨莉娅回头……一股占有她的肉体的炽热、疯狂的欲火涌上心头。奇怪……他不理解，也不想理解：恰恰因为知道淫妇回到家里时性欲已获满足，浑身沾满了另一个男子肮脏的唾沫、汗水和精液，他才比任何时候更想和这女人交媾。

从大树后面朝宅第正面张望，有三扇窗户亮了灯。他制定了今晚的行动计划。抢在罗萨莉娅反锁门之前钻进卧室，迫使妻子与他性交，即便必须强奸、打耳光、掐脖子让她就范也在所不辞……一定要占有她，让她的肉体脏上加脏！

远远望见一个人影在大使馆周围游荡。是更夫……潘乔从树后出来，低声吹着口哨，沿马萨诸塞大街的人行道朝威斯康星大街方向走去，到了十字路口已经喘不过气来。他走进一家杂货店，要了一杯咖啡，没有放糖就喝进肚里，仍然神不守舍地考虑着今晚的行动计划。他喜欢看杂货店的霓虹灯，喜欢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杂乱的气味……付了咖啡钱，来到杂货架旁边，拿起一本《时代》杂志心不在焉地翻阅一下又放回原处，然后朝摆着文具的货架走过去，拿起一盒蜡笔，打开闻了闻。蜡笔的气味使他回忆起童年的一个好友。他叫西尼，是联合种植公司一位高级职员儿子的儿子。潘乔觉得他漂亮得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王子，不仅羡慕他那蓝色的眼睛和干燥的玫瑰色皮肤，更羡慕他身上从纽约买来的衣服、他的自行车、机械动力玩具，尤其是几十支彩色蜡笔（“美国制造”）。小西尼用这些蜡笔画了许多让人眼馋的图画……比万科记得清清楚楚（怎能忘记呢），蜡笔的牌子是“彩蜡”，黑字印在蓝天上，蓝天下面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在追猎一群水牛。来到美国以后，比万科一直在杂货店和文具店寻找“彩蜡”牌蜡笔，仿佛是在寻索失去的童年。没有！似乎“彩蜡”有使西尼死而复生的神力（潘乔知道，朋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任上尉时，战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①）。看来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牌子的蜡笔……现在，比万科闻着蜡笔的气味，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满头金发的小男孩。和他在一起，比万科躲到学校墙后边偷偷吸了第一支香烟；是他教会了比万科干那种大人们禁止的用手获得快感的勾当。

① 瓜达尔卡纳尔岛 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两国曾在此激战。

此时，莱昂纳多·格里斯正在寓所里接待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客厅里没有开灯，晨曦送进一丝若有若无的光亮。流亡者不由地想起青年时代考试前夕彻底攻读之后，信步走到郊外等待日出的时刻。深夜来访的客人坐在最黑暗的角落的一张软椅上。两人的交谈已经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我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先生来这里非常危险。”格里斯低声说。

“为什么？”

“最近几个星期，一个人在跟踪我。我完全相信，他是我国大使馆豢养的。”

米格尔·巴里奥斯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好。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在华盛顿最后一次会面，两天之内我将离开本市。如果有人跟踪，我有办法甩掉。在这方面我有经验……”

巴里奥斯四十稍过，身材高大，棱角分明，长长的脖颈上喉结突出，两只深陷的眼睛里放射出耀眼的刚毅的光芒。格里斯博士还没有发现，为什么在他的目光下感到局促不安。他的脸与豪尔赫·莫利纳一样，有某种苦行僧的痕迹。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像位教师。确实，巴里奥斯当过中学教师，格里斯博士任教育部长期间至少在中学联欢会上见过他一次。

“我已经搞到了急需的武器弹药。”

“在哪儿搞到的？”博士问。

“佛罗里达州。我们的一个朋友，美国人，很有钱，愿意用私人游艇把物资从迈阿密运往哈瓦那。他经常在加勒比海上游玩，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并且每年都去埃斯梅拉达港

赌场赌钱。”

“可靠吗？”

“任何人都不完全可靠，格里斯博士。可是，在我们进行的这次密谋中，迫于环境，不得不冒一定的风险。我所说的美国人自称同情我们的事业，我倒更加相信他仅仅是热衷于冒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战地救援队中尉。”

“不可思议！”格里斯想。旨在打败卡雷拉的这场革命的领袖，这个脸色苍白，穿一身黑西服、坐在客厅一角、两只又瘦又长的手搭在椅扶手上的人，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

“打算首先在哪里登陆？”他问，但马上纠正说：“不，不要告诉我。最好我什么都不了解。”

“我不会给你留下任何书写的情报，但先生应当对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个大致的概念。埃斯梅拉达港、圣费尔南多、奥罗威德、普拉托诺斯、帕拉莫和索莱达德马尔等地的卫戍部队中，几乎全体上士和至少三分之二的军官和我们站在一边，单等得到我们首批人登陆的消息以后起事响应。在古巴，我们拥有几支由流亡者组成的武器精良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时刻准备攻入萨克拉门托。如果头一项计划受挫，就退往山区，用游击战动员国内外舆论。一旦革命部队踏上祖国的土地，大学、工厂、街区和农村将同时发生骚乱：破坏活动、消极抵抗等等。不过，要是埃斯梅拉达港的守军立刻投向我们一边（不仅可能，可以说颇有把握），那么胜利将会迅速到来，快得让人们大吃一惊。”

莱昂纳多·格里斯走到窗前，朝外张望，没有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影，随后把脸转向客人问：

“为了更好地帮助这场运动，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博士，请继续发表文章，继续举办报告会，设法说服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两者对我们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非常必要。”

“报社社长们似乎对我的公开信感到厌倦，已经退回了几封……”

“还有报告会呢。博士，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可以利用讲台。还有，你在这里存在本身。”

教授点了点头。

“喝杯咖啡吗？”他突然问道，似乎为了暖一暖冰冷的沉默。

“不用了，谢谢。喝了咖啡我要失眠的。”

“怪事！”格里斯暗想，“这是第三次与巴里奥斯会面，但两人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同志式的亲切情感。是谁的过错呢？”流亡者心里问道，“我的？他的？还是两个人的呢？”他看看巴里奥斯，得出的印象十分明显：此人已经登上了王位，更确切的说，坐到了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上。

远处传来警笛声。“一场火灾。”教授想。他回忆起那个悲剧之夜，类似的笛声不时划破凌晨的寂静，从墨西哥使馆安排的卧室凭窗望去，看到陷落的城市几处烈焰冲天。

沉默仍在继续，格里斯竭力回想别人讲过的关于米格尔·巴里奥斯的一切。他知道，此人曾经被卡雷拉的警察逮捕，在狱中饱受虐待和折磨。

还是由巴里奥斯打破了沉闷的局面：

“我知道，你同大使馆一位秘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对，巴勃罗·奥尔特加。在莫雷诺垮台的那天晚上，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我送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的。对他，我完全信任。”

“庄园主的儿子，属于统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并使之遭受灾难的几个势力强大的家族之一。统统都是美国糖业中心和联合种植公司的走狗。”

“我向你担保，巴勃罗对他的处境不满，从内心讲完全站在我们一边。”

“住在华盛顿、工资优厚、拥有昂贵的汽车，说这类话容易得很。先生所说的奥尔特加‘内心’的那些政治感情和主张必须尽早浮上表面，变为行动。只有这样，我才相信他确实站在我们一边。”

“好吧。只有时间能证实或者否定我所说的关于巴勃罗·奥尔特加的话。”

“不要再谈这个年轻人了。你认识罗伯托·巴伦西亚吗？”

“好像听到过这个名字。”

“巴伦西亚是位真诚的革命家，曾在马埃斯特腊山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没有陶醉于已得的荣誉，而是开始与我们一起工作。他将是我的得力助手。”

格里斯又坐下来。现在他想起了巴伦西亚。在学生时代，小伙子便在大学积极投身于革命煽动和宣传，不只一次被捕。

“巴伦西亚头脑清醒，”巴里奥斯说，“知道该怎样做，熟悉游击战术。总之，他是个思想家兼实干家。这种人

在我们当中难得遇到，博士。”

格里斯贸然问了一句，但马上又后悔了：

“武装行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对方稍稍犹豫了一下：

“或许在两三个月之内，但必须在十一月份大选之前爆发。一切迹象表明，为了取消大选，卡雷拉将举行政变，关闭议会，逮捕反对派，继续执政。眼下只苦于没有借口……”

米格尔·巴里奥斯站起来。

“好了，我该走了。下次见面也许是在塞罗埃莫索……”

这句话说得认真，口气与其说充满希望倒不如说更像庄严宣布一项事实。

“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

“没有了。我只想告诉你，格里斯博士，如果我们决定建立萨克拉门托流亡政府，先生将被指定担任首脑。”

“请放心。感谢对我的信任。”

他帮助巴里奥斯穿上大衣。

“不知道先生是否还记得，教授，我的妻子和儿女是被萨帕拉的警察杀害的……”

“我非常难过！”流亡者尴尬地嘟囔了一句。

“请相信，博士，我也非常难过。然而，现在不是吊唁或多愁善感的时刻，而是行动和仇恨的时刻。”

“难道非仇恨不可吗？”格里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等一等。”教授重新走到窗前，伏在窗台上长时间左顾右盼，发现街上空无一人，才转向来访者：

“最好我先出大门，朝河边方向走。你看好表，五分钟后往城里方向走。如果穿浅色雨衣的人在下边，他肯定会跟踪我。”

巴里奥斯点点头。格里斯穿上大衣，两人一起下了楼。来到大门口，革命领袖说：

“关于我的下一个消息先生要在报纸上读到了……”

两人握手告别。

第二部分

招 待 会

12

按照比尔·戈德全的说法，一个人只有在傍晚回到家里，摘下社交活动中被迫戴在脸上的假面具，脱掉穿了整整一天的戏装，换上旧裤子和合脚的旧鞋，只有这时候才举止自然、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联合通讯社拉丁美洲部主任在星期五傍晚走进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大使馆的时候感到很不自在。他穿一身海蓝色棉毛混纺西服，这是在穿着上一向不拘小节的鰥夫最好的服装了。他心里完全明白，衣服皱皱巴巴，领带的颜色过分鲜艳（露丝生前常说，红领带和任何颜色的衣服都相配）。亲手擦过油的皮鞋有点夹脚。半个小时以前草草刮了刮脸，过敏的皮肤几处渗出了血，现在用手摸摸脸上，结了痂的凸出处还火辣辣地疼痛。他讨厌参加大型社交集会，喜欢两三位知己在灯光暗淡、气氛安静的环境里谈天，只有因职业关系非去不可的时候才肯出席外交招待会。

来到大使馆前厅，把熄灭了的烟斗装进口袋，手托着帽子站了一会儿。但愿不要有人请他出示请帖，因为他没有带

来，不知道丢在家里还是忘在办公室了。

米歇尔走过来，身子微微一躬，问了他的姓名，以便向率领使馆人员在宴会厅迎接宾客的大使先生通报。总管还没有听清他的名字（搏德金？戈德平？），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已经远远望见了老记者，张开双臂，大声呼喊奔过来：

“伙计！多少日子不见了！”拥抱的时候，大使用力太猛，弄得戈德金有点不好意思，几乎感到自己成了个什么重要角色。尽管知道许多对新任大使不利的传闻，戈德金觉得见到他还是相当高兴。

大使从记者手里把帽子夺过来，像美国足球比赛里传球一样传给总管。看了看飞到手上的不成形的黑“东西”，米歇尔仍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请进，戈德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拉着他的胳膊，“这就是你的家。千万别走，我们好好谈谈，要说的话多着呢……”

接着，把他介绍给迎宾队伍里的第二个人：

“这是比万科太太。今天她是这里的女主人。”

戈德金和黑白混血女人握了握手，觉得她长得挺标致，心里想：“莫非又是上帝差遣来的？不，这回该是魔鬼的信使了。”但是，罗萨莉娅已经开始把他介绍给下一个人：

“认识公使衙参赞先生吗？”

“当然。”比尔小声说，“你好，莫利纳博士！”

从对方干巴巴的礼仪性问候里，戈德金看出他在这位萨克拉门托外交官心目中的标价很低。这大概是因为联合通讯社驻塞罗埃莫索记者发回的报道大都对胡韦蒂诺·卡雷拉政府不利。

队伍里的下一个人是乌加特将军。他穿一套引人注目的军礼服，靛蓝色的上身配着金色的纽扣，黑色的裤子两边镶洋红线条，胸前挂着几枚奖章，其中一枚是金豹勋章。

“你好，将军。”戈德金说。

对方握了握他的手，表情空漠。突然，将军喜笑颜开，张开大嘴，露出两颗闪闪发光的金牙，一双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啊！我们的金发美国鬼子！你好呀？”一边说一边拥抱老记者，然后转身问站在旁边的妻子：“尼珐，不记得这位先生吗？在塞罗埃莫索的时候，他到家里吃过晚饭呢！是在哪年来着，先生？”

将军夫人把像亚马逊野鸽一样又肥又柔软的手伸给戈德金。

“怎能不记得呢？”她压低了声音，“我知道，你非常欣赏我们的食品。好吧。告诉你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派飞机从索莱达德马尔接来一个女厨师，专门为这次招待会做大名鼎鼎的‘萨克拉门托馅饼’。你一定要尝一尝！”说着，用手指捂住嘴唇，随后把手一扬，像是抛了个飞吻，“简直是神仙的美味！好，请进，别客气！”

女人几乎把他搽进了宴会厅。

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二百多人。每次走进萨克拉门托大使馆的宴会厅，他总是被过分豪华的装饰弄得头晕目眩。木质的屋顶上绘着十八世纪艺术家风格的油画，中间吊着巨型枝形灯，像一朵光华四射的硕大的水晶花。放眼一看，绣在墙帷以及沙发椅套上的颜色有两种最为醒目：萨克拉门托国旗的金黄和红色。两个巨大的金框威尼

斯镜子嵌在两边主墙正中的玫瑰紫大理石博物架上方，遥遥相对，映射出枝形吊灯熠熠多彩的光芒。据说，阿丰索·布斯塔曼特先生在聚会结束、最后一批宾客离开使馆以后，常常趁着夜深人静照着镜子和自己的影子对话。

戈德金下意识地 from 口袋里掏出空烟斗，叼在嘴上，穿过热气熏人、香味扑鼻的人群。他觉得像个既没有地图又没有带指北针的人在热带森林里行走——当然，并非原始森林。

据他估计，此时招待会上的一层薄冰已经开始破裂。头几杯酒下肚，灌满了肠胃，烧热了头脑，起初还照顾礼仪压得很低的声音逐渐提高，开始带有金属般的尖叫，头几分钟拘束的微笑慢慢出了声，很快会变成放声大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盘子里摆满了盛黄色饮料的玻璃杯。为了找点事干，戈德金拿了一杯，喝了一口：优质威士忌。现在，他开始用目光寻找熟人。头一个看到的秘鲁大使朝他微微一笑，作了个表示友好的手势。接着，他朝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点头致意。随后又看见巴西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正跟华盛顿一个“神圣的母牛”交谈。

他在一伙讲法语的客人中间穿过，另一伙人大概说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某国语言（有一位女友对他说过：“如果死神也有语言，那么它肯定说瑞典话。”）四位样子像拉丁美洲人的太太正在用西班牙语叽叽喳喳地争论本地商业中心的冬季服装大拍卖，戈德金停下来听了几句。他发现，大部分人讲的是西班牙语。他自认为是个拉美西班牙语行家。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给塞万提斯的语言加上了意大利的佐料——大蒜和滇香薷（有一次，他——比尔——幽默地说，阿根廷人像意大利人说西班牙语，而又自以为在说英语。阿

根廷大使馆一位秘书听了大为脑火)。墨西哥的西班牙语语调亲切而又戏谑，使我们以为所有墨西哥人都是吹牛大王的表兄弟。古巴人说起话来嘴边跑风，含糊不清。至于委内瑞拉和大部分加勒比地区居民，则像是一盘录音磁带快速从后朝前放。比尔特别喜欢听哥伦比亚和智利的西班牙语那清晰的吐字发音。

“比尔！我的老伙计！”

记者应声看到，克莱尔·奥吉薇在如云似雾的天蓝色连衣裙里出现了。

“克莱尔！在外国的土地上迷了路见到你这张熟悉的脸，真让人高兴！”

两个人紧紧握手之后，克莱尔把朋友拉到一个无须大声喊叫也能听得清对方讲话的角落，把头往大厅一扬：

“你看怎么样？”

“好气派的招待会！”

女秘书哼了一声，鼻子和嘴撇到一边：

“我本想举办个小型招待会，仅限于拉美人士、几位国务院官员、专栏作家和新闻界代表参加。那样花费少，玩得也痛快。哪能呢！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坚持举办大型活动。你知道，华盛顿有八十个外交使团……全都邀请了！”她笑了一声，紧紧攥着比尔的胳膊，“可惜，你没有看到加纳和伊拉克大使身穿民族服装走进大厅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眼神多么惊讶。看见身披纱丽的印度大使夫人，他险些鼓起掌来……我们的大使像个看马戏的孩子一样开心……”

“你们也邀请了苏联大使吗？”

“当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亲自决定邀请的。俄

国人已经来了。他们的会见让人难忘。两条彪形大汉互相微笑着握手，没完没了地握着，摇着。你知道，那俄国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我们这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除了西班牙语什么也不懂。说起这个，我告诉你，从头一批客人到来我就站在他旁边当翻译，刚才让巴勃罗替我一会儿，我好喘口气。”她踮起脚尖，从人群头上往门口望了望，“我该回去了。再见，比尔，愿你开心！”

克莱尔·奥吉薇驾着蓝色的云雾朝门厅飘去，比尔·戈德金用充满喜爱的目光送走她之后把玻璃杯放到小桌上，开始往烟斗里装烟丝。

巴勃罗·奥尔特加正站在大厅中央东张西望。寻找格伦达·多列玛斯——其实并不抱多少希望——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指顶在脊背上，同时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举起手来，不准喊叫！”

“贡萨加！”他转过身，把巴西朋友紧紧搂在胸前。巴西人小声说：

“拉丁人，此地不可如此放肆！我看见几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正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们呢……”

“我正在等尊贵的女宾。”

“那个日本小姑娘？”

“不，是个美国人。只见过她一次。今天上午我打电话邀请她，她答应要来。”

“有趣吗？”

“还说不准，不过觉得还不错。”

贡萨加望着天花板嘟嘟囔囔地说：

“蒂蒂科说得有理。这间大厅的装饰囊括了法国三位路易斯国王：路易斯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在这种气氛里，如果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穿上路易十五的衣服，坐在王位上，我不会感到奇怪……”他压低声音，补充了一句：“刚才我有幸握了蓬邦杜尔夫人^①那纤细的小手……”

巴勃罗没有注意听朋友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他看见了什么人，吓得手足无措。

“你看那边谁来了！”他一边对贡萨加说一边想法躲避，“那个面色苍白的瘦女人，穿一身黑……”

“谁呀？莫非是死神？”

“伙计，你不认识，她叫奥古斯塔·施奈德尔！关于这个维也纳女人，流传着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据说她在一座纳粹集中营里关了一年，疯了。慢性疯癫，你知道……被美国军队解救出来以后来到这个国家。她的一个叔叔住在美国，死后给她留下了一小笔财产。每逢有使馆举行招待会，她都不请自到。她有说西班牙语的癖好，对我们这种拉丁美洲人似乎有点偏爱。没有一个人不躲避她。贡萨加，快，装作没有看见，到另一个房间……”

可惜太晚了，奥古斯塔·施奈德尔已经皮笑肉不笑地站在他们跟前。她像一帧水粉画——干草色的头发，褪了色的灰眼睛，白皮肤，表情空茫——若不及时修复，这幅画必将永远消失。奥古斯塔对巴勃罗笑着，巴勃罗对奥古斯塔笑着，贡萨加则向两个人笑着。奥尔特加知道，与这女人的一成不变的对话又将重新开始。

^① 法王路易十五的王后，此处暗指罗萨莉亚。

“我认识你。”奥地利女人脸上带着水性扬花的表情，用又瘦又长的食指指着他说。

“当然认识，小姐。”

“你是智利人，对吧？”

“不，小姐，我……”

“别告诉我，让我猜猜。厄瓜多尔人！”

“不！”虽然看到贡萨加站在维也纳女人身后做鬼脸，他仍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墨西哥人？”

“不！”

“不过，你是外交官……”

“对。”

“秘鲁人？”

“不！”

“那么，大概是……”

“萨克拉门托人。”

“这就对了，我知道认识你嘛。我叫奥古斯塔。你呢？”

“奥尔特加。巴勃罗·奥尔特加。”

“我非常高兴。”老姑娘伸出干枯的手，外交官只让她握了两秒钟。

突然，奥古斯塔·施奈德尔脸上乐开了花。原来他看见了中国大使夫人——华盛顿外交界最迷人的女性之一——，于是丢下巴勃罗，朝中国女人奔去：“啊，郭女士！”

“终于逃脱了劫难！”奥尔特加舒了口气。

“现在轮到我了。”贡萨加无可奈何地说，“我的‘恋人’来了。上帝的惩罚！”

帕特里西亚·伍德沃德太太——已进七十岁大关——是本首都社交界最知名的贵夫人之一，自称常常和总统夫人一起进餐，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怀着母亲般的温柔，正在和一伙女士——大部分是美国众议员或参议员的妻子——学习西班牙语。据贡萨加说，攻读三年之后，她只学会了“你好，朋友！”、“再见”、“太好了”和“非常感谢”。

她抓住巴勃罗·奥尔特加，托着他的下巴掂了几秒钟：

“我非常喜欢你，可爱的巴勃罗。可是我得承认，贡萨加是我宠爱的拉丁美洲人。我要把他介绍给一位迷人的姑娘。一定要让这个不可救药的光棍结婚。我们走吧，奥尔兰多！”

两个人朝大餐厅走去，那里桌上已经摆上了食品。巴勃罗一直望着他们。帕特里西亚·伍德沃德太太瘦高个子，虽经多次整容手术，脸上的肉仍然松弛下垂，头发染成金色，像熟透了的草莓。她知名的原因之一是佩戴着各式各样异国式的项链、手镯等饰物：非洲、波利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古玩、护身符和神像。这位太太穿衣和化妆都过份浓艳，活像马戏团的小丑。巴勃罗觉得，她似乎在现实的生活中着意模仿那些末等演员，而那些演员在舞台上又模仿现实生活中浓妆艳抹的女人。

奥尔特加转身要去前厅，不料发现广田喜美子小姐站在眼前。

“啊！”他握着小姐伸出的手说，“什么时候到的？”

“几分钟以前。”

姑娘又黑又亮的头还不到男人的肩膀。那张瓷娃娃似的圆脸总是使巴勃罗产生大哥哥对小妹妹的温情，虽然那双眼

睛一直煽动他男性的欲火。

奥尔特加叫住一个端着满满一盘杯子在身旁走过的侍者。

“喝点什么？”

“啤酒。”

他好不容易才从盘子里找到一杯女友要的饮料。

“我们该找一天一起去喝茶。”他说得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瞥着大厅门口。

现在他自我感觉良好，头也不痛了。整整一天，美国姑娘的形象一直在脑际萦回。与她见面的可能性在巴勃罗心中激起了一种他称之为“不饮而醉”的冲动。确实，他还滴酒未进。

“你还欠我一首俳句呢。”广田小姐喃喃地说。

“是啊。我带来了，在这儿。”

说着，掏出一张明信片递给女友。

冬 日

皑皑白雪间，
有个蓝色的阴影，
死鸟已僵硬。

喜美子接过俳句，长时间地反复默念，然后仍然低着头。囁囁地说：

“太凄凉了。”

“我同意。可是它确实发生过。去年冬天我从大使馆的

窗户往外看，发现了这个景致。”

“可现在是春天！”日本姑娘大声说。

巴勃罗几乎没有听见女友在说些什么，注意力和两只眼睛全都转向了大厅门口。

“你在等什么人吧？”广田小姐问。

“一位朋友。我是说，一位女友。这里，她谁也不认识，进来以后我必须陪着。”

说完，他俯下身，拉住喜美子小姐的胳膊，看那谨慎小心的样子，似乎是拿着一个珍贵而易碎的雕像：

“请原谅，我去去就来。不要拘束。”

喜美子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一连把头点了几次。奥尔特加离开以后，她仍然一动不动，手里的明信片沉甸甸的，像一只僵硬的死鸟。

13

从头一批宾客到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就按照克莱尔·奥吉薇的嘱咐和礼仪的要求一直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头。但是，他像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停在起跑线，急于冲向跑道，不时朝大厅里张望……一开始，还算令人开心：等待着出现意外，就像赌博一样（下一个来的是谁？）华盛顿外交界集各国各民族之大成，认识一些新的面孔总是件高兴的事。

然而，随着大厅里人越来越多，说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大，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再也无法集中精力接待来客，而是焦躁不安，如同买了一场演出的入场券，想从头开始欣赏精采的表演。不能参加自己的招待会，荒唐之极！最后，他再也忍受不住，请莫利纳代替他的位置，挣脱了囿环……。

现在，大厅里挤满了人。女人们五光十色的衣裙、天花板上的油画、墙帷上的刺绣，映照出巨大的枝形吊灯和烛架的威尼斯镜子……更使熙熙攘攘的大厅像个丰富多采、变化不定的万花筒。面对这一切，萨克拉门托大使不仅精神上，

而且特别在肉体上感到快活。他尽情地呼吸夹和着酒精、香烟和雪茄味的脂粉香气。是啊，许多干净而且地位高贵的女人聚在一起，产生一种难以描绘的气味，催人心醉，让人冲动……一股颤栗的情感从头顶到脚跟，流遍了全身。妈的，这招待会好气派！

几个人走过来，懂西班牙语的交口称赞宴会厅和招待会，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一表示感谢。如果交谈者是个女人，特别是长得标致的女人，他就拉住对方的手吻一吻。如果是男人，他便友好地拍拍对方的肩膀，继续在宾客中穿行。“怎么，没有喝点什么吗？”他问一位满头金发、表情有点沮丧的高个子绅士。绅士文雅地耸耸肩膀，用英语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懂西班牙文。”

“怎么？怎么回事？”大使高声说。随后又对从身边走过的侍者吆喝：“喂，小伙子，给我们这位朋友拿点什么来！”侍者也不懂西班牙语，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准确无误地理解主人的手势。

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已经喝完第三杯鸡尾酒，眼睛格外明亮，舌头不听使唤。他一把拉住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胳膊，拽到一面镜子旁边，声音有点含混不清：

“亲爱的大使，为什么我们两国不合兵一处，共同入侵古巴，嗯？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伙计，”萨克拉门托人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就笑着回答说，“倒也是个办法。可是，谁肯为军事行动出钱呢？美国佬吗？”

“为什么不肯？为什么不肯？对他们有利，完全有利，

可他们不懂！”多米尼加人摇摇头，沮丧地垂下胳膊，“他们太迟钝。我国的总统——国父——向美国公司订购了大批飞机、坦克、机枪、弹药……可是五角大楼呢？竟然劝艾森豪威尔颁布对加勒比地区禁运战争物资的法令！”他用力拉住萨克拉门托大使的胳膊，“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在空军方面，我们比古巴强大。我们有八十架战斗机，其中五十几架是喷气式的。而古巴人不到六十架。我刚才说了，我们必须入侵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岛屿，不然就太晚了。那个大胡子是共产党，请相信，他是共产党。他可以公开否认，但确实被切·格瓦拉一伙人所控制。是时候了！”多米尼加人突然中断了预言家式的演说，撇下对方，去追一个侍者——他端着摆满杯子的托盘。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对着镜子紧了紧领带。要是特鲁希略^①以为他的干亲家卡雷拉会这样铤而走险，那他一定是个疯子。

大使转过身，走了几步，来到大厅中央的枝形吊灯下面。那个一身西方装束、穿着高雅却头戴一顶伊斯兰白帽的黑人是谁呢？几内亚人？加纳人？不，加纳大使穿一件白色长袍。

他以挑剔的目光望着正跟巴基斯坦大使夫人说话的娇小的中国女人。她的裙子旁边各开一条缝，露出大腿，让人动心，不过两条腿太细，太难看。他也不喜欢那张脸，黄得苍白，眼睛长得像只什么动物。

这时候，一个蓄着黑胡子的先生（“我敢打赌，是印度

① 特鲁希略：当时的多米尼加总统、独裁者。

人！”）走过来。只见他留着一头女人似的长发，用一根带子绾到脑后。这不男不女的傢伙握着大使的手说了句什么……英文还是法文？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满脸堆笑，机械地用法文欢呼：“感谢，非常感谢！先生，谢谢！”说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印度人转身朝门口走去。

大使想起了陆军第五团的一个上士，高个子，皮肤微黑，留着大胡子。他小时候最恨那个大兵。这时，一个早已遗忘的声音飘洋过海，从时间的尽头来到他的心中：

“加夫列尔！小加夫列尔！回家来！”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看看镜子里映出的自己的形象。

“要是她现在看见我该多好！”他想。不过，即便看见了，也不会理解……甚至不会相信……她是个无知的女人，大字不识，肉体是她唯一的才智、资本和谋生的工具……驻索莱达德马尔镇的陆军团全都上过她的床。星期六（确实如此还是他的想象？）她特别为列兵减价。

“加夫列尔！小加夫列尔！回家来！”

大使是从镜子里看见埃内斯托·比拉巴挽着一个女人走进大厅的。那金发女人体格粗壮，比他还高出一截。大使立刻转身朝他们走去，但发现两个新来者淹没在人群之中。不过，靠着猎手的本领，终于找到了陌生的漂亮女人。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蒂蒂科毕恭毕敬地说，

“我非常高兴并且荣幸地向你介绍我的女友弗朗西丝·安德森·瓦琳太太。瓦琳太太，这位是萨克拉门托大使先生，我们招待会的主人。”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握住女人伸过来的手，在手背上响

亮地吻了一下，蒂蒂科觉得主人动作贪婪得近乎粗野。夫人转过脸责怪使馆二等秘书说：

“你忘记了，我不再叫瓦琳。我的离婚要求上星期已获法律批准，正式生效。”

蒂蒂科躬身请求原谅。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欣羡地望着女人，神情恍惚：“为什么这些不男不女的家伙总能找到漂亮姐儿呢？”眼前这位漂亮姐儿——他心里描绘着她的容貌——头发像熟透了的麦田，眼睛像大海，皮肤像白雪。对，像早晨的头一缕曙光照耀下的白雪。你看那乳房，啊！索莱达德守护女神！我的妈呀！再看那长相！不折不扣的画中人！嘴较大（他最喜欢大嘴女人），鼻子又细又直，美丽的脖颈简直出自像我主上帝一样的画家之手。趁比拉巴向他简要地介绍女人的身世的时候（出生在美国西部，祖父母是丹麦籍，前夫曾任美国驻南美几个国家的海军武官），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专心致志地从事起把她的衣服剥光的任务来。她的臀部与罗萨莉娅不同，非常光滑，那么大腿必定又长又圆。“离过婚的女人”这几个字足以使大使先生感到头脑里和五脏六腑欲火熊熊燃烧。他又拉住安德森太太的手，这次是用两只手握住的，喃喃地说：“我亲爱的夫人，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奴仆。”只是此时用眼睛的余光看见罗萨莉娅在鲜红连衣裙的云雾里飘过来，他才不得不放开那只又长又温暖的手。

“啊！安德森小姐，我愿意向你介绍比万科太太，驻华盛顿的萨克拉门托的美女代表。罗萨莉娅，亲爱的，这位是弗朗西斯·安德森太太。蒂蒂科把这花儿般的女郎请来参加我们的招待会，我一定要提升他为一等秘书！”

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两个女人相互打量了一眼。美国女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但两只胳膊仍然垂直，保持与身体平行。罗萨莉娅刚刚抬起右臂准备握手，马上又缩了回去。她还不知道美国的社交习惯。被介绍给某个人的时候——不论性别——她始终弄不清该把手伸给对方还是仅仅点点头。

“你的裙子太漂亮了！”弗朗西丝笑着说。

“没有你的漂亮，太太。”罗萨莉娅回答说，“是冰色的，对吧！”

“完全正确。”

萨克拉门托女人带着挑剔并有几分仇视的心情从头到脚把美国女人打量了一番。这时，蒂蒂科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同时举起冒火苗的打火机，争着为安德森夫人点燃刚刚举到唇边的香烟。

在不远的地方，巴勃罗·奥尔特加和比尔·戈德金正从旁观察这一场景。他们看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蒂蒂科推到一边，替金发贵妇点燃香烟，然后对二等秘书说了句什么，只见他立刻摇摇晃晃地穿过宾客，朝餐厅方向走去。

奥尔特加在别的聚会场合认识弗朗西丝·安德森，向记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大美人的情况。奥尔兰多·贡萨加摆脱了伍德沃德小姐的纠缠以后来到两位朋友身边，顺着他们的目光看了一眼，说道：

“要是我判断不错的话，比万科夫人遇到了情敌。她要小心……”

“不用你着急。”巴勃罗小声说，“罗萨莉娅大概早已

预感到存在危险。你们看，她在怎样打量那个女人……”

“两头骡马驹之间站着我们这匹即将退役的种马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坦率地说，要是必须从两个女人之中选其一的话，我一定要留下那黑白混血儿。她更热情，有使人联想起海滩上的血迹、吉他、鲜花满枝的杏树、阿拉伯风味掺杂着加勒比狂风烈日的日子。我从亲身经历知道，瑞典人和挪威人爱惜身体，可谁能一生保持忠诚不渝呢？”

戈德金一声不响，只是面带笑容，通过烟斗里冒出的烟云欣赏着那边的三角调情。巴勃罗拉着两位朋友的胳膊说：

“安德森太太给我们的印象是块钻石：珍奇、光彩、昂贵、难得，但坚硬，而且有点凉。”

“你们看，这两个女人的乳房多么威风！”贡萨加说，“她们俩像两艘装上大炮的铁甲舰，面面相觑，准备开战。你们看，她们引起了多少男人注目……比尔，注意你那位联合通讯社的同事和他旁边那个人的脸，都呆痴了……嗨，两个傢伙都冲动起来！比尔，我的老伙计，你的同胞们还处在‘嘴’的阶段，见了女人的乳房就流口水，所以从心里学上讲还是吃奶的婴儿。你看，在美国的电视和电影上乳房突出的女明星们大出风头……我们拉美人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我，我吃奶吃到两岁……而且是吃黑人的奶。”

比尔瞥了对方一眼：

“那么你们拉美人还处在‘肛门’的阶段……”

这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手挽着金发女人，一手挽着黑白混血女人朝大厅的一扇门走去。克莱尔追上她的上司，用指尘敲了敲他的肩膀。大使回过头来，女秘书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听完，他把脸一沉，转身跟女秘书走去，但

并没有放开两个漂亮的猎物。

大厅的一边突然一阵骚动，像暴风吹皱了水面。波托马克小姐大驾光临！她在一群崇拜者簇拥下迈着缓慢的步子威风凛凛地走进来，不时停下来接受朝拜，如同一艘风帆鼓满、旗帜飘扬的巨轮在水草的海面上行驶。她穿一件紧身黑缎子连衣裙，缀满了玻璃饰片。戴着闪闪烁烁的戒指的手指间夹着个长长的烟嘴，上边插着的香烟冒出一缕青烟。像往常一样，她一边走一边用近乎男人的沙哑嗓音说着至理名言，引起簇拥者们一阵阵谄媚的笑声。她的尖酸刻薄是颇有名气的。就在东道主走过去向她致意的时候，波托马克小姐还在挖苦一个女专栏作家——她的竞争对手——说此人虽然财产有限，却偏爱为达官贵人和百万富翁们举办聚会，所以现在落得捉襟见肘，身无分文。

三个朋友只注意了“神圣母牛”几秒钟的时间，随后戈德金转过身来问贡萨加：

“喂，你是怎样挣脱伍德沃德太太的魔爪的？”

“嗯，是南朝鲜大使救了我的命。他把她拉去谈什么‘外层空间’，我就乘机留出了轨道……”

巴勃罗笑着说：

“伍德沃德太太是华盛顿的纪念碑之一。”

“你们知道我又有新发现吗？”贡萨加问，“这位贵妇人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代表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她们按照一套成规定则生活，而这些实际上只不过是神话……”

比尔·戈德金请贡萨加把他的意见解释清楚，虽然已经预见到巴西朋友会像往常一样言过其实。

“嗯，其中几个神话可以归结如下：美国生活方式是世

界之冠……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黑人是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几乎所有民主人士都是秘密共产党……”

戈德金笑了：

“我认为，你以伍德沃德小姐作为美国妇女的代表，那就对她们太不公正了……”

贡萨加亲昵地抓住老记者的衣襟说：

“我刚才的讽刺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包含着不少真理。这个国家靠镀金加糖的神话为生，最后又通过你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倾销。你们的报纸、电影、电视和戏剧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最丰富多彩、最吸引人而又效率最高的宣传网，所宣传的尽是神话故事或恐怖冒险。”

“贡萨加，听了你这番议论，”戈德金说，“人们不会理解，美国人既然茫然无知，只会幻想，有那么多缺点，怎能建设起我们星球上最富有、最舒适的国家之一呢……”

贡萨加发出一阵笑声：

“比尔，别生气，不要对我的话过分认真。我已经喝了三杯威士忌，可是还没有吃一点东西。”说着，把脸转向奥尔特加，“喂，把你发明的‘制造’美国人的配方给比尔说说。”

巴勃罗正踮着脚尖朝大门口方向张望，指望发现格伦达·多列玛斯。他嘟囔了一句：

“用不着说了。”

“说吧，伙计！比尔知道，你和我爱挖苦美国佬，可是从来不怀恶意。”

奥尔特加转向老记者：

“要造个美国人，取锅一口，放入一份勤劳，再放入一份较少的戏谑，然后稍加些虚伪，调匀，微火炖之。”

戈德金正要反驳（因为，他觉得他本人倒是有点勤劳，但绝无戏谑），看见克莱尔·奥吉薇走过来。

女秘书拉住巴勃罗的胳膊悄悄说：

“我要向你忏悔。”

“那就说吧。”

“今天我背叛了你。”

“跟谁？”

“跟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我刚一来，他又是拥抱我，又是吻我，你想想，随便你说他什么都行，但‘今天’我不相信。我喜欢这条汉子，巴勃罗。”接着，又以写绝命书的口气说：“永远属于你的奥吉薇塔。”

“什么时候开始吃饭呀？”巴西人问。

“刚才加夫列尔由一个金发女郎和一个黑白混血姑娘陪着朝餐厅那边去了。”女秘书说，“首先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华盛顿社交界介绍大名鼎鼎的‘萨克拉门托馅饼’。走吧，不然馅饼就被野蛮人抢光了。”

路上，女秘书讲述了加夫列尔先生和波托马克小姐见面的情况，说大使感谢她在专栏上发表的文章，吻了她的手，夸她的裙子漂亮，说她长得年轻……好一个勾引女人的能手！

“不过，在翻译他那些调情的话的时候，我十分谨慎，省略了过分夸张和有失体统的词句。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敢肯定：我们的大使大获成功！”

与富丽堂皇的大厅相反，毗邻的餐厅为文艺复兴后期的

风格，显得坟墓般阴沉、肃穆。瓷砖地上没有铺地毯，墙上只有几幅模仿拉斐尔的图画的挂毯。至于家具，则使人想起艺术家门和文学艺术保护人对罗马帝国和古希腊的怀古主义尚未盛行的时代。不过，阿丰索·布斯塔曼特有先见之明。为了打破餐厅的阴郁气氛，他专门订制了仿十五世纪威尼斯天鹅绒高背椅套：红葡萄酒色为底，中间绣着刺洋蓐，周围饰以金线花环。桌子上图案简练，像是修道院的用品。当年，老外交家在华盛顿举行划时代的宴会时，二十几位宾客就围着这张桌子进餐。

现在，这张胡桃木镂花长桌被派克帕克饭店用来做自助餐桌（“让人恶心！”看到桌子上的食品，米歇尔·米歇尔皱皱鼻子嘟囔了一句）。桌子四周装饰着鲜花（总管觉得太讨厌：“你们美国人，哼……”），中间的长盘一字儿排开，盘子里是看上去是整个一只但实际上早已切开的火鸡，还有切成片的火腿和羊肉。火腿和蛋糕上嵌着石竹花，周围饰以菠萝片。咸食花样繁多，与其说是厨房制作的，倒不如说更像五彩套色的印刷品。还有热气腾腾的蛋炒饭（这是奥吉薇小姐在最后一刻增加的，主要考虑到拉丁美洲和东方人的口味）。当然，还有鱼——整条的大鱼上盖一层白色果冻（也许是别的！）果冻上画着萨克拉门托国旗图样（“太俗气！”）。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挽着他的两个美人走到桌子旁边，这就等于向堆在四周的宾客发出了等待已久的信号。在总管责怪的目光下，满身香水气的侍者们来回穿行，有几个开始往客人伸过的盘子里放食物。忽然间文艺复兴式餐厅一阵骚动，原来是三个侍者用长盘端来了撒着砂糖、热腾腾的金黄

色馅饼!

“馅饼!”尼珐·乌加特喜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她的一帮同胞带着爱国主义的贪婪呻吟着冲向侍者。尼珐太太已经把一个馅饼塞进嘴里，弄得下巴上和绒髭上尽是砂糖，这时她举起双臂，用油乎乎的嗓音大声呼叫：“等一等，姑娘们！文明些！萨克拉门托人的殷勤好客到哪儿去了？先让客人们尝尝馅饼！”她的声音淹没在人们歇斯底里的吼叫之中，她本人也被挤进侍者周围的人堆里。加纳大使，一个高个子黑人站在门口，穿一件白色长袍，神态庄重，微笑着观赏这混乱的场面，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奥尔兰多·贡萨加嘴也馋了，拉着戈德金朝前走了几步，伏在他耳边说：“莫非给新成立的非洲共和国的代表们端来了烤人肉吗？”戈德金吸着熄灭了的烟斗嘟嘟囔囔地说：“我敢打赌，这些黑人比你我更有文化，更有教养。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大学。”

米歇尔带着厌恶的表情从桌子的一端望着这“酒神圣典”的场面，像每次感到恶心时双唇紧闭时一样，额头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朝他打了个手势：

“米歇尔，打发人给我们端一盘馅饼来！”

总管派人执行了大使的命令。大使请弗朗西丝·安德森和罗萨莉娅·比万科尝尝。萨克拉门托女人拿起一个馅饼，送到嘴边，看样子像个举行一项神圣的礼仪。美国女人学着她的姿势，不过出于礼貌有意装得不动声色，用指尖夹起来咬了一小口。但黑白混血女人却狼吞虎咽，馅竟然顺着两个嘴角流出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德森小姐的脸，看着她越咬越起劲，最后把半个馅饼一下子塞到嘴里

——这个动作更使萨克拉门托大使浮想联翩，性欲勃发。

“怎么样？”他急不可耐地问，“怎么样？”

“味道美极了！”美国女人说着，又拿起一个馅饼。

大使兴奋异常：

“你一生吃过比它更香甜的面食吗？秘密在馅里，我亲爱的夫人。”

“鸡肉？”

“鸡肉里掺牛肉和虾，再加上我国独有的各种草药。制作方法来自殖民时代。喂，米歇尔，拿香槟酒来！”

不一会儿，三个人手举玻璃杯，开始互相祝酒。

餐厅里挤得水泄不通，桌子四周更是乱作一团。两条鱼已经切开。一个怀念家乡的萨克拉门托人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块，注意不毁坏祖国国旗，现在正一面舔着嘴唇，一面毕恭毕敬地吃着。

尼珐·乌加特和丈夫站在桌子旁边，吃得兴致正浓。

“火腿味道很好。”她说。

“可是……我的胆固醇呢？”丈夫犹豫不决。

“去你妈的胆固醇吧！”

人们拥来挤去，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发现，弗朗西丝和罗萨莉娅都不知道挤到哪儿去了。他刚把一块最爱吃的烤成金黄色的鸡胸脯拣进盘子里，就看见桌子对面一位身着制服的美国将军正冲着他笑。

大使的思绪以光速把将军带到了索莱达德马尔镇，带到了1915年夏天的一天傍晚。他当时只有十二岁，正朝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地张望。一个美国上士拿着个鸡大腿在空中晃了一下，衣衫褴褛、打着赤脚、饿得发慌的孩子们一齐举起干

枯的小胳膊喊：“扔呀！扔呀！”美国人把鸡肉朝他扔过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个子最高，不等鸡腿落地就一手接住，紧紧搂在怀里，撒腿就跑。不料一个小伙伴抱住他的膝盖，他摔了个嘴啃泥，鼻子摔扁了，但却没有撒手放开鸡腿。别的孩子们也呼喊着重冲过来，撕破了他的汗衫，抓破了他的背，咬伤了他的胳膊。要不是又一些海军陆战队队员朝他们投过几枚镍币，孩子们肯定不会与他善罢干休。大使还记得，镍币的一面是水牛浮雕图案。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冲进教堂。虽然因为刚才一阵战争和飞跑还气喘吁吁，但马上狼吞虎咽地啃起来。鸡肉和现在的鸡胸脯一样，美国味道，但掺杂着他自己的汗水、尘土和血——他鼻子里流出的血还没有凉。他一面吃一面望着圣母像，心里还感到有点羞耻，觉得不该吃外国军队的剩东西。他们是为杀害胡安·巴尔萨和他的游击队员才在索莱达德马尔登陆的。

在这神奇的一瞬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清晰地回味起那个遥远的生活插曲中的场景和感觉。

现在，他望着手中的盘子笑了。一时心血来潮，他绰起餐叉，叉上鸡腿，扔进美国将军的盘子里。将军先是一愣，但马上发现了主人的作法出于亲切，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巴勃罗已经失去了今晚见到格伦达·多列玛斯的希望，不料姑娘却在厅门口出现了。在头一瞬间，他竟然没有认出来。奇怪，心思过重能使记忆里的形象扭曲！比起头一次见面来，格伦达显得不那么伤感，而且更漂亮。巴勃罗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热情地握住她的手，感谢她的到来。

“对我，请你多多包涵。”美国姑娘说，声音还是晨曦般清亮，巴勃罗听起来非常悦耳，“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外交招待会。”

“一生头一次？”他感到诧异。

“对，头一次。”

“好吧，我们先在大厅里走走。这群动物蛮有意思。那个高个子男人是埃塞俄比亚大使。”格伦达似乎对黑人外交官不感兴趣。“那个微黑的胖绅士——样子像个节制饮食而减肥的菩萨，长得倒挺和善——是泰国大使。那边是法国大使夫人，华盛顿最高雅的贵妇之一……”

他挽起格伦达的胳膊，发觉（还是幻觉？）姑娘触到他

的手时缩了一下，似乎讨厌他。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松开姑娘。

“啊！这位是我的朋友奥尔兰多·贡萨加，巴西大使馆一等秘书。要小心，他是个危险人物……”

巴西人握了握美国姑娘伸出的手，巴勃罗拉着美国女客扔下巴西朋友，继续往前走。

“比尔！”他大声喊，“来认识认识你这位女同胞。”

见过老记者以后，他们走到一位动作娇柔、轻捷，像个舞蹈演员似的男人跟前：

“多列马斯小姐，这位是我的同事埃内斯托·比拉巴。”

蒂蒂科从头到脚把格伦达·多列玛斯打量了一番，立刻得出结论：泛美联盟的女职员。参加社交聚会不是她的长处。举止拘谨，身体瘦弱，裙子很蹩脚。想不到巴勃罗对这种人钟情。

“请原谅。”他说，“我要执行一项艰苦的使命。我们大使让我领华盛顿外交界的五位太太——个个都是贵宾，人人对拉丁美洲感兴趣——参观大使馆。再见，小姐，很高兴认识你……”

当巴勃罗把女友介绍给一位皮肤微黑的绅士时，这位蓄黑唇髭的男子吻了吻她的手说：

“我在你脚下，小姐。”

等离开谄媚的绅士，她问：

“为什么说‘在我脚下’呢？”

“这是西班牙表示礼貌的客套话，不喜欢吗？”

“我讨厌一切客套，”她烦躁地说，“尤其是表示礼貌

的客套。”

巴勃罗笑了。他感到幸福。有格伦达在，招待会增添了令人振奋的色彩。现在，他完全相信，已经喜欢格伦达·多列玛斯这个人了，但本能近乎在大声警告，与此人相处会发生一系列问题：看法相悖，各式各样的摩擦和冲突。不过，既然两个人互相交谈尚且极少，佐治亚州姑娘的论文又不偏不倚得像报纸上的新闻，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呢？

“喂，巴勃罗，怎么不把这美人给我介绍一下呢？”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刚刚喝完第三杯香槟酒。介绍完毕以后，大使对美国姑娘的魅力垂涎欲滴，而姑娘却冷淡得近乎仇视。

“随便玩玩吧，小姐，这就是你的家。巴勃罗，好好照顾她，让她尝尝萨克拉门托馅饼。一会儿见，小姐。”

“他有印第安人血统吗？”格伦达目送着大使朝一位穿一身红的漂亮女人走去。

“大概有。”巴勃罗回答说。明明知道会引起争论，他还是问了一句：“这有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

“一个人血管里流哪种血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不重要吗？”

他做了个鬼脸，表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格伦达第二次企图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不料巴勃罗不肯松开。

正在这时候，他远远看见海地大使站在大厅中央，手里端着喝空了的酒杯，于是决定做个试验。

“我想请你认识认识我的一位朋友……”他一面说，一面拉着姑娘朝海地外交官走去。格伦达发觉要把她介绍给一个

黑人，立刻要改变方向。“不行！”她大声说。可是巴勃罗仍然用力握住她的胳膊往前拖。“为什么如此凶狠？”巴勃罗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想制服她，让她伤心呢？”

“求求你！”她仍然想挣脱出来，“我不愿意，不愿意！你没有权力强迫我！”

巴勃罗依然微笑着把她强拽到海地代表跟前：

“大使先生，这位是我的女朋友格伦达·多列玛斯小姐。”

外交官微笑着鞠了一躬，伸出手。美国姑娘犹豫片刻，把手指尖伸给海地人，但马上又抽了回来。巴勃罗发现，她脸上失去了血色。

“请原谅，大使先生。”奥尔特加低声说了一句，随后又拉着猎物往前走。对，完全正确，格伦达是他手中的猎物。“现在我明白了。”他想，“完全明白了。她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和黑人握了手，胃里大概正搅得不亦乐乎。”他看到，美国姑娘额上流下一滴滴汗水。现在，她第三次想逃走。

“你快把我的胳膊扭伤了。”她抱怨说，并且朝对方投过一缕恼恨的目光。

“好，放开你。”他仍然笑着，“但不要跑，我们还要谈话呢。”

两个人走了几步，谁也没有吱声。她突然停下来：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已经说过，不愿意被介绍给那个黑人。”

“不错，他是个黑人，但首先是个人。”

“我不是来听你上伦理道德课的。”

“不要胡说！”巴勃罗对自己的举止也感到惊讶，他一

生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女人。“我请你按规则办事。”说着，他递过去一支香烟，多列玛斯小姐摇摇头拒绝了，“从法律上讲，本大使馆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领土，所以我是在自己的祖国。”

“正因为如此，你的举止更应当像个绅士。”她环顾一下四周，反驳说，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厅里的温度，杂乱的说话声，隔壁传过来的食品气味，这一切都使她头昏脑胀，翻肠搅肚。“我要走了。”她喃喃地说。

巴勃罗又挽起她的胳膊，不过这一次动作非常温柔。

“请不要走，还有话对你说。我们还没有讨论你的论文呢？”

“我不是为论文来的。”

“那么，为什么来的呢？”

她似乎吃了一惊：

“多么愚蠢的问题！我来是因为受到邀请。我来是因为你坚持请我来，我也答应要来。你喝醉了？”

“我还没有喝酒，连水也不曾喝一口。”

“那么，吸了毒？”

“我不吸毒。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几秒钟的时间里，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绷着脸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你打算在这地狱般的环境里讨论我的论文吗？”

“不。我像你一样讨厌这类社交聚会。现在，我要违犯大使馆禁止其秘书单独照顾某一个客人的规定了。我们先找点吃的，喝的，然后躲到个清静的地方。好吗？”

她耸耸肩膀，看来对一切都准备逆来顺受。两个人到隔壁餐厅盛满两个盘子，摆进一个托盘里，随后又放上一瓶香槟酒和两个杯子。

“我们到图书馆看看是不是空着。”

他们从旁门出去，走进一条在前厅大楼梯下面穿过的小楼梯，进了图书馆。图书馆一角有两个人在交谈，巴勃罗认出来，是豪尔赫·莫利纳博士和华盛顿佐治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只听博士以口授的语气说着：

“……这样，命运之神便是生灵通往本体的方向。我甚至可以说……”

看到两个人进来，他压低了声音。巴勃罗弯下腰在女友耳边说：

“壁炉上面那张油画像就是胡韦蒂诺·卡雷拉总统。”

格伦达对画像不感兴趣，看也没有看一眼大元帅模仿着西蒙·玻利瓦尔当年姿态站立的形象。

他们离开图书馆，穿过一条条走廊、一个个在格伦达看来像缩小了的凡尔赛宫镜厅似的大小不一的房间，来到左翼后边一个小屋里。

“这是整个大使馆里我最喜欢的所在。”巴勃罗说，

“据行家们讲，家俱是纯正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看见角落里那个大柜子了吧？是真正的西班牙雕花立柜。”

多列玛斯小姐从来不曾听说过什么西班牙雕花立柜，也没有兴趣了解它的来由。

格伦达坐在沙发上，巴勃罗把托盘放到她跟前的茶几上就开始开瓶盖，突然，瓶塞嘣的一声飞上天花板，打中了一个天使像，落在松软的地毯上。同时，香槟酒泡沫涌出瓶

口。巴勃罗斟满两个玻璃酒杯。

“让我们对饮讲和吧！”他坐在姑娘前边的软椅上，喝了一口，而姑娘只把酒杯拿在手里。

“怎么，不喝？”

“会伤胃的……”

“哪能呢！这类胃病一般来说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你总不会不吃东西吧……”

她看了看盘子：有火鸡肉、颜色和形状都值得怀疑的沙拉子，还有两个油光闪闪的馅饼。巴勃罗很快喝干了他那杯香槟。

“你为什么强迫我和那个黑人握手呢？没有必要。我们并没有碰到他，是你存心把我拉到他旁边的。想考验我吗？”

“完全正确。”

“好，现在你该明白了，我讨厌黑人。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谈的了。我尊重你的喜好和信念，相反，你也该尊重我的喜好和信念。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做得不够礼貌。”

巴勃罗又斟满了自己的酒杯。

“你对我很恼火，对吧？”

“坦率地说，是这样。”

“那么，请接受我低贱的请求，请你原谅。”

“我已经说过，讨厌俗套。请你不要再用那个讨厌的字。”

“哪一个？”

“低贱的。”

“好，开始吃吧。”

他把一个盘子递给格伦达，姑娘却没有胃口，只是用餐叉搅拌沙拉子。

巴勃罗站起身，走到他们进来的门口，把门锁上了。

“为什么锁门？”格伦达倏地站起来，神色惊慌。

“不想让别人来打搅。”

“把门打开！”她命令说，口气生硬。

他回到美国姑娘身边，好像没有听到她的命令：

“坐下，格伦达。放心吧，我不会强奸你。”

她一下子变得煞白，仇恨的表情使她的脸绷得紧紧的，眼睛里闪着凶光。

“再也不要当着我的面说这个字！”她口气严厉。

她重新坐下，用哆嗦的手从提包里拿出烟盒。巴勃罗打着打火机递到她嘴边。香烟在她唇边颤抖。直到神情紧张地喷出一口烟雾之后，才看了外交官一眼。

“奥尔特加先生……”

“请称呼我巴勃罗。”

“好。巴勃罗，你是个怪人。头一次在大使馆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觉得你谨慎，头脑清醒……话该怎么说呢？……温和。总之，是个我可以信赖的人。现在我才发现，你跟所有别的男人一样。”

他一声不响地看了姑娘一会儿。

“格伦达，打开天窗说亮话，从你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一直在演戏：巴勃罗·奥尔特加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善于控制他人的角色。请相信，我根本不是那种人……”

“那么，为什么要装成那种样子呢？”

“不知道。也许因为你唤醒了我沉睡中的本能。”他微

微一笑，“要么因为从心底里……嗯，说不清。也许我想成为我所扮演的那种人。不，完全不是！我们和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说心里话，我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后悔来参加招待会……要是为你而来的话。”她停顿一下，问道：“你为什么不去照顾别的客人呢？为什么对我特别关心？”

“受到一个男人的关心你不高兴吗？”

“不高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结果总是不好。”

“你太悲观了，格伦达。好了，吃点东西，喝杯酒吧。”

她向刚才推到一边的盘子投去犹豫不决的目光，把它拉回原处。

几分钟以后，姑娘稍微平静一些，吃了两小块火鸡肉，半个馅饼，只是觉得馅饼的馅佐料太重，让人恶心。巴勃罗一再坚持，她才喝了几口香槟，但喝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唯恐第二天身体不适。

奥尔特加已经喝完第三杯。现在，他站在美国姑娘前面，准备坦率地就她那篇关于萨克拉门托的论文谈谈看法。

“希望听到你诚恳的批评。”她双臂交叉，压住胃部。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因为眼下既没有感到胃疼又不恶心。

“好吧。”连巴勃罗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如此乐于刺伤姑娘的心，“你的论文没有表现出任何历史远见，并且满纸虚假。”

她眉头一皱，感到这句话不仅刺痛了灵魂而且鞭挞着整个肉体。

“虚假？怎么虚假？为什么？”

“首先，你的消息来源受过污染。”

“可是，我用的资料大部分是由你们大使馆提供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说不纯、虚假。”

“你喝醉了。”

“也许醉了。即便这样，我刚才的话也千真万确。”

格伦达死死盯着脚下地毯上的图案。

“当然，你的论文中也有一些不可辩驳的事实。”巴勃罗接着说，“不错，萨克拉门托是个岛国，位于加勒比海，是西班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多·科尔多瓦船长在1525年发现的。一个叫莱安德罗·加西亚·埃斯卡拉的人在岛的西北海岸建立了埃斯梅拉达港，后来又在中部高原建立了塞罗埃莫索。不过，那个所谓褐色美洲豹守在银矿洞口专吞西班牙人、不吃当地人反而舔他们的手的故事纯属捏造，与母狼用乳汁喂养罗穆洛和雷莫的传说同样不真实。”

“莫利纳博士借给我的一本书上说，殖民时代留下的文物证明这只褐色美洲豹确实存在，甚至萨克拉门托共和国国徽上也绘有这个动物。”

“完全是神话，请相信。”

格伦达挺直胸脯，双手托腮，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抬起眼睛望着外交官。

“难道我写的一切都无可救药吗？”

“你本人可以救药。”

“别开玩笑！我讨厌。我说正经话呢。下月必须交上论文。”

巴勃罗耸耸肩膀。几杯酒下肚，他变得口若悬河，洋洋得意，忘乎形骸了，觉得有格伦达作伴，感到一种性虐待狂的享受。

“关于萨克拉门托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及我国作为墨西哥伊图尔维德帝国的一部分和在中美洲联盟中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写的不错。”

“那么，你认为哪些写得不好或者写错了呢？”

“其余的一切。”

她又挺直胸脯，双臂交叉，保护住胃部。

“这样武断而又空泛的批评我不能接受。请你指出具体的段落，有哪些错误。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原稿带来呢？”

她依然感到馅饼里奇特调料的臊味，于是打开提包，拿出一片糖衣铝化镁药片，塞进嘴里。

“首先，”巴勃罗又点燃一支香烟，“萨克拉门托的历史并不像你所介绍的那样笔直。我国的秘史比教科书所宣扬的史要有趣得多，并且更富于人情味。”

“我还不知道你要扯多远……”

“作为一个从小受匪徒和好汉故事熏陶的善良的美国姑娘，你总是想从我国的历史中寻找绝对的匪徒和绝对的英雄。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你用最基本的颜色勾出了一个粗糙的画面，结果成了一张没有色调的招贴画。”

她慢腾腾地摇摇头，似乎茫然不知所云。

“请你一部分一部分地说吧……”美国姑娘说，“我写的关于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的段落错了吗？他是不是个残忍的独裁者？是不是统治了萨克拉门托近二十五年的暴君？”

看到姑娘情绪激动，巴勃罗很开心。

“在论文中，你把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写成了个庸俗的匪徒、无知的家伙、贪婪的窃贼，至少我的印象如

此……”

“那么他是什么东西？圣人？学者？”

“不。他是一种类型的人，既有一点学者的知识，又有一点圣人的心肠，更多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癫狂。”

姑娘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把残留在嘴里的药片咽进肚里。

“我等着听你关于萨克拉门托历史的说法呢。”

“好……1899年，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五十多岁，是个不曾从过业的医生，属于我国所谓农村贵族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以在野近二十年的反对党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共和国总统竞选。被保守党击败之后，他声称政府政治和警察机器在选举中舞弊，开始与反对派头目们策划，并得到了小小的国民军大部分官兵的支持，于1900年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

“这些都是我在论文里写过的。”格伦达插嘴说。

“我知道，在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政权‘政绩’的鼓舞下，尤其是因为醉心于自己的施政计划，查莫罗封闭了议会，建立了他称之为‘家长式独裁’政权。他的想法是需要培养善于治国的杰出人才，同时必须在人民当中扫除文盲，使之能自觉地行使选举权。为了执行这一纲领，他全力支持并非常关心古老的联邦大学，拨巨款为教师增加薪金，从法国和德国聘请知名学者以充实教师队伍，同时命令在全国修建小学……”

“这命令从未执行。”格伦达打断了他的话，口气激烈。

“说得完全正确。请继续听下去……安东尼奥·马丽

亚·查莫罗一心成为文学艺术保护人的兴致令人感动。他颁发奖学金，派本国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到欧洲留学……他贪婪地阅读历史书籍，崇拜古希腊和古罗马，喜欢音乐和诗歌，一心想学路易斯一世建设慕尼黑的壮举，把塞罗埃莫索变成艺术都城，让他的首都以加勒比的雅典著称。”

“这并没有使他免于以‘加勒比豺狼’的绰号著称。”

“依我之见，这个绰号并不公平。我既没有为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的‘临时家长式独裁’辩护，也无意替其它形式的专制唱赞歌。格伦达，我只提醒你注意查莫罗的人性方面。他身材魁梧，宽宽的额头，金黄色头发，蓝眼睛，宽胸膛，有点像倒霉的墨西哥总统马克西米亚诺。人们想授予他‘宏图大略者’的称号，他拒绝接受，同样也拒绝了武装部队荣誉将军的头衔。从骨子里讲，此人是个带有家长制倾向的文官执政主义者。他愿意被称为‘保护者’。当得知人民称他为‘伟大的老爹’时，他非常高兴。”

“老爹？也许在独裁初期算得上，那时他暴君的本性尚未暴露。”

“他的‘本性’？也许只有上帝知晓。”

“上帝和你，巴勃罗。”

巴勃罗觉得这句玩笑开得好：

“完全正确，只有上帝和我知道。你想，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在政府大厦举办舞会、文学聚谈会、音乐会（他最喜欢柏辽兹和瓦格纳的作品）、文艺作品比赛……”

“而人民却因饥饿而死。”

“对，今天依然如此。不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请让我继续讲下去……安东尼奥·查莫罗很多错误之一便是关在

政府大厦里生活，或者说，生活在他自己的幻觉制造出的世界里，从来不过问外边的情况如何，整天沉湎于签署文件、为国家制定宏大的规划、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或跟他的知心朋友、萨克拉门托大主教埃米尼奥·奥马萨瓦尔先生下棋。每天早晨（他黎明即起）都用来撰写一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但又永远写不完。为了过这种生活，他把各省交由省长治理，而省长们大都是农村贵族、农场主、牧场主和榨糖厂厂主的代表，他们像封建男爵似地吞并小土地所有者的田产，以最残酷的形式剥削农民。查莫罗只要求各省长对他政治上忠诚，言听计从，当然还要求他们支持‘伟大的老爹’继续当权。”

格伦达突然站起身来，点上一支香烟，喷了两口烟问道：

“一个聪明的人竟然在幻觉中生活二十五年，你认为可信吗？”

“可信。他的部长和亲信用尽一切办法让他脱离现实。警察首脑堵住了新闻界的嘴，而‘保护者’只看官方日报。武装部队使手无寸铁的反派不敢动弹。于是，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这个庞然大物就成了个囚徒。”

“谁的囚徒？”

“从心理学角度看，是精神病的囚徒，因为一切迹象表明，他具有类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从肉体和政治上说，是他周围那些人的囚徒，他们用他作为船头上的偶像，因为他在全国，在一定程度上说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是个受尊敬的人物。可是，你知道这伙狱卒的首领是谁吗？谁是真正的‘王位幕后操纵者’？查莫罗的妻子！”

“拉斐拉夫人？”

“说得对！她是个野心勃勃、大权独揽并且同样精神错乱的人物，而你却没有把她写进论文。”

“我不想写小说。”格伦达辩解说。

“嗯……写历史的时候间或用上点小说技巧能使文章增色……”

突然门把手转动了一下，发出金属声响，他停住口，两个人的目光同时转向门口。隔壁房间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巴勃罗接着说

“拉斐拉夫人与几位共和国部长狼狈为奸，建立了一架效率极高的镇压和贪污机器，她和她的同伙们借此发了横财。”

“你们的历史书把查莫罗说成是这个集团握有全权的首领。”

巴勃罗摇摇头：

“在查莫罗执政期间，美国资本流入了萨克拉门托，并且站稳了脚跟。不过，政府和纽约的银行家代表之间的所有合同事先都由拉斐拉和她的顾问们研究过。不经她批准，任何事情都无法办成……1905年至1915年间，加勒比糖业中心在萨克拉门托购买了五千万美元的土地，并且开始大量种植甘蔗，建立榨糖厂。在同一时期，大名远扬、令人敬畏或者说令人仇恨的联合种植公司也在我国安营扎寨，种植和出口香蕉、可可、剑麻、树胶和植物油。全国铁路都落到美国资本手中，电力供应和电话网络命运完全相同。在这一笔笔交易中，拉斐拉夫人和她的同伙们要么获得了这些公司的股票，要么收到了现金。作为回报，他们向投资的公司提供了

种种方便。”

“你想让我相信，对这一切查莫罗一无所知，仅仅沉湎于听柏辽兹的乐曲、写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吗？”

“不是这样吗？他为国家的进步洋洋自得。萨克拉门托吸引了外国资本！破旧不堪、慢慢腾腾的小铁路被又快效率又高的现代化大铁路所取代……电力供应和电话系统大大增长，大大改善。联合种植公司和糖业中心建设起自己的港口，疏浚了淤塞的河道，在从前疟疾流行的沿海地区灭蚊防疫……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到各省视察的时候（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省政府组织盛大游行和宴会欢迎：学校的男女儿童挥舞国旗，太太和小姐们往他头上撒玫瑰花瓣，人们高呼：‘我们的保护者万岁！’。查莫罗相信，他治理下的人民生活幸福，把他奉若神明，于是心满意足地返回政府大厦。”

格伦达把香烟头在烟灰缸底上捻灭，向巴勃罗投去一缕近乎温顺的目光。

“后来呢？”她问。

“还好，你总算对我讲的历史感兴趣了！嗯……拉斐拉夫人不仅控制了丈夫，还欺骗他呢。”

“跟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通奸？”格伦达神情严肃。

“跟很多男人，尤其喜欢三十岁以下的中尉和上尉。她已经年过五十，但对其中一个的肉欲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小伙子厌倦了老太婆，开始跟有名的比里迪亚娜·奥尔蒂斯太太睡觉——她是塞罗埃莫索最漂亮、最令男子们垂涎的女人。你知道拉斐拉太太发现受欺骗之后是怎么干的吗？”

“差人毒死情敌？”

“不。报仇的方式更加高雅。她相信确实无法挽回中尉以后，便打发她的秘密警察里的一位‘专家’把小伙子阉割了，然后把他的生殖器用绿天鹅绒包好，作为礼品送给比里迪亚娜太太，当然还附有一张精致的说明书……据说比里迪亚娜太太当时就昏死过去了。”

“巴勃罗！”格伦达大声喊，脸因为羞涩、恶心和恐怖而变了形。

“请原谅我这个写实主义的细节。当然，它无须在你的论文中出现。不过，我认为拉斐拉夫人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七十多岁的时候，她陷入一场精神危机，后悔犯下种种罪孽，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获得了‘穷人之母’的称号，并向当时的潘菲洛主教忏悔，去望弥撒，每天吃圣餐，以补赎罪恶……查莫罗倒台前一年，她隐居到修道院，最后在那里带着圣光寿终正寝。有人说，在咽气以前，她看见一群天使弹着竖琴、驾着玫瑰色祥云在卧榻四周飞翔，要把她带往天国。你知道吗？还有人说，在弥留之际，见到她手上出现了圣疤^①。”

“你太尖刻了，巴勃罗。”

他只是笑了笑，又喝了一口香槟酒。美国姑娘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沉默：

“为什么萨克拉门托正式历史书上对这些事实统统只字不提呢？……我指的是拉斐拉夫人的专横和腐化行为。”

“啊，这就要归功于萨克拉门托人古老的绅士气度了！”

① 圣疤：圣徒身上出现的疤痕，表明他曾与耶稣同时受难。

何苦要在身后玷污国家第一夫人的名声呢？再说，大主教很快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势，说服了胡韦蒂诺·卡雷拉尊重他死去的女友。最简单、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把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说成是‘加勒比豺狼’——正如你在论文中所写的一样。”

格伦达发出一声叹息，既可以说是因为无可奈何（巴勃罗就是这样看的），又可能是有点不耐烦了。

“胡韦蒂诺·卡雷拉呢？”

“在谈卡雷拉之前，得先说说胡安·巴尔萨。他是个破了产的小农场主，在1913年召集并武装起一批农民逃往山区，不时带领队伍下来袭击巡逻队和兵营，在村镇上补充粮食、武器和弹药。渐渐地，他的事迹传遍全国，人民把他视为自由的象征。两年的时间里，游击队不断骚扰，大大削弱了装备低劣、弹药缺乏、军饷拖欠的联邦军。由于不能继续向丈夫隐瞒有人造反，拉斐拉夫人便称胡安·巴尔萨的游击队为土匪。游击队开始焚烧糖业中心和联合种植公司的种植园，于是萨克拉门托政府正式请求美国派一团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军捉拿‘纵火犯’。1915年，海军陆战队在索莱达德马尔登陆，几个月之后便生擒住胡安·巴尔萨，交给了萨克拉门托当局。不久以后的一天凌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几乎在秘密情况下把他处决了……”

“无论是塞罗埃莫索还是埃斯梅拉达港的报纸都没有提到萨克拉门托政府是为追捕胡安·巴尔萨及其同伙才请求我国海军陆战队干预的。”

“当然不会提到。这样一条消息足以搅乱安东尼奥·查莫罗和他的‘宫廷的安宁’，无异于难堪地公开承认国民军方

面无能。所以只是报道说，查莫罗政府允许友好国家——美国——的一营军队在我国领土某地进行登陆演习。”

从进入大使馆以来，格伦达脸上头一次绽出了笑容。

“如果你讲的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我的论文就确实一文不值了。不过……接着讲下去。”

“进入了1925年。拉斐拉夫人躺在了圣徒亚伯拉罕^①的怀里，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则完全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弯腰驼背，老态龙钟，须发皆白，关在政府大厦里，从这个大厅走到那个大厅，不停嘴地和自己的幽灵交谈。政府四分五裂，卢纳贬值，人民怨声载道。反对派互相串通，密谋起事。大学成了煽动者们的巢穴。国民军的一些军官——主要是上尉和中尉——与革命的文职领袖们秘密策划。订下了起义日期：当年6月15日……”

“可是，革命在4月12日爆发了……”

“对，格伦达，问题出在你在论文提到的英雄胡韦蒂诺·卡雷拉中尉身上。当时他在普拉托诺斯市驻防，担任团军需官。本该按约定的日期和时间发动全团起事，但他却提前行动了……在论文中，你把‘仓促行事’的原因归结于这位二十八岁的军官脾气急躁。”

“不对吗？”

“不对。下面我讲讲实际情况。1925年4月的一天下午，上校团长把卡雷拉召到办公室，劈头盖脑地说：‘我们刚刚发现，你侵吞了本团的公款。钱柜里少了十万卢纳！中尉，对你高水准的生活，我们早就有所怀疑了。我限你在四

① 亚伯拉罕：希伯来人，即今犹太人的始祖。此句指拉斐拉夫人开始皈依宗教。

十八小时之内把那笔款放回保险柜!’这时候，勇敢的中尉那性烈如火的脾气起了作用。他一分钟也没有犹豫，抽出手枪，一连把三颗子弹打在上校身上。随后，他高喊着‘革命万岁’走出了指挥部。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参加运动的军官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打死。卡雷拉打发人烧毁了团部的账本，向全国发表了一项慷慨激昂的声明，说自由的钟声已经敲响等等，等等。其它地区的革命者先是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但随后都宣布起事。与驻扎在索莱达德马尔尚未参加革命的陆军第五团进行了一场战斗之后，卡雷拉带领六百名士兵前往卡拉维拉山，从此开始了游击战争。这一部分，你，格伦达，做了热情洋溢的描写……这样，本来是许许多多革命军官之一的卡雷拉一跃成为革命的首领。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尽人皆知了。六个月之后，卡雷拉威风凛凛地进入塞罗埃莫索，在城门口受到埃米尼奥的欢迎。这位大主教和他握手，把象征着首都的钥匙交给他，并请求他对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慈悲为怀——此时，老独裁者也许正在吃午饭，陪客中有路易斯、瓦格纳、普鲁塔克和伯拉图等人的幽灵……”

格伦达开始感到有点恶心。该诅咒的馅饼！她又往嘴里塞了一片药。

巴勃罗再次斟满自己的酒杯。

“举行盛大游行庆祝胜利的那一天，你猜是谁紧挨着卡雷拉站在主席台上？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山上救过卡雷拉一命的传令兵、我们这位威武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巴勃罗停顿一下，呷了口酒，“好，现在该谈谈论文当中我认为完全错误的部分了：你说革命政府对失败者公正、宽

容。不折不扣的鬼话！虽然大主教多次抗争，萨克拉门托至少有一个星期处在恐怖之中。成立了臭名昭著的‘革命法庭’，开始草草审判和处决被推翻的政府的成员。至少三天三夜，卡雷拉任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喝得醉醺醺的群众在全城抢掠，焚烧查莫罗政府一些成员的住宅，奸淫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甚至让人们把前警察首脑活活打死，陈尸广场……看到这些过火的举动，大主教胆战心惊，急忙向卡雷拉呼吁。卡雷拉向他解释说，对那些‘欢天喜地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算得了什么！——人民在‘豺狼’的专横统治下受苦受难整整二十五年，现在应该‘出出胸中的闷气’。不过，为了讨好教会当局，他立刻命令正规部队开进各个街道恢复秩序。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取消了‘革命法庭’，停止了处决，后来在政府大厦的阳台上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演说，宣布萨克拉共和国从那一天开始了秩序、和平、繁荣和公正的新时代。据说当时埃米尼奥·奥马萨瓦尔大主教就站在胡韦蒂诺·卡雷拉旁边，表情严肃，对新任国家之首的话点头称是……那一天，细雨纷纷，空气非常潮湿，大主教一连咳嗽了两次，第二天开始发高烧，卧床不起：肺炎复发。请不要忘记，格伦达，当时还没有发明抗菌素。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把灵魂交还了造物主。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此人集政治家、神父、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是个颇为奇特的角色——被推选代替他的老朋友和保护人，担任大主教的职务。不过，这属于另一个特殊的章节，我暂时不讲……。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罗萨莉娅带到使馆大楼右翼最后边的一个房间。一进屋，他就把灯打开，锁上门，把情妇紧紧搂在胸前，把嘴唇对着她的嘴唇，像个拔火罐似地狠命吸，弄得年轻女人难受地呻吟了一声。

“哎呀！”她把脑袋挣脱出来，向后一扬，埋怨说，“都快把我憋死了……”

她把脸贴在情夫的胸脯上，喘着粗气，听着咚咚的心跳声，弄不清究竟是自己的、还是情夫的、还是两个人的心在一起跳动。加夫列尔没有松开胳膊，用嘴吻着她的头发，手从她的脊背摸到乳房，又摸到屁股，摸得她五脏六腑之内出现一股紧涨的热流向四周放射。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家庭医生的形象。那个秃顶、面黄肌瘦、身材矮小、总是穿一件白色长袍的老人手里拿着听诊器对她说：“你迷走神经亢进，对生活中的激情——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肯定比别人感觉更加强烈。但是，用不着担心，这算不上什么疾病……”每当被一首诗歌、一首乐曲、一部小说里的一个场面，

部电影或一出戏剧所感动的时候，她总是觉得激情像打个寒噤似地从头顶传到脚跟。有的日子，她感到身体的某些部分仿佛处于麻醉状态。现在，她相信，今晚的强烈冲动之后，会感到像是挨了一顿毒打——不仅是肉体，而且还有头脑。

“今天夜里我想让你跟我一起睡。”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轻轻咬着她的耳垂说。

“那怎么行呢？我怎么对潘乔说”？

“随便怎么说都行。”

“不行！前天晚上他钻进我的卧室，硬是不肯走，强迫我跟他上床……”

“你们一块睡了？”

她犹豫了片刻：

“他扬言要打我……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条狗！”

“你忘了，他是我的丈夫。”

“不错。可我呢，我是你的男人。”

罗萨莉娅的头还偎依在情夫的胸前。

“这种局面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低声说，“我的生活简直是地狱。我们俩回到家里，面对面坐在客厅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他一声不吭，用那双充满痛苦与悲伤的狗一样的眼睛盯着我……不时叹口气，扔几只纸鸟，又重新看着我，似乎有话想说又不敢张口。到了睡觉的时间，他哀求我不要把卧室的门锁上。”她停了一会儿，用手指漫不经心地理了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西服口袋里的手绢，

“有时候，他也会发一顿火，威胁说要杀死我，要自杀，要出丑，从窗口跳下去，在河里淹死……今天，准备来这儿的

时候，他突然放声大哭。我没有勇气问他为什么哭。随后他又漫不经心地用彩笔画起来，理也不理我……他晚上吃安眠药才能睡觉，早晨又吃另一种药保持清醒。我们要落个什么结果，落个什么结果呢？”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没有回答，只是又吻起情妇的嘴唇来，这一次亲吻柔情多于性欲。

“你留下不留下”？

“怎么留下呢？”

“我让乌加特编个谎话，说大使馆有紧急特殊任务，比万科必须在天亮以后才能离开。我们说你和尼珐一起到她家去了。”

“你疯了”！

他把情妇放开。情妇挺直了胸，两人相对无言。这时候，罗萨莉娅隐藏在心中的话冲破了似乎紧锁的喉咙：

“你以为我没有发觉你看中了那美国女人吗？”

“上帝赐予我眼睛就是为了让我看。”

“你迷上了她，说实话吧。”

“看到美女，任何正常的男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想跟那美国女妖精睡觉，对吧？”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笑了：

“你……是想听实话呢，还是谎言？”

“实话。”

“那么，你听我说。我想跟她睡，而且一定要跟她睡。不过，罗萨莉娅，并不因此就不再疯狂地想你，因为你是我的合法的妻子！”

弗朗西斯基塔的形象在脑海一闪而过：上午九点，在床

上喝咖啡，吃烤面包片，围着针织头巾，披着披肩……

罗萨莉娅转过身，背对着情夫，走到镜子前头，开始梳理头发，往脸上涂涂脂粉，再抹抹口红。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望着她，恨不得去摸摸她全身每个部位。罗萨莉娅是他的女人，可是他也想要另一个——那带着圣母神气的金发女郎。倒也不是觉得她比黑白混血女人更合胃口，绝对不是！只因为弗朗西丝·安德森身上有一种矜持的神态他想打破，有一种纯净他想玷污。虽然那女人可能多次和别的男子交媾，但他从她白皙的皮肤和光彩夺目的装束上发现了某种处女的贞洁——他非把这贞洁破坏不可！

罗萨莉娅从镜子里看到了大使的影象，对他说：

“快用手绢把嘴唇擦一擦，沾上了好多口红。再把衣襟弹一弹，我的脸在上面贴过……”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微微一笑：

“所有这些污渍都是勋章。别的男人们见了会眼馋的。”

罗萨莉娅回转身，走到情夫跟前，用小手绢给他擦了擦嘴唇，又用手指轻轻弹弹他的前襟：

“回大厅去吧。”

“好吧，亲爱的。”

走到门口，他一面开锁一面低声问：

“留下还是不留？”

“你为什么不去请那美国女人？”

“你的嫉妒使我欲火燃烧。留下吧，我敢保证让你度过生来最美好的一夜。”

“不知道，我不知道。看在上帝份上，让我想一想！”

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个小瓶，打开盖，从里面倒出两

个药片，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谁先出去？”她问。

“宝贝儿，我们一起出去。”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门打开，挽起情妇的胳膊，拉着她朝大厅方向走去。半路上，罗萨莉娅决定钻进女宾休息室。她需要安静几分钟，理一理混乱的思绪。大使独自走进了大厅。

碰到的头一个人是比尔·戈德金，他正靠在门口悠闲自在地吸烟斗，眼睛望着大厅里越来越兴奋的宾客。

“喂，黄头发美国佬！”大使大声招呼，把手搭在老记者肩上，“伙计，怎么没有来看我呀？我到华盛顿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等着邀请？可你是自己人……你以为我忘了1925年我们在卡拉维拉山上那次值得纪念的会见吗？喂，莫利纳博士！”他看见了公使衔参赞，喊了一声，请他过来。

“这个坏家伙！”大使面带笑容，望着戈德金，“一直写文章骂我国政府。喂，比尔，大元帅对联合通讯社憋着一肚子气呢。不论怎么说，你对他太不公正，忘恩负义。”

比尔·戈德金早就预料到他要奚落一番，所以没有反驳，只是笑着抽烟斗。

“你应该再次访问萨克拉门托，”大使接着说，“去看看‘解放者’取得的成就。你可以认为已正式受到了邀请。莫利纳博士，随后我们就发出请帖。去看看吧，比尔。无论什么时候，怎样去都行，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你会亲眼看到政府正在为工人们建筑新住宅，看到最近三年通车的新公路……发现议会正常活动，新闻自由，人民幸福。你们怎能

把我的干亲家称为独裁者呢？怎能呢？”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远远望见蒂蒂托·比拉巴挽着弗朗西丝·安德森走出餐厅，立刻撇下记者追了过去，心里还有点恼火：“莫非她只喜欢同性恋的男人？”

莫利纳博士刚刚和戈德金交谈了两句话就被一个人拉走了。那绅士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黑衣服，紧身坎肩，从衣领上看是位教士。等两个人走远了，戈德金才认出那位神父。当然是他！每次拉丁美洲国家大使馆举行聚会，这位庸俗的神父必定在场。为“恩人”特鲁希略歌功颂德的传记《特鲁希略：一张肖像》即出自他之手。他以热衷于独裁者和获得奖赏闻名遐迩，已经得到过希门尼斯、罗哈斯·比尼利亚、索摩查和特鲁希略等人的勋章。一切迹象表明，最近发表的那篇关于胡韦蒂诺·卡雷拉的文章至少能使他荣膺美洲豹银质勋章。

又剩下戈德金孤身一人了。他点燃烟斗，开始向最喜欢的幽灵发问：“这一切如何解释呢，露丝？答案在哪里？”妻子的影像又来到脑际，样子仍然和临终前几天躺在病床上时那样消瘦，苍白。断气之前，露丝还请求丈夫继续“寻找答案”。也许有一天他会理解上帝的语言……会掌握上帝在宇宙间传播的美好“词汇”所表达的含意。上帝的词汇遍布自然界：五彩缤纷的天空、硕大的星辰、花冠、孩子们的笑声、明净的湖水、鸟类的羽毛、大海的力量与奥秘、尤其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懂得爱、懂得创造美的本能……就在露丝用微弱的声音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一个刁钻的念头掠过他的脑际（现在，这念头多么使他伤心！）应当问问露丝，癌症、麻风病、战争、人类仇视并毁灭其同类的本能……这一

切在上帝的语汇里占据什么位置？

现在，比尔·戈德金从大使馆大厅里看到了数以百计的单词，却无法用它们构成任何有意义的句子，哪怕是最蹩脚的句子。

庸俗神父在豪尔赫·莫利纳跟前站了几分钟，大谈胡韦蒂诺·卡雷拉的品格。神父在一年前访问萨克拉门托的时候有幸受到他的接见。莫利纳听得并不十分在意，只是轻轻点头，心里越来越不耐烦。等神父离开他去找哥伦比亚大使，他才松了一口气。

于是，他又返回孤寂之中，返回置身于数以百计的人中间却能超然物外的奇特而惬意的感觉里。在宾客间穿行，又不爱任何人、对任何人都并不感兴趣、不属于任何人，只是听听人们用各种语言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他感到心里快活。粗俗下流！言不由衷！苏联大使馆的那个小伙子笑得虚伪，刚刚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法国大使说俄国打算在1970年以前把两个以上的宇航员送上月球。莫利纳也丝毫不喜欢头脑简单得可怕的美美国务院拉美司的官员们。这些四肢发达的壮汉们表情迟钝，只关心统计数字，以为思考可以留给电子仪器去完成。

同胞们也令他厌烦，有时候还让他无地自容。几分钟以前，他在一个小休息室里听见两个萨克拉门托年轻女人在进行一场喜剧性对话，当时两个人站在墙壁上挂的一帧凡·高^①的原作前面。

① 凡·高：（1853—1890）荷兰名画家，

“这是准画的呀？”其中一个问道。

另一个凑到跟前，看了看签名：“潘戈。”头一个又问：“潘戈是谁呀？”女友回答说：“就是那个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的画家。难道你没有在电影上看到吗？”

莫利纳感到背部疼痛难忍，恨不得躺到地板上。他想到自己的床，看了看手表，快八点半了……看看四周，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人们的兴致有所减退。

莫利纳又想起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刚才看见他挽着情妇溜出了大厅。国家派这样一个品德低下、知识贫乏的人担任驻美国大使，他满腔气愤。此人是个浑浑噩噩的无赖，仅有一副英俊的外表和过人的胆量。莫非卡雷拉总统丧失了理智？否则怎能决定任命他的干亲家担负这项外交重任呢？现在阿丰索·布斯塔曼特先生的灵魂大概在坟墓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了。

他发现加纳大使站在两步远的地方。神采奕奕的黑人正朝他微笑。莫利纳只是轻轻把头一点就接着往前走。他不像美国人那样有种族偏见，但也并不酷爱黑人。看到出席招待会的那些非洲新共和国的代表，他很是恼火。共和国？只不过是些半野蛮或完全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组合而已。很多人张口闭口奢谈“结束殖民主义”。啊！世界必将对太阳永远不落的大英帝国充满眷恋之情！造成非洲国家可笑繁衍的间接罪人是莱昂纳多·格里斯一类的知识分子。这些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发表演讲，撰写文章，鼓吹自由和自决，仿佛没有责任感甚至没有常人理智的地方会有自由存在，仿佛由互相吞噬的部落组成的所谓国家（或者说畸形国家）也能自决——这里所说的互相吞噬不仅是比喻，而且有时还是原意。

忽然传来一阵尖利的笑声，莫利纳猛地转身观看。他感到一刺心的疼痛从脖颈传到左手指尖。一连几秒钟，双唇紧闭，低声呻吟。过了一会儿疼痛稍稍减轻。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坐到一把直背硬椅子上。他朝图书馆走去，希望上帝（上帝？）让里面没有别人，让他随便拿一本书，在那里一直读到招待会结束。

好一会儿，领事注视着公使衔参赞的一举一动。对于莫利纳博士，他尊重但不喜欢。对于他——比万科——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尊重，包括他本人在内。他是个忘八，温驯的忘八，胆小怕事的懦夫。人们都知道他的妻子跟大使睡觉。这一点，他从人们的眼光中感觉得到：一些人怜悯，另一些人嘲讽，很多人轻蔑。

他一转身，从威尼斯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尊容，不由得暗暗骂了几句。他感到自己躯壳内有三个人：气势汹汹的骂人者、可怜巴巴而又抑郁悲伤的被骂者，还有谴责骂人者同情被骂者的“我”。无论哪一个，他都不喜欢。

他又猛地转过身，背向镜子。现在明白了，脸上怯懦的表情来自那过短的下巴。他用手绢擦了擦眼镜片，动作缓慢、认真，然后放到鼻子上，把眼镜腿稳稳放在耳轮上，才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里游逛。罗萨莉娅在哪里？大使在哪里？既不想让两个人脱离自己的视线又不想让别人发觉他在监视他们。每当疑心有谁发现了他在焦急地寻找那对情人，他总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把手插进衣袋，摆弄着纸卷，轻轻吹起口哨。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这天晚上对蒂蒂托介绍来的陌生

美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致，这倒使比万科有点恼火。究竟为什么，他本人也解释不清。如果大使看中了那美国女人，忘掉了罗萨莉娅，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这样的话，他，比万科，就有希望收回妻子。然后再请求调往其他大使馆或领事馆任职，和妻子开始新的生活。不过，奇怪的是，发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目不转睛地盯着金发女郎，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他自己却感到受了什么委屈。

后来，看见罗萨莉娅回到了大厅，发现她的眼睛有些异样。对，妻子哭过……对于妻子的这种表情，他非常熟悉……她和她的情夫离开大厅那漫长的几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事吗？莫非他们上楼到卧室去了？你看，她东张西望，肯定是在寻找那个男人。婊子！臭妓女！这两个词在头脑里响着，但有气无力，更没有回声。

他想起两天前夜里发生的事情。为了逼迫妻子跟他上床，差一点没有动手打她。妻子眼里含着泪水任他行事，但这非但没有使他有所收敛，而且更煽起了他的欲火。“求求你，潘乔，把灯关了吧。”“不，亲爱的，我要看看你的脸。”“看在上帝份上，快点吧，我都累死了。”突然，他鼓起了勇气：“今天你跟大使睡了觉，对不对？”“潘乔，让我安生一会儿吧。”“睡了没有”？她沮丧地闭上眼睛：

“既然你知道，何必再问呢？”这时候，他一件一件地扒下妻子的衣服，动作非常缓慢，以享受其中的快感。罗萨莉娅仍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现在，他贪婪、急切而又气喘吁吁地舔妻子的全身。对方的冷漠更使他性欲勃发，如疯如狂。

“你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巨人，对不对？”见妻子仍然一言不发，他又飞快地咬咬她的脖颈、乳房、阴部、大腿膝盖，

并且使劲地用鼻子闻着，企图从妻子的躯体上发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气味。“他跟你交媾的时候，你非常快活，对不对？”妻子泪流纵横，要不是紧紧咬着嘴唇，非放声大哭一场不可。最后，他颤抖着爬到妻子赤条条的躯壳上，歇斯底里地占有了她。在快感达到高潮的一瞬间，他觉得床上躺着另一个男人，并且因此而兴奋得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似地呻吟起来。罗萨莉娅一把将他推开，跳下床去，跑进浴室，立刻把门锁上。他仍然趴在床上，紧紧搂着枕头，像个孩子似地大声哭了一场。

17

格伦达靠在雕花立柜上，巴勃罗在离她五米左右的沙发前面踱来踱去。他们还在讨论胡蒂诺·卡雷拉的人品。“他原来不是个很好的总统吗？”她问，“不是很快就举行了选举，组成了立宪政府吗？不是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吗？”

巴勃罗一边听对方说，一边把手插在口袋里来回走动，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

“对，立宪政府推选‘大元帅’为共和国总统，任期五年。”

“那一段时期国家不是相对安定吗？新闻自由，议会正常活动，没有受到压力。”

巴勃罗耸耸肩膀：

“新闻自由？世界上哪个国家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呢？在专制制度下，新闻直接受政府控制。在所谓民主制度下，各财团间接领导新闻界，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向议会施加压力。”

“你这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怪癖念头让人生

气。”

一气之下，她本想追问巴勃罗一句：既然如此，既然你不相信政府的真诚和纯洁，为什么还为它效劳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以为，萨克拉门托大使馆的这位秘书喝醉了，说话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似乎要在高谈阔论的帷幕后面躲藏起来……可是，为什么要躲藏呢？怕谁看见呢？

“巴勃罗，别走来走去了！”

“好。那么你挨着我坐下，不要害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奥尔特加和格伦达先后坐到沙发上，但两个人的身体没有任何接触。“至于心理上的隔阂，”他想，“情况就更糟了。要是吻吻她……她怎样反应呢？当然，会把这看作是企图强奸……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自然是为了不让我拉过来。”

她看了看表：

“我们在这里快谈了一个小时了，你还不该回到招待会上去吗？”

“应该，但不愿意。现在我们就要谈到萨克拉门托历史中最有趣的部分了（至少我认为如此）。 ”

一连几秒钟，巴勃罗用眼睛的余光瞟着格伦达那丰满的大腿和乳房上清晰而又起伏不定的线条。

“在执政的头几个星期，”他说，“胡韦蒂诺·卡雷拉接见了糖业中心和联合种植公司的董事长，同他们达成一项默契。在我看来，这项默契至少可以解释为‘解放者’今天拥有巨额财富的开端。”

格伦达斜睨了巴勃罗一眼，脸上露出不肯置信的表情。

“过了一个星期，美国就承认了他的政府，并向塞罗埃莫索派了一位新大使，因为前任大使是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的座上客，虽说与‘豺狼’同桌共饮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发现他身边有什么达·芬奇和拿破仑·波拿巴等杰出人物的影子……”

格伦达猛地回过头来对外交官说：

“你永远不能正正经经说话吗？”

“永远不能，因为从根本上说，我是个悲伤的人。”

“酒精使别人胡说八道，”他想，“却使我头脑清醒。”

“格伦达，听我接着说。”他双腿交叉，又点上一支烟，“不出人们所料，五年以后，大元帅竞选连任。反对派推出了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所得票数少得让人笑掉大牙，因为亲政府的选举机器早已开始运转。乌戈·乌加特上校——就是穿将军服的那个印第安人，你大概在宴会厅见过——组织了一支整个加勒比地区最精明强干、最残酷无情的警察部队。于是，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打着宪法和议会的幌子、装着民主门面的巧取豪夺盛行的时期。我们这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卡雷拉在游击队里的战友——虽然还很年轻，却在政府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集保镖、传令兵、公共关系联络人和不管部部长于一身，或者叫卡雷拉与有意与之作交易的人之间的桥梁，更确切地说是为奸商们和政权牵线的掮客、以权谋利的贩子。他精明、狡猾、大胆，大部分肮脏交易都由他出头露面：买、卖、放行、免税、解决难题……丰厚的佣金流进了‘解放者’及其同伙的口袋……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仅发了横财，而且社会地位也日渐升

高。

“一开始，‘官僚阶层’拒绝与他为伍，但后来在总统以及大主教庇护下进入了上流社会，并且与一家富豪的女继承人结了婚。姑娘面貌丑陋，又比他大几岁，但是这桩婚事使他在安蒂利亚银行担任了高级职务，至少表面上获得了人们的尊敬。现在，他是那家银行的主要董事长。”

“现在，为什么这样恶心？”格伦达暗自发问，“因为吃了萨克拉门托馅饼，还是由于听了巴勃罗表情坦然地讲的这些肮脏故事？既然他并不寡廉鲜耻，为什么要摆出这副神态？为什么他一再贬毁他本人为之效力的政府呢？”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出现了赌场和夜总会，使埃斯梅拉达港成为美洲最著名的旅游中心之一，成为唯一允许自由赌博的地区。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妓院一个接一个出现。尽人皆知，乌加特就是设在埃斯梅拉达港各饭店和夜总会的赌博机器的两位老板之一，并且从妓院的老鸨那里获得抽头。我相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佣金相当大的一部分落到‘解放者’手里。”

“这不可能！”

“哎呀，格伦达，拉丁美洲这些独裁者都是一路货色。你再听听下面这个颇有教益的故事。大元帅的第二届任期将满，我国宪法有一条禁止他第二次连任，而卡雷拉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不仅如此，假若政敌当选，他的‘造币工厂’将遭毁灭的厄运。议会中，反对派酝酿着一场运动。人民不满。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是联邦大学里出现不安定的迹象。几家报纸开始攻击政府。显然，卡雷拉曾想到挑选一个由他操纵的候选人强加给选民。可是，他最后似乎得出结论，进行一

次正常的选举也要冒风险。我尊敬的小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是好？毫无疑问，要发明一种危险，杜撰一个阴谋，使采取非常措施势在必行。哪种借口最显眼呢？当然是共产党人政变迫在眉睫了。”

“但是，1935年，这种危险在几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确实存在。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巴西甚至曾发生起义……”

巴勃罗举起手，随后放下，像是在空中砍断了一条无形的线：

“不要打搅巴西吧。我们的警察首脑和他的专家们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文件，证明一个由莫斯科支持并资助的阴谋集团妄图颠覆‘萨克拉门托的民主秩序’。乌加特的秘密警察派人在公共场所扔了几枚炸弹，导演了一场谋杀‘解放者’的闹剧（谋杀自然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吓得如惊弓之鸟。联合种植公司和糖业中心的董事和经理们开始收到匿名恐吓信。一天上午，国家发生政变。卡雷拉关闭了议会，宣布了戒严令，以冠冕堂皇的‘救国运动’的名义建立了独裁制度。”

“如此说来，真的不曾有阴谋集团？”

“真的没有。萨克拉门托的共产党人都是些看客，他们一般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大部分仅仅从理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

格伦达还是不肯相信：

“你怎么会了解这次政变的计划呢？”

“其中一部分就是在我家策划的。”

“在你家？”她大声说，“难以令人置信！”

“我也觉得难以相信。当时我十六岁，一天晚上看见一

些人走进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宅院，个个表情严肃，行动诡秘。他们当中有大主教先生、我父亲的几位朋友——和他一样的庄园主、保守报纸的董事长、军官……还有乌加特本人。政变成功之后，我家的餐桌上曾明白无误地谈论过，我母亲兴高采烈地向我讲了制定‘运动’计划的细节。”

“如此说来，你父亲……”

“格伦达，至于我父亲，他属于另一个特殊的章节，现在我不想细讲。也许有一天……他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心地善良。我应当公正地说，他有所怀疑，但更愿意想象为他真诚地相信了卡雷拉的特务请他过目的可怕的阴谋集团的文件……对他来说，地球上没有比共产主义更令人深恶痛绝的了。”

“这么说，我的论文……”

巴勃罗打断了她的话：

“回头再谈你的作品，先听我把故事说完。胡韦蒂诺·卡雷拉成了萨克拉门托独断专行的独裁者。美国大使奉召回华盛顿磋商，一星期后笑咪咪地返回住所：他的国家承认‘兄弟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当时，纳粹主义对欧洲威胁日益增长，这无疑也间接帮助了卡雷拉。除了斯大林的幽灵之外，又出现了希特勒的幽灵。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元帅的政权更加巩固，因为他的国家加入了西半球的防御计划。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萨克拉门托追随美国向日本宣战，随后又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我从莫利纳博士送给我的一本萨克拉门托历史上读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卡雷拉自愿决定隐居，把权力交给一个民选的继承人……”

“自愿？可笑之极！事实是，盟国胜利以后，在联邦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解放运动的组织，由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和胡里奥·莫雷诺发起，受到了学生、作家、艺术家和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大街上发生了反对卡雷拉独裁政权的集会。警察企图驱散示威者，群众用石块和棍棒还击。报纸也纷纷要求恢复民主制度。美国大使（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父亲曾在饭桌上证实）拜访了胡韦蒂诺·卡雷拉，那是在1948年底，暗示他美国乐于看到萨克拉门托重见民主。就这样，那次拜访以后几个月，召开了立宪议会，制订了并在三个月后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举行了自由选举，胡里奥·莫雷诺博士在1949年就任第三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你能否认莫雷诺有赤色倾向吗？”

“格伦达，你患有色盲症，不能区分颜色，所以能成为国务院出色的职员。根据我的字典，胡里奥·莫雷诺是个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不出人们所料，他的政府堪称楷模。”

“也许从左派的观点来看是这样。他所采取的头一批措施中就包括承认共产党合法。”

“莫雷诺给了所有政党自由，释放了全部政治犯，彻底废除了报刊检查，决定对前政府几个部门进行调查，要求卡雷拉及其同伙、部长和追随者向法院和人民解释其巨额财富的来源。调查刚刚开始，大元帅（直到此时，他一直认为留在国内安然无恙）就携带家眷乘私人飞机逃往多米尼加，向他的干亲家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请求避难去了。乌加特也起而效尤。但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却留在了塞罗埃莫索，他靠的是岳父的威望，更相信自己政治上手腕高

强……他象那种遇到危险就装死的虫子一样，保全了性命。”

“摆脱政敌之后，”格伦达不无讥讽地说，“莫雷诺就放开手脚，全力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化的任务了。难道不是吗？”

“依我看来，他不过在治理国家时着眼于中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罢了，其目的是废除城乡大资产阶级的特权，推行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共产主义惯用的伪装之一。”

“你错了，麦卡锡小姐^①。”

姑娘瞪了他一眼：

“我叫多列玛斯。”

“我叫弗·伊·乌里扬诺夫，以列宁的名字闻名天下。”

“你喝得太多了。”

巴勃罗看到美国女人怒气冲冲，心里颇为得意，突然想把她搂在怀里，吻吻她的嘴。不过他没有放肆行事，只是笑了笑，接着说：

“避难期间，卡雷拉多次到欧洲旅行，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他还举行记者招待会攻击莫雷诺，称其为‘莫斯科的走狗’。但是，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圣多明各进行秘密策划，企图卷土重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则在国内为他的干亲家效劳，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莫雷诺博士执政期间国

^① 麦卡锡（1909—1957），美国参议员，以充当反共急先锋著称。1950年宣称美国国务院中“有共产党”，对许多机构和个人进行“忠诚调查”，实施非法审讯。其观点和做法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内有自由气氛。”

“我希望你不要否认，那个所谓自由政府有明显的反美色彩。”

“否认！胡里奥·莫雷诺博士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对美国非常崇敬，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所做的无非是收回糖业中心和联合种植公司享有的一小部分特权而已。”

巴勃罗又站起来，把瓶子里剩下的香槟统统倒进自己的杯子。

“你来听听这段故事。”他喝了一大口，“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萨克拉门托在美国的存款达五亿金美元。我国的空军和海军经不住曼哈顿^①各公司的诱惑‘发现’需要一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一批飞机、坦克和高射炮，你知道……而纽约那些精明的家伙们则企图向我们倾销大量战争剩余物资。莫雷诺否决了这项要求，同时也就得罪了我国的武装部队，惹得国内一个打算在这笔肮脏交易中充当中间人、获得丰厚佣金的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他火冒三丈……用广告费支撑我国各主要报纸的美国大公司向它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开展一场反政府的宣传运动，各报社当然立刻照办。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也偷偷干着挖墙角的勾当。在教堂的讲道坛上，神父们开始攻击莫雷诺，甚至说他‘反基督’。这样，1951年底，雇佣军分头在我国沿海不同地点登陆：埃斯梅拉达港、普拉托诺斯、奥罗威德、索莱达德马尔……这些地方的卫戍部队里早有阴谋分子从中策反，这时他们纷纷倒戈投向入侵者方面，两者合兵一处向首都进发，而塞罗埃莫索仅

^① 曼哈顿：纽约哈得孙河口岩岛，为纽约市中心。

有为数不多的士兵、人民代表和学生继续忠于莫雷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首都指挥着第五纵队首先冲进政府大厦。这出戏的后半部分你了解。”

“莫雷诺自杀身亡。”

巴勃罗作了个怀疑的手势：

“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莫雷诺死了。死于自己之手还是死于敌人之手？这个星期我和格里斯博士谈过，他倾向于第二种假设……”

格伦达昏头胀脑，感到失望的苦涩。莫非巴勃罗是在戏弄她？如果是的话……他的目的何在？如果不是的话，他讲的这一切都可信吗？

巴勃罗喝干了杯子里的香槟酒，死死盯了姑娘一会儿，突然间欲潮汹涌，恨不得立刻把她按倒在沙发上，占有她。为了逃脱对方的诱惑，他继续讲下去。

“就这样，格伦达·多列玛斯！后来，胡韦蒂诺·卡雷拉大元帅率领部队开进塞罗埃莫索城的时候，各教堂钟声齐鸣……潘菲洛大主教在城市大门口迎接胜利者，按照习惯把象征首都的钥匙交到他手里。可是，各条街道空无一人，家家关门闭户，人民以这种方式表达悲痛和抗议。只有几家大资产阶级的阳台上有些男人和女人向卡雷拉挥舞彩旗，投掷鲜花。长话短说吧。从1952年到1954年，萨克拉门托处于以大元帅为首的三架马车统治之下。莫雷诺没收的土地重新归还给美国公司。警察新任首脑萨巴拉开始一场不慌不忙、仔细而又无情的‘扫荡’：监禁、肉刑、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保守阶层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1954年底，卡雷拉依照新宪法重新当选总统，但由于旧寡头阶层代表的坚持，宪法里

包括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的条款。于是我们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美国立刻承认了萨克拉门托新政府。我的颇有教益的历史故事到此结束。”

格伦达越想越恶心，一身冷汗像麻醉剂一样使她的脸、手和全身失去了知觉。“大概我苍白得像具死尸。”她想。

“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论文本身。”巴勃罗笑着说，“根据我对你的作品的理解，你力图证明，无论是被查莫罗那样专横暴戾的白人独裁者统治，还是由你想象为民主分子的混血儿卡雷拉管理，萨克拉门托这类国家难于甚至永远达不到政治成熟，也建立不起繁荣稳定的经济秩序，原因很简单，其人民主要由混血儿构成。对吧？”

“完全正确。”

“那么，你错了。”

格伦达猛地站起身。

“只有一件事我想不通。”她突然改变话题，简直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像你这样一位‘自由主义者’，了解政府的一切腐化行为，为什么还在华盛顿为这个政府效劳呢？”

巴勃罗耸耸肩膀：

“肯定是因为我也是个腐化分子。”

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简单化的解释，但说出这句自我惩罚的戏剧性语言使他觉得一阵轻松，产生一种病态的快感。

“你打算如何处理你的论文呢？”他问。

“还不知道，我看不会作任何改动，至于最后的结论，我们可以各持己见。现在我想走了。”

巴勃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他感觉到自己幻化成了气体，飘在空中，身体却保持直立。头又开始稳稳作痛了。

在楼道里，他挽着格伦达朝大厅走去。到了大厅门口，美国女人停住脚步，像个站在树冠交织、黑咕隆咚的森林边上的小姑娘，不得不钻进去而又犹犹豫豫不敢迈步一样。奥尔兰多·贡萨加朝他们走过来。巴勃罗很了解自己的朋友，发现他很“快活”。

“想听个让人笑掉大牙的笑话吗？刚才，我和一个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讨论种族问题，给他讲了讲我对于世界末日的说法。你们也听听吧！天空响起圆号声，接着一个声音在宇宙回荡，宣告最后审判开始。人类战战兢兢。得克萨斯人下意识地伸手掏出手枪，但马上明白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上帝肯定会更快扣动扳机。全世界的人都翘首朝天空凝视，看见万能上帝的巨大宝座光亮耀眼。圆号、竖琴和里拉琴齐鸣，天使们唱起圣歌，等等，等等。担任司仪的加百利宣布造物主刚刚就座……得克萨斯人都举目望天，但惊奇地发现我主耶稣是个黑人！怎么样，嗯？可笑不可笑？我那位得克萨斯朋友可不喜欢。你认为如何，巴勃罗？”

“贡萨加，我们回头再谈，多列玛斯小姐有点不舒服。”

奥尔特加无须看格伦达的脸就能感到，巴西人讲的故事刺伤了她的心。

“走吧，巴勃罗。”

他俩离开贡萨加，开始“穿透”人群，朝门庭走去。格伦达恶心得越来越厉害，肯定是人们身上冒着烤人的热气，萨克拉门托馅饼的气味在空中弥漫，黑人们散发着恶臭……她和一个胸前戴朵枯萎了的兰花的胖女人撞了个满怀，胖女人朝她一笑，用英语说：“对不起，亲爱的！”格伦达觉得在吃那朵兰花，更加感到恶心。眼前突然冒出了一张某个非洲

国家大使油黑的脸。接着，又看见一个黑白混血女人嘴唇满是肥油，唇上的绒毛沾着糖末。很多人呼吸里带有那可怕的气味。格伦达昏昏沉沉，被巴勃罗拉着往前走，紧紧用手提包压住胃部，冷汗淋漓，两脚发软。馅饼……黑人的狐臭……在胃里发酵的兰花……人声嘈杂……又闷又热……

“快！我很难受……”

总算到了前厅，出了大门。凉爽的夜晚使她稍感轻松。她靠在一根石柱上。

“格伦达，我可以去给你取点药吗？”

“不用。请你让他们马上把我的车开过来。”

接着，把汽车号码、牌子和颜色告诉巴勃罗，他立刻转告给大使馆的看门人。

“我跟你一起走。”等格伦达的汽车停在门前，外交官说。

“不，巴勃罗。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安生安生吧！”

说完，她飞快地走下台阶，钻进汽车。

“格伦达，你病了，不能一个人回家。”

她脸色惨白，嘴唇颤抖，感到胃里翻江倒海，不由得用手捂住眼睛：

“巴勃罗，别着急。请你理解……”

“好，我理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她摇了摇头，开动了发动机：

“不知道。我不知道。”

汽车猛地启动。巴勃罗目送它飞驰，一直到在远方消失，然后点上一支烟，返回招待会大厅。他对自己很不满意，头又开始隐隐作痛。

第三部分

外 交 圈

四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萨克拉门托大使前往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就任。刚刚走进泛美联盟大厦，就被一阵阵鸟鸣迷住了。这尖利的叫声唤醒了在他心中沉睡的“顽童”。他甩下随从，大步流星地朝“热带院”走去，那里有两只鸚鵡正站在支架上叽叽喳喳地调情呢。这种鸟色彩鲜艳，身上的羽毛嫣红、翠绿、湛蓝、金黄，像是水彩画就一样。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走近其中一只，想抓住它的尖嘴，惹得色彩斑斓的小东西叫得更欢了。接着，他开始对鸟儿唠叨起来，这种语言蒂蒂托·比拉巴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秘书想让上司看看院子里其他珍禽异物，但大使根本不听，又去逗另一只鸚鵡玩。

这时候，一伙旅游者走进来，导游请他们观看院子里几种有代表性的热带树木——一株橡胶树，一株香蕉树，一株咖啡树和一株马蒂茶树。“中间的喷泉，”导游说，“由紫色大理石筑成。请旅游者先生们注意，其建筑风格受玛雅、

阿斯特加和扎帕特加^①艺术的影响，甬道上镶嵌的图案……”
白费气力！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洪亮的嗓音和鸛鹑鸟的叫声响成一片，导游只好满心不高兴地停住嘴，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局面，蒂蒂托劝大使先生上楼，说举行仪式的时刻就要到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兴致正浓，问道：“这两只小鸟是我们的同胞，对吧，比拉巴？”小时候，他常到索莱达德马尔镇附近的树林里捉鸛鹑鸟，然后卖给美国旅游者，每只卖两个美元！蒂蒂托不无遗憾地告诉上司，这两只是来自危地马拉的礼品。“记下来，比拉巴，差人去取两只萨克拉门托鸛鹑鸟来，以我国政府的名义送给泛美联盟。注意，要一只公一只母，因为，不知道你是否了解，鸛鹑鸟是单配偶制，从一而终……”蒂蒂托轻轻摇了摇头，心里暗想：“我可不肯恭维它们的习性。”

几分钟以后，在豪尔赫·莫利纳博士、巴勃罗·奥尔特加和埃内斯托·比拉巴簇拥下——博士看到“热带院”那难堪的场面时悻悻地躲开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缓缓走上通往上一层的楼梯。这是他一生中又一个伟大的时刻！在“英雄与旗帜大厅”，他和等候在那里的大使们一一握手：“啊，亲爱的大使！”“你好啊，老朋友！”随后，一齐向理事会办公室走去。

大使馆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坐在巨型办公桌前，处于阿丰索·布斯塔曼特的目光监视之下。画像栩栩如生，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在对面墙壁上死死盯着他，表情严厉。这

① 均为拉丁美洲印地安民族，具有古老的文明。

幅半身像出自一位美国名画家之手。画像上，杰出的外交家身穿黑色西服，胸前的荣誉勋位勋章像是前襟上一滴紫红色的墨水闪着自豪的光芒。阿丰索面色红润，雪白柔软的头发在火红色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如艺术家蒂蒂托所说，画像的配色与办公室的装饰非常和谐：胡桃木壁板、樱花色天鹅绒地毯、深褐色笨重家俱……

每当从文件上抬起头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总是发现阿丰索带着挑剔的神情监视着他。要是这位新任大使站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发现踱着步比坐着或躺着更便于思考——觉得老外交官一直在注视着他，想逃也逃不掉。有一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对奥吉薇说：

“你发现了吗？那个鬼画家画得太妙了。无论你站在办公室的哪个地方，阿丰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

“请允许我开句玩笑：阿丰索是民族意识的象征。”

大使笑了一声，说他的国家需要更年轻、更欢快的民族意识。

现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正在审阅一份公路建筑计划。拟议中的巨大柏油路将横越印第安山脉，在山坡上蜿蜒盘旋，穿越无数涵洞，实现萨克拉门托人的夙愿：连结北部主要城市和南部较为落后的奥罗威德和圣费尔南多两省。

莫利纳博士经常来大使办公室，送来文件、计划、解释性说明——我的上帝，这个人装模作样，讨厌！——总是带着那副深知自己知识渊博、责任重大的庄重而又谨慎的神气。和秘书们交谈中，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称呼他“英国大百科全书先生”。

这时候，大使盯着承建这项巨大工程的美国公司提供的

计划、地图和投资额的影印件，看了看萨克拉门托工程师们代表政府就此提出的可行性意见的副本……他打着哈欠，抓抓头皮，睏得眼皮像铅一样沉重，于是喊来奥吉薇小姐（他还不习惯按电铃）要一杯咖啡，点上支雪茄，离开办公桌，在屋里走来走去，稍带仇视地斜睨阿丰索的画像一眼，站在窗前朝外望望，然后喝下咖啡，重新坐下，设法看懂文件堆里的图表和文字……几周之内要在美国国务院会见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只有对“课文”倒背如流才能说服美国佬。当然最重要的是得到贷款。还必须和泛美发展银行的董事长们多次交涉……搏斗一定相当艰苦——这算得了什么——他生性喜欢搏斗。

有一天下午，他觉得屋里热得难以忍受，几乎感到窒息，就跑出办公室，在奥吉薇小姐身边经过时大喊一声：“我在这坟墓里呆不下去了，来露天活动活动！”然后走出大楼，光着脑袋在花园里散步，在心里大声喊着各种问题和打算，嘴上独自唠唠叨叨。他热爱山区，热爱旷野。没有比跟着胡韦蒂诺·卡雷拉在山上打游击的时候那种“猪狗生活”更让他感到爽快的了。盖着星星睡觉，早上醒来脸上结了霜，脸蛋和眼皮像灼伤了似的痛，多么惬意！

四月末，冬天的余韵消失殆尽，天气转暖，大使馆的暖气停了。一天上午，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来到办公室，对女秘书说：“克莱尔，把窗户全都打开，把春天请进来……”

现在，每逢停止手头的工作稍事休息的时候，他往往走到窗前，饶有兴致地观看小鸟在花园的树颠嬉戏，仿佛置身

于一张外国名信片之中。随后又望望耸立在英国大使馆屋顶上那几个色调严峻的大烟囱，肺里吸满了清香的空气，感到分外快活。有时候，闻到绿色的清香，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形象：美人鱼胡安娜！栩栩如生，太栩栩如生了！仿佛她就站在跟前，贴在身边。

当时他十六岁，在索莱达德马尔镇附近的山上替人家放羊，每星期挣两个卢纳。每当性欲来潮，就在母羊身上发泄。他知道，干这种勾当是罪孽，但是肉欲比对地狱和忏悔神父的惧怕更加强烈。有一天，他正在抚摸着最宠爱的那只母羊，准备在它身上干那种事儿，嘴里嘟囔着自己创造出的情话，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怎么跟畜生干呢？”他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原来是胡安娜，镇上最漂亮的混血女人之一。有一天渔夫阿马利奥独自驾船出海，傍晚带回了这个女人。有人问起女人的来历，阿马利奥笑着回答说：“是我用网从海里打上来的美人鱼。”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好意思地望着她，裤裆里那玩艺儿胀得又粗又直。他马上意识到这尴尬的处境，于是赶紧弯下腰，把背转向胡安娜，用草帽捂住那玩艺儿，佯装捕到了一只小鸟。

胡安娜走到他身边，笑得那样甜，用手摸着他的头问：“你不知道上帝造女人为了什么吗？”他低头望着地面，嘴里喘着粗气。女人的抚摸使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感到美人鱼胡安娜身上带着大海、盐和阳光的热气……美人鱼拉着他的手，把他拽到一个树林里，二话不说就躺到草地上，撩起裙子，露出了大腿、臀部和肚子。索莱达德马尔镇的大嫂

们都说错了，胡安娜不像鱼那样满身鳞片，而是光滑、干净，和人心果一样颜色。这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生来头一次看见赤身裸体的女人。胡安娜朝他伸出胳膊：“来呀！”他眼睛湿润，欲火燃烧，又羞又怕，浑身颤抖着趴到胡安娜身上，一时间魂飞魄散，痉挛得死去活来，快活的呻吟变成了欢乐与感激的抽咽。他摇晃着头，不敢正视胡安娜。直到鼓起勇气看那女人的时候，又觉得是头一次和她见面。她是整个岛国、整个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声音和海螺有点相似。

“别害怕，我对谁都不讲，希望你对谁也别讲……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好吧？”他用整个肉体答应了。他心里明白，明白。啊，当然明白！等到能说出话来，他以圣母发誓，绝不把那件事告诉任何人，连忏悔神父也不告诉。这时，胡安娜一句话说得他胸中充满自豪，这巨大的自豪即使山岭那边宽阔的地平线和浩瀚的大海也难以容纳：“你是个男子汉！”她走了几步，停下来，转过身，又补充了一句：

“每星期五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这里等我，我会来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受宠若惊，不住地点头。羊群寂静无声，风儿撩动着胡安娜的头发和裙子。她下山了，朝镇上走去了。

那是小羊倌生来最幸福的一天，但同样幸福的日子接踵而来。每到星期五，胡安娜准时到来，两个人就在大树下的草地上云雨交欢。有一天，他发现不仅迷上了这个女人，而且开始嫉妒每天晚上跟胡安娜在同一个床上睡觉的渔夫了。每天凌晨他都在他们家附近游荡，胸中憋得疼痛，希望阿马利奥早点死去。对情妇，他日思夜想。没有胡安娜在跟前，山峦似乎也成了一片荒漠。现在，看到母羊他就感到恶心。不过，一到那一天胡安娜总是准时到来。

啊！十二月那个可怕的星期四……全镇一片惊慌。阿马利奥出海回来晚了，发现妻子和陆军团的一个上士在床上睡觉，一气之下用宰鱼刀把两个人当场杀死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陷于绝望，没有敢去看情人的尸体，跑进教堂，跪在圣母像脚下大哭了一场。下葬那一天，他爬到一棵树上，远远望着人们把棺材放进坟塘，填上土。第二天，他又赶着羊群上了山。又是个星期五。到了胡安娜该来的时间，他想象着情妇已经到来，两个人手挽着手钻进树林，胡安娜躺在原来的地方，他趴在上边。青草的气味就是胡安娜的气味，土地就是胡安娜。这样，当了鳏夫以后的头一天，他只得和土地交媾，精液和泪水濡湿了草地。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讨厌官僚作风，认为大使馆里文件过多。有一天他对蒂蒂托说：“你不认为人们少写一些，少用些纸张会过得更幸福吗？”比拉巴回答说：“依我看，人大致分为两种：动嘴的和动笔的。比如，纪德^①就是个动嘴的（“我可认为他是另一种东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想。）王尔德^②则是个动笔的。”蒂蒂托接着说，“就是说，他写起来比说话能更好地表达。大使阁下就是个动嘴的。”但心里又补充了一句：“是个末等动嘴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看了秘书两秒钟，恨不得让他滚到某个地方去，脏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随后拿起他送来的文件，无可奈何地批阅起来。

克莱尔·奥吉薇尽量减少大使馆的文件，但乌加特及其党羽的愚蠢、莫利纳博士的学究气和比万科对文件和官场礼

①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②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仪近乎肉欲的钟爱使她的努力收效甚微。奥吉薇每星期三个上午给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上英语课，认为她的学生聪明，记忆力好，能较快地背过所学的单词。问题在于发音。每逢要用他亲爱的林肯的语言说点什么，舌头总是沉重得像是灌满了锡。女教师认为，他发音上的毛病根深蒂固，难以改正。

“你说‘Very Well’^①。”

“Berí Guel。”

他总把“V”念成“B”，而“W”又像“G”。如果某个词以辅音结尾，学生就毫不留情地把尾音吃掉。他把“that”^②念成“Ze”，把“United States”^③说成“Unai Estei”。听到这古里古怪的发音，奥吉薇强忍住没有笑出来，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却开怀畅笑，说他学不会“那种野蛮人的话”，猛地合上书，又孩子似地大笑一阵，英语课遂告结束。

有潘乔·比万科在眼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感到某种欢乐，倒不仅由于那个“肥肉球”是罗萨莉娅的丈夫，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领事在工作上谨小慎微，爱钻牛角尖。要是他说话做事稍微随便一点，自然一点，人们倒也可以忍受。但那个软体动物偏又唯唯诺诺，奴气十足：“请问，阁下允许吗？”……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签署文件的时候，讨厌有他站在桌子旁边，手指间摆弄着有名的一美元钞票，似乎比万科的目光能把又凉又黏又难闻的口水抹到他身上。

① 英文：“很好。”

② 英文：“那个。”

③ 英文：“美国”。

有时候，公事办完，领事收起签过字的文件，但仍然在原地站着，好像有什么事要对上司说。“好了，比万科，你可以走了。”罗萨莉娅的丈夫还犹豫一两秒钟，看样子像没有听懂大使的话，然后才转身离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恶狠狠地望着他，恨不得站起身来，追上去，朝领事那肉墩墩的屁股猛踢一脚……

至于对豪尔赫·莫利纳博士，他的感情就不同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赞赏（当然有点勉强）公使衔参赞，但并不尊敬他。处理大使馆公务时几乎必定先经他的手，对此大使并不甘心，所以尽量不去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像个小学生似地急于指望有一天能抓住莫利纳博士工作中的差错。可是，这个鬼家伙从来不出什么疏漏，无所不知，一切都做得很好。说来也难怪，他在天主教神学院学习了整整十年！“从另一方面看”，心情好的时刻，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这样想，“有公使衔参赞这样一个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各委员会中担当代表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任务——这些任务一般说来让人头痛，有时还很微妙——倒也不失为交了好运。”

不过，他对豪尔赫·莫利纳的恶感突然增加了。有一天，蒂蒂科神秘地在大使耳边嘀咕说，公使衔参赞是阳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听完狠狠在桌面上捶了一拳，大声喊：“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劣等神父从来不笑！”

蒂蒂托……对他这位二等秘书，大使怀着双重感情。首先，他言谈举止不男不女，走路像舞蹈演员一样扭扭捏捏，说起话来像女低音，穿一身馅饼色的衣服，这一切都有损大

使馆的名声，算得上共和国国徽上的一个污点。当然，驻华盛顿的八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当中，哪一国都至少有一名或明或暗的同性恋者。但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希望他的大使馆里个个都是无可争议的男子汉。

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埃内斯托·比拉巴不仅聪明，而且总是精神饱满，花样百出，常常讲些笑话，拨弄点是非，给大使馆轮回反复的单调生活增添点乐趣。有一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险些笑破肚皮。蒂蒂托带着世界上再严肃不过的神气对他说，奥吉薇实际上是个男人，经过整容术之后才变成了女人。

大使容忍二等秘书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蒂蒂托是弗朗西丝·安德森的密友。

“我们的女神哪儿去了？”埃内斯托·比拉巴到纽约短暂旅行回来不几天，大使问他说，“招待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安德森小姐？”二等秘书把腰一扭，“我到曼哈顿首都剧院看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出，幕间休息时碰见了她，她头上绾一条缎子束带，身穿……”

“等一等！安德森小姐怎样穿戴我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能扒下她的衣服……她回华盛顿来吗？”

“据她说，一两个星期之内回来。”

“喂，蒂蒂托，你不会不知道，我看中了这个女人……”

“大使，我也不至于迟钝到那种地步。”

“好。等安德森小姐到了以后，你想法让我见她一次，但必须绝对保密，余下的事由我来干。”

比拉巴微微把头一低，张开巴掌，捂在胸前；

“要是阁下允许，我建议她刚一回来就送去鲜花。”

“成吨地送！你看，送她一件珠宝怎么样？”

蒂蒂托举棋不定：

“必须循序渐进，不然她会生气的……”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荒唐可笑。他——竟然是他！——在向一个同性恋者请教如何把女人搞到手。他忍不住大笑一阵，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咬一咬烟头，叼在牙齿中间，点着，一边抽一边在阿丰索·布斯塔曼特严厉的目光下来回走动。

“蒂蒂托，现在我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安德森小姐有……有什么风流事吗？”

二等秘书耸了耸瘦弱的肩膀：

“只知道有许多人追求她。我认识费城一个花花公子，很有钱，长得也英俊，二十多岁，对她穷追不舍。”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作了个轻蔑的手势：

“我们的女友多大岁数？”

“大概三十有余了。”

“我也估计她是这个岁数。好年龄！不过我不相信像她这样聪明的成年女人愿意跟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睡觉。”

“我倒愿意，非常愿意。”比拉巴心里暗想。

几天以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收到了卡雷拉总统的漆封密信：

“亲爱的干亲家：这里情况不妙。你知道，按照宪法规定，必须在今年十一月举行总统选举。我原本打算

把政府移交给我的合法继承人，彻底隐退，到普拉托诺斯的庄园安度余生，因为我身体欠佳，非常劳累。不幸的是，使命尚未完成，我想至少应当等横贯萨克拉门托公路的巨大工程开工、我已开始的其它工程完成之后再说。此外，我不认为我国已经具备经受一场总统选举的大动荡的条件。常言说，魔鬼之所以无所不晓不是因为它是魔鬼，而是由于上了年纪。我——你的干亲家，一只老狐狸——闻到气味有些异常。我感到，不仅大学里的师生当中，即使在街上、甚至在我国社会上层也有闹事的迹象。

“前天，我召集内阁会议，询问他们我很久以前提出的向议会递交一份允许我再次连选连任的宪法修正案的建议进行情况如何。当初，他们曾保证修正案至迟在三月初通过。现在已经是五月份，至今毫无动静！内政部长对我说，他本人和内阁大部分同僚认为，讨论这项修正案是个危险行动，因为它会鼓励左派，为他们提供闹事的借口。我气昏了，大声喝斥了阿连德几声，骂得他面红耳赤，低下头去，但一句话也没说。我揶揄地问他，尊贵的部长们是否已经为我选择了接班人，他回答说已经有了。你猜是谁？最高法院院长拉蒙·特雷哈博士！阿连德唠唠叨叨地说，博士有文化，品德好，是个倍受尊敬的大法官，并且不属于任何党派，能获得大多数选民的信任。我又火了，大声喊道：‘特雷哈博士可以当，但只能当进养老院的候选人！他快八十岁了。你们都是些疯子！’没有任何人肯吭一声。他们的打算是安排一个傀儡总统，这些庄园主、银行家和工业家可以

随意操纵。他们知道，对我不能这样。现在我才明白，你说得对：我被一些不忠诚的人所包围。太放肆了！竟敢不和我商量就指定了候选人，并且还用即将通过修正案的诺言哄骗我。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为了不让这伙萨克拉门托富豪——他们从来不相信我，从来对受像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的统治耿耿于怀——掌握权柄，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依我看，唯一的办法是发动政变。昨天我和国防部长密谈了一次，他和我看法一致，并保证军队全力无条件地支持我。我们必须在十一月份之前行动，而且，正如你所知道的，需要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关闭议会，宣布紧急状态。另外，还必须考虑世界舆论，特别要考虑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意见。昨天，我在政府大厦和美国大使及大主教共进午餐。你完全能想到为什么请这两个人。席间，我试探美国鬼子的看法，他傻乎乎地笑了笑，其实那傢伙机敏得很。我得出结论，他也想看到我的倒台。我直接了当地问潘菲洛对修正案有何看法。他发表了一篇辞藻华丽的演说——他在这方面的才干你是了解的——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用说，大主教乐于看到一位像特雷哈博士那样每星期天必定去望弥撒的虔诚的教徒主持政府。

“这样，干亲家，我们只好等捣乱分子冒出头来再采取行动了。如果他们在十一月以前仍不冒头，我们将被迫重新杜撰一个颠覆阴谋，再次用共产主义幽灵吓唬美国国务院，吓唬你的‘朋友’、无国籍的流浪汉格里斯称之为‘农村寡头’的阶层了。

“糟糕的是，此时此刻的任何政治——社会动荡都会影响贷款谈判。无须重复，我一生的梦想就是至少让横贯萨克拉门托的公路工程动工。如果这条公路以我的名字命名，那么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尽快告知我你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意见。有时候，我后悔把你派往华盛顿任职。我不怀疑、也从来不曾对其忠诚和友谊怀疑过的人屈指可数，你是其中之一。你暂且留在那里吧，设法把那笔贷款弄到手，这对我国至关重要。我相信我福星高照。十一月以前，我们一定能找到发动政变的好借口。

“我授权你向乌加特出示此信，再不要给其他任何人看到。最好是读后烧掉。对于见之于文字的东西，我总是提心吊胆。请接受老朋友和干亲家热烈的拥抱。

胡韦蒂诺”

读完这封信，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心潮起伏。他早就怀疑内政部长伊纳西奥·阿连德会领导一场“白色革命”，以避免卡雷拉重新当选，强加给他一个所谓“萨克拉门托精华”阶层的候选人，并且美国国务院和大主教也卷入其中。他现在才明白——啊，当初是多么愚蠢！——为什么外交部长那么急于把他派往华盛顿，为什么议会那么快就一致通过任命他为大使。原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是阿连德他们一秋鞋里的石头。而他——白痴！——却中了圈套……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肯定是被大使的头衔冲昏了头脑，想有幸和艾森豪威尔握手，在宏伟的大使馆过上至少一年的时间，当然，也想为他的国家效力，谈判巨额贷款……还有，想到住

在离林肯纪念碑不远的地方，尝一尝华盛顿社交集会的滋味，和罗萨莉娅在一起自由自在地混上几个月……岂不乐哉？并且——见鬼！——男子汉应当敢于坦率地承认某些难于启口的事：他想稍事休息，躲开银行的日常事物和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远离弗朗西斯基塔，听不见她唠唠叨叨、无病呻吟，不必每天晚上在床上看那张涂脂抹粉的脸——那个女人为自己和别人的肉体羞涩，不能给丈夫任何性的快感……他不是向自己、向所有的人发过誓吗？他一定要担任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务！

他差人唤来乌加特。将军一走进办公室，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就锁上门，把胡韦蒂诺·卡雷拉的信交给他。将军读得很慢，他烦躁地从那张宽宽的紫红脸膛上寻找反应。一无所有，像个大字不识的狮身人面像。眼睛呢？像窥视着小鸡的毒蛇。几分钟的时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却觉得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武官把总统的信叠好，一声不响地还给大使。

“怎么样？你怎么看？”大使问。

“依我看形势不妙。”

“是啊。以往几次更大的乱子我们都闯过来了，这一次也一定要闯过去。绝不能把政府交给阿连德那伙人，更不能交给左派匪帮。”

“你认为被阿连德挑作后选人的老混蛋能获胜吗？假如当选，你认为没有掌握军队的卡雷拉的支持他能够执政吗？”

“当然不能，这倒使我稍微放心一些。但仅仅是‘稍微’放心。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发动一次政变。说实话，我恨不得明天就乘飞机返回塞罗埃莫索，把内阁、议会打个落花流水，叫那帮人清醒清醒。可是，你知道，我不能丢下贷款谈

判……已经约好拜访美国国务院，尽管我担心这些美国鬼子会用冷水熬我们……”

从颤抖的肩头看出，乌加特哑然一笑：

“也许我们留在这里对总统的帮助更大。”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大使，“今天收到这份指令。你一看就明白，绝密件。”

纸的上方印有国防部的签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看了一遍：

“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有人正在策划一个入侵本岛、煽动联邦军和农民在全国起义的阴谋，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是这一阴谋在华盛顿的核心人物。必须紧急行动，查清此项颠覆活动的计划，并了解萨克拉门托国内与革命者有联系、单等他们一声信号便拿起武器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的人员名单。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是进入格里斯的住所，查获他的文件。既然此项任务不能在法律范围内完成，请在法律范围外行事。希望在行动中十分小心，以免与美国当局发生纠葛。”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马上把密件还给乌加特，仿佛那张纸能烫伤他的手指似的。现在，大使开始捉摸武官正在制定的行动计划：

“就算你没有让我看到这份文件，懂吗？你的上司是国防部，而不是我，你放手干吧，但有一件事要说清楚：什么也不要对我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对我讲。”

“这么说，我有全权决定如何行动？”

“要说有全权的话，也不是我授予的。我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用很多水和肥皂……我不想让双手沾上鲜血。我已经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不主张暴力。”

武官笑了：

“谁提到暴力了？”

“你看，美国警察非常精干……”

“但也并非无空子可钻。”

离开办公室以前，乌戈·乌加特说：

“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如果形势真的恶化，我就逃往瑞士，谁也无法把我从那里引渡回国。我太老了，忍受不了铁窗之苦。你知道，要是反对派取胜，他们会悬赏要我的脑袋，让我面对墙壁，赏我几颗子弹尝尝。”

前警察首脑说完，离开了大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呆呆地等了一会儿，强忍住心中的怒气。他望着阿丰索的画像，仿佛这位年迈的首任大使能听见他气势汹汹的骂：

“胆小鬼！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家伙！忘八！带着你的母牛逃到瑞士去吧！她背着你跟我的司机私通，就在我的梅塞德斯牌汽车里干！”

他感到非常需要出一出胸中的闷气，找个真正的人谈一谈。找谁呢？莫利纳是块冰，并且咬文嚼字。奥吉薇小姐是个外国人。蒂蒂托是个轻佻的飞蛾。比万科？想也不该想到那个软体动物。巴勃罗倒是个男子汉。“可是，巴勃罗不喜欢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想，“不论我怎样讨好这孩子，他总是和我保持距离，冷若冰霜。况且，巴勃罗是格里斯的朋友！在那个悲剧之夜，格里斯正是靠迪奥尼西奥·奥

尔特加·伊穆拉特这个宝贝儿子的帮助才免于被捕，逃脱了被处死的命运。”

啊！唯一的办法是打电话给罗萨莉娅，约她到随便什么地方见面。是啊，可以用汽车去接她，两人到公园里散散步……

他拿起电话听筒，里面立刻传来奥吉薇的声音：

“请讲，大使先生。”

“给我接‘那个’号码。”

20

巴勃罗·奥尔特加又到Q街登门拜访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在整个华盛顿，没有任何别的去处比格里斯的客厅更使他觉得如同“回到家里”了。博士的客厅别具一格，按照本人的爱好布置得充满美洲移民和英国初期的气氛。摆放的东西都是格里斯流亡的几年中从首都远郊“小偷市场”或者乔治敦的拍卖行买来的。他像择友一样满怀情感的仔细挑选地毯、家俱、灯和绘画。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客厅才显得那样热情好客，仿佛每个物件都寓意无穷，饱含着时光、梦想和坎坷的往事。墙壁上，只要满满的书架上方有块空闲地方，就在褪了色的玫瑰色墙纸上挂一幅戈雅^①作品的复制品，尤其是《奇想集》和《战争的灾难》。装在黑色匣子里的大提琴像个伙伴似地躲在客厅的一角。

五月初那个傍晚，格里斯用“特制咖啡”招待他的朋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钢板组画《奇想集》和《战争的灾难》是他的代表作。

友。两个人慢条斯理地喝着，随便谈论音乐和文学。后来，沉默了一会儿——巴勃罗觉得这沉默像是印刷品上分开两个自然段的符号——流亡者才说：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莫雷诺了。梦的细节记不清了，大致是这样的：我还是个孩子，该起床去上学了，可是懒得动弹，眼皮沉重，想再多睡一会儿……这时听见有人叫我：

‘莱昂！莱昂！你这个懒东西，快起床！’我好容易睁开眼睛，看见床边有个人影，既像父亲，又像莫雷诺博士，两人合为一体……”

“奇怪，你像一些人一样（或者和所有人一样？），有一种神人同形同性论良知……你的良知就是莫雷诺博士。”

“我想可以对这个梦做出解释。最近几天，我正在撰写关于贡哥拉的论文，听巴罗克音乐，还有大学的课程。总之，这一星期过得安宁、惬意。莫雷诺在梦中出现是要迫使我起床去完成使命……因为最近断了联系，完全没有接触革……”他突然停住嘴，笑了笑补充说，“好了，我知道你不想听到这类事。”他又停了一下，问道：“你的良知是谁呢？你的父亲吗？”

对方摇了摇头：

“不，是纳塔利西奥师傅。”

“索莱达德马尔镇那个民间艺人？”

“完全正确。你认识他吗？”

“作品倒是见过，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

“对我来说，纳塔利西奥师傅象征着人民——我国人民——的尊严与苦难。格里斯博士，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相信，从小时候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这样认

为。听说他要是同意别人的建议，用机器代替手工制作泥像，他早就成富翁了。但他拒绝了……甚至有人提到买卖他的泥雕他都感到羞耻，情愿以卖院子里长的水果为生。所以总是那个老样子：农夫，面皮晒得黑红，光着脚，穿白棉布衣服，戴一顶草帽……”

“他制作的那些泥塑出神入化。”格里斯说，“我记得几个色彩鲜艳、长着一双鹰翅膀的独角马，几个人面美洲豹，既像动物又像植物的神像。啊，还有精美的天使……”

“纳塔利西奥师傅是文盲，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上。从来没有老师教他造型法。他的皮肤和使用的泥土同样颜色。我总觉得他那双手特别动人……和别人的手不同，正直……可以说，是圣徒的手。也许圣徒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才有那样的手。”

“他还活着吗？”

“我想还活着，现在该有七十来岁了。我已经六年没有见过他了。”巴勃罗冲着回忆中的场面笑了，“小时候，我爱到他家里去。他住的房子很寒酸，茅草盖顶，夯土为地，离海边不远。纳塔利西奥有五六个孩子，个个都爱摆弄泥土，捏神像，有的做得好些，有的做得差些……我最喜欢闻他家里那种清香、‘丰富’的胶泥味道。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看他做泥人，着色。有时候他让我摆弄摆弄颜料，但我大部分时间还是醉心地看着他那灵巧的手指捏出种种形象……以为上帝就是那样造出世界上第一个人的。说起上帝，我倒想起来了。有一天，我看了他做出的各种动物之后问：‘师傅，真有这些动物吗？’艺术家挤了挤眼，整个脸都在笑：‘人可以做有的，可是也可以带着应有的尊敬创造世上没有。上

帝来不及做的，因为他在六天的时间里来不及做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格里斯笑了：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查莫罗的警察经常找他的麻烦……”

“完全正确。老人偶尔也离开珍禽异兽的领域，从事今天我们所说的‘涉政治艺术’。胡安·巴尔萨带领游击队员在山上活动时，纳塔利西奥做了些这位英雄的着色泥雕，在人们当中流传，有的人把它摆到神龛里作为圣徒供奉。他的一些作品简直像抨击政治和社会的小册子：警察痛打农民；联合种植公司的美国鬼子骑在当地人身上，手拿皮鞭、嘴里叼着雪茄……法官正在从富人手里接受钱财，要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索莱达德马尔镇有个警长，生性残忍，专爱虐待犯人（我是听别人说的），纳塔里西奥师傅捏了一个人在用皮鞭抽打一个平民，平民背上鲜血淋漓。泥人捏得和警长太相像了，在镇上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成了一张秘密传单。世界上不乏告密者。警察闯进纳塔里西奥家里，砸烂了所有的泥塑和工具，揍了艺术家本人及他的妻子、孩子一顿。要不是卡塔里诺神父出面说情，纳塔里西奥早就死在监狱里了。后来，他重操旧业，只是因为警察监视，只能以小儿子为模特做些天使之类的东西了。”

巴勃罗站起身，伏到窗台上朝四下张望，看看他进来时站在附近的穿浅色雨衣的人还在不在。听见格里斯问他，才转过身来。

“那么，今天，我说的是今天，纳塔利西奥在你心目中代表着什么？”

巴勃罗注视着朋友的脸：

“代表的东西太多了。首先，他具有我诚心敬佩的品质：艺术上的真诚，人格上的正直，与大自然密切相连……仿佛他手中的泥土通过手指把大地的秘密信息传到他的心里……对，还有，决不造作。”

“仅仅这些吗？”

“不！我已经说过，他是活在我心中的良知。每次在大使馆收到月薪，我总是想到纳塔利西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萨克拉门托受苦受难的人民。我不记得曾经梦见过他，但他的形象经常在我脑际萦回，有时甚至摆不脱，挣不开。当然，我可以一连几天不想他，可是每当出席聚会，刚刚感到开心的时候，比如喜欢身边的女伴，总之，觉得幸福的时候，纳塔利西奥的影子就出现在眼前，我立刻便悔恨交加，似乎我享乐和欢快的代价是我国人民的疾病、饥饿和不幸。一般说，我‘看见’他蹲在草屋门前的地上，太阳照着他的脸，海风吹拂着他苍白的胡须和头发。他看看我，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什么请求。有时候，只是他的手指在说话……”

巴勃罗在客厅里踱了几步，默默地停在戈雅的一幅画前。格里斯慢慢点了点头。他明白了。

“莫非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也有良知吗？”

巴勃罗转向博士：

“我一直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也许大使的良知是他的母亲。你不会不知道，是个妓女……据见过她的人说，那女人长得还算漂亮，只是被性病和疟疾折磨得不成样子，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像个六十岁的老太婆了。胡韦蒂诺·卡雷拉从山上胜利归来以后，给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个收入丰厚

的职位，人们都以为他会回到索莱达得马尔镇，把母亲救出最下等妓院的苦海，不再过贫困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回去。等到两年以后他访问故乡的时候，老太太已经死了。包括教区长在内，谁也说不清她的尸骨究竟埋在什么地方……。”

格里斯沉思了片刻问道：

“你和此人的关系如何？”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嗯，如果我能够仇恨他，蔑视他，根本不理睬他的存在，一切反而好办了。但是，这家伙招人喜欢，富有魅力，我心里越来越喜欢他了。我无法回避这样的想法：现在，我正在再次背叛纳塔利西奥师傅和他的人民。”

“我认为，此人的不道德行为对你有很强的迷惑力。”

“真的这样认为吗？”

“巴勃罗，在这一点上，所有知识分子都相似。我们暗暗羡慕那些肆无忌惮地使用自己的肉体、从不拒绝肉欲要求的男子汉。”

奥尔特加又坐下来：

“可是，请你相信，尽管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趾高气扬，表面上非常欢乐，时常纵声大笑，他也有垂头丧气的时刻。我多次发现他表情阴郁，蜷缩在屋子的一角，一动不动，满脸悲伤。这是他那‘印第安人的一面’压倒了另一方面或另一些方面。每次陷入情绪低落危机不能自拔时，他总是去参观林肯纪念碑……”

“他在外交场合出了很多洋相吗？”

“没有。恰恰相反，出尽了风头。他和美国助理国务卿

谈话时，有莫利纳博士和我在场。对方精通西班牙文。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仅对我国报界称之为‘横贯萨克拉门托的公路’的巨大工程的财政部分，而且对其计划的技术部分的了解都使我吃惊。在谈话中，加夫列尔有意夹杂一些笑话，引得美国人开心地发笑。尽管如此，关于贷款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最后决定。看样子美国政府想把这件事推迟到十一月份我国大选之后解决……”

“大使对待你怎样？我猜想，是不是在你头上倾泻成吨的‘魔法’……”

“我给你讲个故事。昨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请我和他一起到小石河公园散步。看样子他闷闷不乐。我觉得这邀请太离奇，但还是同意了。下了汽车以后，我们俩沿着小河慢慢朝前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是谈小鸟、树木和花卉。他说非常喜欢大使馆花园里那棵红枫，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巴勃罗，你知道我站在那棵树前有什么感觉吗？为不能与它亲密无间而难过。在索莱达德马尔，我和那里的松树、榆树、椰树和仙人掌都称兄道弟，但对这棵青铜色的大红枫却不能。这个国家就如同那棵红枫一样，漂亮、整齐、丰富多彩……可惜我不能成为它的知心朋友’。他停住嘴，望着一群白色鸭子排成一行在我们面前走过。我看了看他的脸，发现表情既悲哀又孤单，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怜悯，同时又对自己很恼火，觉得竟然会同情这个无赖，这个独裁者的密友，这个奸商，这个高利贷者，这个盘剥劳苦大众的傢伙。当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很会装模作样，可是我不知道……依我看当时他并非逢场作戏……悲伤出自内心。突然，他问我：‘巴勃罗，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格里斯忍不住笑出了声：

“啊，对这种人我太了解了！虽然他们男子汉气十足，不可一世，但其女性成分也极为明显。当然，一个魔术师，一个情场老手容不得任何人抵御他的魅力。”

“我嘟囔了几句话，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亲切地拉住我的胳膊，兴致勃勃地叙说起他的经历：青少年时代，在查莫罗独裁统治时期，受虐待，蹲监狱，挨拳打脚踢。最后还说：‘你不应该仓促对我下结论。关于我的谎言多着呢。也许有一天你能理解我。’”

格里斯在椅子上挪动一下身子，叉起双腿：

“你认为可能吗？”

“也许吧。这个人不像外表那样简单。话又说回来，我们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多少呢？对我们自己了解吗？”

流亡者摇了摇头：

“也不了解。留待上帝去进行最后审判吧，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巴勃罗，我无意从哲学角度讨论你们大使的品格与灵魂。不能以永恒的观点，而应以历史时间为准绳评判他，因为历史是以数以百万计的人物及其命运构成的。我无意从神学角度考虑他的罪孽，只能从社会的角度加以分析。他象征着一种在我看来是罪恶、残忍、不公正的局面。如果想让我国群众摆脱牛马般的水平，过上人的生活，就必须清除这种局面。”

“我同意，教授，完全同意。然而，我不能因此而不从艺术家的角度观察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个艺术家，比如小说家，为了了解他人并通过他人进而了解自己，应当绝对不偏不倚。”

格里斯用力把头一摇，表示强烈异议：

“请允许我对你说明，此时此刻，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不偏不倚不仅荒谬，而且有罪。你是知道我多么讨厌断然下结论的。但是，我国的土地和人民唯一的希望在于卡雷拉以及支持他的寡头阶级倒台。我仇恨暴力，难道还需要再次重申吗？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得很多，确实很多。我的结论是，有一种暴力我同意。虽然承认这样做内心悲伤，但仍然同意。那就是用以反对暴力的暴力。我无力成为革命者。我对你说过的这句话绝对不加更改……不过我已经在革命中占有一个位置。”

“作为一点佐料吗？”

“也许加上一滴血。”

现在，奥尔特加深感不安，头又开始痛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片阿斯匹林，放到嘴里嚼碎，咽了下去，随后喝干了小杯子里剩下的冰凉的咖啡。

“格里斯博士，我担心从今以后你的形象会和纳塔利西奥师傅一起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象征着我的负疚感。”

“请原谅，巴勃罗，请原谅！”格里斯站起身，把手搭在朋友肩头，“不希望你以为我在谴责你……我太不像话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我理解你的处境，知道你和我们一条心，但由于父亲的健康状况不佳，暂时不能有任何作为。”

“对此我倒不如此相信。也许我正在利用这一处境作为开脱的理由讹诈自己，以便不采取决定性行动，一脚踢开我的职务，毅然参加革命队伍，不论眼下他们在哪里……现在的生活倒是舒适、惬意：住在华盛顿，每月收入一千美元，

有一辆巨鸟牌汽车，偶尔参观国家艺术宫，到纽约度周末，看有名的话剧……”

格里斯站起来，转身到屋子一角，从匣子里拿出大提琴，重新坐下，把琴放在两腿间，调准琴弦，然后低声说：

“现在，为了驱走你心中的乌云，我只能奉献给你这个了……”

说罢，他轻轻拉了几个乐句。巴勃罗听得出来，是巴赫的作品。

“听过吧？”流亡者问，“是《逾越节的布道坛》第二乐章。本来是为巴松管和管弦乐队写的，我改编成了大提琴曲。尽管演奏得不好，但这个曲子毕竟比阿斯匹林镇静效果更佳……或许稍许悲凉了一些……不要再想刚才那件事了……也不要怪罪我……”

现在，巴勃罗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博士演奏。如泣如诉的琴声飘进他的脑海，力图用乐曲的节奏减轻他的头痛。

“看到了吧？”格里斯拉完曲子，问道，“谁能相信像我这样的人是革命家呢？”

他一面把大提琴放进匣子，一面问：

“喜欢吃中国菜吗？我们一起到‘东方’餐馆吃晚饭怎么样？很近……步行就能到……”

罗勃罗拒绝了邀请，说和奥尔兰多·贡萨加有个约会，只能握手告别。

他钻进汽车，却没有立刻发动，而是瞪大眼睛望着格伦达·多列玛斯的房间所在的大楼。大使馆招待会以后，他千

方百计想和她见面，始终没有如愿以偿。招待会的第二天，他打过一次电话，请求她原谅不雅的举止。她回答说，既然两个人今后不再交往，无需作什么解释或请求原谅。他说：“可是，我想成为你的朋友。”对方干巴巴地问了一声：“为什么？”他笑了：“这是什么话？因为我喜欢你。”接着，电话里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来，姑娘的声音又在听筒里响起来，这一次不像先前那样生硬：“最好永远不再见面。”说完，突然挂上了电话。

他又三番五次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一个带西班牙口音的女人回答说多列玛斯小姐不在。显然是她委托一个同事接电话撒谎……巴勃罗也曾想过在她下班的时候到泛美联盟门口等她，但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正是大使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商量什么事情、让他草拟一封函件或者随便谈谈的时间。

巴勃罗问自己，如果“现在”去敲格伦达房间的门，会受到怎样对待呢？想象到可能出现的不愉快场面，羞得耳根也发烫了。于是，他发动汽车，朝市中心开去。头痛得厉害，像是槌子有节奏地敲打着太阳穴。

21

那一年的四、五两个月份，没有任何驻华盛顿外交官比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的名字在社会专栏出现得更加频繁了。

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他在寓所举行的非正式晚宴，出席的有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国际货币基金会和泛美发展银行的董事以及其他头面人物。

一位在首都报界颇具名声的女专栏作家在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像个东方君主，差人从本国取来许多珍贵或半珍贵的宝石，作为礼品分送给社会专栏作家（波托马克小姐得到一块巨大的绿宝石）和曾回请他参加晚宴或招待会的华盛顿知名的贵妇们。他慷慨好客的名声大震，他的美酒佳肴及出色的俏皮话尽人皆知——“带有乡土气息的幽默”另一位专栏作家写道，“非常接近土地，接近生活。”

有一天，蒂蒂托·比拉巴蹑手蹑脚走进奥吉薇小姐的办公室，悄悄问她：“我们的巴格达富翁怎么样？”不过，不

难从二等秘书的讽喻的口吻里听出她对上司的钦佩和柔情。

确实，除了古里古怪的老学究豪尔赫·莫利纳博士以外，大使馆全体人员都被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迷住了。他待人亲切和善，爱说爱笑，慷慨大方，每天上午走进大使办公室前都露出两排牙齿，大声向下属们问好，声音响亮。有一次，他在梅塞迪塔的办公桌前停住脚步，抚摸着她的头发问：

“小崽子，过得怎么样？”可怜的姑娘受宠若惊，蜷缩成一团，泪如泉涌。

奥吉薇呢？她仿佛与主人有心电交流，接受了传感。至于乌加特，人们清楚地看到，这老匪徒对当年的战友诚心实意。

比万科该有一切理由仇视与其妻子睡觉的男人，但是连他也难以向自己和别人掩饰对大使的喜爱。

五月中旬，社交活动频繁的季节将过，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命令从萨克拉门托空运来两个民间艺术团：帕拉莫的印第安人舞蹈团和奥罗威德的农民歌唱团。

两个艺术团在华盛顿仅仅访问了一周。但是，按克莱尔·奥吉薇的话说，是“震撼世界的七天”。一共三十个人：十八个男人，十二个女子。遵照大使的指示，奥吉薇负责两个团的一切，集演出承办人、翻译、保姆和导游于一身。三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会讲英语。头一个问题是住处。两三个小型旅馆拒绝招留帕拉莫这伙披头散发、葫芦色皮肤的印第安人。奥吉薇万般无奈，只得吁请住在华盛顿的萨克拉门托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每家安置至少三个舞蹈演员——她的呼吁得到了响应。她本人把两个姑娘带回自己房间，梅塞迪塔

也收留了两个。蒂蒂托挑选了最英俊、最年轻的男舞蹈演员。巴勃罗负责两个歌手的食宿。一小群人留在使馆——为此米歇尔气急败坏。到达后几个小时，三十个人都安置停当，奥吉薇才松了口气。但是，麻烦事才刚刚开始。蒂蒂托爱上了男客，称呼他“我青铜色的阿波罗”，晚上又要跟他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气之下，小伙子照他脸上就是一拳，把他轰出房间，反锁了门。比拉巴被打得眼圈黑紫，只好到一家旅馆求宿。梅塞迪塔抱怨说，两个女客把她的房间糟踏成了猪圈。歌唱团和舞蹈团的姑娘们都闹着要去买东西，克莱尔·奥吉薇把她们领到一家正在拍卖的大商场底层。见到桌子上和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萨克拉门托姑娘们一个个都疯狂了，又是吼叫又是互相厮打着抢购裙子、项链、帽子、袜子、鞋、短裤和头巾（“我的！”，“我先看见的！”，“混帐！”，“母驴！”，“给我放下！”）……奥吉薇像个警察上士，威武地站在她们中间，大声喊着，叫着，试图恢复秩序：“姑娘们！姑娘们！”

两个弹吉他和竖琴的中年男子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惹事生常，被抓进警察所，巴勃罗·奥尔特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三四个歌唱团的小伙子头上抹着一层厚厚的发蜡，蓄着浓浓的唇髭，一天晚上跑出去找女人，说是非跟“美国金发女郎”睡上一觉不可。由于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容易找到，便破口大骂这座城市落后，连家妓院都没有。这难道称得上文明？称得上进步？

在声名狼藉的一周里，最糟糕的要数帕拉莫印第安人大部分舞蹈演员们的惆怅凄凉了。他们思乡心切，被说野蛮语言、习惯迥然不同的城市吓得战战兢兢，硬是关在屋子里不

敢出门，不吃饭，不说话，拒绝去排练，还有不少人大放悲声。

“这种情况要是再坚持一星期，”奥吉薇小姐大声感叹，“我非自杀不可！”大使在使馆花园里为两个艺术团举行了一次午宴。米歇尔鄙视地看着这群野人像动物似地狼吞虎咽，那玫瑰花蕾似的小嘴撇到一边，表示出一个文明人的厌恶。

最后，两个民间艺术团总算在泛美联盟的大厅里演出了。身穿花里胡哨民族服装的演员们受到很多观众的热烈欢迎。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感到像个当晚票价高昂、演出精彩的马戏团老板，恨不得跳上台去，在每个节目开始之前讲解一番。他为祖国的歌舞心花怒放。听到歌手们在低沉的竖琴和吉他伴奏下唱起当年母亲爱唱的一首小曲时，他这条彪形大汉眼睛模糊了，不停地抽咽，勉强忍住才没有放声大哭一场。

五月二十七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代表他的国家参加了在阿灵顿公墓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举行的葬礼。仪式简朴得让人寒心。为了他的人民与和平，这位不知疲倦的国务卿乘飞机旅行的距离相当于往返月球一趟。现在，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安详地躺在英雄墓地。

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独自一人坐在汽车里，垂头丧气。他想到自己的死，不仅预感到末日将至，而且几乎确信不会为他举行英雄式的葬礼。也许人们把他弹痕累累、鲜血淋漓的尸体扔进乱坟坑，要么陈尸旷野，任凭

空中飞来的黑鸟啄食……。

“往哪儿开，大使先生？”阿尔多·博雷里问。

“直接去大使馆。”

那天，他独自一人吃晚饭，只是把米歇尔叫来吩咐了几句话，因为只有桌子上长长的银制烛架顶着两支蜡烛，屋里太昏暗。

“熄灭蜡烛，把电灯都打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大声说，总管赶紧照办，“这里不是灵堂！”

吃过晚饭，他漫无目的地从这个大厅去到那个大厅，比较看他和阿丰索·布斯塔曼特之中谁更孤寂。接着，又怀念地看了看女儿们和外孙们的照片。后来又开始给弗朗西斯基塔写信，没有写完两行就停了笔。他打开电视机：一个西部片正演到半截。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等了一会儿，想看最后的决斗，不料一个牙齿整齐洁白的家伙出现在屏幕上，为一种名牌牙膏唱起赞歌来。只好关上电视机。

他坐到沙发椅上，随手翻翻杂志，等待罗萨莉娅到来。八点钟左右，那女人打来电话说，她心情非常不好，不能来了。大使差一点对着话筒大骂一通。

今天晚上干什么？可以叫乌加特和另外两个伙伴来打打扑克。但想到要在几个小时里看看武官那张脸，听着他时而哼哼唧唧、时而啧啧叫好，又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前警察首脑是个再糟糕不过的牌友，总是想赢，牌运不好时那副神气令人讨厌。

九点之前，蒂蒂托打来电话，说弗朗西丝·安德森已于当天下午返回华盛顿，刚一到就打听她“亲爱的大使”。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万分感激。

“真的？”他笑吟吟地大声叫喊，“你看我什么时候能见这位大自然奇观？”

“如果阁下愿意，今天晚上就行。也许弗朗西丝会接受你的邀请，到一个夜总会去。要是你允许，我建议去索列汉姆区的‘蓝厅’。手头有铅笔吗，大使？我把挪威海峡女神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什么女神？”

“斯堪的纳维亚海峡女神。”

“啊！好，说吧。”

1

22

巴勃罗·奥尔特加和广田喜美子不仅通过邮局互赠俳句，而且定期在F大街一家茶馆见面，每月至少一次。谈话时，两个人的声音都压得很低，男声像秋天的枯叶窸窸窣窣，女声则如小音箱里播放断奏小曲，只有三四个音符。一般说来，他们都回避谈论私人和政治问题，仿佛脱离了时间，进入了一个地图上不见、没有名字的国度的神奇空间。

有一天，奥尔兰多·贡萨加问巴勃罗·奥尔特加，与那个“素描的女人”一起喝茉莉花茶有什么乐趣。奥尔特加回答说，和喜美子小姐相见等于逃遁到某个四维空间，忘却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华盛顿的纷乱生活……还有自己。接着又补充说：“在她面前，我似乎变成了朦朦胧胧的日本画上一个形象——鱼、鸟、树木、昆虫。”朋友狡黠地嘲笑说：“依我看，你是在满足三十年前孩提时代压抑下去的欲望：摆弄布娃娃。”

星期六晚上，巴勃罗和广田到“成吉思汗”饭店，一面

吃日本“素烧”，喝日本白酒，一面谈论俳句艺术。

她穿一件非常素雅的海蓝连衣裙，与其麦黄色瓷器般的皮肤颜色很谐调。

“在俳句艺术中，”姑娘说，“有一系列细微的奥妙：比喻、引用、双关语、画龙点睛……”

看看她说话的样子，巴勃罗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姑娘是一只款款而飞的蝴蝶。

“比如，”喜美子小姐接着说，“诗人可以用简单的词汇让读者明白作品描写的季节和时间……”

“我知道，提到‘花’是指的樱花，所以相当于说‘春天’。”

“对。蟋蟀意味着夜间，杜鹃象征着傍晚。如果诗人说到钟声，那么他指的是晚霞满天，因为日本庙宇的钟声总是在这时候响起。依次类推……”

“对我来说，教堂的钟声使人联想起清晨、金色的阳光、荣耀、逾越节、喜庆……”

广田笑了，颧骨显得更高了。一时间，黑色的眼珠隐没在吊眼的两条斜线之中。

“日本的钟声极为文雅。”她侃侃而谈，“带有晚霞的音韵，声音不大……”停顿一下，又补充说：“我说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声音。”

侍者当着他们的面做成“素烧”，两个人不声不响地吃起来。

喜美子用纤细的小手端着酒碗，举到唇边，喝了一口，但眼睛一直盯着对方，随后又谈起禅宗来，把那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又讲了一遍。有一天，菩萨的一个弟子来到他身边，交

给他一朵金花，请他讲解真经。

“菩萨接过花儿，”广田接着说，“把它从眼前挪开，长时间地默默望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想告诉弟子，真谛不在于对事物的描绘，而在于静观之中。”

“也许有一天我要变成和尚”巴勃罗开句玩笑，“静观一朵花儿……比方说，花儿就是你，突然间电闪雷鸣，我能悟出真谛。”

“要想获得本能中的雷电，必须遵守佛规，还要耐心、虔诚。有些和尚静观了十年之后才悟出真谛。”

广田说，她要透露一件关于一个美国家庭的秘闻，请求朋友不要追问其姓名，问她也不肯说。巴勃罗以为她要讲一桩阴森可怕的秘密、一件凶杀案或者乱伦桃色新闻。

“你想想，”她小声说，“那家人院子里有个花园……每星期六家长都剪草坪。到了一定的季节，他修剪树枝，喷药杀虫……花园很漂亮。家庭成员们在花园里照彩色照片，在树荫下吃喝……然而，他们不和花园息息相通，不和花园亲密相待，不考虑它的花、草和土地……只知道购置更多的东西打扮它，使它更加舒适宜人：石凳、石桌、充气游泳池、石膏雕像……却始终不理解花园，把它视为陌路人……这不太可怕了吗？”

巴勃罗笑了，这笑声有点使日本姑娘伤心。然后，他像往常说话时一样压低声音说：

“我理解你的话。可是，亲爱的朋友，美国人常常以工程师的眼光看待世界。整个西方也大致如此。我们想征服自然，使之俯首贴耳，利用它。总之，让自然为我们服务。”

“纯物质意义上的服务。”她争辩说，“结果，西方人

脱离自然，也脱离自身。”

“说得对。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克服人与物之间的心理障碍。你以为东方哲学家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吗？”

“毫无疑问。”

“就算日本人大部份是善于静观的佛教徒吧，那么你们国家战后飞快地、几乎盲目地工业化又作何解释呢？”

“这种工业化思想正走向我们真正的本体，正如人造珍珠正在日益接近天然珍珠一样。我们还有时间和兴致静观大自然，接受它传出的寓意。”她又笑了：“是啊，所以才写诗、作画。你知道吗？几乎一百万日本人崇尚俳句艺术！”

巴勃罗又把两个碗斟满。

“他们美国人，”广田小心地环顾四周，低声说，“美国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真正享受他们所做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做’比‘本体’更重要，‘行动’好于‘静观’。”

她稍稍停了一下，巴勃罗接过话茬：

“有一天，我和比尔·戈德金谈过这个问题（还记得他吗？就是那个红头发、脸上有老人斑、抽烟斗的记者……），他像往常一样耐心听我讲完，然后说：‘要不是那些发明家、工程师、开拓者，尤其是科学家，我们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假若面对大自然的凶暴、肆虐和灾害西方人像佛教徒一样静观，遥望上苍或者看看自己的肚脐眼，那么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况呢？首先，人类必然年复一年地遭受瘟疫的蹂躏……你只要想想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发展过程就明白了……’接着，这位朋友历数了西方的种种发现和发明，说他们不仅改善了地球上人们的生活，而且延长了他们的生命。”巴勃罗微微

一笑，“这时候，我的另一位朋友贡萨加插嘴说：‘喂，比尔，你们美国人缺少的是魅力，这个民族是平庸的求实主义者。’戈德金抽一口烟，望了望巴西人回敬说：‘你们拉丁人靠说话产生魅力，而我们则靠行动和事物。还有比我们现在所做的把海水变成饮用水的努力更富于魅力的事情吗？’。”

广田又讲了几件她的朋友接受天意的例证。巴勃罗将信将疑，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请想想以下这个魔鬼般的矛盾吧。策计和执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参谋部成员都是禅宗派佛教徒……而发明、制造并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投掷原子弹的又是个直言不讳的基督教国家……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

奥尔特加马上又后悔说出了这最后几句话，因为心中巨大的悲伤使日本大使馆女秘书的脸阴沉下来。

两个人走出成吉思汗饭店，进了一家电影院。巴勃罗心神不安，不停地在椅子上挪动身体，说什么也引不起对影片的兴趣。电影院里半明不暗，喜美子散发热气和香味的肉体就在身边，他几次想抓住姑娘的手，但按捺住了心头的冲动。那样做无异于往这幅精美的日本画上撒块油渍。他又想起格伦达·多列玛斯，感到从肉体上想念那个美国女人。今天上午给她捎去了一个便条：“请不要固执下去了。按照你们国家法律的精神行事吧，即便给我这个‘被告’留点捉摸不定的余地也好。我一定要见你。请给我的住所或大使馆打电话。”

23

第二周的星期一上午九点左右，巴勃罗照常把汽车停放在大使住宅后面，步行穿过花园，朝使馆办公室走去。湛蓝的天空上金色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蜻蜓翅膀光彩斑斓，照得草坪喷灌器彩虹纷飞，预示着夏天正蹑手蹑脚来到人间。

一等秘书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一面走一面想着格伦达，指望能在办公桌上发现她的一封信。猛一抬头，看见潘乔·比万科办公室的窗户里飞出一个又轻又亮的物件——鸟儿？标枪？——慢慢悠悠地穿过空气钻进浓密的树冠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领事又在以放纸鸟开始新的一天！他走进大门，向沉默寡言的看门人道个早安，对梅塞迪塔说了几句亲切的话（这长得难看的姑娘有时能激起他的怜悯！）又对乌加特手下的一个中尉不冷不热地问候了一声——这军官总是向他要“姑娘们的电话号码”——朝从楼道那边走过来的奥吉薇点点头，然后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坐到办公桌前，拿出钢笔和一张白纸，给喜美子小姐写了个便条，感谢她星期六晚上陪着他度过的美好时光，接着又为她写了一

首俳句：

领事的工作

叠起自信笺，
领事先生撒手间，
纸鸽舞蹁跹。

潘乔·比万科还站在窗前，望着他的纸鸟钻进去的那棵白蜡树。不一会儿，妻子的形象占据了她的脑海。为什么近日来罗萨莉娅垂头丧气、郁郁不乐呢？她眼睛红肿，常常突然大哭一场，晚上辗转反侧，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她拒不张口说话，不听他的劝慰。现在，站在窗前，他思绪中怀疑的阴影越胀越大，驱不走，赶不开：“罗萨莉娅怀孕了！”多么可怖的事实！怎能不是呢？只会是这样——他打开随后又卷紧手指间一美元的纸币，恨不得把她也卷成个越来越细、越来越紧的圆筒形。“如果罗萨莉娅怀了孕，那么孩子不是我的。我有绝对把握。按她的要求，我每次都采取措施，小心行事。但是，那头自私自利的蠢猪对情妇怀不怀孩子不当回事，也不会考虑后果……”

微风吹动树梢，纸鸟落到地上。死死盯着草坪上白色的斑点（蜜月里的海鸥在他痛苦的记忆中飞翔），潘乔反复考虑这场大祸。怎么办？如果罗萨莉娅同意流产，找谁打胎呢？领事的嘴唇哆嗦起来，额上和双手泌出冷汗。蠢东西！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罗萨莉娅确实有孕在身，只是羞于披露实情。她原本是不想要孩子的呀！这个问题在蜜月里两个人就争论

过。“晚一点，潘乔，等好好享受了青春时光以后再说。五年或者六年以后，谁知道呢？……现在不行。在巴黎生活，却要照顾婴儿，我连想也不愿意想……不行。”

比万科抬起头，望着大使的住处。混帐东西！这印第安人让人恶心的精液玷污了罗萨莉娅的子宫，现在又如同毒瘤一样在她子宫里生长。上帝呀，怎么办？怎么办呢？可怜的女人在绝望之中可能求助于随便什么骗子。不要脸的拉皮条女人尼珐肯定知道不少打胎者的地址，把她的女友带到其中一个贼窝……那么罗萨莉娅就要有致命的危险。必须强迫她说出一切，以便于他——她的丈夫——根据情况采取必要措施。

他摘下眼镜，往镜片上哈哈气，用手绢擦起来，心里却在想象着一幕令人肝胆俱裂的场景：罗萨莉娅躺在一个简陋肮脏的诊所的手术台上，血流如注。“喂，谁在讲话？比万科先生吗？请马上来太平间。刚刚发现你的妻子死在一辆出租汽车上，大出血。”谁会打电话通知他呢？当然是警察了。一定会酿成丑闻，报纸会刊登消息。最糟糕的是罗萨莉娅死了。她躺在太平间的一个大抽屉里，苍白、僵硬、冰凉……

比万科看见一架飞机在天空飞过，飞得不高，正准备在机场降落。他看了看手表。好，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于是坐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几支彩色铅笔，在记事本上画起每天必画的图案来。几分钟以后恢复了平静，才像以往一样兴致勃勃地签发护照和其它文件。

这时候，豪尔赫·莫利纳博士也坐在办公桌前。他正在研究当天下午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的有

关文件。需要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尼加拉瓜，就地核实它提出的一伙叛乱分子从哥斯达黎加乘飞机入侵其领土的控告。

文件摆在眼前，他却看不下去：注意力飞向寓所的写字台，上面有他正在撰写的传记所需的笔记。对那些资料产生的疑问使他惴惴不安。对所写的人的生活和品格的某些方面如何下笔，他踌躇再三，举棋不定。

刚刚站起身，就感到颈椎一阵刺心的疼痛顺着胳膊向下放射，一直痛到左手手腕。只好在办公室来回走动。格里斯的幽灵——它每天这个时候必然出现——已经坐在屋子的一角那张软椅上，身上依然穿着灰色花呢运动式外衣、铅灰色裤子、皱巴巴的软领衬衫，打深色领带。虽然看上去不修边幅，但仍然不失其大学教授的高雅。幽灵要提什么问题，莫利纳已经猜到了。

“这么说，在了解了萨克拉门托大主教的一切之后，你仍然认为可以‘正直地’为他写一篇歌功颂德的传记啦？”

“为什么不能呢？他是个有趣的人物。”

“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依我之见，此人与其说是耶稣的信徒，倒不如说是马基斯弗利^①的门生。”

“这是个观点问题。”

“我还感到，另一个人物出现在你面前，让你惶惶不安，威胁着你的写作计划……”

“我知道你要说卡塔里诺神父。确实如此。我从来不曾想到那个默默无闻、土里土气的教区长会成什么气候，认为他

① 马基斯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只不过是其所写的故事的背景上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而已。然而……”

格里斯笑了。莫利纳仍然踱来踱去，两手叉在臀部，胸膛挺直，脑袋东摇西晃。

“莫利纳，这位乡村教区长的活动与潘菲洛并行，要评判你笔下的英雄的品德，他是个危险的参数。可巧，他们俩人都生在1890年出生。潘菲洛是门阀世家之子，似乎有贵族血统，生长在豪华的宅院，其家庭财富主要靠十八世纪末开采银矿聚敛而来……我说得对吧？好，卡塔里诺则是农民的后代，像耶稣一样出生在茅屋……”

“格里斯，你夸夸其谈的逻辑远离了上帝的教诲，你本人也就成了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不错，卡塔里诺出生在茅草顶、土墙壁的贫寒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是，我认为，以家庭出身论优劣是不公正的。依纳爵^①出身贵族，也很富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创始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也出生在茅屋（我用你的说法），你和我的心里都明白，这并没有使他成为圣徒。恰恰相反！”

格里斯的笑声在莫利纳头脑里响起来。

“当你要为其作传的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和他的朋友、独裁者同席共饮的时候，当他和政治家与百万富翁们称兄道弟的时候（他从来不考虑他们的道德和习惯），当他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时候，总之，当他过着王子般生活的时候，卡塔里诺·辛德尔神父却在一个贫困的教区默默无闻地传教，日复一日地以基督精神分担农民们的苦痛。为了农民，他

^① 伊纳爵（1491—1556），即罗耀拉，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经常与有权有势的地主们交涉。”

现在谁在说话？他——莫利纳，还是魔鬼般的流亡者呢？要么是二者合一的畸形共生物——第三者？因为公使衔参赞头脑里分明听见一种无特色、无语调又不属于任何人的声音，这声音时而以话语的形式出现，时而又变为思想或者综合成为幻象。

“胡安·巴尔萨发动农民揭杆而起，反抗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独裁政权，后来带领游击队逃往山区，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神父卡塔里诺多次离开索莱达德马尔的茅屋，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卡拉维拉山，听活着的人忏悔，替死去的人施涂油礼。这时候，潘菲洛却在塞罗埃莫索大教堂的布道坛上大肆攻击胡安·巴尔萨，把他描绘成‘血腥的无神论者、土匪’，说上帝必定把愤怒降到他的头上。潘菲洛不仅成为年老的大主教埃米尼奥·奥马萨瓦尔眼中的宝贝和私人秘书，而且是首都上流社会的宠儿。每到礼拜天，绅士贵妇们都挤满大教堂，倾听这位年轻神父富有文学韵味的布道。他像西赛罗一样口惹悬河，像古希腊的异教徒一样风度翩翩。潘菲洛知道（啊！他当然知道！）上流社会的信女们对他的炽热情感绝非出自对上帝的崇敬，于是他也成了她们宴席上（也可能是床上）的常客。那时节，礼拜天到塞罗埃莫索教堂望弥撒，听潘菲洛布道就如同去剧院看一场精彩演出一样欢快。莫利纳，这是因为你笔下的英雄首先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变换腔调、戏剧性地停顿、用事先排练过的手势适时地加强语气。你注意到了吗？他对自己、对自己的一切都欣赏备至：身材、长相、聪明、文化修养、风度、嗓音和那两只手。是的，还有那两只高贵的手。莫利纳，总而

言之，潘菲洛是个佼佼者！然而，请你想卡塔里诺神父吧。他身穿那件沾满索莱达德马尔尘土和泥巴的褪了色的教服，成年累月地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安慰病人和受苦受难的大众，当无法挽救一条生命或不能给饥肠辘辘的人一口吃的时又为他们痛哭，为他们祈祷……”

豪尔赫·莫利纳走到窗前，朝外边望望，但他的全部注意力仍留在内心世界，什么也没有看见。那声音仍然响着，冷酷无情。

“一天，政府军强迫卡塔里诺神父带他们去胡安·巴尔萨的藏身之地，因为在整个索莱达德马尔只有神父一个人知道。教区长拒绝了。士兵们威胁说要枪毙他，拷打他，但神父硬是不肯就范。于是查莫罗的国防部长让埃米尼奥把桀骜不驯的神父召到大主教的大厅狠狠训斥了一顿。大主教问教区长是否知道他的做法会连累教会……卡塔里诺神父摇摇头：不知道。埃米尼奥又问他从今以后是否要改变态度，卡塔里诺神父回答说，他将照旧履行神父的义务，即给有求于他的人以精神安慰，但也不会忘尽作为人的责任，即帮助渴望正义的人们……他又用惯常那种平静的口气补充说：‘帮助那些需要面包填饱肚子的人们。’年迈的大主教火冒三丈，把他发配到圣费尔南德省边界一带一个比索莱达德马尔更加贫困的教区。”

莫利纳用右手按摩着左臂，头不停地左右摇摆。昨夜睡在木头地板上，没有枕枕头，还是无济于事……

“说呀，公使，说呀！鼓起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吧。现在没有别人在场，谁也听不到我们的谈话。查莫罗的妻子拉斐拉太太临死前几年，谁是她的忏悔神父呢？尽人皆知，是当

时还是神父的潘菲洛。他了解老太婆的种种恶行，知道她像口技演员一样操纵她可怜的丈夫，知道她是个淫妇。是个残忍而又自私的女人。然而，潘菲洛仍然跟她交厚，是她家桌上的常客。后来，那水性扬花的女人突然皈依宗教（你自然会力图让读者相信，是潘菲洛促成了这一‘变化’），进入一所修道院隐居，不久带着神圣的光环离开了人间。她死后，棺木停在大教堂，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为她祈祷，那祈祷几乎成了为死者举行宣福礼的序曲。

莫利纳返回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不要忘记，1924年末，潘菲洛宽宏大量地请年迈的大主教允许卡塔里诺神父回到索莱达德马尔教区。大主教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公使衙参赞发现潘菲洛本人也来了，坐在屋子的一角，身穿漂亮的主教服，两只高贵的手搭在软椅扶手上，布满皱纹但依然英俊的脸上带着嘲讽同时又和善的笑容。

“1925年。胡韦蒂诺·卡雷拉发动驻索莱达德马尔的第五团一个营起事，带领反叛士兵前往山区。其它地区的军队也陆续叛乱。卡塔里诺神父遭到政府军逮捕，罪名是帮助叛军，为他们运送军火和食品，并在本教区教堂掩护反叛士兵。”

莫利纳又写起来：“至于卡塔里诺神父对卡雷拉的革命队伍所提供的帮助，没有任何人比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了解得更清楚、更详细了。他本人就曾在索莱达德马尔的圣母教堂隐藏了两三天，等待机会上卡拉维拉山参加造反者的队伍。有人说是卡塔里诺神父亲自送他去的，看来对此不应置疑。”

豪尔赫·莫利纳在两个幽灵之间来回走动。潘菲洛沉默

不语，格里斯说话了：

“你的朋友潘菲洛发现查莫罗的政府军日见削弱，联邦大学以及塞罗埃莫索和其它城镇开始骚乱，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找到埃米尼奥大主教，请求授权他秘密上山与胡韦蒂诺·卡雷拉面谈。年迈的大主教困惑不解。“你疯了？”大主教问。“不，阁下。”神父回答说，“我相信查莫罗的日子屈指可数，卡雷拉即将获胜，而教会必须站在胜利者一边。”埃米尼奥怎样回答的？莫利纳，你知道，说呀！你亲爱的朋友潘菲洛本人也在，他一直为自己这一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壮举而自豪……”

现在，潘菲洛本人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响彻莫利纳想象中的拱形大教堂。

“埃米尼奥对我说：‘去吧，但并非由我授权。你自作主张，甘冒风险。潘菲洛，如果胡韦蒂诺·卡雷拉战败——我估计如此，也希望这样——你的调解意图被察觉，我将公开宣布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把你的头交由政府论处。虽然心灵痛苦，但一定要这样做’。我笑着回答说：‘阁下，我同意这些条件。’当天傍晚，我穿一件普普通通的教服离开塞罗埃莫索，到了索莱达得马尔镇。卡塔里诺神父把我带到山上。叛军头目大吃一惊，满腹狐疑。他问道：‘神父先生阁下，几个月以前，不是你在塞罗埃莫索大教堂布道攻击我吗？’我笑着点了点头：‘我来这里既不是为了替自己辩白也不是为了请求原谅，而是为了达成一项我认为对革命队伍和我的教会同样有利的协议。’他决定听我讲下去。我提的建议非常简单。我答应立刻在帕拉莫和埃斯梅拉达港等地驻军中工作，使他们在几星期之内起义，以缩短战争期限，避免更多的人无谓丧

生；立刻通知各教堂停止一切反对革命队伍的布道。卡雷拉将信将疑地听完我的话，问我要求什么作为报答。于是我也提出条件。我要他当着他的参谋部全体成员的面答应以下几点：第一，尊重教会及其神父、财产和迄今获得的权利；第二，不允许在全国任何地方滥施暴力、报复和抢掠；第三，带领士兵列队进入塞罗埃莫索，从大主教手中接受象征首都的钥匙并当众吻大主教的戒指。听完，卡雷拉出去和亲信们商量了一阵，回来以后说同意我的建议，但是这只是个君子协定，他不签署任何书面文件。协议达成了，我下山回到索莱达德马尔镇，执进了诺言。两个星期之内，埃斯梅拉达港和帕拉莫的驻军相继起义（帕拉莫的副司令是我的表弟）。查莫罗倒台了。”

格里斯插嘴说：

“有一条协议卡雷拉没有遵守。至少在胜利后的头几天，他允许滥施暴力、报复和抢掠。当时建立的人民法庭臭名昭著，是一场闹剧。”

潘菲洛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完美无缺。事实上，口头协议的其他各个条款都严格地执行了。啊！我忘了说协议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卡雷拉还答应在巩固胜利的阶段过后召开制宪议会，通过宪法，举行选举。他没有食言。”

莫利纳死死盯着墙角，又开始思考头一天晚上所写的笔记。记得其中一段是这样的：“现在我发现，潘菲洛代表教会上层资产阶级，而卡塔里诺神父则代表无产阶级。”

格里斯又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啊！想不到我的朋友竟然用起马克思主义词汇来了！”

但我想更简单地说，卡塔里诺神父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代表撒玛利亚教派，代表教堂里的圣徒和殉教者们……”

“格里斯，请你三思。要是没有潘菲洛这样的人，教会就无法在历史上生存。它既需要心灵也需要头脑。正是由于潘菲洛和卡塔里诺神父分别代表的两股‘力量’协调行动，教会才得以在精神与世俗之间保持巧妙的平衡。”

一阵沉默。莫利纳又开始揉疼痛的胳膊，眼睛望着屋子的一角。他知道该回过头来研究那份关于尼加拉瓜的文件了，但无论如何集中不起精神。

“但是，请不要回避问题的其余部分。不要再谈1925年了。我知道，把历史提到今天考虑让你胆战心惊。卡雷拉当选为总统，后来又连选连任。他巧取豪夺，杀人不眨眼，滥施酷刑，大发横财，今天他仍然挂着民主的招牌实行独裁。议会俯首贴耳，没有骨气，没有主意，不讲原则，唯他的马首是瞻……这些年来，萨克拉门托教会和政权相安无事，潘菲洛仍然是政府大厦的座上客。也许他有意歪曲圣经上的一句话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属于卡雷拉的就归卡雷拉，属于上帝的就归上帝’。”

“你把问题简单化了，格里斯，因为你仇恨潘菲洛。人既非圆球体也非正方体，而是比所想象的复杂得多的多面体。我不想把传记写成漫画，而是要写成肖像。潘菲洛心灵上也有伟大的品格。”

“好。当卡雷拉的警察杜撰了一个共产党阴谋作为借口，发动一场称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政变的时候，你以为潘菲洛这样精明的人不知道那一切都是谎言吗？如果知道，为什么沉默不语呢？为什么在这反民主罪行中成了帮凶呢？为

什么从来不呼吁停止对塞罗埃莫索监狱里的政治犯滥施酷刑呢？”

“等一等！潘菲洛不止一次为此向卡雷拉呼吁。我有凭据说明这一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可以作证。”

“我了解。应大主教的请求，卡雷拉命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对他的警察头子的恶行和政治性逮捕的指控统统都是敌人的阴谋。……”

“潘菲洛与美国大使勾结，”流亡者接着说，“促成了莫雷诺的倒台和卡雷拉的重新当政！”

“你大概还没有忘记，大主教多次想同莫雷诺成为朋友，经常出入政府大厦，企图把他拉回温和的道路，但莫雷诺总是拒绝。上帝将审判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要由上帝而不是你我对这位教会王子作出结论。”

“莫利纳，可你并不相信上帝。”

“那么，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所说，既然不存在上帝，一切都是允许的了。”

“你不要忘记，那个悲剧式的夜晚过后不几天，潘菲洛在大教堂布道，把胡里奥·莫雷诺博士的灵魂不可挽回地打入地狱，理由是他自杀身亡。而我怀疑他真的相信莫雷诺确实是自杀的。”

“你不该当着我的面把潘菲洛大主教说成是个阴险的小人、道德败坏的东西！”

“但丁在他们‘神曲’中把几个主教打发到地狱是颇有些道理的……”

“在这篇传记中我可以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潘菲洛为了拯救教会曾甘冒失去灵魂永生的风险。在一定意义上

说，这也把他变成了一位殉教者。”

“太妙了！可是，你不要忘记把卡塔里诺神父说成是莫斯科间谍、魔鬼撒旦的使者。”

公使衔参赞坐到桌前，两手捂住脸。那个声音还在耳边响着……

“豪尔赫·莫利纳，我敢打赌，你不可能为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写出真实的传记。你所写的历史中真正的英雄是卡塔里诺·辛德尔神父！他的神学知识比大主教少，但一直遵照山上垂训^①的精神而生活。潘菲洛获得过多种勋章，经常当众展示。而索莱达德马尔教区长得到的唯一是胃溃疡。豪尔赫·莫利纳，他才象征着真正的基督教，仁爱和同情的宗教、永恒和不可战胜的宗教！”

前神学院学生拿起一支铅笔，开始轻轻敲打桌面。假若在传记中把通过分析、推断、文件或者直接了解的关于大主教的一切都披露出来，那么势必不仅失去被写者的友谊，而且有损于他非常热爱的教会。他渴望重新发现上帝，回到教堂之中。

现在，格里斯像个魔鬼似地在他耳边嘀咕说：

“鼓起勇气，挖一挖你内心深处的动机吧！你绝对不肯得罪你的朋友大主教，因为还指望有一天他在卡雷拉耳边吹吹风，建议委任你为萨克拉门托驻梵蒂冈大使……这是你一生的梦想！”

豪尔赫·莫利纳两手攥住铅笔，折为两截。

^① 山上垂训：又译为“登山训众”，指耶稣在山上向门徒传道的内容。

24

克莱尔·奥吉薇看了看手表，心里想：“大使今天迟到了。出了什么事？”她又看了看记事本。上午十一点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办公室会见尼加拉瓜大使；十二点半，在“西方饭店”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董事长共进午餐；六点，参加秘鲁大使馆招待会。

晚上呢？奥吉薇心里狡黠地笑了。晚上，她的上司当然要把弗朗西丝·安德森小姐带到一家夜总会，以后的事情就只有天知道了。可怜的罗萨莉娅！现在，女秘书修改了一会儿巴勃罗·奥尔特加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写的英文讲话稿——下星期四大使以贵宾身份出席全国新闻俱乐部的午宴。她的任务不轻：用西班牙文字母标出英文发音，以便大使使用英语朗读讲话稿。我的天呐！

她又看了看手表。

离大使馆几英里远的弗吉尼亚区，高速公路边有一家汽车旅馆。阿尔多·博雷里看了看门厅墙上的大钟：十点二十

分。中午必须返回大使馆，把大使先生送往“西方饭店”。

尼珐·乌加特要了一个房间，对侍者说要休息一会儿。在登记卡片上填写的是“贡萨雷斯夫妇”，付了十二个美元。这是她第三次或第四次在这家旅馆要房间了。阿尔多·博雷里非常尴尬，不知道该看着哪里，不知道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侍者正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他。当然小伙子心里明白，他们并非一对夫妇。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司机涨红了脸。这种处境确实让人心烦意乱。更糟的是，越是想它心里越焦躁不安。要是被妻子发现了可怎么办呢？妻子已经开始怀疑他为带回家的额外收入编造的来历了。“没什么，亲爱的，新任大使非常大方，总是给我许多小费。这些领带？也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给的。你没有看出来吗？是用过的。皮鞋也一样，恰巧我们俩穿同一号鞋。汗衫稍微肥了点，不过也不可能再瘦了，他的脖子有公牛一样粗。”啊！要是被乌加特将军发现呢？——我的妈呀——说不定他会朝我开枪。

好歹大使站在他一边，知道一切而又不指责他。恰恰相反，还庇护他，允许他每周不穿制服离开大使馆两次，每次都都在同一个时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用这种方法报答拉皮条的女人。

“二十五号房间，夫人。”侍者满脸堆笑，把钥匙交给女客，“在楼道尽头，右边。请。”

她接过钥匙，朝房间走去，阿尔多跟在后边。吃女人倒贴的家伙，不折不扣的吃女人倒贴……跟这个老太婆睡觉，从她手里接受礼品和现金。他身上穿的衣服（“男子用品商店”，六十美元）就是这个情妇送的。现在，他正跟在“情妇”后面穿过这条清爽、干净得像医院一样的长长的楼道。阿尔多

看着她左摇右摆的屁股，油乎乎的脖颈，闪闪发光的头发……那肥胖的肉体发出阵阵刺鼻子的香水草气味……还是长寿花味？不论是哪种香水，都让人恶心。是他羞耻的气息，是他干这种没滋没味的勾当的气息。不过，两三个月之内攒下的钱足够把弟弟接来。他知道，听他说如何这样快就挣得大笔美元时，弟弟一定很开心。“吉诺，把这些钱拿去吧。我出卖了肉体，当了男娼。”两个人哈哈大笑。

两个人走进房间，关上门。尼珐使劲把小伙子搂在胸前，不停地抚摸他，同时发出阵阵呻吟，随后又闭着眼睛把嘴伸过去。阿尔多厌恶地吻了吻那涂满红唇膏、散发着烟草味的湿漉漉的嘴唇。老太婆的乳房像是泡沫橡胶填成的。尼珐几乎失去了人形，成了个漫画上的胖老太婆。每次和她睡觉，阿尔多都恐怕被她吞下去。交欢的时候（“交欢”一词用得不准确，绝对不准确！），他总是闭上眼睛，心里想着妻子，想着妻子那干净、漂亮而又富有弹性的身体。

尼珐开始脱衣服。阿尔多脱下外衣。他没有一句话可说。胖女人哼着一首西班牙摇篮曲。

阿尔多·博雷里慢腾腾地解着领带，突然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他没有勇气正视自己。

大使离开寓所，到办公室去了。米歇尔·米歇尔到各房间巡视一遍，看清洁女工和收拾房间的女佣人活儿干得怎么样，接着到厨房转转，吩咐厨师晚餐菜单应当如何安排，最后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心里觉得是拍了拍自己的肩膀，祝贺任务完成。现在，他回到自己房间，锁上门，拿出日记本，用他那规规矩矩的小字在上面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我一直在以近乎科学家的兴趣观察新任大使。毫无疑问，他学识浅薄，但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大使馆的人员都钦佩他）。他没有文化，对文学、绘画和音乐一窍不通。但是，不可否认，他具有天生的聪明。总之，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一样。大使馆的各个大厅经常回荡着他响亮的笑声（顺便说一句，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幽默和幸福的事情值得那样纵声大笑）。奇怪，有时候他又垂头丧气，像个呆头呆脑的印第安人似地蜷缩在房间一角的椅子上，一声不响，死死盯着空中的某一点。一天夜里，我被楼上的脚步声惊醒，穿上长睡衣上了楼，发现大使穿着那件难看的睡裤，正在各个房间闲逛，一面挠头一面打哈欠。他对我说，被恶梦惊醒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让我煮点咖啡：他准备彻夜不眠。‘米歇尔，做梦是从生命中偷来的时光。’我端去咖啡，他客气地请我坐下。我接受了邀请。他递过一杯咖啡，我拒绝了。他对我讲了一生的经历，简直是大仲马和基度山伯爵的混合体……多么浪漫的小说（或者是满口胡言）！我的眼睛睏得疼痛难忍。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夜里，也是凌晨时分，我发现阿丰索·布斯塔曼特像个幽灵似地在各个房间踱来踱去。两者何其不同！阿丰索身穿考究的绸子长睡衣，脚蹬他常说的‘法国阿纳托尔式’拖鞋。我们俩人讨论哲学问题，一直谈到东方发亮。阿丰索说，他常常半夜里醒来，心惊胆战，惟恐死去，惟恐‘化为乌有’。在我们的彻夜长谈中，他说到‘虚无’。‘米歇尔，你认为什么是虚无呢？’我能怎样回答呢？‘大使先生，虚无就是虚无’。他悲伤地点了点头。可怜阿丰索！你一生只怕死去，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只想活着。”

奥尔兰多·贡萨加坐在巴西大使馆的办公桌前，正在翻阅秘密文件。

他把女秘书叫来，吩咐道：

“替我往巴西接加急电话，找国务秘书。”

他又把文件看了一遍，大惊失色。巴西要从美国进口大豆！简直是世界末日到了！交易将通过一家美国公司进行，而他——贡萨加——已经从纽约各银行了解到，这家公司情况不妙，并且已经告知了使馆。必须尽快把情报转告国务秘书办公室，避免这笔买卖成交。

奥尔兰多·贡萨加点燃上一支烟，若有所思地吸起来。他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西——它经济上没有受战斗之害，而且战后在美国有几百万金美元的存款——不得不从荷兰进口土豆！战争期间，为了阻止纳粹军队入侵，荷兰那个区区小国被迫打开堤坝，让海水淹没土地，并且有几座城市被德国空军炸成了一片废墟。

贡萨加要把这条情报发回国内，无非是为了推卸责任，免得将来人们指责大使馆失职或者同谋。但能否引起应有的重视，他并不抱太多希望，因为已经从这宗大豆交易中间闻出了作弊的气味。有时候，他觉得巴西政府所有负责人物都无尊严可言。那些所谓社会中坚要么玩忽职守，要么贪图佣金。例外者如凤毛麟角。崩溃的边缘……

他走到窗前，望望大使馆的花园，坐在软椅上，从桌子那边扯过一张信使从纽约带来的小报，随便翻一翻，偶然发现一条有趣的消息，作者是一位颇有名声的专门写社会传闻的专栏作家：谁和谁在一起啦，在什么地方啦，两个人怎样啦……

“加勒比某共和国‘明星’大使是位尽人皆知的人物。虽

然在华盛顿外交和社交界初露头角，人们却经常看到他在本首都出入于不同地点——‘埃斯皮奥纳吉’、‘皮尔’和索列汉姆区的‘蓝厅’——由一位刚刚离婚、光彩照人的金发女郎陪伴。此拉美外交官不仅已经结婚，而且当了外祖父，虽然显得还年轻。”

奥兰多·贡萨加笑了。他站起身，拨通了巴勃罗·奥尔特加的电话。

“巴勃罗，怎么样？”

对方的声音似乎高兴。

“喂，贡萨加，今天早晨起来头一点也不痛了。这对我来说简直算得上佛教徒涅槃了。”

“巴勃罗，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我刚刚从一份纽约报纸上看到一则‘谎言’，说的是你们大使。你听着。”他把那一段念了一遍，“你意下如何？就差一笔一画地写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大名了……”

“你让我怎么办呢，伙计？看来我们这位英雄非活生生地显示显示拉美人蜂恋蝶迷的男性气概……”

“是啊，他没有为修筑横贯萨克拉门托的大公路搞到贷款，但似乎搞到了安德森小姐，爬上了她的乳房，把旗帜插上了妙不可言的雪山山峰……对，还打通了隧道……巴勃罗，这是你的祖国莫大的光荣！”

“贡萨加，你太刻薄了。”

“不，伙计，不是刻薄，是羡慕！”

比尔·戈德金身穿长袖汗衫，嘴叼点燃的烟斗，手拿一支蓝铅笔，正在仔细审阅当天上午联合通讯社记者从塞罗埃

莫索发回的两则通报。“本首都盛传卡雷拉总统将改组内阁，罢免所有文职部长，用亲信军职人员填补空缺。危机已现端倪，起因是现内阁除国防部长之外的所有成员都表示反对通过允许大元帅再次连选连任的宪法修正案。另外，众议院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一再推迟讨论此项修正案。据信，大部分众议员和参议员想以此阻止修正案在七月份两院休会之前付诸表决。”

戈德金两只手抱着后脑勺，一边抽烟斗一边思索。另一则通报说：“本首都上层人士非常重视昨天晚上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大主教先生在主教议事厅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有内政部长伊纳西奥·阿连德博士和内阁其它文职成员。大主教的挚友胡韦蒂诺·卡雷拉大元帅没有受到邀请一事在此间引起了极大的惊讶。”

比尔·戈德金笑了。卡雷拉在总统宝座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除非……嗯，最近几个月，萨克拉门托的情况难以预料。议会拒绝通过大元帅提出的修正案，局势维持现状……但国内动荡将持续到大选……也许大选不能举行。如果举行的话，卡雷拉会提出个傀儡候选人，此人能否当选，亦难料定。如果当选，“解放者”将在幕后操纵，继续执政。如果不能当选，大元帅只得发动政变，以免把政府交给合法继承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萨克拉门托将再次处于赤裸裸的独裁制度之下。

比尔站起身，走到窗前，漫不经心地看看K街川流不息的车辆和马路对面人行道上顶着初夏明亮的阳光来来往往的人群。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卡雷拉现在发动政变，今天，明天……两三个星期之内。不过，为此他必须寻找一个

名正言顺的借口，因为近五年来拉美局势已不比从前。罗哈斯·比尼利亚、佩雷斯·西门尼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都已被人民运动推翻，罪名是贪污腐化。美洲大陆的公众舆论绝对对独裁制度不利，不论是军人独裁还是文官独裁。

比尔在高脚金属烟灰缸边上磕磕烟斗，又装上烟丝，点着。所以，卡雷拉目前所需要的是发动政变的“正当理由”。还有另一种可能。在政变之前，在十一月大选之前，革命者在萨克拉门托沿海登陆。据可靠消息，比尔知道萨克拉门托流亡者在古巴组成了队伍，武器弹药充足，时刻准备入侵。他甚至知道他们首领的名字：米格尔·巴里奥斯。

入侵一旦发生，胡韦蒂诺·卡雷拉必将立即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进行拼死抵抗。那么，革命者们的机遇如何呢？

比尔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他的结论是：大有希望。萨克拉门托人民已经厌倦了卡雷拉。首都墙壁上已经出现了鼓动人们起来进行武装革命的标语，反政府的秘密小册子到处流传……像以往一样，大学成了“革命传染病中心”，卡雷拉控制的一家报纸就是这样说的。国民军呢？没有贪污行为的军官和军曹们可能带领士兵加入革命部队……

戈德金深深叹了口气，喷出一口青烟。露丝，亲爱的露丝！三十五年前，要是和我一样在卡拉维拉山上看到胡韦蒂诺·卡雷拉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那饱经风吹日晒的年轻脸庞，你该作何感想呢？他们胸膛中的热情与勇气多么灼人！他们头脑中的为解放而斗争的思想多么强烈！那两双眼睛里充满着希望、渴求、好奇和信心的光彩！他们要把人民从专制枷锁下解救出来，建立社会公正……然而，看到了吧，亲爱的？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露丝？莫非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蜕化吗？一切都如此吗？

他浏览了一下国际政治版上的新闻。统统糟糕透顶。上帝要用这一切告诉人们什么呢？这一团混乱的意义何在？至少应当在万能的上帝和联合通讯社之间建立直通电传……

“即使如此，”戈德金笑着穿上外衣，打算到一楼杂货店买块三明治，独自一个人凑合吃顿饭，“即使如此，通讯社社长发现上帝的意旨有损于美国大公司的利益，也要毫不留情地删改。必然这样，因为根据联合通讯社的方针，任何对美国钢铁公司、杜邦财团、埃克森石油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有利的，一无例外地对上帝和世界有利。这至少是宣传界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们向普天之下灌输的精神。

“不过，我无须悲观。”他离开办公室时得出了结论，“我还活着，并且饿了。太阳还普照四方。”

这时候，一辆伊巴拉牌轿车停在人行道上。里边，乌戈·乌加特将军正等待着阿灵顿一所中学的学生们走出校门。他怀着孩子逃学的激动心情，每星期至少两次在这里“等待”。

这种消遣极为便宜，只需花从大使馆到这里的汽油钱和十美分的定时停车费。

他饿得胃里辘辘作响，但仍然在抽着烟等待，眼睛盯着草坪上的长长一排平房。

突然，校门里拥出一群群十二至十五岁的男女学生。他们有的走有的跑，吵吵嚷嚷地穿过草坪朝街上走来。

多么壮观的场面！“塞罗埃莫索的女学生们穿白汗衫、

海蓝色裙子。”乌加特顿发思乡之情，“而美国女孩子们的裙子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羊毛衫使她们胸脯的线条更加清晰。有些女孩的胸脯已经发育得像个女人，另一些的乳房则刚刚开始隆起——乌加特最欣赏、最眼馋这些十一岁至十三岁的女孩子。有一伙穿过马路，朝伊巴拉汽车走来。将军望着她们红喷喷的脸蛋笑了：有的长得难看，有的不丑不俊，大部分非常漂亮。是啊，美妞儿太多了！她们越走越近，人也越来越多，武官的眼睛不够用了，不知道该看她们的脸还是看她们的腿或者胸脯……一些小姑娘蹦蹦跳跳，一些哼着歌儿，还有的佯装争吵，仿佛舞台上的演员，意识到行人或者在公共汽车站排队等车的长者们正注视着她们。“噢！膝盖！”将军呼吸也急促了，“世界上没有比十三岁的妞儿的膝盖更香甜的了，仿佛它们之间轻轻摩擦能使两条细细的腿产生调人胃口的滋味！”

乌加特叼着香烟，眼睛里发出饥饿的老狗的目光。

就在同一个时刻，在离这里几公里远的地方，泛美联盟办公大楼里，格伦达·多玛列斯正坐在办公桌前往嘴里强塞三明治。刚才，拒绝了两位女友到泛亚杰尼餐厅一起吃午饭的邀请。如果接受的话，又要和她们谈话，而她不愿意交谈。要来了一块三明治，一杯纯咖啡。为什么要咖啡呢？她喝得全无兴趣，简直是在服一剂苦药。这是每天必受的惩罚。下午，每当一位女同事问她：“要我给你带杯咖啡来吗？”她总是机械地回答一句：“好。不加牛奶，也不加糖。”说完，递给对方一枚镍币。接过咖啡以后，她看着纸杯里的液体，象个要自杀的人站在高高的桥上望着即将吞噬她的湖

水。她知道，咖啡对她身体有害，喝了之后胃气痛，但还是硬喝下去，并且喝得干干净净。

现在，她正无精打采地嚼着三明治，端着烫手的纸杯。一滴咖啡掉在桌面上巴勃罗的便条上。这张便条她已经看过十遍了。该不该见这小子呢？可是，见的话……为的什么？只因为他要求见吗？继续拒绝不更明智吗？否则就耽误了。耽误了什么？……为什么？啊，否则，互相产生激情之后，一切都会急转之下，她的肉体和精神会再次受到创伤，再次被强奸！

她又喝了一口咖啡。最近几个星期，她多次想起巴勃罗，愿意再见他一面。脑海里出现的巴勃罗不是把她锁在大使馆一间屋子里给她讲独裁者、通奸、匪徒和窃贼的那个居心叵测、玩世不恭的家伙，而是她在办公室头一次见到的那个言谈举止严肃稳重、稍带父辈风度的男人。这两个之中，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巴勃罗呢？明果接受邀请，再次见面，她遇到的会是哪一个呢？

一生的大事，应如彻底解决，无论以哪种方式解决。应不应当和巴勃罗·奥尔特加再次见面呢？

25

一天晚上，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在阿美利加大学举行公开报告会，报告的题目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残酷现实》。奥尔特加、贡萨加和戈德金一起坐在第一排，仿佛是报告人的帝王卫队。

八点整，报告人由社会科学系一位教授领上讲台。此教授细高个子，戴一副金属边眼镜，表情和声音同样空漠。他介绍了演讲人，并特意提醒听众，格里斯博士即将发表的看法不一定是本系和本大学的意见。“当然”，他补充说，“报告人可以畅所欲言，但言责自负。”

介绍完毕，莱昂纳多·格里斯走到讲桌前面。桌子上放着麦克风和一杯水。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但不打算逐字逐句地念诵讲稿：纸上是个简单的提纲。

巴勃罗在贡萨加耳边悄声说：“我很紧张，就像个胖太太看儿子当众朗诵一样。”贡萨加笑了：“为什么说是个‘胖’太太？为什么要紧张呢？”奥尔特加耸了耸肩膀。其实，没有任何慌张的理由。他不止一次听当年的老师讲演了，知

道博士沉着冷静。他的英语在牛津大学进修期间更臻完美。虽然带些西班牙口音，但说得清楚、流利，遣词造句无可挑剔。

莱昂纳多·格里斯扫视了一下听众。大厅里有四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大学学生，对拉美问题感兴趣的华盛顿居民，三四个神父，几位外国报纸记者，还有十来个萨克拉门托流亡者。

“女士们，先生们，”格里斯博士开始讲演，“在美国介绍某个拉丁美洲国家情况的演说家们容易犯一个通病，即迎合一般听众的愿望，讲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描绘当地习俗和异国风光。比如集市上摆满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和花卉、印第安人制作的陶器、地毯和篮子……还夹杂上一些笑话、民间故事和传说……总之，一些招徕游客的彩色画片和招贴画上的东西，只能满足你们的猎奇心理……”

他稍微停顿一下，接着说：

“但是，我决心不迎合这种愿望，作一个现实主义的、所以也是不讨人喜欢的报告。在我分析美国对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所负责任的时候，你们或许觉得我咄咄逼人。正因为如此，请诸位忍住烦躁和恼恨，听我讲五十分钟。”

贡萨加用胳膊肘碰了碰巴勃罗，巴勃罗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体。戈德金叼着熄灭了的烟斗，朝钉在对面墙壁上的牌子狠狠瞪了一眼：“请勿吸烟”。

格里斯脸上闪过的奇特表情没有逃过巴勃罗的眼睛：突然眉头一蹙，眼睛一眯，像是在调整焦距寻找什么东西，最后嘴角又狡黠地用力一闭。似乎他突然从听众里发现了一个

不曾料到（或者早已料到）的人。巴勃罗顿起疑心，回过头去，但一无所获，只见坐在他后边的一位和蔼的太太那肥胖的脸朝他露出客气的笑容。

“正如诸位当中有人知道的那样，”格里斯接着说，“萨克拉门托共和国仅仅挂着民主的招牌，这种情况与我们大陆其他一些国家相同。它的政府所宣扬的和言论自由与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参众两院尊严一样，纯属子虚乌有。拥有土地、庄园、牧业和农业加工工厂的三十几个家族组成的寡头阶层与两家实力雄厚的美国公司——联合种植公司和加勒比糖业中心——相勾结，统治着萨克拉门托。当然诸位要问：那么，共和国总统的作用何在？……答案很简单，但并不因为简单而不那么可耻。实际上，胡韦蒂诺·卡雷拉这个独裁者倚仗着这个寡头集团和两家外国公司的支持。只要大元帅维持经济和社会现状，用警察和军队镇压一切反对派的活动，这些强大的经济集团就对他的独断专横和腐化堕落视而不见。

“萨克拉门托的参众两院由自由党和保守党选出，这两个古老的全国性政党直接或间接地代表着各大家族和它们的同伙以及两个实力强大的美国公司的利益。这样，主子们要做的一切，议会都照办不误。那么，反对派呢？它的领袖们不是被迫流亡国外就是在监狱中腐烂，从来无人起诉，也不经任何审判。莫须有！那么，报刊呢？原有的几家反政府报纸相继消失了。这倒不是因为政府强行封闭或者对它们进行无法忍受的新闻检查（不会的，我国不是处于民主制度之下吗？）。摧毁新闻自由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完全控制进口的政府不按时配给纸张，把反对派的日报逐个扼杀了。控制报

刊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分配广告——诸位知道，广告是这些报纸的最大收入来源。今天，如果哪家报纸敢于刊登有损那些经济集团利益的消息或者社论，它就要冒因为缺少广告而窒息的危险。

“那么，人民呢？大部分识字而又能思考的萨克拉门托人对可耻而又压抑的形势不满，但他们没有用言论或者武器进行反抗的物质手段。劳苦大众遭到恐吓，被贫穷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只能浑浑噩噩地在难以想象的精神错乱中生活。”

在以后的二十分钟里，格里斯博士详细介绍了萨克拉门托政府主要成员的人品和经济状况。

“大元帅是整个美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说，“拥有土地、庄园、不动产、工厂、各公司的股票——这些都是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给予国内外经济集团各种好处所获得的礼物。他对利润的贪求永无止境。据估算，他在瑞士一家银行开有帐号，存款达几百万美元之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现在他出任驻白宫和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大使，‘代表’我灾难深重的祖国。

“胡韦蒂诺·卡雷拉其人毫无伟大可言。不错，他胜利地领导了反对查莫罗独裁政权的革命运动，表现出了勇敢无畏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自私、虚荣和为报复不惜犯下任何残忍罪行的本质。在1951年底那个著名的‘悲剧之夜’，他率领反叛部队卷土重来，开进塞罗埃莫索，再次掌握政权。随后，他本人一定要指挥队伍袭击《秩序报》，并亲手开枪打死了主编，借口是他流亡多米尼加、在他的朋友和干亲家特鲁希略卵翼下生活期间，该主编曾多次撰写社论

对他进行污蔑。”

谈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格里斯博士说此人是他见到的最可爱的无赖之一。

“他同样勇气过人。”格里斯说，“据说，甚至还有些慷慨大方的举动。但是，他是个伪君子、以权谋利的贩子、投机商。通过有利可图的婚姻当上了当年颇有影响的安提里亚斯银行董事长之后，把这家银行变成了高利贷中心。”

格里斯突然停住口，环视了一下听众，然后以插话的口气说：

“诸位完全有权利问，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在外国听众面前肆无忌惮地说本国政府的坏话呢？”

格里斯张开双臂。这个戏剧性动作大出巴勃罗所料，他吃了一惊。

“可是，女士们，先生们，请诸位按逻辑思考。这与其说属于伦理学，倒不如说是个语义学问题。可耻的不是我在这里用语言向诸位描写萨克拉门托共和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真正可耻的是这种形势确实存在！”

“妙极了！”贡萨加转过脸对巴勃罗低声说。巴勃罗用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如同在望见大路尽头出现了一个可憎的人影一样，他看见每日必到的头痛又迈着沉重的步子朝他走来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一摸是否带来了阿斯匹林。戈德金于咳了一声，神态凄凉地嘬起冰凉的空烟斗来。格里斯接着说：

“大概诸位多次听说过埃斯梅拉达港那座奇异非凡的城市，加勒比海的宝石。那里海湾清澈，绿色椰子树环绕着白色的沙滩，旅馆豪华舒适，赌场里可以自由赌博，夜总会丰

富多采的节目使人流连忘返，不亚于纽约和巴黎……好吧，现在我飞快地、惴惴不安地，毫无疑问怀着愤怒和耻辱的心情带着诸位去看看加勒比海宝石的夜生活吧。让我们在它的主要街道走一走。五颜六色、图案怪诞的霓虹灯使我们想到拉斯韦加斯^①。看到那些来来往往的妓女了吗？她们甚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女人：是些十二到十四岁的小姑娘在人行道上游来荡去地拉嫖客。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从哪里来的？大都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村镇。她们不识字。没有任何生活经验，被老鸨们选到此地在埃斯梅拉达港这个人肉市场出卖色相。持有卢纳或美元的本国和外国旅游者们为了发泄性欲，定期来这里度过淫荡的假期。

“在萨克拉门托的贫穷阶层，生个漂亮的女儿意味着有了再好不过的生计。孩子刚到青春期，父母就把她交给妓院的经纪人，一位‘太太’给她买衣服，让她穿上高跟鞋，涂脂抹粉，教给她取悦男人的技术，从此姑娘便有了‘职业’。诸位知道为什么父母不大犹豫地做这类交易吗？因为可怜的姑娘用娇小的肉体一夜之中挣的钱比一家人在庄园辛辛苦苦干一个月还多得多。这些妓女性病或肺结核缠身，有的还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所以未老先衰，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像六十岁的老太婆了。”

巴勃罗听见身后的胖太太叹息了一声：“啊！太不像话！”，觉得自己的脸大概羞得红到了耳根，仿佛他本人就是埃斯梅拉达港的妓院老板或股东。贡萨加着了迷似地望着格里斯。他一向钦佩博士的文雅和沉静。一天晚上，他在半

^① 拉斯韦加斯：美国内华达州最南端城市，以赌城著称。

明不暗的客厅看见博士就是那样怀抱大提琴，拉了一首巴罗克乐曲。现在，此人却站在讲坛上，两眼炯炯发光，像古代预言家似地慷慨陈词。

“因为贩卖可卡因、海洛因和美洲大麻是这座美丽加勒比海城市一本万利的买卖。”报告人接着说，“当地有二百多所妓院，条件和价格各不相同，从中等到豪华一应俱全。而我们的政府要员们——从‘解放者’到他的伙计们——不仅从数以千计的赚钱机器中，而且从妓院和买卖毒品中收取一定份额的利润。

“在萨克拉门托，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新动词，叫‘逛埃斯梅拉达’。这个新词语含意广泛，比如说度发泄性欲的假期，逃避正人君子的生活，变变口味，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兽性解放一下——几天或者几星期，等等。来此地游玩的人似乎能感到消除记忆的功效。那些被认为是我们社会秩序中坚的绅士们每礼拜日必到塞罗埃莫索大教堂做弥撒，跪在地上，双手捂在胸前默默祷告。但他们也偶尔逃到加勒比海宝石城市进行‘纵欲疗养’。这些社会栋梁当中不少人是赌场甚至妓院的秘密股东。他们知道，按时得到忏悔神父的宽恕并不难，因为——真是活见鬼！——他们定期捐赠数目可观的现金用于慈善事业，以为这足以让上帝眉开眼笑。”

格里斯稍稍停顿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微微一笑，继续说：

“萨克拉门托大主教与大元帅之间保持着默契。政府在全国各地明令禁止赌博和开设妓院，大主教阁下则对埃斯梅拉达港的事情视而不见。于是，在共和国世俗政权和教会当局纵容之下，迷人的海滨城市沦为全国正式妓院，沦为整个

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卖淫和赌博中心。外国旅游者们花在女人身上和赌桌上的美元要么通过最奇怪最复杂的渠道流回本国，要么到了从这些恶习中捞取好处的人在美国或瑞士银行开户的私人帐号上。总之，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

现在，格里斯开始描述贫民区。他说，在萨克拉门托几座人口聚集的城市的郊区甚至市中心，一堆堆破烂不堪的小屋象癌细胞一样繁衍滋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触目惊心的脓疮不断扩展。在那些恶梦般的街区，麇集着蓬头垢面、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人群。他们用泥土、土坯、木棍和柴油桶垒成的一个个难以遮风挡雨的棲身之地，构成一座臭气熏天的迷宫，人们出出进进常常踩到自己的粪便上。

“啊，太不像话了！”胖太太又叹起气来。巴勃罗感到头颅一阵阵疼痛。戈德金难受得在椅子上挪动身体。贡萨加咕哝了一句：“我们这位朋友中邪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报告人又开始讲话：

“胡里奥·莫雷诺博士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我们（我说‘我们’是因为本人有幸在他的政府任教育部长）一直努力为那些可怜的人改善生活条件，我曾几次有机会亲自访问那些街区。记得我和一位印第安人模样的妇女谈过话。她的脸像石雕一样麻木，只有那双既温柔又凄凉的黑眼睛给她的表情增加了一点活气。我一连问了几个有关她家庭的问题。她说，二十年里她生了十四个孩子，只有三个活下来，其他的死于痢疾、肺结核或营养不良（当然，她用别的名字称呼这些疾病……）。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最后那段话，悲惨之极，催人泪下。‘您想想啊，博士，我把仅有的一切都花在埋葬孩子上了。哪一年都有孩子死于这种病或那种病。好

在我命运不错，认识个殡葬馆的人，心肠特别好，我每次买小孩棺材他都减价。先生您知道，我是老主顾了。’‘我是老主顾了！’”格里斯重复了一句，声音悲怆，同时把手掌往桌面上一拍，震得杯子摇摇晃晃，水险些溢了出来。

“莫雷诺博士掌权以后，命令关闭埃斯梅拉达港所有赌场和妓院，并且宣布向贩毒现象进行殊死战斗。这些措施招致了一切与那种社会毒瘤有利害关系的人和经济集团的敌意和仇恨。新政府开始建设医院和学校，为穷人造体面的房屋。按照一项精心组织的计划，可望在五年之内烧毁萨克拉门托最后一个贫民窟！莫雷诺执政期间，报刊享有最充分的自由。许多由寡头阶层或两家美国大公司控制的报纸变本加厉地攻击他们称为‘左倾政权’的莫雷诺政府，有时甚至对总统及其内阁成员进行人身污辱。”

从报告人提到萨克拉门托大主教的时刻起，社会科学教授就显得局促不安。现在，他不停地咬着指甲，随着头部神经质地猛烈晃动，眼镜片上反射的光线时明时暗。戈德金仍然咬着烟斗。凭着新闻记者特有的本能，他想象着报告人谈到“责任”那一章节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格里斯喝口水，用手绢擦擦嘴唇，接着说：

“一天，莫雷诺博士采取了在一定意义上判处了他死刑的措施。他征购了属于大庄园、联合种植公司和糖业中心的四十万英亩土地，以政府股票付款，然后分给两万户农民。对此，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大为不满。他的土地改革计划目标明确，合情合理，堪称典范。女士们，先生们，五十多年来，希望之风头一次开始吹拂我国的大地。”

他垂下胳膊，耸了耸肩膀：

“其余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件了。有一天，在加勒比各国招募的雇佣军乘联合种植公司和糖业中心的轮船（有照片可以证明）在岛上登陆。国民军部队被寡头集团收买，投向反叛力量。叛军闪电般取得了胜利。人民痛心疾首，但束手无策。在三十个大家族支持下，‘解放者’重掌政权，并通过一系列虚伪的法律程序，建立了‘他的’民主制度，通过了‘他的’宪法。埃斯梅拉达港再次成为放荡堕落的中心。原有的公司死灰复燃，新公司纷纷出现，妓院和赌场的数目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中坚们摆脱了在他们高贵的头上游荡的‘共产主义胁威’，大大松了一口气。现在，又可以和从前一样去‘逛埃斯梅拉达’了。”

莱昂纳多·格里斯喘了口气，盯住大厅的一角。从开始演讲以来，他不时朝那边望望。随后，他举起右手，像是请听众看一幅美丽的图画：

“今天，访问塞罗埃莫索的人都能看到，国徽广场正在兴建一座雄伟的大厦，那就是将来的联邦政府所在地……工程是四年前破土的，如果说还需十年才能完成也算不得夸张，因为这样对靠这项工程敛财致富的集团有利。确实如此。据报界说，这座大厦将是三个美洲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国库为其付出的费用之高令人瞠目，仿佛用实心金砖砌成，用金粉代替水泥。整个工程由‘解放者’的一位妹夫领导，独裁者的兄弟、姪子、表兄弟、朋友和干儿子以及投靠他的人都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议会对工程的拨款要求照批不误，从来不讨论工程的造价。

① 指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报界把这座‘纪念碑’吹捧为我国文明的象征和骄傲。通过一整套伪造发票的系统，大厦的所有建筑材料都比实际价格高出两倍以上。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差价都进入了独裁者、他的姐夫、妹夫及同伙的私囊。这个罪恶集团靠人民的贫困大发横财！”

26

莱昂纳多·格里斯喝一口水，飞快地瞥了一眼提纲，随后又面对听众说：

“你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情况可悲，美国有什么罪过呢？能指责我们什么呢？’啊，亲爱的朋友和邻居们，答案绝不简单，也不容易。我尽量简单地回答。

“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写过，美洲是神灵留给世界的保护区。你们的托马斯·杰弗逊也说过，美国代表着人类第二次机遇。你们这个新国度从出生那天起就满怀对人类伟大前途的信念。杰弗逊还说过，他曾在上帝的祭坛前发誓，永远反对人们头脑中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可以说，在十八世纪，美国是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旗手，是本大陆人民为摆脱殖民状况而进行斗争的希望和后盾。法国革命得到了你们驻巴黎公使的同情。这位公使也曾对一些渴望祖国独立的巴西青年说过鼓励的话。

“无须我来帮助诸位回忆你们史诗般的向西部进军。你

你们的年轻一代、你们的勇气和胆略、你们创造和建设的才能以及你们对印第安人和墨西哥混血儿的民族优越感促使你们（如果还需要促使的话）把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纳入了你们的版图。独立宣言的梦想曾伴随着你们度过漫长的时光，直至今天仍使你们眼花缭乱、惴惴不安。

“罗斯福总统制定的‘大棒政策’已成为往事。如果有人不肯相信‘北方的大哥哥’曾对本大陆的某些国家施加压力并进行过军事干涉，我劝他读一读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参谋部史麦德利·伯特里尔少将在1931年写的《战争即儿戏》一书。本书已告售罄，但你们可以在国会图书馆借到一册。在这部自传中，这位美国军官——他因为1914年参加夺取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城和1917年攻克海地里维尔堡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主要讲述他二十三年的军事生涯，把他所在的海军陆战队称作‘美国最机动的武装力量’。在这本厚厚的书里，作者热情洋溢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和他的士兵如何把墨西哥，尤其是其北部港口坦皮科变成美国石油公司投资的安全地区，如何把古巴和海地变成花旗银行的小伙子‘干净的’用武之地。

“在书中，还描述了在1909至1912年为了另一家美国银行，他如何帮助‘清洗’尼加拉瓜，后来为了美国果品公司的利益，他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又如何被派往洪都拉斯。我还清楚地记得作者历数赫赫战功之后写下的那段厚颜无耻的话：‘回顾往事，我感到可以对卡波内有所劝告。他充其量在一座城市的三个街区杀人越货，而我们海军陆战队却在三个大陆横行无忌。’

“啊，你们会说，这一切都是陈年旧帐。可是我要反驳一句，美国各公司利益在拉丁美洲的磨盘仍然在转动，只不

过今天的动力和手段不同罢了。”

莱昂纳多·格里斯漫不经心地摸了摸麦克风，带着难以察觉的笑容瞥了身边的人一眼。社会科学教授仍然心神不安地一会儿双腿交叉，一会儿双腿分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格里斯接着说，“美国以最强大的民族出现在地球上，其军事实力保护下的经济财政繁荣只有苏俄可以与之相比。你们的生活水准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对于美国人的梦想来说，这是个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威胁。你们在国内外为自己描绘的理想形象开始扭曲……因为这个富有、舒适、倍受尊敬的民族变成了保守得近乎反动的国家，摒弃了十八世纪曾经以惊人的勇敢、高尚和开拓精神挥舞过的自由旗帜。于是，共产党人急不可耐地抓起了这面旗帜，现在正在巧妙地用它为他们的事业服务！”

“依我之见，美国人民的善良只有一种尚在：他们的天真。你们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吸引人的报纸，但又是个消息不灵通的民族，特别是对他国和他国人民一无所知。你们不会明白，为什么美国花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帮助外国政府，却没有交上朋友，而且‘买来了’敌人……”

“原因何在？就拉丁美洲来说吧——这是我特别关心的地区——我可以举出一个……首先，我举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例子：古巴问题。上个世纪，美国曾帮助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我担心，今天美国更关心保护本国公民在古巴岛上的投资，而不想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的理由和目的，不想帮助那个小小的邻国走上经济解放和自决的道路。我不是有话必中的预言家，但是愿意冒昧地说，你们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策很可能最终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

的革命者们推进共产主义的怀抱。

“你们政府的善良用心和你们本人交纳高额税款所做的牺牲被在拉美投资的公司和经济集团的贪婪所破坏。似乎你们的大实业家希望我们继续充当没有民族工业的‘香蕉共和国’，永远是廉价原料生产国。我认为，这些强有力的集团已经使你们的政府相信，他们的私人利益即整个美国人民的利益，结果这个伟大的国家便使用其威信和政治力量，必要的时候还使用其军事力量，来保证这些美国托拉斯和垄断集团在拉美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请注意，这是连美国法律也不允许的！”

“要是忘记美国的资本和技术给我们各国带来的好处，忘记它们在我们蹒跚起步的发展初期所起的作用，那是荒谬的。然而，现在已经到了危机的地步。这些经济集团在拉丁美洲开发石油、电力、电话、矿产……得到了极大的权力，甚至决定性地影响我们的政治命运，维持或者推翻政府，控制新闻界，贿赂议员，利用他们通过的法律以专利权、利润、技术服务、股息红利等形式把大笔款项汇回国内。对我们薄弱的经济来说，这无异于致命的定期放血。这样，女士们，先生们，许多拉丁美洲的共和国成了名符其实的‘美元出口国’！（请诸位想想，多么荒唐！）

“多年来，你们的政府支持、扶植的是特鲁希略、索摩查、巴蒂斯塔之流奸诈而又残忍的独裁者。理由很简单，也非常明确（但相当卑鄙），这就是，这些祸国殃民的独裁者符合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我承认，美国同拉丁美洲各独裁政权打交道并不容易。如果国务院同他们合作，我们这些自由主义者就要反

对，就要大声疾呼：‘你们爱的是独裁者！’如果你们的政府对专制政权进行制裁，我们这些自由主义者又会喊：‘干涉！’并且要求各国自决……

“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本半球防御计划，你们的五角大楼要求政府要员容忍这些独裁者。美国政界人物们也许一向从心底里鄙视他们，但还是和他们交杯换盏，亲亲热热。现在，大战早已结束，还有什么开脱的理由呢？共产主义威胁？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

格里斯停顿了一下，仿佛等待着大厅里有人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贡萨加把头歪到戈德金一边，低声说：“我们的朋友在自掘坟墓。虽然讲的不少是事实，但不该走得太远……你以为如何？”戈德金没有答腔，只是耸耸肩膀，从嘴上拿下烟斗，放进口袋里，同时叹了一口气。“我希望格里斯博士现在就结束讲演。”巴勃罗嘟囔了一句，从口袋里掏出一片阿斯匹林，放进嘴里嚼起来。格伦达的身影在他头脑中一闪而过。社会科学教授干咳了一声，声音很大，报告人不由得回过头去看了他一眼，以为他要提出什么质询。

“你们的问题我了解。”格里斯接着说，“请诸位允许我不揣冒昧告诉你们。你们生活在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怀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另一方面，经验告诉你们，如果不仅在理论而且在实践上绝对忠实于这一理想，那么你们就不能维持已经很高并且在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准。因为在我看来，只要存在极其富有的国家、集团和个人，那么他们的富有必然以另一些国家、集团或个人继续保持贫困为代价（我在宣扬经济学上的异端学说吗）。

“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民族像美国这样认真对待宗

教。你们的教堂里总是挤满了善男信女。然而，我的印象是，你们不知不觉地在教堂和商业办公室之间筑起了一道钢筋混凝土的高墙，企图使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就是说，你们用一只手抚摸着上帝的羔羊，用另一只手抚摸着金羊羔。”

贡萨加撇着嘴小声说：“我们的朋友疯了。”巴勃罗点了点疼痛难忍的头。在他眼前，格里斯的形象罩上了一层迷雾，随着血液在他太阳穴有节奏地涌动而跳跃。

“西方世界变成了你们的花园。可是，请你们不要被纹丝不动的树木、万紫千红的花卉和明暗有致的光线所迷惑。在这座广阔的游乐场地下，有可怕的浆液在发酵、翻腾，它放出的瘴气即使不能消灭你们的肉体，至少会摧毁你们的精神。这座漂亮的花园完全可能变成墓场。

“我从许多听众的脸上看到了质询的表情。‘这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他们似乎在问，‘我们慷慨收留的这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对我们说三道四、横加指责呢？’对此，我要回答，是你们自己通过宣扬民主、通过不断地强调基督精神赋予了我这种权利。

“我相信，已经到了这个拥有种种显赫头衔的国家决定什么更为重要的时刻了：是保持其在西方世界的道义权威、真正促进依靠它的各国人民的进步和幸福呢，还是不顾一切代价地继续增加其财富，提高其生活水准呢？……

“看来，在这次报告会上，我信口讲来，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我只得一吐为快了。你们精神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之一是荒唐的种族优越感，它至少把人类的三分之二排除在与你们共同生活、互相尊敬、尤其是互相亲善的范畴之外！”

“啊，太不像话了！”坐在巴勃罗·奥尔特加后面的胖太太又呻吟起来。社会科学教授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镜片，动作慌乱。

“现在，”格里斯停顿一下，慢慢扫视了整个大厅，接着说，“现在，我要做一个重要的说明。请诸位相信，在这篇坦率得近乎粗鲁的演说中，我无意把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灾难的责任统统推到美国宽阔的肩膀上。它们主要应由我们的政界人物、工业界的首领和所谓社会栋梁们来承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推翻独裁者，把剥削者从政府驱逐出去，摧毁和消灭寡头阶层，纠正我们的过错，建立社会公正。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请相信我的话——都有不少善良、勇敢、正直和才华出众的人。一般说来，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请不要大惊小怪！）这些人绝不肯接受右的或左的极权制度，这些人才应当得到你们的同情、信任和支持！”

“现在，结束演说之前，我还有一点说明。如果我不肯承认，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处于山姆大叔的荫护下要比站在苏联熊一边安全、有利得多，那么我就不仅忘恩负义，而且有失明智了。我也不会忘记，假如美国像共产主义俄国一样实行检查和不讲容忍，那么我在这个报告会上连三个字也不能说完。我完全相信，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今天晚上讲了这些话受到政治当局的传讯，也不会受到本太学校长和警察的惩处。我也知道，明天你们的报纸会毫不犹豫地刊登我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另外我也想说明，我来美国寻求避难，正是因为还相信其人民依然保留着善良和主持正义的精神——我重复一遍，不应当把人民和金融经济集团混为一

谈。

“非常感谢大家！”

大厅里响起短暂的、稀稀落落的掌声。戴金属边眼镜的教授站起来。巴勃罗奇怪地发现，在五十分钟的报告中，他长得高大、粗壮了。格里斯掏出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眼睛死死盯着大厅的一角。巴勃罗半直起身子，转过脸，发现穿浅色雨衣的人坐在一个似曾相识的大胡子混血儿身边。

社会科学教授宣布，如果有人要提问题，报告人乐于回答。头一个站起来的是位神父。

“格里斯博士，您真的是无神论者吗？”

一阵交头接耳声。“肮脏的打击……”贡萨加嘟囔说。戈德金忍不住烟瘾，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大厅。格里斯和藹地朝神父一笑：

“我不是无神论者，而是不可知论者。这位朋友知道，两者不是一码事。我向你保证，我非常热爱生活，对人类怀着纯真的感情。难道这不是人世间最为重要的吗？假设上帝存在——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爱他的生灵也是间接地爱上帝。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存在（对此我非常遗憾），那么也不会单单为了取悦上帝、为了自己的灵魂在天国有个好归宿而爱我的同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友爱来自我的五脏六腑，来自内心奥妙的源泉，我无法用语言形容……”

神父笑着说：

“亲爱的博士，这种无法形容的力量就是上帝！”

神父坐下了。格里斯严肃地点了点头，低声说：

“但愿如此，神父！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如此！”

接着，有人提了两个愚蠢透顶的问题，巴勃罗难为情地

用手捂住脸，但报告人却带着不无幽默的耐心解答了。

巴勃罗似曾相识的混血儿站了起来。他黑黑的眼珠，四方脸，表情严厉。

“尽管你一再否认，但我仍然相信你是个共产党！”他声音粗犷，英语里带西班牙口音。

“你不是在提问题，而是在断然肯定。”报告人笑着说，“不，我并非共产党人，而是个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老自由主义者，如果按照内心深处的喜好行事，我会在知心朋友、高雅的书籍和音乐之中以养花种草度过余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良心上时时笼罩着我的人民受苦受难的阴影，是因为对他们怀着一种令我肝肠寸断的责任感。”

混血儿气乎乎地坐下了。一阵椅子挪动声、咳嗽声、脚和地板的磨擦声和低语声。有个人举起手，格里斯打了个制止的手势。

“请稍等片刻！”他说，“对刚才断言我是共产党的那位绅士的相貌和声音我并不陌生。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听到过他说话……很久以前……也许在我的国家……我甚至相信当时他穿一身国民军制服……（我没有记错吧？）好。无论如何，这位绅士的发言使我想起了同牛津大学一位英国教授的谈话。当时我们正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他的下面一段话深中肯綮，简单明了，让人拳拳服膺：‘共产主义与民主对立纯属谎言。’他解释说，‘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反义词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独裁。问题是，当我们自认为是资本主义者的时候，以为自称民主主义者更加动听！’”

巴勃罗回过头去，看见刚才质问格里斯的那个人气得脸

色铁青，穿雨衣的人坐在他旁边，却面带微笑。

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大学生们想了解有技术知识的美国青年到拉丁美洲工作的机会如何。格里斯既像慈父又像教师似地作了回答。

穿浅色雨衣的人终于站起来了。格里斯眉头一皱，准备还击。

“博士，据说先生是华盛顿一个旨在用革命推翻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政府的阴谋集团的首领，这是真的吗？”

听众的头一齐好奇地转向他，随后又转向格里斯。“要出事！”贡萨加低声说。巴勃罗小声骂了一句。社会科学教授的眼镜片上光线闪了几下。格里斯不慌不忙。笑着说：

“我援引著名的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拒绝回答这一问题。”

大厅里几处发出笑声。穿雨衣的人没有坐下，追问说：

“先生究竟是不是旨在推翻卡雷拉政府的武装革命运动的成员？”

“是！”格里斯大声说。接着又重复了两遍：“是！是！”

那人刚要坐下，报告人对他喊道：

“等一等！站在那儿！现在我要向你提个问题。”他死死盯着对方。大厅里的气氛顿时像充了电。“两个月来，不论我到哪里，你都像个影子似地跟着。谁收买你来干这勾当的？萨克拉门托大使吗？说呀，回答呀！谁？”

那人尴尬地坐下了，用牙咬着嘴唇，脸比以往更红了。坐在旁边的混血儿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一阵骚动。奥尔特加猛地站起来，贡萨加一拉他的外衣下摆。让他重新坐下。

戴金属边眼镜的教授举起手，请大家安静。

“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社会科学系，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莱昂纳多·格里斯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今晚光临，为我们作报告。不过，我再次提醒大家，他所发表的看法并不代表我们系和我们学校的意见。”一秒钟之后，又补充说：“也不代表我的意见。”

他把脸转向报告人。

“格里斯博士，非常感谢。”接着又转向听众，“朋友们，我宣布报告会结束。非常感谢，祝大家晚安！”

有人鼓掌，但零零落落。贡萨加和巴勃罗走过去和格里斯握手以后就留在他身边——他们要陪他回到寓所。另外几个人，大部分是流亡的同胞，也前来向报告人表示问候。

罗萨莉娅暗暗发誓，永远不再迈进大使的寓所。她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之间的一切都完结了！她知道，有人晚上看见大使陪着弗朗西丝·安德森出入夜总会和餐馆。也许两个人随后在某家旅馆或大使馆一起过夜，而她却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家里，忍受潘乔的哀叹和乞求。“罗萨莉娅，亲爱的，我向你提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你怀孕了没有？”她恨不得冲着呆子的脸大笑几声。“怀孕？我怀孕了？你听着，要是真的怀了孕，不管儿子是谁的，我早就服毒自杀了。”潘乔像个可笑的蹩脚演员一样，跪在妻子面前，一边吻她的手，一边说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嘴里不停地嘟囔：“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罗萨莉娅一生中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鄙视丈夫。整整一夜，那倒霉的家伙一声不响，坐在屋子一角，用彩色铅笔画他的图案，偶尔抬起头来，带着畜牲般的表情看她一眼。在自己房间度过的几个钟头多么漫长！丈夫在家的时候她更感到寂寞。怎么办？靠那点可怜的英语，她看不懂电视和电影。而且没有女友，又讨

厌居住在华盛顿的萨克拉门托人。只好守着电话机。加夫列尔随时可能打电话来……两个人几乎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她的肉体如饥似渴，但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肯主动打电话……奇怪的是，潘乔似乎也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仿佛他也希望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赶快把情妇拉到床上。

一天夜里，看到妻子焦急地盯着电话机，他忍不住问道：“莫非他不给你打电话来吗？”“他？谁？”“大使……”

“潘乔！我真没法理解你……”丈夫耸了耸肩膀：“我也没法理解自己……”他又开始在手指间摆弄着纸卷，踱来踱去，不再看妻子，“只要你幸福，我不会阻拦你和那个男人交往。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难过，不愿意让你抛弃我。为了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我什么都肯迁就，什么都肯！”妻子一阵恶心。丈夫这番话像冰凉而又粘乎乎的唾液充满了客厅，顺着墙壁、顺着家俱往下流淌……弄脏了她的皮肉，弄脏了她的五脏六腑，使她脊背、胳膊和腿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现在，她感到昏昏沉沉，头脑中空空如也，脸上——尤其是嘴四周的皮肤——失去了知觉，就像牙科医生在牙龈上注射了麻醉剂一样。

那天晚上，电话铃一直没有响。十一点钟以后，夫妻俩准备就寝。潘乔身穿条纹睡衣，披着那件难看的锦葵紫色睡袍走出浴室，声音里带着牙膏的气味乞求说：“我可以到你的卧室去吗？”啊，上帝！对这可怜虫稍稍有点恻隐之心也好呀！闭上眼睛，从头脑中“抹去”一切，“死去”半小时，把肉体交给他，任凭他用软绵绵的嘴唇去吻，任凭他用湿漉漉的手去摸，听着他说些低三下四的荒唐话……可是，不行！“不行，潘乔。我偏头疼得厉害。别着急，明天再说

吧。”他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在道晚安之前，又嘟囔了一句：“没关系，明天他一定会叫你的！”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居住在华盛顿的萨克拉门托人（尼珐负责把流言蜚语转告她……）把她称为“大使的小老婆”。多么光彩的头衔！二十六岁的女人，如果愿意的话，最英俊的年轻情夫也会跪倒在脚下，却偏偏对一个从年龄上说可以做她的父亲的男人唯命是听，任其摆布！

现在，她试图分析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感情。正是这个男人，使她头一次享受了性器官的快感，充分尝到了女人的欢乐。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她觉得“浑身振奋”。这个男人说的话使她感到自身的重要，自身的存在。这个男人极像她小时候在书刊上看到的玛雅印第安人。不可否认，对他肉体的迷恋之中包含着害怕的成分。有多少次她怀着既陶醉又厌恶的复杂心情抚摸紫铜色前额上那块泛白的伤痕？当那巨人般的躯体把她压住，肌肉结实的手臂把她搂紧，器官的快感使她全身痉挛的时候，她曾多少次荒谬地希望这男人把她杀死，把她压碎！但是，几乎每次魂飞魄荡的时刻过后她都痛哭一场，变成一个被遗弃的可怜的孤儿，只想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抚摸她的头发，只想偎依在他结实而又温暖的躯体之中，对他说些与性交毫不相干的话。

而现在，这负心的家伙却跟那美国女人鬼混，遗弃了她，并且直言不讳。不要脸！

一天傍晚，潘乔还没有下班，电话铃响了起来。她一下子窜过去，气喘吁吁地抓起话筒：“喂！”“罗萨莉娅，亲爱的！”是他的声音。“下午好，加夫列尔·埃略多罗。”

“怎么这样冷冰冰的，我的宝贝儿？我想你都想疯了。今天晚上来这里，好吗？”她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并且浑身颤抖起来，好不容易才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能不能……”“当然能！像往常一样，我给你准备夜宵。”

“我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打发阿尔多去接你。八点整，说好了！”

现在，她来了——她曾发誓永远不再迈进大使馆一步——下了大使的梅塞德斯牌汽车，按了按正门门铃。米歇尔把门打开，像以往一样躬着身子不看女客（他的义务是不看、不认出夜间来的女客）：“晚安，夫人！”她又走进了门厅。大使馆的气味（地毯、木制家俱、消毒剂隐隐约约的松树香气）钻进她的鼻孔，唤起她往日的风流韵事和一阵模模糊糊的羞怯。现在，她感到又“回来了”，感到一切与原先一模一样。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张开双臂走上楼梯：“罗萨莉娅！你终于来了！太好了！”她让对方拥抱、亲吻一阵之后，又被他拉到楼上。

只是在如疯似狂的云雨交欢之后，罗萨莉娅才提起弗朗西丝·安德森。两个人还躺在床上。

“亲爱的，说到底，为这件事操心的应当是我的结发妻子，而不应当是你。重要的是我喜欢你，没有你就活不下去。”

“真心话？”

“什么叫真心话？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真心话，那么请说给我听听。我反正不知道，只知道我的感觉。”

罗萨莉娅拼命忍住，但眼里还是涌出了泪水。加夫列

尔·埃略多罗分明感到情妇的泪珠在毛茸茸的胸脯上滚动。

“你怎么了，我的宝贝？”

“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没关系。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千次，现在再重复一遍：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绝不会遭到不幸。你看看我，我的末日快到了。”女人抽抽咽咽，男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要是我把单独一个人呆在这所大厦时的想法告诉你……你以为我没有感情，是个粗汉吗？那样反而好了。我小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和所有的人都想把我变成个粗俗的无赖，变成个无可救药的反叛者。可是，我战胜了全部敌人。你想，当时我光着脚，穿得破破烂烂，胃饿得生疼。今天的一切是靠我自己而不是倚仗任何人得来的。”

大使话到嘴边，没有说出口：“我的母亲是妓女，我不知道父亲是谁。甚至可以说，‘制造’我只花了三个卢纳。这就是那个妓女的牌价。每星期六还特别对第五团士兵减价优待。”

“你不想念妻子吗？”罗萨莉娅问“不想念女儿和外孙们吗？”

“当然想念，非常想念。不过我不为家庭操心。除了最小的那个以外，女儿都嫁给了富裕人家。我很有钱。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弗朗西斯·基塔和女儿子们会受到保护。我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当然思念我的亲人。一旦政府倒台，我就把他们打发到特鲁希略城。然后他们可以来美国或者去欧洲。”

“你呢？”

“下地狱。但不会没有人陪着，一定要带很多人一起

去……”

罗萨莉娅摆弄着挂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脖子上的那小小的铝制神像。他笑了笑说：

“这是索莱达德马尔镇的圣母，我的保护女神。听说过我们那儿教堂里这尊神像的故事吗？没有？一天，刮起了骇人的飓风，海水涌向岸来，似乎到了世界末日。索莱达德马尔教区长作弥撒祷告，乞求上帝对善良的人民慈悲为怀。整整一夜，狂风怒号，大海冲击着沙滩。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逃往高处投亲靠友。一个霹雳打死了市监狱的两名看守，犯人们全都逃走了（当时我十岁或者十一岁）。多半个夜晚，我都站在小屋的窗前，乘着闪电眺望远处的山峦……胡安·巴尔萨和他的游击队员就隐藏在山上。我不停地祈祷，请求上帝放过革命者，把霹雳投向陆军第五团的兵营。第二天天亮，暴风雨过去，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渔民们看见海边沙滩上躺着一个人。原来以为是个溺水者的尸体，后来才发现是海浪冲到岸边的一尊木制圣像。一连许多天，人们千方百计打听圣像的来历，但谁也不知道，并且没有人听说哪里淹没了庙宇。只能是个奇迹……于是神父命令修复圣像，纳塔利西奥师傅带着颜料来重漆了一遍。漆得太好了，比塞维利亚^①大教堂的斗牛士保护女神还漂亮。大主教亲自从塞罗埃莫索赶来参加圣事。从此，这尊神像就放进教堂的神龛，被称为索莱达德马尔的保护神……也就是我的保护神……”

加夫列尔沉默下来。罗萨莉娅用手指摆弄着他胸前的神像。她无法理解这个男人，可是……难道她能理解自己吗？

① 塞维利亚：西班牙城市，以雄伟的大教堂著称。

格伦达的便条只是说：“明天上午十点半，在艺术宫第八室，拉斐尔^①的《草地上的圣母》前面。”这是个星期六。巴勃罗先到了，但等了不到三分钟女友也来了。两个人握手之后马上就开始谈论绘画，仿佛重新开始头一天中断了的交谈。格伦达说她并不特别欣赏拉斐尔，认为此人过分高傲，他的作品完美得近乎冷酷，缺乏人类的激情。巴勃罗的看法呢？他，完全同意……

两个人肩并肩地走着，一幅接一幅看下去，脚步很慢。实际上，两个人谁也不大注意绘画，一直互相偷偷观察对方。巴勃罗觉得格伦达今天特别迷人，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头发披散着，像刚刚从浴室出来一样清爽。到了波堤切利^②的《圣母与圣子》前面，巴勃罗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又不显得卖弄学识：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杰出画家。《草地上的圣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② 波堤切利（1441—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这张画是桑德罗·波堤切利在佛罗伦萨画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张古画上的圣子真像个婴儿。”她说，“眼睛都不够天真，不够漂亮。”

巴勃罗点头同意，向女伴投去一缕时间更长、更带有个人色彩的目光：

“说得很好，格伦达。”

“谢谢。”她说。又险些补充一句：“你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好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两个人在菲利比诺·利比的《圣子的崇拜》跟前停住脚步。巴勃罗本来想说：“据说菲利比诺是弗雷·菲利比诺勾引一个修女而生的一个私生子。”但也没有说出口。格伦达似乎忌讳任何提到性的句子。她很可能蛮有理由地反驳，说对十五世纪的流言蜚语不感兴趣。

“啊！”他感叹一声，“这幅是我最喜爱的画之一。”

两个人走近画布，原来是波堤切利的“青年肖像”。

“格伦达，你不觉得这个伙子的脸上刻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吗？你看他这双眼睛画得怎么样？”

“好奇、对生活的渴望、茫然……也许有点胆怯。”

巴勃罗想挽住她的胳膊，但克制住了心头的欲望。格伦达也想让他那样做，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觉得他最好不要急于过分放肆。就这样，两个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过艺术宫西翼的展室。格伦达说她认为希腊瓶画没什么意义，巴勃罗则表示他的看法完全相反。

他们像日程紧张的旅游者一样走过陈列佛拉芒^①画家作

① 佛拉芒：分布在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的一个欧洲民族。

品的展室。格伦达说，她觉得伦勃朗^①的作品很好。这时，巴勃罗越来越烦躁，真想高声呼喊：“小姐，你大声说吧，伦勃朗会高兴得露出纯洁的微笑的。”但他忍住火气，没有说出口。

“你认为《红帽姑娘》如何？”格伦达承认，头一次看弗尔美^②这幅原作时她不仅惊奇，而且失望，觉得画面尺寸太小，不过仍不失为一件珍品。

他们在宽阔的院子中心的喷泉旁边停住脚步，相对无言。突然，两个人都笑起来。

“我们多么像两个大傻瓜，嗯，巴勃罗？”

他挽起女友的胳膊，声音显得轻松多了：

“去看看后期印象派的作品吧，格伦达。你应当习惯于和我在一起。我想成为你的朋友。在你身边，时刻担心哪句话或哪个动作惹得你伤心，这对我不是件高兴的事。”说着，他拉着女友朝凡·高和高更^③的展室走去，“我知道，在大使馆的那天晚上，我给你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毫不奇怪，因为我对自己的印象也很糟糕。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请相信，我完全出自真心，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那样对待你。我对任何人都不曾那样……”

她默默地笑了。“紧紧挨着她那热烘烘的散发着香味的身体多么惬意。”巴勃罗想。可是，伙计，小心点，你搬运的这件物品上贴着个看不见的纸条：“易碎品，小心轻放！”

“如果你讨厌我的时候，”他接着说，“就坦率地告诉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现实主义画家。

② 弗尔美（1632—1675）：荷兰画家。

③ 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

我，把我轰走。好吧？你认为高更这幅自画像怎么样？要是我像他一样能写……对，像他那样能画该有多好。你看凡·高的那几棵树，那扭曲的表情多么悲伤。”

她点了点头。现在，她的兴趣不在一幅幅名画上，这些都看过无数次了，而是在巴勃罗身上。虽说心里还有点嘀咕，但已经完全相信这一点了。但愿两个人能继续这样干干净净地志同道合，定期长谈……也许有一天会对他倾吐一切。一切？不可能！但至少有人交谈，虽然绝不会涉及内心的秘密，不触动痛处，不提到那毒汁四溅的根源。奥尔特加是个敏感的人。格伦达喜欢看他的相貌，爱听他的声音，喜欢和他在一起。但是，在她的躯壳之中还有一个内核在抵抗，还有一个小小的城堡在挣扎，绝不肯束手就擒。

“你累了吗？我们坐一会儿吧。”巴勃罗说。

两个人坐在一条沙发上，面对着一幅马奈的作品：《死在斗牛场上的斗牛士》。

“巴勃罗，”她把头转向男友，注视着他的眼睛，“你大概觉得我很古怪，对吧？”

巴勃罗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点了点头，但马上又反问道：

“可是，谁告诉过你我喜欢不古怪的人呢？”

“要是我提个问题，你保证诚恳地回答吗？”

“保证。”

“你喜欢我什么呢？在你心目中我意味着什么？莫非你和与你种族、年龄和地位相仿的大部分男人一样，也热衷于收集女人吗？莫非你要像儿童摆弄玩具一样摆弄我吗？你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坦率地说吧，不要怕伤害我或者惹我生

气。”

“喔唷！”他惊叹一声，“你一连串提了一百个问题，要我用一句话回答吗？我看可以把这一切归结为：我喜欢你，和你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想尽量经常有你在身边。满意了吗？”

“你说喜欢我……是喜欢我的外表，对吧？”

“岂有此理！你不是一幅画、一首乐曲或者一种想法。你是个人，有躯体的人……难道我喜欢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外表有什么害处吗？”

“有。因为假若你只对肉体感兴趣，那么我的命运必定……这你知道。”

他忍不住烦躁地叹了口气。

“格伦达，亲爱的，设法了解我吧。你的长相、线条、身段，总之，你身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都让我着迷。至于其他——你的头脑——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总是锁得严严实实。你难以接近，总是拒绝、推托，你不肯和我亲密相处。我爱（看到了吧，已经漏了嘴，说出了这个词），我爱从你身上看到的一切。至于你的内心，我们在我们之间垒起了一堵带碎玻璃渣的墙壁，把内心藏在了墙壁那边。我怎能爱我没有见的东西呢？关于你所说的必然的命运……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它一定悲惨……”

她默默地望着画面上死去的斗牛士。

现在，巴勃罗才头一次静静地长时间打量格伦达的身影，带着几分肉欲暗暗勾画她的肖像，用炭笔描出她圆得喜人的前额、挺直而高贵的鼻子和充满肉感的嘴唇——这是她脸上最让人性欲勃发的音符（秘密在哪里？）……姑娘的脸

蛋匀称而结实，皮肤不像太白的女人那样毛孔显著，经太阳一晒就像坏了的水果那样出现块块黑斑。格伦达的皮肤更接近于玉兰花瓣，这不仅由于像绸缎一样柔软，而且因为色调稍显滑润。那双似乎怀有思乡怀故的沉静与哀伤的眼睛呈紫罗兰色，与一头褐色的秀发适成对照。巴勃罗暗暗得出结论：如果说她的眼睛、前额和脸与这个画廊里许多作品上的女圣徒有某些共同之处，那么这两片嘴唇却和天使大相径庭。这是一双女人的嘴唇，从头一天看到巴勃罗就想吻它……对，还喜欢她那不胖不瘦的身材，喜欢她那匀称的长腿、平缓的臀部……巴勃罗又一次发现，活生生的格伦达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要迷人得多。然而，姑娘为什么沉默寡言、悲凉地望着那个死去的斗牛士呢？

“格伦达，你应当学会不怕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信任我。”

她回过头来望望巴勃罗。巴勃罗心潮起伏，很想吻吻她。

“我并不怕你，但也不信任你。”

他笑了：

“好。我建议咱们做个试验：以后更频繁地见面、交谈……啊，格伦达！但要真正的交谈，毫无保留、推心置腹地交谈。如果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这要看你的愿望）以后我们仍然不能互相理解，那么你就把我赶走。好吗？”

她只是耸了耸肩膀。

美术馆的一个守卫靠在门柱上，偷偷打量着他们。

又是一阵沉默。格伦达又望了望躺在场地上的斗牛士和

他身旁的剑和红布。他是被公牛顶死的。男人们都像公牛一样，扑向女人，顶破她们的阴部、肚皮。而女人们则像斗牛士一样，直挺挺地躺着，叉开双腿，手无寸铁，已经死去……

“让一切都见鬼去吧！”巴勃罗心里想。他把姑娘的一只手紧紧攥住。姑娘带着近乎惊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但没有把手抽回去。

“格伦达，亲爱的，今天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到你家去接你。好吗？”为了不让对方多心，他又补充说：“你七点整在大楼门口等我，好吗？”

格伦达·多列玛斯点了点头，动作轻得让人难以察觉，接着又重新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幅图画。现在，她看到的已经不是斗牛士，而是个黑人小伙子躺在地上，浑身血污，被割下了生殖器，缺胳膊少腿，脸被拳打脚踩得失去了人形。

“格伦达，你怎么哭起来了？我哪句话得罪了你，伤了你的心？”

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在“塞纳河岸”饭馆一起就餐。格伦达虽然依旧不谈个人生活，但表现得不像先前那样拘谨，话也比往常多了。后来，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又见过几次面。一个星期天，风和日丽，他们到“幽谷回声”公园，吃了热狗，还在“俄国山”上散步。在那里，巴勃罗头一次听到了格伦达的笑声，笑得那样响亮清脆，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笑起来她的脸是多么快活！

他渐渐习惯了格伦达的“风格”——桀骜不驯而又挑剔。此人和他认识的大部分美国女人不同，似乎毫无幽默

感。

夏天来临，天气渐热，两个人觉得打开折叠车篷，到郊外野游最好。汽车沿着芒特弗农纪念公路，一直开到当年乔治·华盛顿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别墅。随后，下了汽车，肩并肩在浪湖盆地附近散步，躺在草地上看松鼠在树间嬉戏，听小鸟在枝头啁鸣。两人长时间沉默不语。这是个危险的景况，因为巴勃罗心里明白，四周寂无一人，身边是让人动心的年轻姑娘。淫荡的遐想搅得人心慌意乱，他唯恐做出什么动作伤了女伴的心，把她吓跑。

格伦达从交织的树冠的罅隙中望着炎热的蓝天。几个月来，她头一次感到肌肉松弛，神经轻快。巴勃罗是个了不起的男伴，至今没有任何话语或者动作让她失望。很多次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反而希望让他挽起胳膊，在嘴上吻一吻。这正是她希望发生而又害怕发生的事情。

这样，仅仅保持好朋友的关系不很好吗？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有的夜晚，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巴勃罗，希望他来到身边，捉摸着跟他交欢的感觉……巴勃罗不像别的男人那样鲁莽，他感情细腻，是个艺术家……最后，还是觉得不去想这些、冲个冷水澡为好。

六月下半月，迎来了头一阵蒸人的暑气。一天晚上，格伦达和巴勃罗一起开汽车出城。把车停在浪湖盆地附近的东波托马克公园，然后沿着河边走到汉斯观景台，躺在杨树下边的草地上，默默地仰望天上的星斗，倾听城里隐隐约约的嘈杂声……热风挟着夏天的香气吹到他们身上。格伦达尽量从头脑中驱赶对塞达城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天的回忆，而巴勃罗

则完全沉醉在孩童时代度过的夏季之中。今天晚上的香气和炎热召来了逝去的岁月的声音、相貌和感受，使他渐渐产生一种思乡怀故的麻木。现在，他几乎像自言自语一样压低声音，慢条斯理地向格伦达描述了塞罗埃莫索他父亲的家。那是一所西班牙殖民时代风格的古老建筑，家俱陈设古香古色，花园里的松树和榲桲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神态悲凉的柏树常使年幼的他想起坟墓。还有镶有西班牙塔拉维拉·德拉雷依纳瓷砖的喷泉、从喷泉通往廊檐的方砖小径两旁的石雕像。在一定意义上说，那些古老的石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都是活生生的人。

“一共是九尊艺术女神，当时我为知道每一个的名字和代表什么而沾沾自喜。历史女像克利俄断了一只胳膊；花卉女神塔利亚手中的面具缺了一块；十二岁的时候，我爱上了头戴玫瑰和单花玫瑰花环的抒情诗女神埃拉托，并且写了一首诗献给她……上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悲剧女神墨尔波墨涅。以她为灵感，我写了一篇《希腊悲剧》，男主角类似疯狂的俄瑞斯忒斯^①。”

一阵沉默。格伦达心里想：“他们把黑人那皮开肉绽的尸体埋到哪儿去了？”据说（啊，上帝！为什么夏天总是让她联想起那个肮脏的场面呢），据说有人把小伙子的生殖器喂了饿狗。格伦达摇晃着脑袋，企图把这些悲惨的回忆驱逐出去。

“奇怪……”巴勃罗接着说。现在，父亲的形象浮现在

① 俄瑞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父王被母亲及其奸夫杀死，他长大后和姐姐共谋杀死母亲及奸夫，为此而受到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的惩罚，变成疯子。后来女神雅典娜解救了他，使他归国继承王位。

脑海，“童年的某些场面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我总难以忘怀。比如说，一天傍晚……天气有点凉（塞罗埃莫索的海拔高度大约八百米），我十岁或十一岁，趴在卧室的窗台上望着父亲。他披一件披肩，若有所思地低着头，独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非常怜悯他。大概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意识到他不可救药的深重的孤独。我真想跑下楼去，拉住他的手，和他一起散步，哪怕是一句话不说也好。但我不好意思那样做。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迪奥尼西奥……”

“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格伦达问。

巴勃罗犹豫了一下。他自己了解父亲吗？

“他个子很高，很瘦，有点驼背，面容清癯，一双阔人们那种长长的手，声音沙哑。从外表看是这样。至于其它方面，他寡言少语，喜欢读书，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我小时候常常听人说，绝不能惹迪奥尼西奥……不要跟迪奥尼西奥吵闹……不要让迪奥尼西奥难过，因为他病得很厉害……家庭医生有一天对我说：‘你父亲还年轻，但他那可怜的心脏已经非常疲劳，用了一千年。’还是个孩子的我按字面意思理解了这句话，相信父亲的心脏真的有一千年……”

“你的母亲呢？”

“如果父亲对我来说是个传奇人物……或者说，是花园里石雕像中的一个影子，那么母亲就完全不同了。她是个活生生的太太，强壮、威严、无所不管，像个尽心尽力的女管家一样照看我。独生子，你该理解……宠爱而又严格，亲吻同时又规定严格的纪律。甚至算术还是由她亲自教我的。等到学代数的时候才让迪奥尼西奥负责。不用说，对代数一无

所知，学到的一丁点儿都忘了……后来让我去学法律，仅仅因为他们觉得（这主要是母亲的主张）一个男人应当有文凭，成为博士。啊，还是回过头来谈我的母亲伊沙贝尔太太吧。她出身在富裕家庭，独断专行，对门第特别敏感（啊！你该亲自听听她谈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家谱！）我母亲一直是她丈夫这个孤岛和世界大陆之间的桥梁。或者说是个解说员，总是替丈夫与现实生活沟通。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产业是靠她才兴旺发达的。请注意，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带有明显父系特征的国家！”

“那么，你父亲究竟干些什么呢？”

“我怀疑他过去直至今天都生活在梦境之中，沉湎于幻想，拒绝接受不符合他理想的现实。我相信，他愿意进修道院。假如到修道院当一名俗人僧侣，会过得更幸福……”

巴勃罗双手放在后脑勺下面，躺在草地上。看到格伦达仍然不言不语，他接着说：

“应该考虑到，迪奥尼西奥从年轻的时候起就被两个可怕的念头所困扰。一个是死，这使他笃信宗教。另一个是爆发一场共产党革命没收他的财产，取消他的信仰和其他自由——没有这些自由他无法活下去。但是，格伦达，请你相信，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曾几次做出令人感动的努力，试图和我互相理解，虽然每次都落了空。”

“那么你呢？你是怎样对待父亲的和解努力的？”

“我嘛……小时候对他怀着既尊敬又怜悯的亲切感情。等长大成人以后，我造反了……反叛的程度在我对你说过的那个‘悲剧之夜’达到了顶点。我认为，之所以救格里斯的性命倒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导师，而且是为了‘反对’父亲

和母亲——不可知论者兼公有化主义者格里斯的思想威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当然，这一点很久以后我才理解……”

“啊，巴勃罗！”格伦达叹了口气，“生活多么复杂呀！”

“我十五岁的时候，到索莱达德马尔度假，那里有奥尔特加家族的庄园和一座别墅。我爱上了一个佃农的女儿。她叫皮娅，年龄和我相仿。我们俩钻进甘蔗田里，躺在甘蔗上，吃水果，讲故事，说呀，笑呀。既然我们都是活人，必不可免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下午，我们交欢的方式你难以想象，是皮娅采取主动。于是……我们疯狂地热恋起来。我们经常秘密相会，有时候在河边的树丛里交媾，尽兴之后赤条条地跳到河里游泳……奇怪的是，直至今天，每逢闻到蔗糖、绿草和太阳晒热了的土地的气味，还总是想起皮娅。嗯。有一天，事情败露，天塌地陷了……伊莎贝尔·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太太的反应你可以想象出来。她的儿子，她身上的肉，她血中的血，竟然和佃农的女儿在甘蔗里干不要脸的勾当！我被赶出了伊甸庄园。母亲又哭又闹，咒骂我，最后擦干了眼泪问道：‘你想要父亲的命吗？不知道他的心脏受不住这种烦恼吗？’她决定不把儿子的‘罪孽’告诉父亲，这桩丑闻算是压下去了。皮娅的父亲被辞退以后被迫带领全家到别的庄园谋生。至于我，他们把我送进一所耶稣会寄宿学校，在那里我学习了宗教，受到入地狱遭火刑的威胁。我相信，在教会学校度过的两年为我的不可知论打下了基础，并且认为宗教是个可悲的东西，而上帝是个过分严厉的父亲……母亲的愿望是让我保持童贞，直到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

亲，让她生下成群的儿女，让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名声、土地和地位万世不衰。到了十八岁，我进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挑选了三四个塞罗埃莫索大户人家的姑娘作候选人。我又一次造了反，对任何以财产利益为基础但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感兴趣，并且更无意保持童贞。我曾和很多女人交往，她们也不尽是妓女。对这一切你一定感到厌恶，对吗，格伦达？”

她没有立刻回答，仿佛那个缺胳膊断腿的男人又在身边闪过。

“不，巴勃罗，为什么一定厌恶呢？只是让我伤心……我想不通，生活为什么如此无情。”

“要获得学士学位的那一年，由于你们知道的原因，我被迫离开萨克拉门托。现在，我在这里，尽量无所作为，免得伤害迪奥尼西奥的心脏或者伊莎贝尔太太的自尊。”

他停住嘴，望着一架飞得不高朝机场方向去的飞机上一闪一闪的灯光。现在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格伦达在外表上与皮娅有某些相似之处。也许是嘴……长长的腿。但是，皮肤颜色不同……皮娅是黑白混血儿。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想不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与母亲相比，你更喜欢父亲。对吧，巴勃罗？”

“这也奇怪，但我尽量不去想它。不错，当着面或在通信中我和老太太发生过几次摩擦，而对她的不够冷静常使我有某种负疚感。对老头我倒总是有点温情（或者仅仅是可怜？）我的伤心事之一便是长大成人以后不曾认真地设法和父亲深谈一次……”

树梢上有什么黑影飞过，河对岸点点光亮明灭无定。城市上空罩着黄里透红的晕环。

“你想回家吗？”格伦达觉得既是在问巴勃罗，又像是在问自己。

“既想又不想。我害怕，觉得我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大不相同。也许是担心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和他们一样，那么会使我自己绝望。活见鬼，太复杂了。”

“老头子总有一天会死的。”格伦达犹豫了一下，才小声说。

“到了那一天，母亲会找到另一种讹诈的方式，继续控制我的生活。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他的尸体长眠在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墓地，那时伊沙贝尔太太会利用对迪奥尼西奥的怀念，说我负有神圣的义务为他增光。她还会一再重复老头子对我的希望，即保持家族的繁荣，接受他是主要支柱之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制度残忍、不公正、荒唐……”

“你是社会主义者吗，巴勃罗？”

“很可笑，你们美国人对‘社会主义’一词总是谈虎色变。你们所害怕的只不过是这个词而已，因为我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哪国人民比你们更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你们国家内已经存在社会主义形式。好，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愿意，你可以给我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化和人文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对名称不感兴趣，最关心的是建立社会公正。我国有近二百万人口，说到底是被区区三十个富有的家族和两个强大的美国公司统治着。另外，人民不仅无声无息，而且还有贫穷、

饥饿、疾病、夭亡、灾难……你想，我能回萨克拉门托去帮助他们维持这种状况吗？”

“还有别的出路吗？”

他翻过身，趴在草地上：

“这正是我在寻求的。”

29

米歇尔·米歇尔钻进自己的房间，又写了一段绝密的日记：

“晚上八点二十分。加·埃朝我挤挤眼，再次暴露他是个缺乏教养的下等人。他要我准备两个人的特别夜宵，十点钟他和情妇从卧室下楼以后吃。

几分钟以前，门铃响了。我把门打开，大吃一惊。不是意料中的‘比’太太，站在我眼前的却是‘弗·安’小姐——这漂亮的美国金发女郎笑起来像在做牙膏广告。我的天哪！现在，两个人在上边，也许已经脱得净光，正在伊丽莎白式的床上滚呢：一个白色大理石雕像，一个青铜色动物。多么奇特的对照！我倒愿意去亲眼看一看，一半是出于科学的兴趣，一半是出于淫荡的心理。唉呀！”

脱衣服以前，罗莎莉娅总是要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大

灯全都关闭，只留下屋角那盏蓝色的小灯。弗朗西丝·安德森则不同，在床头两盏灯照耀下，像进行脱衣游戏一样大大方方地脱个净光。大使身上只披一件薄薄的绸子睡袍，站在浴室门口看着她，提前享受着雪白的女人即将给予他的欢乐。他性烈如火，急于求成，整个“行动”拖得时间太长了，有时候不得不强行忍耐，以免发作一通。两个人去了多少次酒家、饭店！跳舞的时候在耳边嘀咕了多少话语！多少次她答应了又不算数！多少次拒绝、多少次推推就就！他送给安德森小姐许多礼品：从国内带来的各种宝石或半宝石首饰，请金银匠在一只白金戒指上镶了一颗墨西哥湾捞出来的硕大的黑珍珠。

弗朗西丝·安德森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闭着双眼。按照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看法，乳房随着呼吸起伏得还算均匀。她的皮肤那么白皙，那么洁净……一生中从来没有享用过给他的印象如此纯洁、如此遥远而又不可企及的女人。

他慢腾腾地走到床边。没有任何话可说。欢快的呻吟是交媾中唯一的语言。

他坐到床上。弗朗西丝感到男人来到身旁，微微一笑，但仍然闭着眼睛。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轻轻吻了吻美国女人的两个乳头。她稍微哆嗦了一下，下意识地并上两条大腿。他脱下睡袍，扔到地板上，摸了摸女人的肚皮。看到两人的皮肤黑白分明，他满心高兴。手从肚皮往下摸，但弗朗西丝仍旧并着腿，保护着阴部。他伸嘴去吻女人的嘴，女人躲开了。于是，他开始吻女人的头发、太阳穴、脸蛋、下巴、脖子，随后又吻她的乳房、肚子。这时候，她四肢伸开，用两只手用力抓住情夫的头发，仿佛要把它们揪下来。他躺到

女人旁边，呼吸急促，鼻翼翕合，紧紧把她搂在怀里，重又想吻她的嘴，她又把头一扬，躲开了。他失去了耐心，恨不得在女人脖子上咬几口。

“莫非她讨厌我？”他想，“好，我要教训教训这个趾高气扬的白母狗，非让她服服贴贴不可。”一阵凶狠的欲望涌上心头：爬上去，把她的身体弄脏！他越搂越紧。

“慢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弗朗西丝在他耳边小声说，“别着急。你在想钟表上的时间吗？时间永远属于我们。让我喘口气。”

他猛地把女人松开了，直挺挺地躺在她身边。卧室的冷气开着，但他感到汗水涔涔。弗朗西丝把脸转向情夫，睁开了眼睛。

“你头一次杀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惊呆了。

“谁告诉你我杀过人？”

“唉，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你有生以来的历史我都知道得很清楚。告诉我，有什么感觉。你杀人的时候是怀着冷酷的仇恨还是带着火一般的热情？”

“我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

“难以令人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参加过不止一场革命。游击队往往是夜间偷袭，爱用刀砍死哨兵，免得闹出响动。说呀，你杀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记不得头一次杀人了。我脑子很坏，并且讨厌往事。”

“究竟杀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在战斗中？高兴！几乎是在赌博。关键是把敌人打发到地狱里，否则他就会先把你送去。”

“以后呢？后悔吗？”

“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呢？你以为我承认是杀人凶手之后，会跟我交欢得更快活吗？”

“谁知道呢？我跟那些半男不女的家伙们睡够了，跟那些英俊、健壮的小伙子们睡够了，他们把我当成半个情妇、半个母亲，而且都是那么纯洁、那么天真，正派得让人倒胃口。”

“我既不是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父亲——虽然从年龄上讲完全可以做你的父亲。到时候了，该结束这番谈话了。”

他又去吻弗朗西丝的嘴，对方再次躲开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你一生杀过多少人？”她问，“多少？”

他使尽全身解数，抚摸弗朗西丝肉体的每个部位，但这女人仍然不动心，拒绝就范。

“多少人？”她追问说，“十个？二十个？五十个？”

“我从来没有数过！”他大声说，恨不得抽这女人几个耳光。

“有什么感觉？”

“手里端一挺机枪，扣动扳机，子弹扫射出一个扇面。被我打死打伤倒在地上的都不是人，而是敌手。他们既没有姓名也没有长相。”

“究竟多少人？”

“五十，一百，二百……有什么关系？”

“如果现在我不肯依从你，你会杀死我吗？”

“不会。我不想杀死你，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想让你活着。”

“可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我感到你是个杀人凶手。大概你不仅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打死过人，而且亲手杀死过。说呀，快说呀！”

他不想回忆往事，已经把所有那些尸体埋进了头脑中那块墓地的乱坟坑里。没有一块墓碑。他们不值得。胸中欲火燃烧，他又把弗朗西丝紧紧搂住，床“咯吱咯吱”响了几声，他想起来了……

“好，我说。当时我二十一岁，被独裁者的警察追得东躲西藏，因为参与了一次向查莫罗总统的汽车扔炸弹的阴谋，事情败露……”

“是你要扔炸弹……你冒着生命危险亲手扔吗？”

“我们一共四个人，还没有抽签决定谁去牺牲，就有人告密了。警察包围了我们经常集会的地点，三个人被捕，只有我逃了出来……”

“如果抽中了……你会接受杀死总统同时也被弹片炸死的任务吗？”

“不！我恨独裁者。他的士兵杀死过我的朋友……杀死了我出生的那个镇上的许多无辜农民。但我还年轻，想活下去，活下去是为了继续恨他。死人是不能恨的。”

她笑了：

“不是你为了逃避责任而告发了同伴们吧？”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再一次恨不得朝弗朗西丝脸上抽一

巴掌。他忍住怒火说：

“你的问题是对我的污辱，不值得回答。”

弗朗西丝抚摸着情夫的脊背，在他耳边小声说：

“接着讲呀……你逃走了……藏在什么地方？”

“藏在一个妓女的卧室里……她是我的朋友，叫埃尔维拉。”

“她长得怎么样？漂亮吗？年轻吗？”

“既不漂亮也不丑。金黄色的头发。已经四十多岁。那时候我几乎把她当个老太婆……”

“她爱上了你吗？”

“不知道。她喜欢我。”

“她怎样把你藏起来的？”

“在塞罗埃莫索的妓女区有所古旧的房子，她租了一间小屋子。屋子里很寒酸，充满了她身体的气味、廉价香水的香味和拿她取乐的男人们的汗臭……”

“‘顾客’进去时怎么办？”

“埃尔维拉总是伏在窗台上招徕人行道上的男人。‘顾客’进去以前，我就爬到屋顶的夹层里藏起来，与蜘蛛和老鼠作伴……”

“男人们和你的女友在床上干那种事的时候，你听得见也看得见吧？”

“尽量不听。躺在上面，热得要命，浑身大汗。可是屋顶低矮，又有窟窿，总还是听得见。于是，小小的房间就成了个舞台，各种角色轮流表演，有老色鬼，也有头一次接触女人的孩子……男人走了以后我就下来，等第二个。凌晨，埃尔维拉锁上门，我已经累得半死，才能安安稳稳睡一

觉。”

“跟她一起？”

“只有一张床。”

“藏了多少日子？”

“两个星期，十五天……二十天，记不清了。埃尔维拉给我买来了吃的，烟，甚至衣服。可是，我必须逃出城去……”

“现在该讲讲你杀死的那个人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犹豫了片刻。

“不知道到底杀了没有……”

“你已经说过你杀了。快讲呀！”

“也许是个梦，是个恶梦。”

弗朗西丝笑出了声：

“那么就讲讲这个恶梦吧。”

“一天夜里，我躺在妓女的床上，觉得难受，发烧，像发疟疾似地浑身哆嗦，但什么也没有对埃尔维拉说。她还伏在窗台上招引嫖客。我听见路上传来脚步声，一群男人停下来和她讨价还价，接着又朝前走去。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返回来。埃尔维拉给我打了个手势。我好不容易才爬上夹顶，躺在一根横梁上……我全身疼痛，头脑发昏，不停地打冷战，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产生幻觉的……也许是睡着了，作起梦来……嫖客进来了。从声音判断是个中年人。他脱下衣服，也让埃尔维拉脱得一丝不挂。我听见床咯吱咯吱地响起来。那男人开始说话，要埃尔维拉求他一件事……”

“求他什么？”

“‘给我种个儿子。’埃尔维拉回答说：‘别胡说，快点！’”

可是，那男人又死皮赖脸地说：‘要是你肯说想让我给你种个儿子，我再出两个卢纳。’她回答：‘为什么呢？谁的儿子我也不想要。’男人又说：‘只是说着玩玩，让我开开心。我再出五个卢纳！你说呀！给我种个儿子，给我种个儿子。’埃尔维拉别别扭扭地说了一遍。我突然火上心头，对那个人，不，对那个声音感到恶心。再说一遍：‘给我种个儿子！再说一遍……’埃尔维拉一边说着，一边笑着。那男人像个性畜似地打起鼾来。”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扯过床单一角，擦了擦额头上泌出的汗水。

“当时发生的事情记不清了，一切都混乱不堪……似乎我从夹顶上跳下来，落到趴在埃尔维拉上边的那个男人身上，把刀捅进他的后背……他喊了一声，埃尔维拉也喊了起来。我看到闯了大祸，只有逃走……冲出门去，来到人行道上，钻进了头一个胡同，逃出来了……”

“你认为真是一场恶梦吗？”

“不清楚，不清楚。天亮的时候，我到了郊区。出了一身大汗，烧退了，额头上凉嗖嗖的。口袋里还有几个钱，乘上了开往索莱达德马尔的火车。车还没有到站我就跳下来，藏进树林里，等待晚上再到镇上去，因为那里人们都认识我。夜里，我找到卡塔里诺神父家里，他是我的朋友。”

“你把杀人的事告诉神父了吗？”

“告诉了。是他对我说，那一切可能是昏迷中的幻觉……”

“为什么？”

“因为我的衣服上没有一点血迹，并且也不记得随身带着刀子。”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站起来，走进浴室，拿起一条毛巾擦了擦胳膊上和背上的汗，又往腋窝里抹了点除味香水，回到床上。

“在教堂的钟楼上藏了两天。卡塔里诺神父给我送去了塞罗埃莫索近三天的报纸，没有一张有报道妓女区犯罪的消息……一天晚上，我溜出索莱达德马尔镇，上了山，加入了胡韦蒂诺·卡雷拉的游击队……”

美国女人笑了：

“就算这一切都是梦……或是幻觉吧，那么用刀子捅那个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奇怪，当时的感觉跟头一次跟女人做爱时的欢快有点相像，只是更快，更猛……”

突然，弗朗西丝扑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身上，贪婪地吻他的嘴唇，舌头像个爬虫似地伸进他的嘴里。两个人气喘吁吁，性欲大发，在床上滚来滚去，活像在进行一场肉搏。

这时候，潘乔·比万科正在大使馆前马萨诸塞大街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天气闷热，空气凝滞了。潮热的气味从石头上、柏油马路上缓缓上升。罗萨莉娅的丈夫感到汗衫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身上，很不舒服。他不停地走动，不停地用手绢擦脸，眼睛却一直盯着大使的住处，特别注意第二层上两个窗户的灯光……就在那间卧室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正和他的美国情妇在一起，而可怜的罗萨莉娅却在家里受着煎熬，两眼哭得又红又肿，守在电话机旁边等待，电话铃一

直不响……

比万科停下来，靠在一棵树干上，呼吸急促，因为他看到大使馆的警卫夜间巡逻，正穿过花园。

他捉摸着此时此刻大使馆卧室里的场面，想到美国女人和大使赤条条的样子，内心产生一阵奇异的快感。一瞬间，他附在了大使的肉体上，正在占有美国女人，同时又阴差阳错，他反而成了那个女人，被彪形大汉紧紧搂住。这时候，他朝大使的脖子上戳了一刀，就像杀猪一样，大使顿时血流如注（“帕拉莫猪血灌肠！来吃帕拉莫猪血灌肠喽！两个卢纳一根！帕拉莫猪血灌肠！”）。猪躺在床上，哼哼着，流尽了血，浑身惨白。他，弗朗西斯科·比万科，对他说：“这就是你祸害我们的报应！”

又擦了擦脸（手绢已经湿透了），嗓子里火辣辣的。最好还是用枪，五颗子弹打进那妖魔的躯壳。然后，他要被捕，押解回萨克拉门托受审，肯定判三十年徒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是总统的知心朋友，哪位法官也没有胆量宣判凶手无罪。要在肮脏的牢房里度过整整三十年。也许他们会设法毒死他，用高级的刑具处死他。不能。唯一的出路是自杀。那将永远失去罗萨莉娅。往自己头上开一枪？未免太残酷。可以从立体交叉桥上往下跳……（他听到了自己头颅撞在水泥路面的响声）。他非常爱惜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服用大剂量的巴比土酸，从睡觉的大门进入死神的世界……

比万科慢腾腾地朝北走，他的汽车停在威斯康星大街。口渴了，一家小吃店还开着，他走进去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要了一杯柠檬汁，一下子喝下去，又要了一份冰砖。

“浇汁吗？”女店员问。

医生禁止他吃发胖的食品，可是比万科非常爱吃糖汁，体重至少应该减少八到十公斤。可是，既然即将自杀，这还有什么关系？

“浇汁！”他斩钉截铁地说。

女店员用塑料瓶把烫烫的巧克力汁挤到冰砖上。潘乔像个贪婪的孩子似地吃起来。

豪尔赫·莫利纳穿着他的修道士服装，直挺挺地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头下边枕着个很低的枕头。灯都关了，屋里气温有如春天，唯一的响动是空气调节器的嗡嗡声。

“今天晚上工作极有成果。”公使衔参赞闭着眼睛想，“一个伟大的夜晚！经过无数次的怀疑和与自己争论之后，总算最后确定了撰写萨克拉门托大主教传记的指导思想。忠实于原来的方案，把潘菲洛写成历史上的英雄。卡塔里诺神父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区长，也许在书中一笔也不提他。说到底，教会能在历史的风云中奇迹般地生存应当归功于它的王子们——大主教、红衣主教、主教。这些人不仅懂得神学，而且熟谙政治手腕、具有历史意识和常人意识；这些人善于在教皇荫护下，或者更确切地说照教皇的伟大形象思考和行动。如果教会交由索莱达德马尔教区长那样多情善感、蒙昧无知、头脑简单的神父领导（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在政治上头脑简单是致命的罪孽！），那么天主教将滑向左倾，势必落入贪得无厌的共产妖龙口中……

莫利纳完全按照瑜珈功的姿势躺着，使身体处于最松弛状态，对精神来说完全消失。现在，他竭力从头脑中搜寻所写传记第一章里的人物和场景。决心不严格以年份为序，小

心翼翼地加进一些小说的技巧。这样写……1915年5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十点钟（描绘塞罗埃莫索、它殖民时代风格的屋顶、教堂的塔楼等等，等等……不要忘记写湖泊、高原上清新的空气）。响起欢乐的钟声，望弥撒的时间到了，国徽广场上大教堂密密麻麻挤满了人（描绘带有花叶形装饰的教堂正面，简略地讲一讲教堂的历史）。人们感到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也许应当插入一段两位绅士在教堂门口的对话。一个说：“怎么，你不知道？年轻的神父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今天头一次布道。”另一个吃了一惊：“是拉米罗先生的儿子？”不！不能这样写！最好不落入用滥了的窠臼。作者应当用自己的话点出即将发生的事）。

莫利纳不仅“看”到了当时的场面，而且听到了教堂里的声音，闻到了教堂里的气味。巴罗克风格的祭坛金光闪闪。枝形烛台上燃起蜡烛。教堂里柱子之间排列着雕像。神龛里是古老的画像，其中几张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香烟缭绕，气味浓烈。钟声“钻进”教堂（奇怪，这些词在我们头脑里紧紧相连，扯不开，砍不断）。弥撒开始了。众人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年轻的神父潘菲洛登上讲道台。教堂里一阵嗡嗡的耳语。有人咳嗽一声。哪个凳子挪动一下，又有人咳嗽一声，随后全场沉寂下来。潘菲洛神父身穿金线镶边的法服（拉斐拉·查莫罗太太的礼品），神采飞扬地扫视了众信徒一眼，举起胳膊。他低沉而且富有男性气质的声音充满了教堂（见头一次布道的全文，他的大作《训诫与牧师》第一卷）。写一写信徒门的反应，从潘菲洛的角度描绘几个人的表情，分析年轻神父发表那篇抨击战争与暴力、谴责胡安·巴尔萨及其匪徒的著名布道词时的感觉。

第二章呢？作者巧妙地笔锋一转，追思往昔，把读者带到阿朗戈家族的宅院（1890），听见一声婴儿落地的啼哭……

可是，公使衔参赞头脑中拉米罗·阿朗戈老先生的宅邸成了他本人的家。确实听见了婴儿落地的哭声，同时也听见了一个男人的抽泣。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

豪尔赫·莫利纳全神贯注地想起一件他一直不愿想的事：母亲生他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30

六月下半月，热浪持续了近两星期，华盛顿成了个熊熊燃烧的火炉。这蒸人的暑气潮湿、粘黏、无情，下午四点左右达到最高温度，直到深夜还不见减退，第二天又周而复始。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带着弗朗西丝·安德森逃到弗吉尼亚海滩上去了。

罗萨莉娅·比万科瘦了，整整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翻翻杂志，一会儿肉欲发作，一会儿嚎啕大哭。丈夫从大使馆回来以后， she 就把卧室的门反锁上，拒绝见他。潘乔心乱如麻，只得在客厅踱来踱去。偶尔晚上出去走走，独自一人在这家或那家饭馆吃顿晚饭，然后沿波托马克河蹒跚，想着跳进河里淹死。回到家里，妻子又把他拒之门外。他面对卧室的门抽抽泣泣地哭上几分钟，然后开始摆弄不久前买来的手枪，于是再次想象起暗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场面来。不过，有的夜里欲火难忍，他就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以手淫自娱，心里想着赤身裸体依在大使怀里的罗

萨莉娅。

莫利纳却感觉不到暑气蒸人。他依然日复一日地过着独身生活，并且现在特别高兴，因为已经完成了潘菲洛传记的前三章，自认为写得令人满意。

星期天，他都到乔治敦的圣托马斯教堂做弥撒。他跪在祭坛前祈祷，尽量使五官都深入到弥撒的奥秘之中。要是能找个神父，向他忏悔，洗涤自己的头脑和良心，然后享受吃圣餐的权利该有多好！既然上帝在心目中以感情的形式存在，为什么不肯在头脑中以思想的形式出现呢？

乌加特将军也逃到一处海滩，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说西班牙语的聊天和打扑克的伙伴。尼珐身穿乌德瓦德·洛特罗帕公司削价处理的游泳衣，满身脂肪更加显眼。她遥望大海，想起阿尔多·博雷里，不住地叹声叹气，同时又设法勾引年轻体壮的职业救生员们，可惜毫无收获。

蒂蒂托呢？这位蒂蒂托仍然留在华盛顿，像个小松鼠似地蹦蹦跳跳，乐乐哈哈。他对女友克莱尔·奥吉薇说，准备在他的房间（完全布置成玫瑰色和黑色）举办一次聚会，这次活动必将载入华盛顿的史册。“只请男人。”他眯起眼睛，诡秘地笑着解释说，“知道谁将是这次聚会的贵客吗？你猜猜看。”奥吉薇小姐摇摇头：猜不出来。蒂蒂托神气活现地抖出了包袱：“维克·特洛伊！”她知道，维克·特洛伊是当前蜚声影坛、尽人皆知的男演员，身高两米，膀阔腰粗，一头金发，样子却长得有点女里女气。女人们对他如痴

如狂，每当遇到他，都歇斯底里地扑上去，撕他的衣服，用剪子铰他的领带甚至一绺头发，当作文物保存起来，因为他是她们的偶像，是人类的奇观。不久前在纽约的一次私人宴会上，维克·特洛伊接受了蒂蒂托的邀请，将于十月初来华盛顿参加“比拉巴先生”举办的聚会。这不是表示对方有情有意吗？奥吉薇耸了耸肩膀，心里感到厌烦。他到科罗拉多州度假顺便参加阿斯本音乐节的计划告吹了。梅塞迪塔和其他女打字员们也都离开了华盛顿，到山上憩夏去了。现在，大使馆寂静得像墓地一样……像撒哈拉大沙漠中间的墓地一样。“啊，蒂蒂托！我多么羡慕你的热情！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举办聚会！”但是，二等秘书并不泄气：“举办的是化妆舞会，男扮女装的舞会，懂吗？”懂，她当然懂！

奥尔兰多·贡萨加已经离开华盛顿回巴西度假。他对巴勃罗说，逃出“波托马克河畔的地狱”，去享受里约热内卢不冷不热的“冬天”，是再好不过的了。

戈德金的生活仍然如故，偶尔和巴勃罗谈谈，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饭。小伙子似乎有什么心事。

一天晚上，老记者一下子说到了他的痛处：

“和格伦达的事不顺利，嗯？”

“说实话，比尔，和这姑娘呆的时间越长，越发不理解她。有时候她好像对我非常钟情，什么都肯答应，突然间变得似乎对我怀有仇恨。”

“你不怕……”老记者犹豫了一下，“请原谅我干涉你的私事，你不怕跟一个……啊……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交往会给生活招来麻烦吗？”

“怕，有点害怕。不过，我还要跟她交往，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有交往了。我几乎被这姑娘的长相迷住，不能自拔了。”

“你认为她……嗯，我是说，她曾有过什么风流事吗？”

“要是有过的话，也是悲惨的经历，它留下的创伤至今未愈。”

“我国南方的女人较为复杂，我是说，比西部和中西部的女人更为复杂。我想这是因为那里有黑人的缘故……”

巴勃罗为之一震，打断了朋友的话：

“你不觉得格伦达的问题与她仇恨黑人关系密切吗？有一天，我和她谈起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消息说，亚拉巴马州一个参议员要求烧毁一本儿童读物，只因为这本书上有一只白色雄兔和一只黑色雌兔结婚的故事。我当然说这种要求荒唐可笑，但格伦达愤怒地朝我看了一眼，大声喊：‘你也是个黑情夫！’”

戈德金慢慢点了点头。

“还有一次”，奥尔特加接着说，“我们俩手挽手在凯尼乌兹公园散步，望着地上的王莲、风信子和水面的荷花。突然，我把格伦达搂在怀里，吻了吻她的嘴。本想她会拼命反抗，打我一记耳光，骂我一通……可是，没有。姑娘接受了我的亲吻，并且非常乐意。你明白吗？我的血液沸腾起来，欲火烧遍全身……我曾对你说过，比尔，绿色配上蓝天，再加上青草、植物、水果、大自然的气味，能刺激我的性欲……格伦达‘具体地’感到我的欲望之后却把我推开了。有时候我想，大概她害怕我皮肤的颜色，认为我有黑人血

统。”

“胡说。你脸上清清楚楚地刻着‘西班牙人’！”

炎热一连持续了好几天。据报纸报道，已经造成十几人死亡。

一天下午，巴勃罗·奥尔特加手握方向盘，汗衫被汗水湿透，眼睛发花，头痛得快要爆裂了。他正在等待交通警察的信号，突然间看见警察中暑倒下了。他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也要失去知觉，于是合衣躺到床上，做了一连串糊里糊涂的梦，直到第二天醒来，才觉得头和胸部轻快了一些。他发现，夜里下了一场暴雨，现在空气清新明净，华盛顿和整个世界似乎逃脱了一场劫难。

为了庆贺与夏季和好，巴勃罗作了一首俳句送给广田喜美子：

夏 天

牛虻色透绿，
熟透的水果掉在地，
生活甜如蜜！

然而，格伦达不肯给他蜂蜜，非给他苦胆不可。有时候，似乎姑娘胃里的酸水传染到他的思想和言谈之中。每逢跟这位佐治亚州姑娘在一起，巴勃罗的偏头痛就更加厉害。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常常走进食品店——她服一片酵母，他吞下一两片阿斯匹林。有一回，奥尔特加自我解嘲地说：

“有时候我想，如果你的胃疼和我的头疼杂交，会生出什么东西来？”使他吃惊并且感到甜蜜的事情发生了：格伦达笑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他们开车经康涅狄格大街去一家中国餐馆，事先已经约好在那里吃晚饭。巴勃罗把车停在了他所住的大楼前面和人行道上，然后猛地搂住格伦达，又贪婪地吻起姑娘的嘴来，同时也感到姑娘以同样的欲火接受他的亲吻。于是他壮壮胆子说：“上楼到我房间去好吗？”她垂下眼睛，点了点头。一开始，巴勃罗简直不肯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但格伦达毫不犹豫地跳下汽车，径直朝楼门口走去。电梯上，两个人都沉默不语，甚至看也没有互相看一眼。姑娘用颤抖的手点上一支烟，他感到按捺不住的欲火烧得太阳穴“咚咚”响个不同。

两个人走进房间。

“不要拘束。”巴勃罗把门锁上，自己反而手足无措了。为了找点事做，他慌里慌张地让格伦达看他的书籍、绘画、唱片和纳塔利西奥师傅的泥人……你喜欢维伐尔地的作品吗？我有一套他的高保真立体声唱片，可以听一听……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变得比往常低沉了。但愿格伦达继续背对着他，因为他的性欲已经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恐怕脸也变了形。

突然，格伦达转身大声说：

“巴勃罗，我们不要再佯装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了！”

巴勃罗二话不说，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吻她的嘴唇，随后把她抱进卧室，放到床上。屋里半明不暗，她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巴勃罗坐在她身边，一再轻轻吻她的

眼皮、脸蛋，而后又长时间用力吻她的嘴唇。格伦达举起一直挨躯干直放着的胳膊，用两只手抱住巴勃罗的头。

“我再也受不了啦！”她呻吟着说，“必须摆脱这个疑问……不然非发疯不可……”

“安静，亲爱的！安静些……”他低声安慰说。

“不要把我当成个孩子，我是个女人……”

她睁开眼睛。现在，眼睛里蒙着一层充满情欲的光亮的雾霭。巴勃罗开始给她脱衣服。先扒下鞋子，然后脱下袜子，正要解汗衫的钮扣，格伦达一把推开他：“你出去几分钟，我自己脱。”

他遵命走出卧室，进来的时候看到她已脱得精光，蜷缩在被单下面。他也脱下衣服，紧挨着那灼热的、微微颤抖的身体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切都虚幻缥缈。卧室里更加阴暗，空气调节器还在嗡嗡地响，床上柜上方是伊莎贝尔太太的肖像（“我的儿子竟然和佃农的女儿在甘蔗田里干不要脸的勾当！想要父亲的命吗？”）。格伦达缩成一团，两只手捂着阴部。巴勃罗也蜷起身子，把姑娘拉到怀里，吻她的后脑勺、耳轮、抚摸她的乳房，随后又想让她把身体伸直。但格伦达仍然保持原来的姿势。

“伸开……”他低声乞求。

她呻吟了一声：

“别着急，巴勃罗。我害怕。”

他继续吻着姑娘——肩膀、胳膊、背——同时两只手沿着肚子往下滑，手指在寻找她紧紧捂着的阴部。

外边传来马路上的汽车响，间或能听见附近公共汽车站上汽动门开关的声音。

格伦达猛地转过身，搂住巴勃罗，看样子不是听任男人行事的情妇，倒像个请求保护的小姑娘。她嗓音也变了，大声说：

“必须让你理解！我小时候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巴勃罗抚摸着她的头发：

“好，格伦达，无论如何我会理解的。说吧，告诉你的朋友……”

他胸脯上感到女友那颗孤独而又可怜的心脏在突突地跳动。格伦达张开嘴要说什么，但一时间上颌仿佛麻痹了，双唇颤抖得厉害，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突然，她恢复了发音能力，大声喊：

“我被黑人强奸过！”

格伦达这句话说出来以前十分之一秒，巴勃罗已经猜到了（或者是幻觉？）。他继续抚摸着姑娘的头发，小声说：

“讲吧，把一切都讲出来……”她把灼热的脸偎依在巴勃罗胸前：

“当时我大概十三岁……”

刚说半句却又戛然而止。巴勃罗觉得应该随便说句鼓励的话：

“在你出生的城市吗？”

“对，在塞达城。我父母家里有个男佣人，黑人小伙子……他身上气味难闻，头脑肮脏。一双狡诈的眼睛经常打量我，盯着我，看脏我的身体……”

“是的，格伦达……后来呢？”

“有一天，我正在后院的粮仓里玩……他突然出现了，

朝我走过来，嘴里说着淫荡的话，还做着不堪入目的手势……我想喊，又喊不出来；想跑，两条腿不听使唤。那黑人把我按倒，撩开了我的裙子……把我……把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吓得昏迷过去……”

巴勃罗搂着滚烫的姑娘，吻着她的头发。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父亲发现我躺在地上……我把受欺侮的事告诉了他……在此以前，我也曾听说过别的姑娘遇到过类似的事……我父亲气疯了，咬牙切齿，叫来了一帮亲戚、邻居、朋友，在全城搜捕那个黑人……”

格伦达突然从巴勃罗怀里挣脱出来，猛地翻个身，趴在床上，脸伏在枕头上。

“想起来让人害怕。”她声音低沉，“他们在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屋里找到了那个黑人，把他阉割了，打断了他的胳膊、腿……用棍棒抽、用脚踢他的脸，打得他面目全非……”

她停住口，抽咽起来，身体随着哭泣而上下颤动。

巴勃罗突然感到一阵难以言状的拘谨，似乎格伦达这番肺腑之言使她的肉体变得难以接近。

“这事是多久以前发生的？”

“十五年了……”

“格伦达，亲爱的，设法忘掉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一切吧。你应当这样想：我没有过错。你不能背着可怕的往事的包袱度过一生，必须扔掉它……”

经他好说歹说，格伦达总算转过身，仰卧在床上，露出了脸，但仍然闭着眼睛，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

“抽支烟吗？”

“不。”

“睁开眼睛，面对生活，向前看。那件事上你绝过没有任何过错。”

格伦达拉过被单的一角把脸盖住，但巴勃罗马上扯开了。

“巴勃罗，请你理解……”

“我完全理解，不想理解的反倒是你。你的身体还年轻，不应该继续拒绝满足它合情合理的欲望。格伦达，不要为你的肉体而羞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以为此时此刻你刚刚出生吧！你简直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喜欢你！”

说完，他拉住被单一角，猛地扯开，扔到地板上，格伦达仍然一动不动，两个乳房挺立在胸脯上，腹部平缓，腰肢纤细，两条大腿又长又圆……巴勃罗性欲又潮涌而来，可他得强忍着，否则他就会像个畜牲似地扑到这女人身上去的。

这时候，巴勃罗开始抚摸她，刺激她的性欲。等姑娘准备接受他的时候，他才趴到她的身上。格伦达挣扎了几秒钟之后，终于闭着眼睛，咬着嘴唇顺从了。可是，姑娘忽然发出一声呼叫：“不！”，并且使劲推他，揉他，但是他似乎要发泄心中的火气，非要穿透对方不可。姑娘还在呻吟着：

“不！不！不！”要把指甲抠进了巴勃罗的脊背。就在巴勃罗要达到高潮的瞬间，她挣脱出来，跳到地上，裹上被单，躲到卧室一角，像个受惊的小孩子一样哆里哆嗦地蜷缩成一团。巴勃罗趴在床上，全身痉挛，呼吸急促，被女人的粗鲁举动气得不知如何是好，黏乎乎的东西流到了床单上，同时又觉得这一切荒唐可笑。过了一会儿，他昏头昏脑地坐起来，却惊奇地发现床单上分明有一片血迹。

“格伦达，你原来是处女！”

对方没有说话，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我真不明白。”他嘟嘟囔囔地说，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怀疑。

他下了床，觉得这样赤裸裸的未免可笑，就披上丢在床脚下的睡袍。脊背上火辣辣地疼，像是被火烧伤了一样。

“可是，你说……”

不等巴勃罗说下去，格伦达就一声不响地拿起衣服，钻进浴室，把门反锁上了。巴勃罗坐到椅子上，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哆嗦着点上一支烟，一边吸一边左思右想，企图理出个头绪，又惟恐发现他最担心的事情……莫非他所想象的果真可能吗？

浴室里传来淋浴喷头的流水声。巴勃罗站起身，来到窗前，朝外眺望。城里的路灯已经亮了，西方地平线上还残留着一片模糊的红色烟云。

几分钟以后，格伦达从浴室出来了。巴勃罗跟着她走进客厅：

“在离开这里之前，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这些男人统统都是一路货色，总是希望从女人身上获得同样的东西，一群肮脏的猪猡！”

“格伦达，你所说的肮脏可能只存在于你的头脑之中。”

“什么？”

“仅仅是你的想象。你从来不曾遭到强奸。”

现在，格伦达脸上带着一种既恐怖又惊愕的表情。她坐到沙发上，茫然地望着巴勃罗。

“格伦达，说呀。把实情讲出来嘛。”

她用双手捂住脸：

“巴勃罗，求求你，不要折磨我了。”

“我只想帮助你从恶梦中解脱出来。你一直在幻觉中生活，被谎言所左右！”

“可是，他是个肮脏的黑人，一直偷偷瞧我，把我的内衣偷到他的屋子里……他是头畜牲。他身上的臭味日日夜夜跟随着我，日日夜夜……”

巴勃罗走到她身边，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强迫她正面看着自己：

“但是，他没有‘碰’你的身体……说实话！”

“他是个肮脏的黑人，想的事和做的事都肮脏……弄得院子里臭气熏天。”

“可是，他没有碰过你一下！”

“巴勃罗，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了！”

“说实话吧，这一切都是你的幻觉。”

“不知道，我不知道。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不知道！”

“你是‘不想’知道。但是，必须正视事实。说实话吧，那小伙子根本没碰你的身子。”

“我怎么会知道呢？那时候，我才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为什么你不阻止父亲和其他人追捕那小伙子呢？”

“我不知道他们会杀死黑人！”

巴勃罗终于忍不住了。

“你知道，知道！”他大声吼叫，“并且希望他们杀死

他！”

姑娘躺倒在沙发上，又哭起来。

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怎么办？怎么办呢？继续追问她、折磨她吗？打发她走还是让她安静下来？

巴勃罗坐到她旁边，又开始抚摸她的头发，尽量装出一副慈父般的样子。

“现在，你最好把一切都讲出来，摆脱良心上的重压。告诉我，这件事发生以后，你没有让医生检查吗？”

她踟蹰了几秒钟，然后垂下眼皮说：

“检查过。”

“医生说你不曾受到凌辱，对吧？”

她没有回答，只是抽咽得更厉害了。

“对不对？”

格伦达突然转过身，冲着他大声吼叫，脸都变了形，

“对！对！那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我父亲和参与这事的人都受到传讯，但后来都无罪释放了。但是，我们不得不离开塞达城。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的生活都完了。你满意了吧？满意了吧？”

“格伦达，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只不过想帮助你。”

“谁也帮助不了，连上帝也一样。”

“别说这种话，格伦达。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应当对你负责。”

“要是因为……因为发生了那种事你才向我提和你结婚的事，我会当面嘲笑你的。”

格伦达站起身，拿起手提包，像晕头转向一样东张西望。

巴勃罗再次失去了自制：

“你总算实现了小时候藏在心底的愿望：被一个深色皮肤的肮脏男人强奸。现在该我问你了：你心满意足了吧？”

“可是，谁能保证刚才在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幻觉呢？”

“格伦达，请你通情达理一些。让我来帮助你……”

她默不作声地望着巴勃罗，随后怒气冲天地说，仿佛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迸出来的：

“也许你已经给予我的帮助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你使我相信，实际上，对于那个黑人的被杀，我感到的悔恨并不像我想得那样严重……”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巴勃罗连个挽留的手势也没有打。

31

巴勃罗·奥尔特加不记得有生以来哪一周比跟格伦达·多列玛斯“闹翻”以后的七天过得更加烦恼。夜里，混乱不堪的恶梦连续不断，早晨起来头隐隐作痛。在大使馆里，他避免和同事们交谈，一连几分钟死死盯着电话机，既想又不愿意给格伦达打电话。如果打，说些什么呢？发生了那一切之后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永远不再相见，对两方面不是更好吗？

做工作，他集中不起精力。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在记事本上画各种图案：格伦达在美术馆那天的侧面像、通往海滩的弯弯曲曲的窄小街道（索来达德马尔镇）、纳塔利西奥师傅的脸、一位站在柏树下的弯腰驼背老人，然后又 是 格 伦 达：她的眼睛、嘴，尤其是嘴……

他经常往嘴里塞上一片阿斯匹林。偶尔也闭上眼睛，靠在转椅的椅背上，听着空气调节器的嗡嗡声，回忆起那个傍晚……必须找人倾吐……可找谁呢？有胆量向什么人讲出一切吗？贡萨加不在美国。即便此时见到他，也没有勇气向他

倾诉，因为心里明白，那位巴西朋友肯定会笑话他多虑（“啊，巴勃罗，你把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女人的全部奥秘不在于她们灵魂本身，而在于她们对男人的想象。”）。戈德金？奥尔特加钦佩并尊重老记者，但可以预测，他对这桩惊心动魄的事件做何反应。比尔会叼着烟斗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然后嘟囔几句亲切但不痛不痒的话。格里斯！对，格里斯！可以向当年的老师敞开胸怀，把他当作父亲……父亲？

一天上午，他请女接线员接通外线，拨了流亡者住所的电话，但没有人接。随后又打到他在大学的办公室，一个女人回答说，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此时大概在家，因为他下午才有课。

巴勃罗走出办公室，低着头在长长的楼道里散步，一边走一边沉思默想，等清醒过来，发现来到了克莱尔·奥吉薇的办公室。

“巴勃罗·奥尔特加·伊穆拉特！”

“大使在吗？”

“不在，和公使衔参赞到泛美联盟去了。还是尼加拉瓜问题……”

巴勃罗坐在女友桌子前面。奥吉薇递过一支烟，他摇了摇头。她说：

“你可以骗别人，但骗不了我。几天来，我一直在观察你。问题出在哪儿？”

“没有任何问题。”巴勃罗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希望她继续追问下去，强迫他吐出一切。

“格伦达·多列玛斯吗？”

他点了点头，随后就把事情统统倾倒出来，连最淫秽的

细节也没有省略。说完，他问道：“你认为我举止失当吗？”

奥吉薇把眉毛一扬，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巴勃罗。慢慢地，她那张马一样的长脸上表情变得柔和了：

“你的举止像个正常人，格伦达的反应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另外，对于黑人，这个国家的一半多白人和那个姑娘一样存有幻觉，有的与她相同，至少类似……不过，如果你甘愿作上帝的羔羊，把世上一切罪孽都放到自己肩上……嗯，那么不要指望我为你唱赞歌。”

“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吧！”

“可是，我认为对格伦达有责任……”

“如果仅仅因为处女膜这个解剖学上的细节，那你就放心吧，小伙子。在这个国家，人们对这东西不像拉丁语国家看得那么严重。如果你希望我说得更坦率一些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理智清楚、那个‘部件’正常的女人能拒绝你的求欢。巴勃罗，可惜我对你钟情是不可能……”

她发出一阵笑声。巴勃罗心神不宁地颤动双腿。

“别再跳你那圣维多舞了！”

巴勃罗遵从了，嘟嘟囔囔地说：

“我想知道格伦达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因为担心她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等一等。”奥吉薇塔抓起电话话筒，告诉女接线员电话号码，等了一会儿，偶尔向巴勃罗挤挤眼，好像在搞什么恶作剧。

“喂！泛美联盟吗？我找格伦达·多列玛斯说话……”停顿了一会儿。“对。”又停顿了一会儿，这次比上次更

长。“什么时候？……啊！谢谢！”

克莱尔放下话筒，望着巴勃罗：

“多列玛斯小姐已于一个星期前辞职，三天前回到亚特兰大她父母家里去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

“真想听听我的意见吗？去度假。带上几本书……不要正经书，什么侦探小说啦，科学幻想作品啦……到山上或海边走走。步行，绘绘画，写写诗，忘记那个姑娘。”

巴勃罗·奥尔特加没有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两周的假期。大使态度非常亲切：“当然可以，伙计！随便多少时间都行！两周，三周也行……去休息休息吧！”

他整理好行装，箱子里塞上几本书、颜料、画笔、画布，以及几本炭画和铅笔画草稿，然后开着巨鸟牌汽车上了路，漫无目的地朝前奔驰，最后在弗吉尼亚州的斯凯莱恩一家汽车旅馆住下来。从旅馆可以清楚地望见琛南斗谷地。那里游客很多，巴勃罗不想前往。他心里别别扭扭，发现自从格伦达称他为黑人之后，跟美国人在一起就不大自在，特别是身边有南方人的时候——从口音上很容易判他们来自南方。岂有此理？他认识不少不是黑人的美国人，他们的皮肤比他深得多！让那些红得像大虾、白得像鱼肚皮一样的美国佬见鬼去吧！

在小小的汽车旅馆里，他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房间的窗户对着谷地。上午，他长时间地散步，午饭之前顶着太阳在游泳池里消磨时光。下午看书或者睡觉。太阳西斜的时候，爬到小山顶上观赏落日。

有一天，他决定画画，支起画架，调好颜色。打算画下从眼前延伸出去的谷地。谷地里绿色、蓝色、褐色、红色交相辉映，简直是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随着阳光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丰姿。

一开始，他动作拘谨，仿佛有人拉着他的手，阻止画笔接近画布。他想起了最初的几幅画——胶板画和水粉画——是暑假期间在索莱达德马尔镇他家的庄园附近完成的，主题大都是家乡和它的人民：山坡上粉刷过的房屋，窄小而弯曲的街道。在那里，曾多次看到神像游行或送葬的队伍经过。那几幅画以新奇和装饰性见长——粉刷过的墙壁、蓝蓝的天空、紫褐色的树影、穿黑裙子的女人、穿白衣服的男人，衣衫褴褛的赤脚儿童，间或有一朵鲜红、绛紫或黄色的花儿，地毯或者头巾的图案……后来，在巴黎“避难”期间，忘掉了索莱达德马尔，忘掉了它地平线上的卡拉维拉山，人物形象也就随之从他的画稿上渐渐消失了（是啊，也从他作的诗句中消失了，诗和画内容相同）。从此，他进入抽象主义阶段，开始仅仅玩弄色调。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他的作品有如迷宫，诗歌也只讲究声韵，不厌其烦地重复迷茫、空虚，像一条条千曲百弯的语言走廊，即便在遥远的尽头也望不到人生的自由天地……

画什么呢？巴勃罗面对着白色的画布自问。翻开最后一次回索莱达德马尔时作的画稿，找到了几个头像——卡塔里诺神父、纳塔利西奥师傅和他的孩子们……还有许多儿童。直到现在巴勃罗才发现，他们个个面黄肌瘦、表情凄凉。当初，他曾把这些人物作为素材收入象征主义阶段所作的画里（“孩子们踢球”、“儿童与花儿”、“瞎眼的山羊”）。

他拿起炭笔，着手打底稿。前面画了一张孩子的脸，背景是穷苦人组成的一支送葬队伍，抬着一个粗糙的小棺材穿过一条街道。现在，巴勃罗开始着色，但毫无计划，随手画来，半小时后再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画孩子的眼睛的时候，他想起了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在索莱达德马尔街上看到的那些患沙眼的孩子们。当时，他厌恶多于同情，常常转过脸去，闭上眼睛不去看那痛苦得令人心烦的场面。转过脸去，闭上眼睛，这难道不正是他对待故乡一切悲惨场面的态度吗？现在，七年之后，画头一个人像的时候，从笔端出来的竟然是一张柠檬色的孩子的脸，脸皮肿胀，带着小小的脓包和覆盆子色的紫瘢。现在，那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他再也没有兴趣钻进文学和美学的迷宫，却沉醉于那双被眼屎模糊了的眼珠之中了（他和皮娅在伊甸园的树林里吃水果，绿色的牛虻在两个赤条条的身体四周飞舞）。巴勃罗一阵烦躁，近乎疯狂地画起背景上的人物来——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都用溃疡的眼睛对画画的人怒目而视。

一个在汽车旅馆憩夏的女人看到巴勃罗站在画架前，好奇地走过来，以为他在画琛南斗谷地平静的风光。但是，看见画布上那张孩子的脸，她恶心得作了个鬼脸，发出一声厌恶的惊叫，转身离开了……

当天夜里，巴勃罗梦见自己糊里糊涂地走在狭窄、弯曲的街道上。也是夜间，他忽儿觉得像索莱达德马尔镇，忽儿认出是塞罗埃莫索的墓地。怀里抱着个病孩子，热得烫手。这孩子一会儿是他自己，一会儿又是画上那个小男孩。他跌跌撞撞，走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仓惶四望，没有一丝

光亮，没有一个人影。他用疼痛的头撞门，门开了，外边的人都没有脸。问他们医生在哪里，说必须找“他”为孩子看病。他们有的耸耸肩膀，有的摇头不语，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抢救重病的孩子……

从睡梦中醒来，天色还早。头痛得厉害，眼皮沉重。眼前模糊一片，站在镜子跟前也看不清自己的面容。余睡未醒，昏昏沉沉，他觉得自己双目失明了，一时间惊惶失措，直到用凉水冲了冲眼皮，点了几滴洗眼剂，眨了眨眼睛，发现视力正常，方才放下心来。

现在，他尽量从记忆中“钓”出昨夜梦中的细节——一些朦朦胧胧而且来往不定的鱼。只记得门打开以后他心中呼喊的名字是“西尼辛托”^①医生。为什么？当然，西尼门托博士就是格里斯教授。发现了这一点，他笑了。

早餐桌上，他把网下到记忆的更深处，“捕到”了一条珍贵的鱼：二十年前死去的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老医生马丁内斯博士。巴勃罗小时候每逢不舒服就请他来诊断。老人坐在床边，让他张大嘴喊“啊——”，然后诊脉，把体温表放到他腋下。看完病就给他讲故事。当时，巴勃罗最喜欢听爱干家务的灰色母猫的故事。他觉得，马丁内斯博士有魔术家的才能。只要有老医生在屋里，他总是感到病好了一些，就像成年之后的巴勃罗有莱昂纳多·格里斯在身边一样。难道格里斯不正是在考虑一副良药来拯救整个萨克拉门托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吗？也许如此解释这场梦并不正确，但是他确实“愿意”承认这种解释无误。

^① 西尼辛托：西班牙文意为“灰色的”。

那天上午，巴勃罗看也没有看一眼头一天画的图画。他走出汽车旅馆，手里拿着广田美喜子送给他的一本书：《幽静的中国花园——禅宗和尚的思考》。爬上山坡，坐在一棵树下，望了望谷地的景色，然后随便打开书：“风吹过竹林，竹林留不下风声；野鹤飞过湖泊，冰冷的湖水留不下野鹤的影子。同样，上等人的头脑只有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才开始活动，事情结束之后就变成虚空。”巴勃罗抬眼远望，想起了格伦达，随后又低下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真经（他心里‘听见’了喜美子用纤细的声音读着这段话）。真经写在用绳子穿起来的竹筒上。每个人心里还有一部大自然交响乐，但被淫荡的歌舞所淹没。人应当抛弃外在的一切，从内心中寻找幸福。”

巴勃罗再也看不下去了，把书合上。人怎能完全超然于所谓外部世界的灾难与不公正之上，像个禅宗和尚似地盘腿端坐，潜入自己奥妙的内心湖泊呢？如果他——巴勃罗——合上眼睛，潜入自己的内心之井……会看到什么呢？是智慧的珍珠、心中的真蒂还是索莱达德马尔孩子们脓腫的眼睛呢？

谷地灿烂的阳光和宁静的气氛更增加了他的孤独感。他站起身，返回汽车旅馆。

正面门厅里，几个旅客围坐在收音机旁边，正收听十点钟的新闻节目。来到这里以后的几天里，巴勃罗既不曾读报，也不爱听播音员那装腔作势的男低音。他从看门人那里取出房间的钥匙，径直朝楼梯走去。这时，一个名字——莱昂纳多·格里斯——在空中迴荡，迫使他停住脚步，凝神静

听：“……萨克拉门托政治流亡者，几年以来在华盛顿阿美利加大学任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学教授，至今仍无音讯。格里斯教授写了不少文章，多次举行报告会，猛烈抨击那个加勒比共和国现政府腐化堕落。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五天以前，由他所住的公寓门房的女值班员看见的。警方得知以后立即开始调查，以期找到格里斯博士的下落。这位萨克拉门托前教育部长在交通事故中遇难的假设似乎已彻底排除。有人说格里斯博士自愿离开了美国，我们认为也不可信。有一家报纸问，这是否又是一起加林德斯事件？我们的听众大概还记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赫苏斯·加林德斯博士在发表一篇指责多米尼加政府的论文前夕神秘地失踪了。嗣后，美国警方发现的迹象表明，加林德斯博士被绑架到国外，可能已被特鲁希略豢养的特务杀害。萨克拉门托驻华盛顿大使写信给该报提出抗议，说这种暗示不仅是毫无根据的污蔑，而且荒唐可笑。”

巴勃罗懵了。发生这种事情，他早有所预感。他慢腾腾地爬着楼梯，嗓子发紧，嘴发干。已经毫无疑问，格里斯遭到了绑架，现在很可能被杀死了……他想起了跟踪格里斯的那个穿浅色雨衣的傢伙。这一切肯定是乌加特干的。畜牲！

估计这时能在办公室找到比尔·戈德金。他请女接线员要联合通讯社。几分钟之后，电话接通了，对方正是老记者。

“比尔？我是巴勃罗·奥尔特加。我刚才从收音机里听到格里斯博士失踪的消息。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还有希望吗？”

“巴勃罗，老伙计，依我看情况不妙。一开始，还有人

以为出了车祸……可是，假如真的如此，尸体总会找到吧。五天了，你该明白……”

“警察搜查了格里斯博士的房间吗？”

“当然。一切都井井有条，毫无暴力迹象。外衣放在衣柜里，内衣在抽屉中……看书用的眼镜仍然在我们朋友的写字台上。”

“大使馆怎么说？”

“声称对此一无所知。还说旅居华盛顿的萨克拉门托人登记册上查无此人。”

“你不认为可能与加林德斯案件相似吗？”

对方似乎犹豫了一下：

“嗯……我们联合通讯社的人也这样认为。”

“乌加特，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大概是幕后指使者……”

“最近两周将军不在华盛顿。”

“当然啦！为了避免怀疑嘛。他是个老滑头！”

“喂！巴勃罗，不要冲动，没有用处。好好休息，让联邦调查局去处理吧。”

“休息？我今天就返回华盛顿。”

“也好。不过，答应我一件事。不要仓促地做任何事，说任何话。要是真想帮助你的朋友的话，就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但是，必须揭露这帮杀人犯！”

“那是自然。不过，伙计，为了揭露他们，我们需要具体的证据。为了证明确是谋杀，首先必须拿出尸体……”

“这时候，格里斯的尸体大概早沉到海底了。”

“这是一种假设，但也还有别的可能。沉住气……你大概什么时候到这里？”

巴勃罗看了看手表：

“现在是十点半。我中午到华盛顿。”

“不要开快车，伙计！小心驾驶。啊，你还要答应我，去大使馆以前，先来找我谈谈。”

“好。”

那天下午，皮肤晒得黑红的乌戈·乌加特将军从海滩返回华盛顿。他刚进入大使馆，就发现气氛紧张。梅塞迪塔战兢兢地看了他一眼。莫利纳在楼道和他碰面找了个借口没有问候。只有比拉巴连蹦带跳地凑过来问：“这么说，你知道格里斯案件了？”

“正是为这件事才来的。大使紧急召我返回。要不是这桩倒霉案子，我本来可以休息到月底。华盛顿热得要死。”

乌加特走进奥吉薇小姐的办公室，她一时心慌意乱，竟然忘了跑过去欢迎。

“大使在等你，可以进去。”

胡韦蒂诺·卡雷拉的前警察头子走进大使办公室，随手把门关上。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正坐在办公桌前，见他进来，猛地站起身，冲过去，看样子像要扇他几个耳光。

“笨蛋！混帐！你以为你在哪里？在尼日利亚吗？在交趾支那吗？”

乌加特仍然保持着心平气和的神态。大使发火，早在预

料之中。

他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吐出一口烟雾，看了看大使，若无其事地说：

“现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劈头盖脑‘赞颂’了我一通……”

“你怎么处置格里斯博士的？”

“我？没有。”

“不要撒谎！你们绑架了教授，也许已经把他弄到国外杀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怒不可遏，脸上的伤疤胀得通红。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大使咬牙切齿，“不准使用暴力。格里斯博士是叛国者，但从根本上说是个非进攻性人物。为什么要对他下毒手呢？”

“我已经说过，我什么也没有干。这些日子一直躺在海滩上，肚皮朝天。”

“我不相信。”

将军耸了耸肩膀。大使紧攥双拳，恨不得揍他一顿。

“加林德斯博士现在在哪儿？”他问。

“谁？”

“我是说，格里斯博士在哪儿？”

乌加特站起来，扯了扯夹在屁股沟里的裤子，嘴角上叼着香烟，小声说：

“这‘活儿’不是我们干的。”

“谁干的？”

“你不记得国防部的密令吗？嗯，我回答他们说，这行动相当危险，可能连累大使馆，最好由其他人执行，既不要

告诉我们由谁来干，也不要告诉我们怎么干。我和这事不沾边。”

“可是，为什么不通知我？”

“因为你亲口对我说过，无论如何不想了解这件事。”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踱到窗前，望着英国大使馆那牢牢耸立、一声不响的大烟囱，随后转过身来，和武官面面对。

“他们怎样处置格里斯？”

“我一无所知。”

“是我们的人干的……我是说，是我们的同胞干的……你……你懂得我说的意思。”

乌加特用牙咬着烟头，眼睛紧闭，样子像是在思索。

“我怀疑他们雇了几个美国佬——这方面的行家。我说不清楚，也不想了解。别人干了坏事，罪责由我承担，为别人开脱，这种事我干够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身体的全部重量一下子落到沙发上。

他的干亲家卡雷拉性烈如火，格里斯写文章、作报告侮辱他，他决不会善罢干休。

“乌戈，你看报纸了吗？人家开始指责我们是杀人凶手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现在，我有什么脸面见美国朋友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同僚？我用手和头脑所做的一切都让他们用蹄子给毁了！”

乌加特把一只手伸进裤子口袋，挠了挠阴茎。烟灰掉在了领带上。

“现在该怎么办？”他问。

“我写一封信给干亲家卡雷拉，坦率地告诉他我对这种

肮脏勾当的想法。”

乌加特看了看桌子上的台历：

“现在是七月末，修正案还毫无结果！要是十一月以前不发动政变，我们非遭殃不可。”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心不在焉地耸了耸肩膀。

那天晚上，巴勃罗·奥尔特加在比尔·戈德金房间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两个人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分析了格里斯失踪的原委。当天的《星报》就“格里斯案件”仅仅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新闻“老”得多么快！人命多么不值钱！）。联邦调查局告诉报界，搜捕仍在全国进行。各航空公司最近一周的乘客名单上都没有莱昂纳多·格里斯，并且任何航空或轮船售票处都没有此人订票。波托马克河从华盛顿到切萨皮克湾段已经打撈，格里斯的照片送往数以百计的美国城市各警察局。

回到首都的第二天上午，巴勃罗来到格里斯的公寓，和门房的姑娘交谈了一会儿。这姑娘他认识。她说的和报纸上登的完全相同。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格里斯博士下午六点半钟出门，到乔治敦一家饭馆吃晚饭。她记得这一点，因为博士出门时跟往常一样和她交谈了几句，抱怨天气太热，说他的国家首都气候四季温和，还说今年夏天不打算离开华盛顿。

“你看他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我记得不像有什么心事。”

“你肯定再没有见到他？”

“肯定再没有见到，因为第二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我的桌子前边经过去大学上班，傍晚也没有回来。我们以为他

病了，就去敲他的门，屋里没有人答应。第二天，格里斯博士任教的大学的系主任就通知了警方……”

巴勃罗又找公寓里其他人交谈，谁也不记得那几天看到过什么可疑的人。

他又到乔治敦区格里斯经常吃晚饭的餐馆了解，同样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那几天，他多次步行到威斯康星转悠，希望——他自己也感到太荒唐——碰到穿浅色雨衣的人。在骄阳似火的日子，谁可能穿着雨衣呢？不过，他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能够认出常常跟踪格里斯的那个男子的面容，听出他的声音。大概是个私人侦探。对从事这类活动的美国人，联邦调查局肯定都有档案记载。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在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科查阅了数百幅照片，但仍然一无所获。

晚上，克莱尔·奥吉薇打来电话。

“巴勃罗，你怎么在城里？”听得出来，她很诧异。

“为了格里斯博士的事，我三天前就回来了。”

“我事先没有通知你，怕影响你休息，相信联邦调查局会弄个水落石出。你怎么样，小伙子？”

“你可以想象出来。格里斯曾是我的朋友。”

“不要太悲观，应当说‘是’而不应当用‘曾是’。”

“我已经开始对他仍然活着失去希望了。”

“你什么时候来大使馆？”

“明天。”

奥吉薇塔寓意深长地干咳了一下，压低了声音：

“巴勃罗，亲爱的，吃一片镇静剂吧。这里的气氛……”

怎么说呢？……像是在出殡。”

“这座大使馆是座坟墓。克莱尔，你是墓中唯一的活人。”

“谢谢。不过，情况变了。你要好生行事，保持镇静。”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看来非发火不可……”

“不要发火，不要忘了迪奥尼西奥。”

“让我父亲认倒霉吧，凡事都有个限度。”

“巴勃罗，亲爱的，来这里以前，吃‘两片’镇静剂。”

第二天上午，奥尔特加走进大使馆，和梅塞迪塔以及其他女打字员握握手，径直走进公使衔参赞的办公室，冷冰冰地问候了一声就开门见山地问：

“依你看，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出了什么事？”

“我猜不出来。怎么啦？”

“我认为他被绑架了，带出了美国，已经被乌加特这个混蛋雇佣的人暗杀了！”

豪尔赫·莫利纳两手十指合拢，像是在祈祷，两个食指顶住下巴和嘴唇，和蔼地望着二等秘书：

“没有具体罪证不能指控任何公民。在格里斯案件上，除了绑架和暗杀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

“莫利纳博士，我愿意有你的沉着、冷静和对逻辑的冷冰冰的信奉。问题是我做不到。每次进入这座大楼，我都感到自己渺小、肮脏、可耻！”

莫利纳像个瑜伽教徒在和星辰通灵。沉默了一会儿，才喃喃地说：

“年轻人，希望你不要指责我参与了这次……这次绑架！”

“不，莫利纳。你绝对清白。我还要说一句，也许你是
我一生见到的最清白的人！”

说完，巴勃罗转身走了出去。

克莱尔听梅塞迪塔说巴勃罗已经来到使馆，就赶紧到楼
道等他。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她惊慌失措地对巴勃罗说，因
为已经从楼道尽头看到了乌加特的身影，唯恐两个人碰面。

巴勃罗被她拉进屋里。

“大使还没有来。请坐。你要特别注意听我下边说的
话。昨天，我偷听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跟将军的谈话。干
这种事从来不是我的习惯，这次完全是为了你。”

“你发现了什么？”

“大使火了。他以为乌加特应该对格里斯的失踪负责。”

接着，她把两个人的谈话内容讲了一遍。巴勃罗静静地
听着，表情沉痛。

“这一次不会是他们演的一出双簧，故意让你听见，告
诉别人的吧？”

她用力摇摇头。巴勃罗把手指插进头发里，囁囁着说：
“不明白……不明白……”，突然又站起身，喊道：

“我再也不能为这个杀人犯政府效劳了！”

奥吉薇塔重重地哼了一声，皱皱鼻子，嘴歪到了一边。

“要给你父母写封信吧？”

“也许……”

“你采取这种态度，就无法返回萨克拉门托了吧？”

“世界大得很。”

“想想你的父母。”

“最近我想得很多，想到了别人的父母，还有青年和儿童们……”

他向女友讲了度假期间绘画的事。

克莱尔若有所思地说：

“十年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在萨克拉门托彻底消灭了沙眼。你所用的材料是小时候收集的。”

“啊，克莱尔！不要这样按统计学……按美国方式考虑问题。”

“好。那些一贫如洗、疾病缠身的孩子们的眼睛——不论有没有沙眼——一直使你不安。可是，现在辞去一等秘书的职务就能拯救那些儿童吗？”

“至少是干点什么的开始，一种表示抗议的方式。那时候我就可以放开手脚揭露这个篡夺了我国政权的无耻集团了。”

“替代格里斯博士吗？”

“完全正确，尽管我不具备他的品德与声望……”

大使馆女秘书嘴角叼着燃着的香烟，围着男友坐的椅子转了几圈。

“好吧。”她在巴勃罗背后停下来，把两只带褐斑的大手搭在他的肩头，“既然你认为应当这样做，那就请便吧。但不要在今天开始。现在你先回家。假期还没有完，你不要见任何人，躺在床上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决心、怀疑、情感……等等。”

“为什么要把今天能做的事留待明天呢？”

“我说得再明了一些。留在大使馆工作不更便于发现格

里斯博士的下落吗？”

“我看不一定……况且，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都感到羞耻……”

“虽然原因与你不同，”她笑了，“我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也感到羞耻。可是，人可以习惯一切。不要以为我劝你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让你的辞职价格更高一些吧。设法找到能推翻现政府的人。”

巴勃罗沉吟片刻。

“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不知道……”

“好吧，你要在大使来到之前离开使馆。他正在垂头丧气、忧心忡忡、痛苦不堪。萨克拉门托形势不妙……我是说，对政府来说形势不妙。如果你们俩今天在这里见面，那么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哪一种都不尽如人意。”

“哪两种？”

“你把他臭骂一顿，两个人拳脚相加……虽然年纪悬殊，我不知道你能否沾得了便宜……要么加夫列尔先生热烈拥抱你，用他的魅力征服你，那么你离开大使馆的时候比进来时更加懊丧。”

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潘乔·比万科在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已经半个小时了。他一直盯着大使住宅的灯光。经过一再追问，他才从罗萨莉娅嘴里渐渐了解到有名的伊莎贝尔式卧室的模样。过不了很久，梅塞迪德斯汽车就会从花园深处开出来，停在大门口……大门开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和弗朗西丝·安德森手挽手走下台阶，她上车以前两个人长时间拥抱……

潘乔抚摸着外衣口袋里手枪枪柄。天气闷热，汗水从额头涌下来，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领事想起近一星期越来越严重的不幸。有的日子，他时刻遭受着恐惧的折磨：罗萨莉娅可能自杀，一次服下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三瓶安眠药。在大使馆，他坐在办公桌前，无法开始工作，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应该签发的文件，无精打采地用铅笔在记事本上胡写乱画。每当电话铃响，他都大吃一惊，心跳加快，嗓子发紧，浑身颤抖，不知道该不该拿起话筒，惟恐是有人要通知他妻子已经死亡……

头一天傍晚，房间的电话铃响了……他赶快去接，却发现罗萨莉娅在卧室里拿起了并线机的话筒。卧室照例从屋里上着锁。好奇心挑逗着他。谁打来的？他想也拿起话筒，但难以抑制的胆怯阻止他这样做。电话打了几分钟。比万科开始怀疑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打来的：这是他在海滨度假归来以后头一次。心烦意乱，在屋里走来走去。终于“叮铃”一声，电话挂了。他焦急地等待着，认为必定要发生什么事情。半个小时以后，罗萨莉娅走出卧室，穿一件灰绿色连衣裙，袒胸露臂，胭脂抹得很重。他还闻到，香水也洒得过多。

“我到外边去吃晚饭。”她连看也没有看丈夫一眼。

“我开车送你去好吗？”

“不用。你还要洗澡呢。冰箱里有鸡和沙拉子。我估计不会回来太晚，不过你先睡吧，不要等我。”

他驯服地点了点头。女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手哆嗦了一下，猛地抓起烟盒和打火机，塞进手提包，走了出去。

潘乔凑到窗前，低头看着人行道，只见罗萨莉娅走到马路中线上，左右张望，抬起右手，一辆黄色出租汽车在她跟前停住。她钻进去以后，汽车马上启动，沿朝市中心驰去。

他看了看手表。七点五分。他想，从这里到杜邦游乐场，出租汽车开五分钟左右……从游乐场到大使馆邸，八到十分钟。加起来是十五到二十分钟。

他离开窗台，打开电视机，坐到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等待……等待什么呢？呼吸有点急促，胃部空空荡荡，皮肤发痒。很像是跟情妇约好见面，现在惴惴不安地单等她来敲

门……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屏幕上的形象，听着电视机发出的伴音。一个黑白混血女人用黏乎热烈的嗓音唱一首黑人民歌。他把手伸进口袋，开始用指头摆弄纸卷，还不时看看钟表。现在，罗萨莉娅大概心满意足了。她终于要和情夫重归于好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会高兴一些。当然要高兴，因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和那个美国女人的风流事即将告吹。社会专栏作家们已经预言，安德森小姐不久就要跟芝加哥一位刚刚离婚的百万富翁结婚。他闭上眼睛，吸了一口妻子留在空气中的香味，又望了望钟表。七点半。罗萨莉娅大概正走进大使馆的大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亲自开门迎接。两个人长时间地拥抱，亲吻。她把头倚在情夫的肩头，不停地抽咽……

电视屏幕上，四个男女正演唱一首小曲，赞扬一种名牌高级香烟。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就是个“高级”男人，正搂着罗萨莉娅的腰肢走上楼梯。现在，两个人走进卧室，打开了蓝色的灯……罗萨莉娅开始脱衣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走到她背后，两只手捂住她的乳房，同时吻着她的后颈、肩膀……她感到心中一颤，这颤抖立刻传到他——比万科身上，使他蜷缩到沙发上。现在，两个人脱得精光，正搂成一团在大床上翻滚……

他用哆里哆嗦的双手捂住脸。大概是病了，病得非常厉害……关掉电视机和电灯，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昏头胀脑，既没有睡着又不清醒，活像一个蜡屈症患者，一动不动，连手指也处于僵硬状态，但脑子在紧张活动，眼前有两三个影子在旋转，挥之不去。一直到屋里的灯亮了他才完全清醒过来，站起身，眨了眨眼睛，看见罗萨莉娅站在门口，愁眉苦脸，眼泡红肿，好像刚刚大哭一场。他向妻子投过一

个病态的目光：“你怎么啦？”然后走到她身边：“见到大使了吗？”妻子点点头。他眼睛一亮，不料妻子大喊一声：“那个男人是魔鬼！”

说完，她冲进浴室，把门反锁了。潘乔跟到门口，激动地听着里面传出的响动。一阵欲火涌上心头，今晚非占有她的肉体不可。他埋伏在浴室门口，像一只饥饿的猛兽，单等猎物露头就扑上去。罗萨莉娅刚一出门，潘乔就把她搂住了。

“放开我，潘乔！”

“就今天这一次，亲爱的。”他气喘吁吁，“就今天……”

女人从他胳膊中挣脱出来。

“一天晚上要一头猪就够了！”她大声吼叫。

潘乔中了邪，伸出手，一巴掌正好打在她的嘴上。

比万科站在大使馆的人行道上，回想起当天发生的一切，又恐惧，又羞臊……上午离开家，但没有勇气走进大使馆，只好开车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后来又穿过波多马克河，朝飞机场走去，到了半路，在河边停下车，望着起飞和着陆的飞机消磨时间。接着，他开车到亚历山大区，在一家小吃店要了一份三明治。下午，钻进一家电影院，但仍然对罗萨莉娅放心不下。干出了如此愚蠢而又粗鲁的举动之后，有什么脸再去见她呢？一生中，他从来不曾这样伸手打过任何女人……昏昏沉沉走出影院。应当给尼珐·乌加特打个电话，请她去看看罗萨莉娅，守在她身边，免得可怜的妻子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但是，他没有打电话，而是信马由缰，沿着亚历山大区的商业街一边走一边看商店橱窗。他走进一家文具店，看了几件办公用具。这时，

一个用黑字写在彩色衬底上的名子映入他的视网膜，在他胸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无形的手指在敲击心脏。

“彩蜡”……潘乔兴奋得不能自持，似乎重新看见了西尼，重新找回了童年。他用纤细的手指拿起蜡笔盒，小心翼翼地打开闻了闻，仔细看看盒盖上的图画……太可惜了！已经不是美国西部印第安人追逐水牛的画面，换成了黄石国家公园秋景的彩色照片。管它呢！反正是五彩蜡笔……他买下一盒，放进口袋。

来到马萨诸塞大街，他又开始用手指尖摸索起“西尼笔”来。啊！可是，与他的不幸相比，这几支蜡笔又算得了什么？

怎么办？领事思绪纷乱繁杂。应该走上大使馆的台阶，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倒在大使馆门前，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和情妇出来时踩在他的尸体上？然而……自杀？这崇高的牺牲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值得吗？在此之前，应当先给报界写封公开信，揭露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是绑架和杀害莱昂纳多·格里斯的罪魁……再写一封信给弗朗西斯卡，说她的丈夫与女人们通奸。对，还要给罗萨莉娅留下一封，请求她原谅这一切。对，明天就写……

右手握住手枪柄，左手指尖摸着五彩蜡笔的笔尖。

他看见大使住所窗户的灯光熄灭了。过了几分钟。潘乔借路灯看了看手表。时间已近午夜。梅塞德斯汽车从花园深处出现了，停在大门前，像辆黑色灵车。他走进花园、朝大使住处走去，到了离开门口几米远的地方，躲到一棵大树后面等待着……前厅传来嘈杂声。女人的笑声。大门开了。阿尔多·博雷里下了汽车，笔直地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帽子……

借大门口的灯光，潘乔·比万科看见他的大使穿一件深色睡袍，挽着那个美国女人。“混蛋！”他嘟囔了一句，“无情无义的家伙……”一股无名大火涌上心头，他浑身颤抖，头脑顿时糊涂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下面，吻了吻弗朗西丝·安德森的嘴。她钻进汽车，汽车立刻启动。直到黑色梅塞德斯汽车在远处消失，大使还留在原地不动，不停地朝情妇招手。潘乔·比万科从头到脚抖成一团。现在，与他所有不幸的制造者之间只有几步的距离。应该惩罚他，不让他继续为非作歹，践踏别人……他身材高大，膀阔腰圆，“质地优良”，我行我素，拿他人的命运当作儿戏。潘乔看见他正上台阶……好一个潘乔·比万科！突然痛苦钻心，从大树后面走出来，紧迈几步追上正要关门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用嘶哑的声音喊：“大使！”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眉头一皱。“比万科。”他吃惊地嘟囔了一声，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笑容，但看到罗萨莉娅的丈夫拿着手枪，立刻倒退一步，大声喊：“你疯了？把武器交给我！”实际上，潘乔觉得并没有举起手枪，而是一场梦，这一切都是梦，所以他不是凶手……梦见要杀死妻子的情夫……而是个复仇天使。他用颤抖的手举起手枪，瞄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生殖器，扣动扳机……前庭一声枪响。大使气得脸色铁青，朝他冲过去：“疯子！疯子！”。“五颗子弹！”比万科一边往后退一边想，“用五颗子弹击中睾丸。”要想打翻巨人歌利亚^①必须用五块石头……他正要再次扣动

① 歌利亚：勇士，身材高大，所向无敌（见《圣经·旧约全书》）。

扳机，突然听见另一声枪响，同时感到胸部左侧猛受一击，扑倒在地。手枪掉了，眼镜也掉了。他先是疯狂地在地板上翻滚，随后半抬起上身，往前爬了几秒钟，嘴里喃喃地说着不连贯的词句：“蜡……五彩……蜡笔……混帐……你……蜡……”他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没有成功。身体内部什么器官破裂了，巨浪在胸内奔腾，冲向咽喉，浑身发冷……他又说了几个莫名其妙的字，指尖几乎碰到了眼镜，似乎想拿起来重新戴上……周围渐渐变得混沌一片。最后，潘乔·比万科直挺挺地躺到地板上，两腿一伸，翻了白眼。在他视网膜上映出的最后的影像是个巨大的光团，那是挂在苍穹的上帝的眼睛……

大使抬头一看，只见夜间警卫贴门站着，手里的手枪还冒着烟。“大使先生，我看这家伙进来……”他用蹩脚的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说。

米歇尔走进前厅，看到这场面，吓得脸色惨白。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凑到领事身边，跪下来，量量他的脉搏……似乎已经消失。接着把手伸到比万科的外衣下面，摸摸胸部左侧：感觉不到心脏跳动。他看到死者的眼球上映出了前厅屋顶上的巨型枝形吊灯。他心里好生纳闷：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几经寻找，才发现子弹从腋下打进了胸腔，大概主动脉破裂了。这类情况他见到过……他站起身。总管问是否请位医生来，他回答说无济于事，领事已经完蛋了。

“大使先生阁下受伤了吗？”米歇尔问。

“没有，这家伙的枪法狗屎不如。”

“现在该怎么办？”警卫问。

“没关系，等一会再说。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他看

了看掉在离尸体不远处的手枪，“谁也不许动这件凶器……”

他好像突然回到了卡拉维拉山，率领着一支游击队作战。必须迅速思考，做出明确的决断，不失时机地执行计划。他环顾四周，寻找什么，发现比万科的子弹贴着他的左臂飞过，把睡袍打了一个洞……弹头嵌进了中间楼梯的第二阶上。

“米歇尔，打电话给乌加特将军，让他立刻到这里来，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但不要告诉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懂了吗？快！”

总管小跑着离开了前厅。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转向警卫：

“请米歇尔给你一大杯威士忌。”

“谢谢，大使先生。”

“倒是我应当感谢你。好啦，去吧。没有我的批准，不许和任何人交谈，不许离开这里。”

现在，只剩下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个人。他看了看领事的尸体，目光中带着冷酷的怜悯，可怜的倒霉鬼！

他点上一支烟，迈着大步踱来踱去，嘴里喃喃自语：

“格里斯事件丑闻之后，我正盼着有人……正盼着……”不难证明这确实是一次谋杀他的阴谋，报界不会怀疑其真实性，巡夜警卫的证词将起决定性作用。米歇尔也是证人。可是……罗萨莉娅呢？他突然停住脚步，作了个烦躁的手势，

“这事怎么对那女人说呢？”

他又看了死者一眼。潘乔·比万科死后比生前稍许顺眼了一些。半长不短的胡子在那张蜡白的脸上撒下一片泛绿的阴影。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听到了儿时的声音。他弯下腰，

把死者的眼睛合上。

米歇尔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盘上放着一杯纯威士忌。

“将军马上就到，大使先生。”

“谢谢你，米歇尔。”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准备足够的咖啡，浓一些。今天晚上我只得通宵不睡了。现在你可以去休息，有事我再叫你。”

总管点了点头，出去了。现在，大使端着酒杯，又围着死尸转起来。对比万科，他什么都想到过，唯独不曾料到他会行凶。归根到底，人永远不能完全了解他人……不管怎样，这一举动几乎有点男子汉的气魄。为什么这可怜虫的手在射击的时刻哆嗦起来？目标很大，近在咫尺，怎么会打不中呢？

几分钟以后，乌戈·乌加特将军来了。看到死尸，吓得目瞪口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简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这条狗企图枪杀我，但夜间警卫及时赶到，一枪就把他结果了。”

“现在该怎么办？”

“伙计，动动脑筋吧。你还不明白谋杀的动机吗？”

“什么动机？为女人而嫉妒？”

“胡扯！好好想想！莫非你看不出来，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我的企图吗？”

“谁策划的？”

“乌戈，你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想喝杯浓咖啡吗？”

将军望了望死者，目光茫然。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又喝

了一口威士忌：

“我们早已盼望的机会来到了。比万科是一个左派阴谋集团的成员。他暗杀我是在萨克拉门托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的信号。懂了吗？”

“那么，证据呢？”

“证据嘛，老伙计，我们——你和我——现在就开始泡制。你打电话找一名会打字的中尉来……啊，一定要绝对可靠。”

乌加特仍然望着死尸，慢慢点了点头。大使接着说：

“我们马上准备文件，证明弗朗西斯科·比万科与反叛分子有联系。不要忘记，美国警方‘应该’从这家伙的口袋里搜到一封信件，信上某某人通知某某人（名字由你编造，这是你的专长），格里斯博士已经秘密离开美国，到达古巴，与那里的萨克拉门托流亡者汇合。需要一个萨克拉门托国内参与这场反叛运动的人员的长长的名单，以便于我国警察开始逮捕……”他把一只手搭在武官肩膀上，“你还看不出来？我们将用金盘子向我的干亲家奉献一个他久已盼望的借口，使他能在世人面前名正言顺地再次举行一次‘救国运动’。”

乌加特笑了。现在，他全都明白了。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蹲在比万科身边，搜了搜他的口袋，掏出了一块又湿又脏的手绢、一张卷成香烟状的美元，还有一盒五彩蜡笔。他抬起头望着同谋，笑着说：

“我看这些罪证不足以……”

大使站起身来。

“所有的文件准备妥当之后，先把关于格里斯的信件塞

进死者的口袋，再把其他罪证放到大使馆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注意，办公桌的钥匙应当在这家伙的口袋里……”说着，用脚尖指了指死尸。随后，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事情干净利落之后，”大使舌头一弹，嘴里发出响亮的啧啧声，“立刻通知警方。明天上午我就这件事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项照会，并且举行记者招待会……喝一杯吗？”

乌加特说喝杯咖啡。他正要去给助手打电话，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他拦住了：

“还有一件事。请尼珐把‘消息’告诉罗萨莉娅，但不是现在，明天上午再告诉。懂了吗？啊！不能让莫利纳等人怀疑我们的圈套。只有我、你和打字的中尉知道这桩秘密。”

乌加特点点头，出去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又围着死尸转起来，眼睛一直盯着他。

“在你猪狗不如的一生中，”大使自言自语地说，“头一次对你的祖国有了点用处。”

天亮以前不久，睏倦不堪的大使接通了塞罗埃莫索的电话，简要地把大使馆内发生的事件告诉了总统。他说，这次阴谋的罪证由信使乘当天的班机送回国内。他的干亲家立刻明白了这套把戏，满意地笑出了声。“谢谢你，老朋友。”总统兴高采烈，“你真的没有受伤吗？”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回答说：“依我看，比万科一生从来不曾打过枪。啊，干亲家，给弗朗西斯基塔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安然无恙，今天我就写信，给她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华盛顿警察在大使馆前厅做完技术鉴定已经过中午时分了。他们录下了大使、巡夜警卫和总管的证词。在运往停尸房验尸以前，还从各个角度给弗朗西斯科·比万科照了像。

尼珐·乌加特把比万科的死讯通知了罗萨莉娅。这女人表现出病态的冷漠。“要把丈夫的尸体运回塞罗埃莫索墓地安葬吗？”尼珐问。“无所谓。”她回答了一声，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埃内斯托·比拉巴时而悲怆，时而像每次身边发生了什么丑闻轶事那样兴奋。大使把比万科的葬礼交由他负责——当然，一切花销由大使馆支出。听到这最后一个细节，蒂蒂托忍不住评论了一句：“贵人行为理应高尚。”不过，他绝不肯相信什么叛乱阴谋的鬼话，但一定要守口如瓶，因为任何怀疑的表示意味着生命危险……

莫利纳心神不安。他不愿意卷入这场肮脏的勾当。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让他负责起草一份就使馆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在克莱尔·奥吉薇的帮助下，他用了大半个上午干这件差事，现在已经是第四稿了，但公使衔参赞仍不满意。他认为，不相信大使所讲事实的真实性总是在照会的字里行间露出马脚。

现在他正口授第五稿，不时看看女秘书，唯恐她突然询问他本人是否真的相信这篇“小说”。奥吉薇塔服了大量镇静剂，此时没有考虑任何人或者什么组织，只是为巴勃罗担心。他现在在哪里？听到比万科被杀的消息他如何反应？他该怎么办？今天早晨几次打电话找他，但没有人接……

梅塞迪塔哭得眼睛红肿。比万科生前常常欺侮她，拿她当替罪羊，似乎以恶言恶语折磨她、虐待她为乐。不过她从来不恨比万科，甚至还有点怜悯。现在，她不时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比万科，可怜的比万科！”

十点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风风火火地闯进大使馆，沉着脸，没有向任何人问候，径直朝奥吉薇走去。

“给国务院的照会写好了吗？”

“写好了，大使先生。和西班牙语译文一起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坐下来，把照会读了一遍，认为写得很好，签上自己的名字。女秘书站在他身边，等他下达什么指示。

“谁会说闲话，嗯，克莱尔？”

她使劲哼了一声，嘴和鼻子撇向一边，但没有吱声。

“大使馆人员都怎样议论？”他又问。

“不知道，大使先生。我从来不听人们嘀嘀咕咕。”

“你不怀疑比万科真的企图暗杀我吧……怀疑吗？”

“不怀疑，大使先生。除了你的话之外，还有技术警察的鉴定证明。”

“你知道吗？我们从尸体的口袋里和他在这儿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非常可疑的文件。”

奥吉薇塔用坚定的目光望着上司，双唇紧闭，表情冷峻。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抵御不住这双似乎能看透他心事的正直的眼神，低下了头：

“好吧。巴勃罗在哪里？”

“还没有来。”

“怎么？这时候还没有来？往他住所打个电话。”

“我打过几次了，没有人接。”

“报界人士几点钟来？”

“二十分钟以后。”

“我要让巴勃罗当翻译。”

“如果大使先生允许，我提个建议……巴勃罗作翻译不合适。”

“为什么？”

“他本人会向你解释，今天，明天……或者以后。”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死死盯着墙上阿丰索·布斯塔曼特的画像。

“好吧，由你来翻译。”

“可以，大使先生。”

“照你看……我应该对记者们说些什么？”

“如实叙述事件的过程，评论越少越好。”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慢慢点了点头，拿起象牙裁纸刀敲打着玻璃板。

“你认为报界会要求看那些文件吗？我指的是比万科参加阴谋活动的证据。”

“当然。”

“可是，文件正在信使送回塞罗埃莫索途中！我们没有留下影印副本。”

“就这样对记者们说就是了，大使先生。”

“今天你怎么了，克莱尔？”

“没有什么，大使先生。”

“好吧。记者们来了以后，让他们到会议室去，吩咐人给他们送咖啡……威士忌……毒酒也行！”

女秘书退出去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觉得有人在看他，抬头一望，发现了阿丰索·布斯塔曼特那严厉的目光。他顺手把象牙裁纸刀朝画像扔过去。

美国报纸以比较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萨克拉门托大使馆发生悲剧的消息。《邮报》、《星报》和《新闻报》以比其他城市报纸更大的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大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原文照登，一般未加评论，只有纽约一家小报发表了一篇持怀疑态度的社论，社论的题目是：《萨克拉门托大使

馆又一个阴暗的日子》。不出所料，格里斯的失踪旧事重题，并且与比万科之死联系在一起。

关于萨克拉门托大使馆悲剧的消息是比尔·戈德金亲口告诉巴勃罗的。两个人一起到斯达特莱尔饭店餐厅去吃早点。向侍者吩咐了吃什么之后，老记者和巴勃罗相视无言。最后还是美国人先开了口：

“你对这一切怎么看？”

“故事编得很不高明……你呢？”

“同意你的说法。但是，当地警察明白无误地证实了一些事实。企图枪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确有其事。手枪是比万科的，枪柄上有他的指纹，弹头嵌进了楼梯上。打死比万科的子弹确实是从巡夜警卫的手枪里射出的。最重要的是警卫本人的证词，还有大使和总管的佐证。对这一切都无懈可击……”

“但关于密谋叛乱的故事是虚构的，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和他的武官编造的，后者在这方面堪称行家里手。关于格里斯逃离美国的那封信能让人笑破肚皮，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逃离这个国家。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古巴或任何其他地方旅行。各航空和轮船公司最近两三个星期的乘客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这作何解释？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吗，自觉自愿地离开，却把衣服、书籍、工作、甚至阅读用的眼镜丢下？格里斯这种人到他国之前不可能不事先付清房租和赎购款项，至少也要对大学的系主任说一声。还有，起码也会向我告别，打个电话也可以嘛。”

侍者端来了所要的食品。巴勃罗要的是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和几片烤面包。戈德金则是全份早点：煎鸡蛋、小泥肠、

麦片、烤面包和黄油。

“我同意你的看法。”老记者一边狼吞虎咽地吃饭一边说。

一滴黄油弄脏了下巴，他拿起餐纸擦了擦。巴勃罗只喝咖啡，面包片动也没有动。

“昨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一直在想应当怎么办……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解释了我当前的处境，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要请求辞职……”

“信发走了吗？”

“一清早就到街上，把信塞进了邮筒，免得反悔……吃完这顿饭以后，我去给外交部打一个电传电报，正式提出辞职。”

戈德金在烤面包上抹果酱：

“以后呢？”

“明天上午去大使馆见大使。”

“你估计他的反应如何？”

“我对此不感兴趣。”

“你认为‘解放者’将如何利用那些所谓‘颠覆性文件’？”

“很显然，这是卡雷拉求之不得的借口，以便取消十一月份的大选，为永久掌权迈出第一步。”

“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你的国家必定出事。巴勃罗，现在，就在这里，我完全能既不怕出错也不怕夸张地写出即将发生的新闻……”

果然，第二天各报以通栏醒目标题报道了萨克拉门托共

和国发生新政变的消息。胡韦蒂诺·卡雷拉大元帅解散了内阁，关闭了参众两院，在全国宣布戒严，数以百计的“参与企图以武力推翻政府的左派阴谋”的分子遭到逮捕。仅在联邦大学，就有二百多名师生被捕，下落不明。总统发表广播讲话，解释采取以上措施的原因，要求人民支持，并说他完全相信人民。他宣称，尽管他的愿望是寻求公正，但不能不“对威胁公共秩序、民主制度和祖国基督教传统的叛徒们采取坚定的态度”。

奥吉薇塔从《邮报》上读到了这则消息，皱了皱鼻子，响亮地哼了一声，随后胸中发出深沉的叹息。又一次政变！

大使用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同僚们通电话，要求紧急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让他解释本国政局。

莫利纳万念俱灰。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大主教已经就卡雷拉的政变公开表明态度，号召天主教徒们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

“传记又有一章可写了！”公使衔参赞暗想。但是，最为关心的并非传记，而是这种局势发展下去会产生什么后果。他预感到，非常严重的事件即将发生。岛国随时可能遭到流亡者组织的军队入侵，国内或许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第五纵队正等待信号，准备发动革命。

“要是革命胜利……我的下场如何？”他想。卡雷拉是个贪得无厌的凡夫俗子、毫无品德可言的奸诈小人。但是与左派独裁相比，他的政府要好得多。现在，莫利纳心惊胆战地想到古巴进行的处决，感到黑洞洞的枪口就在头上。对于

死，他并不惧怕。有时候生比死更令人胆寒。如果反叛分子获胜，他决不返回祖国。与其遭受人民革命法庭审判的奇耻大辱、蹲在臭气熏天的监牢、任敌手们嘲笑责骂，还不如自杀身亡。情愿身亡！一千倍地情愿一死。要死得迅速、清白、体面。

“上帝何在？”他怅然自问，“上帝何在？格里斯何在？上帝。格里斯。上帝。格里斯。上帝。格里斯。”

克莱尔·奥吉薇走进上司的办公室，一分钟以后到隔壁房间告诉巴勃罗说：

“可以去了。不过一定要小心。”

奥尔特加走进办公室，站在大使桌子前面。

“坐下吧，巴勃罗。”

“谢谢。这样很好。”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没有坚持。两只手拿起裁纸刀，平平淡淡地问：

“有什么事吗？”

“正式通知你，我刚刚给外交部发了电报，要求不可更改地辞去外交职务。”

大使没有吱声，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才问：

“为什么？”

“真想知道吗？”

“当然。”

巴勃罗干咽了几口唾沫，攥紧拳头：

“因为我不能继续为一个杀人犯和窃贼的政府效劳。”

他等着对方激烈的发作，甚至看了看桌上的镇纸，准备

一旦需要就用它作武器。但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仍然垂着眼睛，那副沉静、悲伤的表情让他吃了一惊。

“你仔细考虑过自己的作法吗？想过你的父亲、母亲吗？想过你辞职的消息……在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会使我在华盛顿已经不妙的处境更加艰难吗？”

“对你的处境，我不感兴趣。”

“好吧。可是，你应该了解，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

“是你自己造成了这个‘时刻’，是你向你的干亲家提供了发动政变、使他继续实行独裁的借口。”

“这么说，你真的不相信我们从比万科身上发现的那些文件？”

“我不相信从那个可怜虫身上真的‘发现了’颠覆性文件。”

面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麻木与冷漠，巴勃罗非常惊异。他本来准备对方会大发雷霆，不料大使深深陷在椅子上，仿佛身子也干缩了，紧握着裁纸刀的双手指关节也失去了血色。还有那目光，多么卑贱的目光（印第安人，赤脚的印第安人，饱受欺凌的印第安人在望着富有的庄园主的儿子）。奥尔特加不由自主地对这个他所不爱而又恨不起来的人产生了恻隐之心。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慢腾腾地点了点头。

“好吧，巴勃罗，好吧，随你的便吧，我并不因此而恨你。既然不愿意来大使馆，就不要来，在家里等着外交部的决定吧。不过，有件事请不要忘记。我一直想成为你的朋友，但你不愿接受我的友谊。你可以走了。祝你幸福。”

大使的眼睛湿润了。巴勃罗一个字也没有再说便走出了大使办公室。正在隔壁房间等着的克莱尔·奥吉薇挽住他的胳膊，朝楼道走去。巴勃罗向她叙述了刚才的场面。女秘书说：

“几分钟以前有人通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说罗萨莉娅·比万科服下了大剂量的巴比土酸，企图自杀……”

“她完蛋了？”

“不知道。现在还昏迷不醒，情况不妙。”

巴勃罗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抽屉，撕毁了一些文件。桌子上有两封信。母亲的信他看也不看就撕个粉碎，把广田喜美子的信塞进口袋。

奥吉薇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再见吧，巴勃罗？”

他笑了：

“你知道吗？我感觉非常好。头从昨天就不痛了。有生以来不曾觉得这样畅快过，好像五脏六腑都洗了个澡……”

“愿上帝祝福你，小伙子。”

告别之后，他轻松愉快地穿过花园，朝外走去。突然想起塞在口袋里的蓝色信封。刚一打开，一股茉莉花香气袭来，仿佛广田小姐出现在眼前。蓝色信纸上仅仅写着一首俳句：

好一滴露珠，
落在百合花冠上，
宛如光之宝。

第四部分

山 上

35

八月头一周的一天，又闷又热。报纸报道说，可能来自古巴的雇佣军在一个叫米格尔·巴里奥斯的人指挥下在萨克拉门托的索莱达德马尔镇附近登陆。入侵者本指望当地联邦守军投诚，不料遇到了抵抗，被迫退入卡拉维拉山，据估计要从那里开展传统的游击战争。盛传岛国南部各省也有军队登陆，但无法得到证实。

天亮以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已经获悉了事态发展情况。凌晨五点，卡雷拉总统亲自从塞罗埃莫索打电话来，把他从床上叫醒。大使睡眼惺松，几秒钟之后清醒过来，才听明白干亲家通报的消息。刚刚弄明白局势的严重性，便习惯地大喝一声：

“干亲家，在索莱达德马尔登陆的部队有多少人？”

“七、八百……也许一千，不清楚。武器精良。”

“只在一个地方登陆了吗？”

“非常不幸，另外还有两处：奥罗威德和圣费尔南多。南方叛军数目不明。消息混乱。我正在派空军轰炸扫射敌方

阵地。”

从声音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听得出总统精神紧张。

“喂，干亲家，我正在考虑马上返回国内。”

“不行！”

“喂，总统，我对那一带山区了如指掌，并且还身强力壮，足以指挥游击队。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用游击战才对付得了游击战。我们不应当重犯查莫罗的将军们的错误……还记得吧？”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你暂时留在那里吧，我有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做。我们有证据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这狗东西帮助这次入侵。巴里奥斯及其雇佣军就是古巴轮船运来的！你必须设法召开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特别会议，控告古巴的侵略行为。喂，干亲家，还有一件事。和美国助理国务卿谈一谈，坦率地说明我国的形势。我们的弹药只够用两三个月……如果美国不帮助的话，我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让他们想想巴蒂斯塔的情况吧，那还是昨天的事。正是由于对古巴政府武器禁运，菲德尔·卡斯特罗才取得了胜利。干亲家，我相信你的能力。不要让我失望！”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喘着粗气，汗水顺着赤裸的脊背往下流，干渴的嗓子 and 胸膛里像是着了火。

“首都形势怎么样？”

总统那边稍微犹豫了一下：

“嗯，说不上很好……与往常一样。街上和各家各户都出现了颠覆性传单，弄不清是谁散发的……墙壁上刷了污辱我本人的标语……一座地下电台不停地攻击我的政府，并号召人民造反……”他喘了一口气，“喂？昨天晚上学生们用

石块打伤了两名军警，军警开了枪，打死了两三个年轻人，打伤了半打……也许一打，谁知道呢！活见鬼……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如果表现软弱，那么非完蛋不可！”

“当然，当然。喂，干亲家，及时向我通报形势的发展情况，通过电话和电报都行。啊，有件事请你帮忙。让秘书给弗朗西斯基塔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很好，一切都很好……我指的是这里。”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好好跟助理国务卿谈谈，争取为我搞到自动武器和弹药，否则我们非完蛋不可。”

大使钻进浴室。他气急败坏，刮胡子的时候把脸划了个口子。冲了个冷水澡，三口两口吃完早点，七点钟打电话给公使衔参赞和武官，让他们赶快到办公室来。

像往常一样，大使馆其他人员九点准时来上班，人人脸上都罩着一层乌云。梅塞迪塔缩在自己的角落，无法工作；手指发硬，在打字机键盘上动弹不得。蒂蒂托·比拉巴精神病发作，奥吉薇小姐往他嗓子里塞了两片她本人常吃的镇静剂，让他躺到沙发上。乌加特将军办公室的军人们反应更是五花八门。两个最年轻的请上司准许他们立即返回祖国，拿起武器与入侵者战斗。上校呆头呆脑坐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一连喝了几口水，清醒过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曼哈顿银行清算存款帐目。少校突然患了神经性痢疾，上午大部分时间里都风风火火地往厕所跑。

“莫利纳博士！”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大声咆哮。他看到，博士像个刚刚关进笼子里的猛兽，惶惶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给我打电话给国务院，紧急约见助理国务卿。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正在休会期间，但必须

立刻设法召开特别会议，并要求咨询机构开会，我要控告古巴的侵略行径！”

乌加特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地望着自己的脚尖，本来是棕色的脸变成了茄紫色（“该死的哮喘”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大使馆时解释说）。“唯一的办法，”他暗自思忖，

“唯一的出路是逃往瑞士。”他知道，一旦卡雷拉垮台——一切迹象表明局势非常严重——他，乌戈·乌加特，必将被引渡回国，落个被枪毙的下场。对，瑞士和萨克拉门托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混帐东西逮不住我！”他松了松领带，解开衬衫钮扣，望了望大使，“但是，现在什么也不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说。”决心已定。“临走之前再让尼珐知道。女人家见识短。”

“乌加特！”大使又咆哮起来，“想个办法嘛！”

“我有什么办法，老爷？”

“在军事委员会的头一次会议上你就向同僚们介绍我国局势，辟头盖脑地把古巴代表大骂一通，绝不能轻饶他！必须大张旗鼓地干，动员美洲各国舆论，向全世界揭露古巴的侵略。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国与国之间不宣而战的战争！”

他朝布斯塔曼特博士投去愤怒的目光。画布上的老外交官神态安详。然后，他又转向公使衔参赞：

“把记者们召到大使馆来，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今天或明天就干。准备一篇书面声明向各通讯社散发。必须让民主世界相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走狗都是共产党。假如那个巴里奥斯的革命获胜，可以说俄国人将在加勒比地区有两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从而可以直接向美国领土发射原子

弹！”

公使衔参赞朝门口走去，大使又把他拦住了：

“还有一件事，博士。告诉报界，说巴里奥斯品质恶劣，因犯有隐瞒税情罪……强奸罪……随便说什么吧……正受警察通缉……”

“可是……”莫利纳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教授，运用你的想象力，随便编造吧。在这祖国处于危险的时刻，任何武器都能使用。”他走到参赞旁边，揪住他的前襟，眯起眼睛，鼻翼急促地翕合，从牙缝里又迸出一句：“不仅祖国，博士！我们的性命也一样！要是革命者胜利了，我们都要面对墙壁，挨一梭子子弹！”

四天后的一个下午，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实在觉得烦闷，就大声唱起小时候从下层人那里学来的淫荡小调。隔壁房间的克莱尔·奥吉薇吓了一跳，侧耳细听，心里隐隐约约有点惊慌……

大使想起了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在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他直接了当地大肆攻击古巴，指责它帮助对萨克拉门托的入侵，并且一时性起，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格瓦拉破口大骂了一通。古巴代表怒不可遏，站起来回击，在火头上高声吼叫：“混帐！骗子！”大使完全失去了理智，冲向古巴代表，要不是两个同僚及时拉住，把他按在椅子上，他非打古巴人几个耳光不可。会议毫无结果而散。

同一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会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坦率地向他解释了萨克拉门托局势。“如果我的政府不能立

即得到美国的武器和弹药援助，我们将无法为将来负责。我想尊敬的朋友清楚地了解，又一个加勒比国家落入民主的敌人之手意味着什么……”

美国人坐在椅子上听着，跷着二郎腿，两只手交叉放在干瘪的肚子上，一言不发。那张新教传教士似的脸上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最后的回答也含糊糊糊，说要仔细研究这一问题，并向国务卿通报……告别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社交界常见的那种微笑，仿佛接待的只不过是个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客人。

现在回忆起这些事情，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仍然烦躁不安。还能做什么呢？每天和萨克拉门托外交部通电话，随时了解国内局势变化。奥罗威德省省会正进行巷战。在圣费尔南德省，一团政府驻军倒戈，革命军正准备进攻索莱达德马尔镇。有消息说岛国西翼卡那维莱克斯地区也发现登陆部队，但尚未得到证实。上帝啊！巴里奥斯从哪儿招募了这么多人进行入侵呢？毫无疑问，在他的队伍中，必定有数以百计的古巴人和中美洲及南美洲各国的雇佣军。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点上一支雪茄，心不在焉地吸起来，眼睛死死盯着墙上阿丰索·布斯塔曼特的画像。他想起了罗萨莉娅……医生总算抢救了她的生命，可是现在——可怜的女人！——却住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出院以后，他打算把她送回塞罗埃莫索，交给养育她的年迈的姨母照顾。

他又想起弗朗西丝·安德森。两个星期以前，这美国女人离开了华盛顿，去和一个百万富翁结婚。“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更糟糕的是，发生了这场混蛋革命！”

几秒钟的时间里，他默默地望着从雪茄上袅袅上升的烟

环，想起了玩弄过的女人们。回忆和想象把她们一个个带到身边：和这两个女人在伊丽莎白式的大床上像耍杂技似地交欢。回味过去的快乐——亲吻、气味、癖好、低语、呻吟、快感——更增加了他现今的孤独与凄凉。最近几个星期，蒂蒂托把几个女人带来大使馆和他过夜。可是，那些正经娘儿们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觉得她们都过分缺乏经验，还带着大学生的酸腐气，甚至像教会中学的女学生一样无知。交欢起来又过份认真，像是在为争取好成绩而撰写论文，或者像是在打网球，严守规矩，惟恐失分。

他叹了口气，看了看办公桌：干干净净，没有一份文件。想起了巴勃罗。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伙子拒绝了他的友谊，还当面污辱了他一通。现在他怎么样了？也许决定参加革命队伍……岂有此理！奥尔特加这类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些理论家，生活在梦想和书本的虚幻世界，像孩子们怕黑屋子一样害怕流血和暴力。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前额贴在玻璃上望望花园里的树木：家中的一切飞快地在脑海中闪过：女儿、外孙、塞罗埃莫索住宅花园的一角……

他重新坐下，要女秘书接通尼加拉瓜大使的电话。

“喂，朋友！”他对着话筒大声喊叫，“怎么样？没有……很好……当然啦。嗯……倒是我应当请你原谅，当时我完全丧失了理智。有件事要说清楚，我亲爱的大使，如果我们不采取严厉措施，菲德尔·卡斯特罗最终会把整个加勒比地区烧毁！”

对方讲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我们应该让理事会尽快组成临时咨询机构，派代表团

到索莱达德马尔就地考察我控告的依据。巴里奥斯运送军队的轮船在离镇上二十多公里的一个海弯抛锚时被我们拍摄了照片，另外还有数以十计的目击者证明。陆军第五团的士兵抓获了两个负伤掉队的反叛者。他们亲笔签字的供词证明，古巴政府确实参加了入侵萨克拉门托的行动……当然，朋友。好，再见。”

当天晚上，他钻进梅塞德斯一奔驰汽车，让阿尔多·博雷里开到林肯纪念堂。悲伤或寂寞的时候，他往往去拜访美国国父。他慢慢爬上台阶，走进纪念堂，站在透明的大理石雕像前久久望着那灯光照耀下的脸庞。随后，又若有所思地围着雕像转起来。此时，纪念堂里空无一人，只听见他的脚步在“嗵、嗵、嗵”地回响。

阿布拉罕·林肯似乎在静静地遥望林荫道那边白色的国会大厦。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靠在门口的立柱上休息了一会儿，看着落日在长方形人工湖上映出的火红色倒影和兀立在空中的浅色方形塔碑，胸中感到一阵深深的、震颤的、刺心的怀念——怀念谁，怀念什么，他自己也不明白。

那天晚上就寝以前，米歇尔·米歇尔在日记上写道：

“8月12日。星期三。又一次革命。我的天哪！胡韦蒂诺·卡雷拉的末日到了。我感到缺乏勇气，身体不佳，再也应付不了另一位大使，决心辞去大使馆总管的职务，返回祖国，考虑在阿维尼翁开一片拉丁美洲风味的餐馆。回国以后，甚至可以和一位中年太太结婚，但她必须长得不太丑陋、知道节俭，为人勤快，并且在肉

体上不过分苛求。说到肉，想起来了，我学会了‘萨克拉门托馅饼’的配方。餐馆要起个惹人注目的名字：‘帕拉莫’，或者‘塞罗埃莫索’，要么干脆叫‘米歇尔酒家’。在阿维尼翁，我将一边写回忆录一边等待死神到来。‘请进，死神太太，我恭候多时了！’”

深夜，米歇尔被一阵喊声惊醒。听得出来，是主人的声音。他跳下床，穿上睡袍，上了楼，发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光着脚，只穿条睡裤，一边在楼里走动一边指手划脚地咆哮：“混帐东西们！胆小鬼！不要跑！把手榴弹扔回敌人那边！”看见总管，他停住脚步，不再呼喊。

“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大使先生？”

“谁叫你来的？”

“嗯，阁下，我想……”米歇尔声音很小，低下头去，准备离开。

“等一等，我们一起下楼。”

萨克拉门托人拉住法国人的胳膊——大使从来不曾对他这样亲昵过——一起走下楼梯。米歇尔挨着对方赤裸的上身，感到他身上热乎乎的汗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觉得难为情，并且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别扭。

他们走进图书馆，总管打开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象个梦游症患者似地在宽阔的大厅里踱了一会儿，接着转向米歇尔：“拿一瓶香槟酒、两个杯子来。煮点浓咖啡。快！”

几分钟以后，两个人已经面对面坐在皮椅子上。米歇尔对这个跟男仆坐在一起共喝一瓶香槟的粗鲁汉子又一次感到深深的轻蔑（阿丰索完全不同，在这类事情上非常文雅）。

“米歇尔，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正在卡拉维拉山上参加一场激烈的战斗。我的士兵们临阵脱逃，丢下我往山下跑，手榴弹和手枪扔得遍地都是。都是些蠢猪！于是我喊叫起来……醒了以后，我跳下床来，为了发泄胸中的闷气，接着又喊了几声。这算得了什么？我不是在自己家里吗？”

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米歇尔给他倒上一杯咖啡。

“你看我很老了吗？”

“哪里话，我看至多四十四五岁……”

“是啊。你看看这两只手，多么平滑，没有老年人那种紫褐色斑点……没有吧？安德森小姐说从来没有跟我这样的男子汉睡过觉。打开空气调节器，屋里太热。”

总管把空调打开了。

“你看得出来，在这场战争中，我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过去，我一直和政府做对，经过多少曲折，现在才取得了合法政权。谁能想到，我和陆军第五团站在一边！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要和反叛者战斗。这不是名符其实的命运的嘲弄吗？”

米歇尔下意识地不住点头。大使站起身，围着椅子和沙发转起圈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声音像是自言自语。

“山上简直是天堂。空气清新，像水晶一样透明。没有比山顶上看日出更壮观的景色了，宛如大海张开了子宫，生出了太阳。一座座山头染成金色。请坐，米歇尔，不要客气。今天晚上，我不是你的主人，而是索莱达德马尔镇的小伙子，名字叫什么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妓女的儿子。我的家人称‘第五团的厕所’。这一点写进你的回忆录里吧。但是，山上的一切都干干净净。连乌加特也干干净净！有一

次，我们用子弹打下了一架向山上俯冲、扫射我方阵地的政府军飞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们躲在石头中间用自动步枪射击。哒哒哒……我亲眼看见飞机在空中爆炸，摔到地上，一片火光，太美了！那场面真叫人开心！啊！……看着秃鹰在山颠盘旋，多么痛快！那才叫生活。没有墙壁、不拘礼仪的世界。而现在，我却在这座有空调的坟墓里，在这个死人的城市里，在波托马克河边这座大墓地里。为什么呢，米歇尔？为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几点了？三点？你知道我为什么常常烦恼吗？因为华盛顿夜间没有狗叫，清晨听不见鸡鸣。你记住，我将在凌晨五点被枪决。不要问我日期，我只知道时刻……去睡觉吧，米歇尔，这些都是我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忘掉我说的这番话吧。我不认识生身的母亲，只知道继母是索莱达德马尔的圣母，她在当地的小教堂里。教区长是卡塔里诺·辛德尔神父，我的朋友……”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神父此时肯定在山上照顾生者和死者。去睡觉吧，米歇尔。谢谢你，晚安！”

“晚安，大使先生。”

这时候，贝切斯达区一条僻静的街道里，乌加特家的电灯早已熄灭。路灯穿过玻璃窗照进卧室，使充满香水和人体气味的房间依稀有些光亮。

尼珐·乌加特还没有睡着，想着突如其来的旅行，辗转反侧。打从丈夫那里知道她在两天之内前往瑞士的那一刻起——既然卡雷拉倒台不可避免——她就感到胸部憋闷，呼吸

急促，心跳加快……我的上帝！多么悲惨的生活！罗萨莉娅发了疯。萨克拉门托遭到共产匪徒入侵。瑞士大概象绿色明信片上画的一样单调乏味，只有山岗、河谷、水上木屋、奶酪和奶牛。好在那里出产高质量的巧克力……可是，要离开阿尔多·博雷里了。还有那些派热克斯硬玻璃器皿。她在华盛顿购买的、运到塞罗埃莫索家中的所有漂亮东西……

尼珐长长叹了口气。随着抽咽，胸脯起伏。泪水在涂着厚厚一层脂粉的脸上滚动。身旁，丈夫沉沉大睡，时而发出一声痛楚的呻吟。这只肥胖的老猫呼吸急促，总是不停地呼噜。他望了将军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愤怒与怨恨。

有一次，前警察首脑突然大声呻吟起来，整个身体也随之像癫痫病患者似地颤抖。尼珐用力摇晃他的肩膀：“乌戈！乌戈！醒醒！”他迷迷瞪瞪地坐起来，气喘吁吁，头耷拉在胸前。

“喂，你怎么啦？”

他愣了一会儿才回答：

“恶梦……可怕的恶梦……在山上打仗，打败了……我没有办法，朝山下跳……一块大石头在我身后滚……眼看要把我压碎……腿沉得像灌了铅，再也跑不动。幸亏你把我叫醒了……”

“你是肚皮朝上睡的，侧着身就好了。”

将军侧过身，又睡着了。她关上灯，闭上眼睛。但是，眼皮变成了黑色的银幕，银幕上出现了乱糟糟的形象。阿尔多·博雷里在汽车旅馆，光着身子……派热克斯硬玻璃器皿，五光十色……阿尔多紧挨着她躺在床上……弗朗西斯塔基，你看这只盘子多么漂亮，肉红色的，带白色花纹……

对，在“瓜盛顿”买的……可不便宜呀……唉呀，阿尔多。永别了，我的心肝！你会忘了我吗，亲爱的？……总统夫人，你看看这只绿盘子……放在火里也没有危险。唉呀，阿尔多！我子宫里着了火，想为你生个儿子！……说得对，女邻居，蓝色的最珍贵……我本来可以靠它们发一笔大财，谁料想来了这场混蛋革命……对不起，我说出了脏字……阿尔多，你肯抛弃一切……妻子、儿女、弟弟……一切，跟我到瑞士去吗？不用回答，我知道这不可能。派热克斯硬玻璃盘子！你不爱我，只是利用我，只是为了钱。唉呀，我太倒霉了！

尼珐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找个舒服的睡觉姿势。最后，和丈夫面对面躺着。丈夫呼出的酸臭的热气吹着她的脸。突然，她对睡在身边的男人火冒三丈，恨不得用膝盖碾碎他那萎缩而又无用的阳具。

第二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很晚才来上班。最近两天没有接到总统的电话。当天上午的报纸报道说，奥罗威德和圣费尔南多已经完全落入革命军之手，但他们在埃斯梅拉达港附近登陆时被忠于政府的部队击退。

大使把蒂蒂托叫到办公室。

“美国国务院有答复吗？”

“没有，阁下。”

“这群白痴！没有一点办外交的能力，非失去对西方世界的领导权不可！赫脱先生^①应当尽快雇个英国国务活动家

^① 赫脱（1895—1966）：美国政治家。1959—1961年任美国国务卿。

来负责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看了报纸上登载的你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了吗？”

“没有。全都登了？”

“删了一半多，显得有点空洞……大使先生，令人痛心的是美国报界不重视我国的局势。今天的日报给发明奶牛不锈钢假牙的消息的版面比你讲话的版面还大……”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好吧，蒂蒂托。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

豪尔赫·莫利纳博士坐在办公桌前，正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着。

萨克拉门托形势

1. 岛国南部完全被叛军占领。
2. 巴里奥斯的部队不时派小分队下山骚扰。每天都有几十个、几百个志愿者加入他的队伍。
3. 叛军在卡纳维亚莱斯登陆（待证实）。
4. 驻守埃斯梅拉达港的整整一营军队哗变，但没有得到其他联邦守军的支持。离开了城市，（可能）开赴山区。
5. 继续对岛国禁运武器。
6. 革命像油渍一样蔓延。
7. 美洲各国似乎同情革命事业。

公使衔参赞闭上眼睛。政府处境千钧一发。卡雷拉还能

抵抗多少时间？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他想起头一天夜里在寓所时的想法和感觉。他身穿教服，竭力集中精神，试图写出潘菲洛大主教的品格。白费气力！卡塔里诺神父的形象时时在脑海出现，他那黑色的身影像个衣衫褴褛的幽灵遮住了远处蓝色的山坡。现在，公使衔参赞开始对那个乡村神父有点羡慕了，此时他一定骑着毛驴来往于平原和山区，在精神上帮助革命者，重干三十四年前的伟业。卡塔里诺神父可以用清澈无畏的眼睛正视上帝（如果上帝果真存在的话）。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索莱达德马尔这位教区长也可以面无愧色、心地坦然、不眨眼睛地看着其他人和整个历史。现在，莫利纳觉得乡村神父的虔诚与善良确实伟大，足以使或许存在的上帝汗颜。

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拿起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勾出了山脉的草图。他想起了青年时代……在空气清新的日子里，从神学院宿舍的窗户可以眺望印第安山脉的峰峦。对于山区，他一直怀有掺杂着恐惧的向往。孩提时代，他以为霹雳和闪电都来自山上。山是风的巢穴。在怀疑上帝存在的时刻——特别是在举行牧师就职典礼的前一年——他不止一次向山峰发出无声的询问，却感到这询问得不到回答，折了回来，像块坚硬的玄武岩一样撞在他的胸前。

公使衔参赞感到肩膀上隐隐作痛。继续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如果卡雷拉下台，还能回萨克拉门托吗？不能，绝对不能。另一方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开始新生活的勇气。没有任何强有力的理由活下去。他不爱别人，也没有人爱他。

在冷清得没有人气味的办公室里，豪尔赫·莫利纳下定

了决心。到了最后时刻（比万科太太选择的自杀方式最好），他要用客观的，甚至玩世不恭的目光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从急转直下的局势中寻找点乐趣。莫不是向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吧？他来世界多年，作为长期在地球上存在的红利，生活总该让他享受享受目睹这一失败的苦涩欢乐。他想亲眼看看大使馆同事们在萨克拉门托形势变幻中的反应。他要一幕一幕地观赏这出悲喜剧，尤其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态度怀着特殊的好奇。他会返回塞罗埃莫索去保卫干亲家和上司吗？有那样崇高的人格吗？当然不会！他是个庸俗的冒险家，毫无贵族气质可言。乌加特刚刚飞往瑞士，他会起而效尤。

“我也想看看自己的反应。”莫利纳想，“我有采取最后行动的男子汉气概吗？莫非和别人一样，只不过是胆小鬼、追求享受的个人主义者？”

巴勃罗从报纸上看到第一批反叛部队在索莱达德马尔附近登陆的消息，马上意识到眼前敞开了一扇大门，他的命运已经明朗。除了加入米格尔·巴里奥斯的队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头脑里不同的形象和声音都向他指明了这条革命道路。

他决心不再考虑父亲的心脏病，开始准备启程，研究了前往山区的几条最完全的路线。所有那些准备工作——取消租用房间的合同、付清赊购款项、撕碎或烧毁文件——使他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就像一个孩子即将去度假、去冒险一样，既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头不痛了。他马上就要和每天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傢伙”重归于好。

然而，这几天收到的一封信曾使他有点心神不宁。母亲在信里说：

“我的孩子：你出乎意料地决定离开外交界使我们大为惊讶，非常伤心。一开始，我曾想隐瞒这件事，不

让你父亲知道，因为最近以来他心跳加快，胸部疼痛，还稍感气短。可是，我想，他迟早会通过某个没有通知到的朋友或者在报纸上了解，那时所受的刺激必将更加强烈。我一步一步把事情讲给他听，口气尽量缓和。你想象不到他是多么悲痛。

我考虑再三，怎么也想不通，在迈出这一步之前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这一步将使你难以重返祖国、回到家庭。

我恳求你，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们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们非常想念你。要不是你父亲健康状况不佳，我们俩人会立刻飞往华盛顿看望你，尽管我已经不敢相信你真的还想见我们。

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祸不单行。我们也为祖国遭到来自古巴的雇佣军入侵而惶恐不安。简直是一场灾难。这里的教堂里挤满了信徒，他们有的祷告，有的许愿，乞求上帝不让共产党人取胜。你父亲说，他宁肯死去也不愿落到那帮野蛮人手里。

回过头来谈谈你的事吧。要是迪奥尼西奥临死以前不能见你一面，那就太悲惨了。也许我们能请大主教阁下向总统求情，让他允许你回来，并且不受当局传讯。

你父亲祝福你，母亲也祝福你。

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你，亲切地吻你。

伊莎贝尔”

“尽管如此”？巴勃罗十分恼火，把信猛地塞进口袋，尽量忘却母亲的话——轻而易举地忘记了，快得连自己都吃

惊。这是因为，格里斯博士被绑架甚至可能遇害身死，还有围绕比万科被杀耍的肮脏把戏使胡韦蒂诺·卡雷拉得以发动政变并随心所欲地大肆进行暴力镇压，犹如给他精神上注射了疫苗，增加了身上对母亲讹诈病菌的免疫力。

一天晚上，他请奥尔兰多·贡萨加来到住处。像往常一样，巴西外交官一进门就走到壁炉旁边。壁炉上排放的几组表示耶稣受难的彩画泥人出自纳塔利西奥师傅之手。贡萨加每次观赏这些泥人，总能从中发现前几次不曾看到的细节。纳塔利西奥师傅让耶稣受难记里的人物穿上了现代服装。据巴勃罗说，从他们当中可以发现萨克拉门托1915年的政界要人。耶稣的形象就是被查莫罗的士兵杀死的胡安·巴尔萨。巴勃罗常把这几组泥塑称为“圣徒纳塔利西奥的第二遇难记”。

巴勃罗·奥尔特加准备饮料的时候还不时抬起头来笑着看看巴西朋友。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一直想要这几组泥塑……有一次甚至提出付五百美元把它们买去……还记得吧？好了，现在告诉你，我把它们全都送给你。”

贡萨加马上转过身。

“你是在开玩笑吧？”在说这句话的刹那间，他已经意识到朋友下边要说什么。

“我决定上山。”

“我预料到了。”

“为什么？”

“嗯……这几天你说的话，提的问题……你沉默寡言，

心神不定……一切都像水一样清楚了。”

“你认为这主意如何？”

巴西人耸了耸肩膀，接过朋友送来的威士忌，坐到椅子上：

“这种事只能由你自己决定。原先我曾想过你会去巴黎……”

“去巴黎意味着再次潜逃，意味着只换换布景，而我的小小的悲剧会依然如故。问题不属于地理范畴。带到塞纳河岸边和香榭丽舍大街去的将是像臭味一样挣不脱摆不掉的内心歉疚。”

贡萨加望着酒杯，陷入沉思。开口之前，犹豫了几秒钟：

“那么，迪奥尼西奥怎么办？”

巴勃罗从口袋里掏出母亲的信递给巴西朋友。贡萨加仔细读了一遍。

“你说该怎么办？”贡萨加把信还给他时，巴勃罗问。

“母亲甜蜜的讹诈。”

“甜蜜？多少年来，它使我吃尽了苦头。”

贡萨加干笑一声：

“巴勃罗，你认为被父母阉割了。手述是从你跟那个叫什么……皮娅干了风流事那一天开始的。自从这场革命爆发以后，你就产生了一种观念（有点混乱不清的观念，并且你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觉得你的生殖器官在卡拉维拉山顶，必须冒着艰险爬上山去才能找到它，恢复你的男性特征。对吧？”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奥尔特加也在喝酒，但有点心不在焉。他希望让朋友了解他的行动计划，但又想说得轻松自然，不显得过分郑重其事，免得朋友笑话……也担心自己笑话自己。

长时间的沉默。巴西人望着纳塔利西奥的泥塑，但什么也没有看见，心里在思考着巴勃罗的决定，似乎看到他身穿柿色制服，斜挎子弹袋，手里端着冲锋枪……

“喂，巴勃罗，坦率地说吧。你一向非常厌恶暴力。我无法想象你怎样开枪杀人。你考虑过吗？”

“当然考虑过。很多夜晚，我难以入睡，翻来覆去思考这些……”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兽性部分占了上风，杀人大概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你要想想第二天，枪筒和头脑都冷下来的时候，想想战斗之后的‘回潮’……”

奥尔兰多站起身，点上一支烟，用指尖摸了摸钉在十字架上、背上被皮带抽得鲜血淋漓的胡安·巴尔萨。

“也要想想胜利，胜利也会带来问题。人们的狂热煽动起来……报复……枪决……正义和非正义交织，难分难解……人民法庭……你的胃口能承受这一切吗？”

巴勃罗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你认为我应当有承受这一切的胃口吗？还有，贡萨加，我所作出的这种决定不能像算数学题一样去冷漠地分析。我知道，未知数太多了。要是我等到一切疑问得到解答之后，等到一切都万无一失之后再头脑清醒地去冒险……那时必将心灰意懒、胆怯退缩，只好留在华盛顿了。我不想这样做。”

“朋友，你是个受虐狂。”

“胡说！你知道我并非如此。和你一样，喜欢过优裕的

生活。”

“你想到过吗？我也有和你类似的问题。在我的祖国，数以百万计的同胞过着蛆虫般的生活。你以为我愿意留在像花花绿绿的肥皂泡似的外交界吗？可是，我想到了在我们巴西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发生内战的危险……你会说我是个享乐主义者。不错，我不否认，也不因此而痛恨自己。有一次，我曾试图蔑视自己，但没有成功。我非常喜欢自己，对本身的短处和缺点有无限的忍受能力。我也知道，如果参加一场武装运动，不得不杀人，我会发疯的。比起杀人来，死反而更惬意一些。不！不！要惬意得多。不知道……你会说我是个懦夫。也许说得对。不过我并非麻木不仁。有时候我看看巴西地图——巴西是个沉睡的巨人——想想它面临的问题和无尽无休的丑恶政治把戏，不禁扪心自问：干什么？跟谁一起干？怎么干？朝哪里走？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参加秘密革命运动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责任感——假若真的有责任感的话——那么此举无异于疯狂。重要的是拯救巴西，而不是拯救我奥尔兰多·贡萨加先生。看到了吧，这种思维方法使我一事无成……”

“我请你来的目的不是当面指责你，而是和你一起商讨我的问题。我决心参加巴里奥斯的队伍，不顾后果……现在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从各种意义上说，我都已经杀死了亲生父亲。”

“那么，感觉如何？”

“暂时……还没有什么。我像是处于麻醉状态，并且直至革命结束必须保持这种状态。”

“打算什么时候启程？”

“越快越好，两三天之内。也许更早。”

“怎样到达山区？”

“有两条路线可走。第一条：乘纽约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埃斯梅拉达港，然后转乘国内航线的小飞机到索莱达德马尔。”

贡萨加做了个悲观的鬼脸：

“要是在加勒比宝石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呢？要是因为爆发了革命飞往索莱达德马尔的商业班机已经取消呢？”

“也可以从纽约飞到牙买加，在那里包租一架小飞机在我父亲的别墅降落……”

“依我看，这个方案比较安全。然后呢？”

“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甘蔗田从索莱达德马尔一直延伸到山坡上。我相信卡塔里诺神父会帮助我找到巴里奥斯和他的队伍。”

“就像二十五年前帮助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找到卡雷拉一样。”

“完全正确。”巴勃罗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笑着说。

贡萨加似乎仍不满足：

“要是空中出租汽车掉进大海呢？”

“那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奥尔特加立刻发现方才这句话里包含的消极情绪。如果这样，不也是在寻求忏悔和惩罚，而并非决心为自己的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吗？他茫然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贡萨加问道：

“还有谁知道你的决定？”

“只有两个人：你和比尔·戈德金。”

“克莱尔呢？日本瓷娃娃呢？”

“今明两天向她们告别，说前往欧洲。或者说回塞罗埃莫索，没有关系。可是……现在我要和你商量几个实际问题。你不仅是我的继承人之一，而且是我的遗嘱执行人。”

“你还没有死呢，伙计！我希望在卡雷拉及其匪帮嘴啃泥的时候你仍然精神抖擞地活着。”

“这也是我的希望和愿望。但是，应当像有去无回一样行动。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做了个囊括整个客厅的手势，“挑些书和唱片吧，余下的留给戈德金。”他指指壁橱，“《圣徒纳塔利西奥第二遇难记》归你了，现在就可以拿走。”

“我只当它的保管人。”

“不，归你所有，永远归你所有了，不要再争论……高保真留声机送给广田喜美子小姐，我再找几本书……这房间属于我的家俱（有两三件）送给梅塞迪塔。给克莱尔留下巨鸟牌汽车。我会写一份‘财产清单’让你们去分。”

“别说啦！”

贡萨加好生不快，竟然动了感情。为了掩饰心中的悲伤，从牙缝里哼起一首叫《喝玉米面粥的小伙子》的巴西小调来。

“我已经为所有的欠款签好了支票。”

“你这傢伙，非让我哭一场不可吗？”

巴勃罗站起身，表示“实际问题”已讨论完毕。

“奇怪。”他说，“格里斯举行最后一次报告会那天晚上我们告别的时候，我曾对他说头痛得厉害……你猜他说什么？‘山上的清新空气将治愈你的偏头痛。’真的，这是他

的原话，我没有故弄玄虚。”

“那么，你相信……”

“真的，格里斯当时就知道卡拉维拉山上不久将出现革命队伍。不仅如此，还知道我必定在其中……”

巴勃罗随便从架上抽出一张唱片，放到高保真唱机上。原来是德国勃兰登堡演奏的音乐会。两个人静静地听起来。

“山上可没有巴赫的音乐。”几分钟之后，贡萨加嘟嘟囔囔地说，“只有手榴弹爆炸声和机关枪‘哒、哒、哒’的扫射声。”

“我怀疑你是卡雷拉的密探，前来瓦解我的斗志……”

“哪里话！我还羡慕你呢！”

巴勃罗打量了朋友一眼：

“可惜你个子比我矮，也没有我粗壮。”

“为什么？”

“否则，你可以继承我的衣服……”

“去你……”

贡萨加没有说出骂人的脏话，但他压低声音，像在舞台上朗诵似地说：

“英勇的青年人，即使在茫茫的黑夜，你也不难找到通往卡拉维拉山的道路！因为你的生殖器像灯塔一样在山巅闪耀！”

第二天上午，比尔·戈德金坐在联合通讯社的办公桌上，正审阅从萨克拉门托发来的最新消息。革命军队在卡纳维亚莱斯省登陆成功已经得到证实。奥罗威德和圣费尔南多完全陷落，但入侵者向索莱达德马尔的进军速度缓慢，这不仅因为公路年久失修、部队给养困难，而且由于政府军的战斗机反复俯冲扫射。

情况已经明朗，米格尔·巴里奥斯是这场革命的最高领袖。现在，他在卡拉维拉山区建立了指挥部，但索莱达德马尔仍由联邦军控制。对于革命军来说，夺取此镇至关重要，因为得到一团炮兵增援的陆军第五团扼守着沿海的狭长地带——这是绕过山脉、进军北方的最便捷、最安全的通道。

戈德金又把刚刚收到的联合通讯社驻塞罗埃莫索记者的密信读了一遍。为了逃避卡雷拉警察严格的检查，这封信是通过美国信使带出来的。记者说，了解其他地区真实情况越来越困难，因为萨克拉门托政府禁止外国记者离开首都，并且检查他们采写的新闻。因此，盛传埃斯梅拉达港和帕拉莫

发生了骚乱。“塞罗埃莫索简直像兵临城下。”记者接着说，

“居民被迫在夜里八点以前回家。严格禁止公共或私人聚会，大学早已关闭，首都一切咖啡馆、俱乐部、剧院和电影院都停止营业。夜间，空荡荡的街上只有野狗和荷枪实弹的巡逻队。继续搜捕‘可疑分子’。人们私下说，不加审判的处决和拷打政治犯秘密进行——对这类见不得天日的事情没有一家报纸敢于张扬。保守阶级惶然不知所措，据说被卡雷拉解散的议会几名议员正设法与米格尔·巴里奥斯的代表达成秘密谅解。”

密信最后说：

“如果指望卡雷拉在最近几周或一个月之内彻底垮台，未免过分乐观。整个空军和实力强大的塞罗埃莫索和埃斯梅拉达港守军仍然忠于政府。然而，有一个问题严重困扰着独裁者和他的将军们：武器弹药日益缺乏，因为美国禁止向政府军和叛军出售战争物资。如此下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放者’不可能在政府大厦庆祝下一个圣诞节，只好到流亡地或地狱去度过了。”

戈德金十指交叉，托住后颈，一面抽烟一面望着窗外。美国政府进行武器禁运，是因为国务院对胡韦蒂诺·卡雷拉及其一伙继续当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似乎不言自明，米格尔·巴里奥斯仍然是个政治上的未知数，帮助他“独吞”政权亦不可取。对美国利益来说最理想的办法是叛军和萨克拉门托大资产阶级踩着卡雷拉的尸体签订一项协议。可能美国驻塞罗埃莫索大使正在大主教和大元帅原内阁成员帮助下为此进行活动。

戈德金现在才意识到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莫名其

妙的跃跃欲试和无缘无故的害怕。每当要干什么困难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之前的时刻总是这样心神不定……突然他发现了原因所在。不久，他就要把巴勃罗·奥尔特加送到机场。小伙子先到纽约，接着飞往牙买加，从牙买加再转道去卡拉维拉山。

巴勃罗·奥尔特加！你强行改变了自己反对暴力的本性，因为不能帮助本国人民从贫穷和压迫中拯救出来做点什么而感到内疚，并且无法继续忍受下去。

戈德金在烟灰缸边上磕了磕烟斗。他又一次反问自己：“世界上果真有彻底摆脱歉疚感的人吗？”

他往烟斗里装上烟丝，点着，吐出一团浓烟。现在明白了，他本人感到对露丝之死负有责任。露丝病入膏肓，他和任何人都无法救治。不过，他觉得，妻子死了，他活了下来，这本身就是对妻子的不忠。

现在，三个人坐在贡萨加的汽车里沿宪法大街朝飞机场疾驰。巴勃罗·奥尔特加坐在巴西朋友旁边朝车外张望，像在高空荡秋千一样，感到头晕目眩统统“浓缩”到胃里。比尔·戈德金坐在后排座位上，两脚平伸，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挖空思想说点什么，但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头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在晨光照耀下，道路两旁的树木和草坪更加翠绿。汽车在泛美联盟办公大楼前面经过的时候，格伦达·多列玛斯那倍受折磨的幽灵在奥尔特加的脑海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从欧茨莫拜尔大街往左拐，汽车朝林肯纪念堂开去。这时候，大使的影象取代了乔治亚州姑娘。四月的那天上

午……艾森豪威尔总统笑吟吟地站在白宫大门口的台阶上。阳光照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脸，他目光炯炯，走上台阶，伸出手……

现在，汽车正穿越纪念大桥。波托马克河河水混浊，呈紫黄色。乔治敦两侧，浓密的树冠上露出教会大学蓝灰色的屋顶。巴勃罗记得，去年秋天，格里斯曾在其中一间大厅里作过一次关于贡哥拉的讲演。那是个了不起的夜晚。教授在听众前面走过——都是学习西班牙语文学的学生——像个老练的演员一样举止潇洒，还朗诵贡哥拉的代表作《波利非莫和加拉黛亚的故事》。巴勃罗喃喃地念出了声，

“……一群不祥之鸟飞过夜空
发出阵阵哀鸣。”

“你说什么？”贡萨加转过脸。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首诗。”

“啊！”

巴西人吹起口哨。是一首桑巴舞曲。现在，汽车在河的另一边疾驰。美国政府为死于海难的人树立的纪念碑隐约可见，一群海鸥在浪尖上嬉戏——那是一首刻在青铜上的俳句，简短而轻快。奥尔特加想起了广田喜美子。头一天，两个人在常常去的一家茶馆见了一面。他告诉娇小的日本姑娘，这次是为告别而来的。广田小姐沉静地回答说，她知道这个悲伤的时刻迟早会到来。巴勃罗说，他要回自己的国土。她说：“巴勃罗，‘国土’是个含意非常广泛的词，包括城市、农村、河流、谷地……还有山脉。”现在，巴勃罗明白

了，欺骗不了她，她已经猜到了他的目的地。在她住所的公寓前告别的时候，巴勃罗紧紧把她搂在胸前，吻了吻她的前额。她从男友的胳膊里挣脱出来，近乎跑着走进大门，看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同样，也瞒不过克莱尔·奥吉薇。“巴勃罗，在我眼里，你一直像玻璃一样透明。你说要去巴黎，嗯？我不相信。你要上山。”说完，哼了一声。她的眼睛湿润了，嘴撇向一边。“克莱尔，我想把巨鸟牌汽车留给你。”“你不在期间，我可以代为保管。”“不，克莱尔！我是作为礼物送给你的。”女秘书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你疯了？我怎能接受这样的礼品呢？”他笑了：“克莱尔，亲爱的，你们美国人在赠予方面堪称大师，但是应当学会‘接受’这门学问。把汽车留给你作个纪念我非常高兴。请收下吧，不要提什么伦理学或技术上的问题了。”听了这番话，这位生性活泼、老于世故而又精明干练的粗壮女人竟然像个小姑娘似地哭出声来。

巴勃罗在泛美航空公司的窗口签了机票、托运完行李之后，三个朋友便在候机厅里遛跬起来，既没有地方可去又找不到交谈的话题，像个用不谐调的干咳、口哨和抽烟斗组成的奇特的三重奏……奥尔特加在一个柜台前买了本袖珍版侦探小说，准备在飞机上消磨时间。消磨时间容易，杀人可就难了，即使是杀最凶恶的敌人也罢。还是不想这件事为好……只应当有一个念头：到达山区。只想山区。建起一堵墙壁遮住过去，再建一堵墙挡住将来。在这块狭小但生动、紧张而富有弹性的小天地里义无反顾地朝既定目标挪动。

三个人不时偷偷看看候机厅的大钟或者手表，每逢扩音器里传出一架飞机起飞的通知，三个朋友都顿时紧张一阵。

还是贡萨加先开口了：

“巴勃罗，我可以问一个个人问题吗？”

“当然啦，伙计！”

“到了山上，你打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蓄大胡子吗？”

奥尔特加发出短促的、神态不安的笑声，回答说还不曾考虑这个重大问题。烟斗冒出的青烟后面，戈德金的眼睛里也露出了笑容。扩音器里通知，巴勃罗所乘飞机即将起飞，三个人走到指定的入口。戈德金长时间地和奥尔特加握手，嘴里叼着烟斗，含糊不清地说：“小伙子，多保重！”贡萨加紧紧拥抱他，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巴勃罗·奥尔特加刚刚在通往飞机的走廊中消失，他的朋友们便转身默默朝汽车走去。

九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比尔·戈德金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一直惴惴不安。梦见正爬一座高山，心里有一种既高兴又害怕的奇异感觉。尽管明知死神正在山巅等他到来，却还拼命往上爬。“既然如此，”他扪心自问，“为什么还要往上爬呢？”他本人又回答说：“因为应该爬，应该爬。”离人们居住的土地越来越远，但他既不愧惜也不后悔。他不想往下看，免得头晕目眩。只感到自己干净、轻飘、欣喜。高处的空气冰冷清新，天上的星斗伸手可及。突然看见自己的尸体倒在一块巨石上，成群的秃鹰正在啄食。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要上山：约好和露丝在上顶上见面。如此重要的生死会见怎能忘记的？露丝和死神原来是一个人。

凌晨醒来，坐在床上，他竭力回忆梦中的情节，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生命千奇百怪、奥妙无穷。

第二天，他很早就下了床。刮脸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巴勃罗启程前一个星期常常朗诵的一首奥登的诗的头一句：

“我认识一位退休的牙科医生，他迷上了高山。”

坐在厨房喝咖啡的时候，他发现有个念头正在头脑中形成。来到联合通讯社，主意已经拿定。他突然欢欣雀跃，恢复了青春，径直朝社长办公室走去。

“弗雷德，我有个想法。”

“比尔，至少该说声早安吧。”

“请原谅，弗雷德，早安。你大概知道，现任总统胡韦蒂诺·卡雷拉在山上为推翻独裁者查莫罗进行斗争的时候，我采访了他，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当然知道，伙计！已经载入史册了。”

“我临近退休了，如果以在同一个山区采访即将推翻独裁者卡雷拉的人来结束我的记者生涯，那会是很有意义的……”

社长望着他，铁青的脸上毫无表情：

“这把年纪还上山？你疯了。”

“算不了什么。首先，事情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困难。索莱达德马尔还有小毛驴可骑，卡塔里诺神父依然任教区长，上帝仍在天上，并且我也不像你想得那样老不中用！”

“可是，你怎能进得了山区？我并非指身体和地理方面的困难，而是说官僚机构方面……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国驻塞罗埃莫索大使馆可以帮忙。”

弗雷德悲观地摇了摇头：

“我不相信国务院肯插手。局势非常微妙。不要忘记，我们驻萨克拉门托的记者虽经百般努力，当局也不准他离开首都。”

“这一切我不是不知道。不过，即便如此，也还值得一

试。”

“比尔，你究竟要以此来证明什么呢？”

老记者叼着烟斗想了想。

“还说不清楚。今天刚刚想出这个主意，觉得这样干心里高兴。”

“不要指望我‘正式’批准你去冒险。但是，请相信，我决不阻拦。旅费和风险都由你本人承担。不过我怀疑你能过得了华盛顿这头一关。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会发给你签证。”

几天以后，报纸报道说米格尔·巴里奥斯带领队伍下了山，在来自南方的革命军的帮助下包围了索莱达德马尔，守军经过暂短的抵抗之后便宣布投降。现在，叛军已经打开了通往北方的道路。报道还说，革命力量在岛国西部海岸登陆成功，旨在夺取通往首都的必由之路——帕拉莫。

现在，戈德金每天晚上收听革命者设在索莱达德马尔的电台广播，得知米格尔·巴里奥斯在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的庄园别墅建立了总部，巴勃罗·奥尔特加和他在一起，担任秘书。一天晚上，老记者惊喜地听到他的朋友在电台宣读了一份革命军总指挥部的公告。“现在好了！”他想，“可以轻而易举地采访巴里奥斯了！”他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秋天带着琥珀紫色的宁静来到人间。一天下午，广田喜美子走到办公室窗前，望着大使馆花园里的一群松鼠在草坪上嬉戏，在树上跳跃。树叶有的金黄，有的像铁锈一样残

红。

她想起了巴勃罗，默默地为他作了一首俳句。

秋 天

铜色丛林里，
有着无数黄蝴蝶，
一只褐松鼠。

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办公桌前，神色凄凉。眼前是东京刚刚发来的密码电报。只得开始翻译。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花园里草地上随风滚动的枯叶，心中郁闷。上午和卡雷拉总统通了电话。干亲家告诉他，局势虽然还不绝望，但已经相当严重。他，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再抱幻想……知道革命者的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向英国大使馆冷峻的大烟囱投去一个嫉妒得近乎恼火的目光。全完了。虽经他一再努力，最后还没有说服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通过一项宣布古巴为侵略国的决议。他也未能说服美国国务院取消对萨克拉门托政府的武器禁运。最让他气恼的是，近几天来使馆的人员纷纷逃离。

他转过身，看了看阿丰索·布斯塔曼特的画像，恨不得在那个痴呆的脸上啐口唾沫。他把奥吉薇小姐叫来：

“告诉莫利纳博士，马上来这儿！”

几分钟以后，公使衔参赞走进来。加夫列尔·埃略多罗

盯着他的脸说：

“刚刚预感到轮船开始沉没，老鼠们就逃出船舱了。头一个是乌加特，带着老婆跑到瑞士去了，甚至连再见也没有对我说一声。这个卑鄙的东西！胆小鬼！你事先知道吗？”

“我敢发誓，一点儿也不知道。将军和我的关系一直仅限于客套……”

“蒂蒂托逃往巴黎，这倒不奇怪，他算不上个男子汉。”

他死死盯着公使衔参赞的眼睛：

“你呢？……什么时候走？”

“到哪儿去？”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应该清楚。”他转过身，背向对方，仿佛看到莫利纳那张脸心里就别扭，“上星期米歇尔也走了，等到领过月薪才走的……他没有勇气见我，留下了一封告别信，并且是用法文写的！”

乌加特逃走之后，他的助手们都被召回萨克拉门托服现役。现在，大使馆几乎空无一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有一种被抛弃、遭到背叛的感觉。

“读了最新消息吗？”

“看到了。”公使衔参赞尽量品尝这个重要的时刻。趾高气扬、刚愎自用的大使开始陷入窘境，必须不失时机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

“你的意见怎么样？”

“依我看政府岌岌可危。”

“我也这样认为。糟糕的是我在这里无事可做。为什么不坐下，莫利纳博士？”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转身坐下，脸一耷拉，仿佛蜡制的假面具突然熔化了。他弯腰塌背，表情凄凉，目光混浊，一动不动，躯壳中的印第安人显露出来。很快，又挺起胸膛，恢复了常态，眼睛重新闪闪发光。

“克莱尔！克莱尔！”他大声吼叫。等女秘书来了，他吩咐说：“打电话给泛美航空公司，给我订一张机票，只订单程！”

“到哪儿？”奥吉薇塔问。

“这个问题是对我的污辱。当然是到塞罗埃莫索！看能不能订到明天的班机。”

克莱尔走了。公使衔参赞眉头紧蹙。在他构思的闹剧之中没有这个场面！

“莫利纳博士，从此刻起，你就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驻华盛顿的临时代办。通知美国国务院……就说总统紧急把我召回国了……代我向美国佬问候，祝他们下地狱！”

莫利纳目瞪口呆。

“听清我的话了吗？”

“完全听清了，大使先生……可是……我可以知道你回萨克拉门托打算干什么吗？”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懒洋洋地用手擦了擦脸才回答说：

“这时候，我的全家：妻子、女儿、女婿、孙子……都安全到达了委内瑞拉的特鲁希略城……可是我，我要回到干亲家身边，抵抗到底，如果必要，就死在那里。”

豪尔赫·莫利纳看了看上司，目光中头一次带着点尊敬和钦佩。

比尔·戈德金在哈瓦那等了整整三天才买到一张去索莱达德马尔的机票。当飞机在城镇上空盘旋，随后飞近山峦终于在机场降落的时候，比尔考虑的是时间与人生的奥妙，竭力从地上的景物和自身当中寻找自己——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的那个二十五岁的年轻记者。

大海湛蓝，带有紫色，间或有几片翠绿。波浪缓缓涌上洁白的沙滩，慢慢消失。低矮的白色房屋参差不齐地散落在山坡上，像一群群不动的绵羊。

“露丝！亲爱的露丝！我又来了，但仍然是个文盲，看不懂上天的意念。”他望望层峦叠嶂的山脉，觉得妻子正在峰顶等待和他相见。这种想法未免荒唐，但确实使他惴惴不安。

巴勃罗来机场迎接。他穿着柿色作战服——汗衫、裤子、短腰皮靴——头戴一顶军帽。

他冲过去紧紧拥抱老记者：

“比尔，老朋友！真让人高兴！过得怎么样？一路上好

吗？贡萨加呢？克莱尔呢？一共几件行李？机票在哪儿？”

老记者左翻右找，费了很长时间才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张黄色的小本。十分钟以后，一辆吉普车载着他们开动了，司机是个活泼可爱的黑人士兵。比尔抽着烟斗，不时望望坐在身边的朋友。巴勃罗脸晒黑了，稍微瘦了一些，但仍然带着先前那种难以掩饰的焦虑表情。

吉普车在狭窄的柏油路上飞驰，路旁的甘蔗田在轻风吹拂下摇曳不定。偶尔出现一片白色，那是树木丛中的一座座别墅。巴勃罗随口说出是谁家的庄园。间或看见一座榨糖厂，车外扑来一股带甜味的热浪。

一连几分钟，奥尔特加口若悬河，但毫不带个人感情。他用西班牙语请朋友注意土地的颜色，这棵或那棵树的样子，介绍所经过的河湾或者路旁的行人。比尔静静地听着，沉浸在广漠的美景之中。清爽的海风抵销了太阳的炽热。

巴勃罗突然沉默了。戈德金瞥了他一眼，用英语问：

“你怎么啦？”

“以后再谈。”

庄园终于到了。一条两旁梧桐树成荫的大路通往别墅。这座有二百年历史的西班牙式宅院有厚厚的围墙环绕，酷似一座城堡，显得雄伟、庄重，白骨色的正面经时间的冲刷和风雨的剥蚀而斑斑驳驳，好像故意炫耀当年的威严。

门口，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站岗。进到院内，比尔·戈德金听见噼噼啪啪的打字机声，看到身着军服的男女在各个屋子之间来往穿行。老记者注意到，人人精明干练，严格按军事化行事。

巴勃罗把他领到一个房间。

“那儿是浴室，打开行李，冲个澡（当然，如果愿意的话），然后我们一起吃午饭，下午四点见领袖。”

四点钟以前不久，比尔·戈德金带上照像机和录音机，被领到一个宽敞的客厅。屋里笨重的家俱都呈深色，粗糙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一边还有一个中世纪式样的壁炉。巴伦西亚亲自出面接见。两个人握手以后，戈德金用照相机似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巴里奥斯的代表。罗伯托·巴伦西亚四十多岁年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给人以有力量、有权威的印象。”老记者心里想，“这不仅来自他宽阔的胸膛和结实的二头肌，而且来自那张比身体其他部分稍黑而又细嫩的脸，来自他那鹰钩鼻子和倔强的嘴。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燃烧着像炭火一样没有火苗但经久不灭的激情。不知道为什么，比尔认为他是巴斯克人的后裔。此人的样子并不让他反感，但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记者心里敲起了警钟。

“戈德金先生，”革命军参谋长说，“巴里奥斯将军会见你五十分钟，一秒钟也不能超过。我看你带来了录音机，很好，谈话可以录在磁带上。先生有随便提问的自由。领袖回答与否和如何回答，由他决定。至于照片，只限照三张。这些细节我们以后再谈。”

奇怪，罗伯托·巴伦西亚的声音跟贡萨加有点相似。戈德金点头同意。对方接着说：

“会见结束后，先生自然要写稿件。我们要求你把定稿交我们研究，以便决定是否通过。谈话见报以前，磁带由我们保存。会见以后，先生要对麦克风声明，除了磁带上录下的之外没有提任何其他问题，也没有说任何别的话，以保证谈

话的真实性。”

戈德金笑了：

“看来你不信任我……”

“先生，我不信任任何人。”巴伦西亚说，“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肯信任。”

四点钟，米格尔·巴里奥斯走进客厅。军官们站起来，行过军礼便退了出去。看到眼前这个和唐·吉珂德一样又高又瘦的人，看到他黄黄的前额和与面皮呈鲜明对照的黑色大胡子，戈德金不禁暗自发问，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军阀们不模仿西蒙·玻利瓦尔的样子，偏偏要学耶稣的尊容呢。

巴里奥斯伸出手，戈德金一边握着一边嘟囔了几句客套话。革命首领坐到软椅上，两腿交叉，像口授一样一字一句地说：

“我想会有个书面提纲……”

巴伦西亚看了美国记者一眼。他赶紧解释说：

“将军，没有带书面提纲。我认为使这次会见显得随便一些反而更好。当然，我知道要问哪些问题。”

巴里奥斯回答说：

“请相信，我知道该如何回答。开始吧。”

戈德金准备好录音机，试一试，磁带盘转起来。

“我是联合通讯社的记者威廉·戈德金，正在索莱达德马尔的萨克拉门托革命军总司令部会见其领袖米格尔·巴里奥斯将军。现在是1959年10月18日下午四点十分。”他把麦克风放在他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小桌子上，“巴里奥斯将军，这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记者先生，我认为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我可

以回答。我们的目的像中午的太阳一样明白：推翻现政府，建立一个能在本共和国促进社会公正和进步的人民政府。”

“革命政府打算以古巴为榜样吗？”

“我们把古巴人看作朋友和同盟军，但既不依赖古巴也不依赖世界上别的国家。我们所追求的是祖国从未享有过的真正的自决权。”

“那么，你希望在这个岛国恢复民主……”

巴里奥斯像祈祷一样两手合拢，回答说：

“‘恢复’一词用得不确，戈德金先生。不能恢复从未建立过的东西。”

“好，我换一个动词，说‘建立’民主……”

“对，我们旨在萨克拉门托建立林肯所说的民主：属于人民，为了人民。不过，我要提醒美国和其他各国新闻界，我们对围绕民主一词所进行的争论不休的学院式定义不感兴趣，主要目的是达到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社会和政治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存在。”

磁带盘在转动。巴伦西亚不时朝天花板吐一口烟，显得很不耐烦，似乎觉得这种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巴勃罗·奥尔特加坐在戈德金旁边，用一截铅笔在纸上记着什么。

“革命政府将对美国公司采取什么态度？”记者问。

巴里奥斯干咳了一声，巴伦西亚顿时紧张起来，巴勃罗抬起头。

“在适当的时候它们和整个世界就会知道。”领袖回答说。

“革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土改吗？”

“当然。”

“在什么基础上进行？”

“对土改下个文学上的定义，我们也同样不感兴趣。我们将寻找对国家效果最好、最快的办法。总之，怎样对人民最有利就怎样做。”

“可以告诉我你认为什么是‘人民’吗？”

巴里奥斯挺直身子，飞快地看了巴伦西亚一眼，回答说：

“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毫无意义，近乎玩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回答。”

戈德金忍不住瞥了巴勃罗一眼，只见他仍然毫无表情。接着又提出一系列问题：革命政府希望得到美洲各国立即承认吗？在你看来，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失踪如何解释？你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何看法？

巴里奥斯像个有学识的教师一样准确地逐一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有一次，他稍稍犹豫十分之一秒，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巴勃罗刚要插嘴，巴伦西亚粗暴地阻止：

“领袖不需要监护人！”

“我也不需要！”奥尔特加回敬说。

戈德金想知道，为了避免继续流血，革命领导集团是否肯与资产阶级达成一项协议。“当然，应以胡韦蒂诺·卡雷拉立即辞职为基础。”他解释说。

“亲爱的记者，”巴里奥斯说，“答案很简单：不。我们最后胜利在望，不向任何人退让。在几星期甚至几天之内，我们将进入塞罗埃莫索。现在，几乎全国领土都在我们手中！”

“你打算对美国实行睦邻政策吗？”

“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友好，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

“希望通过我们向美洲传达什么信息吗？”

巴里奥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转动的磁带，突然站起来说：

“现在不是传达什么信息的时刻。我们还在战斗。到了适当的时候，革命指挥部会表明态度……”

说定，他站起来，让记者照了三张照片，样子有点急促不安（巴伦西亚拒绝在照片中出现），随后干巴巴地说了声“祝你顺利”，便转身离开了客厅。

“打算什么时候写完访问记？”巴伦西亚问。

“傍晚。我想利用明天的班机寄走。不过，在此之前打算用电报向联合通讯社发一条会见的简讯。”

“去写消息吧，戈德金先生，我负责替你发出去。一直到夜里我都在办公室。”

40

随后，比尔·戈德金回到自己房间，用了两个小时用打字机撰写稿件。七点整，把访问记连同录音磁带一起交给了巴伦西亚。

“今晚十点以前，我把稿件退还给你。”革命家说。

奥尔特加建议戈德金趁还有一缕阳光到索莱达德马尔街上走走，然后到当地一家餐馆吃晚饭。

两个人上了吉普车，这一回由巴勃罗驾驶。戈德金发现，他开车有点紧张，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没有说出口。从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庄园到镇上两个人很少交谈。

火红的太阳慢慢坠到山峦后边，群峰染上一层紫色。巴勃罗把头朝大海方向一扬，低声说：“那里就是有名的埃梅罗海，水面上有一片片葡萄酒色的痕迹……”

巴勃罗把汽车停在中心广场附近的山丘上，两个人下了车，不慌不忙地在镇上蹒跚。沉静的空气中弥漫着傍晚特有的经太阳晒热的土地和石头的气味。

“一片和平景象！”戈德金望望窗口一张张混血女人表

情凄凉的脸，感叹说，“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滞了……”

一个身穿黑衣裙的老妇坐在门口，苍白而皱裂的手里拿着一串木头念珠。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在摆弄缺胳膊少腿的布娃娃。离门口不远的地方，鞋匠坐在小凳上钉鞋底。街上来来往往的男人们打着赤脚，身穿白棉布汗衫，头戴草帽，看到戈德金和巴勃罗，都怯生生地躲到人行道下边为他们让路，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戈德金觉得，三十多年来圣母广场没有任何变化。当地大嫂们来打水、谈天的水池还在。仍然是当年古旧的路灯。

“渔民咖啡馆”把未加油漆的松木桌子摆到人行道上，粗糙的椅子上垫着草垫。水果摊上，苍蝇和蜜蜂围着芒果、菠萝和人心果飞舞。建于殖民者时代的教堂正面的四分之一被九重葛遮盖，绿叶间开满了鲜红的小花。

“可惜卡塔里诺神父不在镇上。”巴勃罗说，“被大主教召到塞罗埃莫索去了。”

“又要训斥他一顿吗？”

“不。这一次主教大人似乎要利用教区长作为信使，试探巴里奥斯是否愿意同资产阶级达成一项协议……”

“我们的辛德尔神父怎么样？”

“啊，仍然患溃疡病……还要关心他人的溃疡，特别是精神上的溃疡……在山上，我多次和他交谈，颇受教益。他是个怪人。”

“怪人？”

“也许用词不当。是个……罕见的人。在他面前，我更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两个人坐在一个长凳上看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一

群男孩子们在玩球；一只猫站在墙头，全神贯注地盯着鸟笼里一对绿色的鹦鹉；女人们头顶灌满水的煤油桶沿着从广场向海湾扩散开去的街道轻快地走着。

“你的头还痛吗？”戈德金问。

“不痛了，可是……接着走吧。”

他们朝通往海滩的一条路口走去。一只瘦骨嶙嶙的癞皮狗跟在后面，闻闻巴勃罗的皮靴，又闻闻戈德金的皮鞋。附近的房子里传出孩子的哭声。两个朋友默不作声地走了几步。

“戈德金，你知道……知道我父亲的事吗？”

“不知道。他怎么啦？”

“死了。”

“什么时候？”

“两个星期以前，那时候我还在上面。”巴勃罗把头朝山那边一扬。

“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每天晚上收听塞罗埃莫索官方电台广播。对我们，它竭尽造谣之能事，但也播一些其它新闻。迪奥尼西奥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他们大作文章，公然说是看到我参加‘革命匪徒集团’而发病的，并且采访了我的母亲。在录音讲话中，她证实了丈夫的死因，称我为杀人凶手，还说永远不再见我……”

“确实是她本人的声音吗？”

“不错。当然，官方电台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称为叛国贼，杀父者……”

“那么你呢……感觉如何？”

巴勃罗耸了耸肩膀：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过。山上有一种什么魔法。大概是空气稀薄的缘故，人们从一个独特角度看待世界，万物也就显得不同了……对生活、对人都有新的看法。可是……对父亲的死，我自然很难过。”

“他们企图把罪名强加到你的头上，我希望你不要接受。你对我说过，你还在穿短裤的时候他就患心脏病。你想想，像迪奥尼西奥这样讲究品德的人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不得不违心地支持卡雷拉，支持他贪污腐化、罪恶滔天的政府。依我之见，正是这种心理矛盾一直噬咬他的五脏六腑，最后致他于死命。现在，他们想把你当成替罪羊，你千万不要承担这个角色！”

戈德金发现，巴勃罗不时偷偷回头张望。两个人在一家商店橱窗前停下来看里边的廉价塑料玩具时，巴勃罗小声说：

“你注意右边……看到那个穿柿色军服的人了吧？从我们下了吉普车，他一直跟踪……”

“为什么？”

“可能是巴伦西亚派来的，想了解我们到哪儿去，干什么，尽量探听我们谈些什么……”

“这么说，他连你也怀疑了？”

“对。以后再解释我的处境。我们来打个埋伏，抓住这个探子。”

他们拐进一个胡同，巴勃罗拉住朋友的胳膊，让他停下来，两个人紧紧靠在墙上（戈德金很开心）。跟踪者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出现在眼前——是个矮胖的印第安人。看

到巴勃罗，他大吃一惊，听得出来，呼吸也骤然停止了。

“为什么跟踪我们？”奥尔特加厉声喝道，同时逼向士兵，仿佛要动手揍他，“谁派你来的？”

对方赶紧立正。

“可是……上尉先生，”他张口结舌，“我散散步……”

巴勃罗喘着粗气，鼻翼翕合，从头到脚打量了士兵一番：

“告诉派你来跟踪的那个人，说他白白浪费时间。给我滚！”

对方慌里慌张地行了个军礼，转身快步朝街那头走去。戈德金笑了。巴勃罗仍然板着脸，但看到同伴的表情，也咧开嘴笑了。

“喂，比尔，在你的文章里，绝对不能提及刚才的场面。我还有很多事对你讲，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保证，我所讲的一切属于绝密，不准公开。”

“我保证做到。”

“好，我们去吃点东西吧。我知道一家餐馆，以海味见长。就在下边，这条街的尽头。条件简陋，不过能脱离美国的杂品店、咖啡馆那种千篇一律的气氛倒也不错。还有，不再用密胺树脂压制品，塑料和镀铬金属餐具，看不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说到灯，我想起来了，电力定量供应，我们不得不在蜡烛下吃饭了。”

“好！好极了！”

傍晚的天空灰濛濛的，卡拉维拉山峰上边有一颗星闪着颤抖的白光。一家后院冒出的青烟袅袅上升，空中充满了熬糊了蜂蜜的气味。

“闻到这种气味我就想起童年，想起堪萨斯州的草原……”戈德金深深吸了口气，嘟囔着说。当年的家浮现在眼前：母亲在厨房里煎丸子，父亲坐在廊檐下的安乐椅上读着当天的《商业日报》。

“那是烧雅卡兰达木的烟味。这种香味能使我回忆起跟皮娅在伊甸园度过的下午时光。”

两个人来到一家餐馆。屋檐下粉刷过的墙上用绿色大字写着“沉思的美人鱼”。他们坐在小餐馆一角的桌子上，紧靠朝海湾开的窗户。戈德金往四周望了望。墙上和地上都铺着蓆子，房梁上吊着鱼网和巨大的空酒瓶，通往厨房的门上边有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个浑身披着金黄色的鳞、长着两个玫瑰色乳房的胖胖的美人鱼正闭着眼睛斜靠在荒无人烟的沙滩上——据巴勃罗说，作品出自当地蹩脚画家之手。

半明不暗的餐馆里没有别的顾客。一个头发花白、皮肤红黑、蓄土耳其式胡须的胖男人走过来问两位先生想吃什么，等认出了巴勃罗，又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面。

“比尔，他是我的老朋友马卡利奥，本餐馆老板。喂，马卡利奥，跟戈德金先生握握手！他是个记者，美国佬，今天采访了领袖。”

“吃点什么？”老板问。

“我们相信你。”巴勃罗说，“先来盘本店风味的大虾，再做个你拿手的鱼。不用说，先要葡萄酒、面包和奶酪。”

戈德金同意朋友点的饭菜，望了望海湾码头，有几只渔船在那里抛锚停泊。

巴勃罗指指街的尽头、靠近沙滩的一座白色房子，

“纳塔利西奥师傅生前就住在那儿。”

“生前？”

“对。他在上星期我们攻下本镇的时候死了。”

“怎么死的？”

“中了流弹。他正坐在门口捏泥人，完全没有留意在进行激烈战斗。人们永远不会知道打死他的子弹究竟是哪边飞来的。”

“他的孩子们呢？”

“跟我们在一起，个个都是好战士。”

戈德金还望着海湾。

“巴勃罗，我倒很想听听你的经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时候，两个男人走进饭馆，坐到靠门口的一张桌子上，看样子是渔民。

“你必须再次答应，对我所讲的一切绝对保密。”

“我再重复一遍，绝不泄漏。”

“好。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历尽艰险才找到巴里奥斯的部队。一天傍晚，我乘一架出租飞机在庄园的别墅场院降落，同一天晚上就带着搞到的所有武器弹药钻进甘蔗田，在一个农民引导下上了山。”

“那么，巴里奥斯呢？……他是怎样接待你的？”

“开始的时候有点怀疑。不过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接纳，任命我为上尉衔纵队秘书。我承认，这一切有其喜剧性的一面。奥尔特加上尉！”

“很好听。”

“比尔，并不压韵。”

“要压韵干什么？接着说吧，巴勃罗。”

饭馆里渐渐坐满了顾客，其中还有几个穿制服的士兵。他们决定用英语交谈。有人大声要求点灯，老板一桌一桌地点着了插在空酒瓶口上的蜡烛。

“革命军经常派出别动队下山袭击附近的村镇和联邦军巡逻队，”巴勃罗接着说，“并且总是在夜间进行。我在领袖身边工作，除了起草命令之外还撰写一种类似纵队日志的文件。你可以想到，我不喜欢如此舒适的书记官职务……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山打仗，很多人永远不再回来……我却平平安安地住在帐篷里……”

“不管怎么说，”戈德金打断朋友的话，“你并非‘明确地’为了死才来这里的呀。对吧？”

“当然不是。”

“你和巴伦西亚之间有什么嫌隙呢？”

“哦。我是个知识分子、庄园主的儿子，特别是曾任外交官，所以从第一天起就受到巴伦西亚的怀疑。从一些小事上也能看出他对我反感。”

夜幕降临，笼罩着村镇、山峦和大海的天空上群星闪烁。

“这位巴里奥斯是哪种人？”

“毫无疑问，此人能力超凡。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忠于自己的事业，并且勇敢、坚韧。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论在怒火冲天还是在做重大军事决策的时刻，他都从不忽视语法和修辞。”巴勃罗紧紧拉住朋友的胳膊，“我再说一遍，比尔，我讲的这一切都要严格保密。”

记者默默点了点头。

“那么，巴伦西亚呢？”

“啊，这位意识形态专家是革命的真正头脑。我无须说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超群出众的组织家，头脑冷静，善于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他对‘领袖’的态度如何？”

“很明显，他把巴里奥斯当作革命航船的风帆，而掌舵的却是他——巴伦西亚。他利用‘领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戈德金明知故问，完全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

“首先，推翻政府，随后把革命引向左倾，左倾得近乎共产主义。”

“你认为巴里奥斯会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巴勃罗耸了耸肩膀：

“他最终会就范。一方面由于罗伯托·巴伦西亚手腕高强，另一方面，比尔，因为你们的国务院众所周知的低能。并且，巴里奥斯尊敬、崇拜巴伦西亚，听他的劝告，照他说的去做……巴伦西亚像个雕刻家，小心翼翼地塑造一个理想的形象——上天注定的人民救星，并把它献给领袖，而现在领袖正按照它生活。我在山上看到巴里奥斯在逐渐变化，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态度、看法上……”

老板端来热气腾腾的长盘——盘里的大虾泡在桔黄色的油里——放在桌子上，还有一瓶葡萄酒、一盘羊奶奶酪和自制面包。两个朋友开始吃喝。

“巴伦西亚现在还需要巴里奥斯？”奥尔特加接着说，“因为农民崇拜他。引人注意的是，在革命以来的短短几个月

里，已经神化了他们的领神。巴里奥斯创造奇迹的故事在贫苦人民当中广泛流传。有人说，只要他用手指摸摸病人的前额就能治愈；还有人说，在三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卡拉维拉山上、奥罗威德和帕拉莫——同时看到米格尔·巴里奥斯。比尔，他那浓密的黑胡须帮了他的大忙，因为跟岛国民间殉道者名册上的大圣人胡安·巴尔萨极其相似。”

戈德金望着海湾，一艘来自公海的轮船正驶入港口，船头灯光闪闪。

“你和巴伦西亚之间的争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已经说过，从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他就怀疑我，讨厌我。不过有件事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了。一天夜里，我们的巡逻队在营地附近抓获了一个农民，说他是陆军第五团的士兵（从未得到证实），前来刺杀巴里奥斯。”

“他携带着武器吗？”

“带一把双刃砍刀，这在我们的农民当中太常见了。巴伦西亚不问青红皂白，决定把他杀死。我提出异议，要求审判。巴伦西亚称我是‘感情脆弱的小资产阶级’，还当着其他军官们大声说，像我这样的人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缺乏进行革命的准备。”

马卡利奥用陶盘端来了鱼。盘子里热气腾腾，一股大蒜和百叶草的气味。

“后来呢？”戈德金问。

“我坚持主张进行审判。出乎我的意料，巴里奥斯支持我的意见。我充当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论据很简单：既然他说是来参加革命队伍的，我们为什么不肯相信呢？可是，巴伦西亚反驳说：‘那么，他为什么偏偏在夜间匍匐前进，靠

近我们的营地，企图骗过我们的哨兵呢？’。长话短说，一个由七名军官组成的陪审团宣布他是个‘危险人物’。如果放走他，他可能向联邦军泄露我方的阵地和保安措施。如果留下，将成为潜伏在身边的威胁，因为他可能暗杀我们的军官，甚至暗杀巴里奥斯本人。”

“那么，此人被判处了死刑……”

“一条命算得了什么？由于我们不肯为那个印第安人浪费一颗子弹，于是一名战士把刀扎进了他的喉咙。好了，不说了，吃鱼吧！”

戈德金和巴勃罗先后吃起来，两个人都蛮有胃口，连互相祝酒时也没有说话。

“从那时起，”过了一会儿，奥尔特加接着说，“我和巴伦西亚的关系彻底恶化了，除非工作需要之外绝不交谈。有一次我听到他在一伙人当中提到我，称我是‘我们那位书柜诗人’。当时，我恨不得把手里端着的满满一杯热咖啡泼到他的脸上。那些话刺痛了我的心……一天，我向巴里奥斯请求参加军事行动。”

“嗯……？”

“我主动要求率领一个夜间别动队袭击这个城镇。这种战斗极为特别，需要绝顶的勇气。我们一共二十个人，其中八个是使用双刃砍刀的行家。他们在前面不出响动地杀死哨兵，为其他人开路。我们这些人的任务是接近陆军第五团营房的西墙，朝窗户里扫射，往屋里扔尽量多的手榴弹。有十二扇窗户，我们正好十二个人。我负责最后一扇，也就是从北往南数第一扇……”

戈德金聚精会神地听着，忘记了吃鱼，餐叉停在空中。

巴勃罗用手指摆弄着一块面包心，揉成了个小小的圆球（潘乔·比万科的形象在他头脑中一闪）。

“就这样，我们挑选了天上挂着一钩新月的夜晚下了山……纳塔利西奥师傅的一个儿子为我们带路。我也觉得不伦不类：巴勃罗·奥尔特加学当英雄，去袭击陆军第五团……前边的战士干得漂亮，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营房，甚至听到了屋里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们趴在地上停了几秒钟。纳塔利西奥师傅的儿子伏在我身边，他把嘴凑到我耳边说：‘听见了吗？’我问：‘听见什么？’他说：‘河水在地底下流。’我把耳朵贴到地上，却只听得见自己心脏在跳动。我嘴里发干，嗓子发紧，胸部憋闷，但头脑清醒，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使命。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和联邦军战斗，而是在同罗伯特·巴伦西亚较量。是为了打击他我才率领别动队进行这次夜间袭击的！”

饭馆里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马卡利奥端着一盘鱼在他们身边走过。海滩上传来吉他声。

“我下达了前进的命令，”巴勃罗接着说，“每个人都弓着身子跑步接近自己的窗口。事先已经约好，我头一个开火射击。我一梭子子弹打碎了‘我的’玻璃窗……几乎同时听见了另外十一个人也开了火……我立刻打开一枚手榴弹盖，扔进屋里，伏在地上。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又是一连扔了两枚，随后吹起口哨——这是撤退的信号。”

“不可思议！”

“难怪你认为不可思议，就连我也觉得是在向你讲述一个梦……甚至像是在说谎。”

“军营反击了吗？”

“我们开始上山，遇到了自己的巡逻队的时候才听见联邦军的号声和噼里啪啦的枪声。我们安全返回，无一伤亡，天亮时到达营地。”

“巴伦西亚怎么说？”

“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看也不想看我一眼。显然，他认为我只不过履行了义务而已。他想得有理。”

“你呢？……事情过后，你感觉如何？”

“睡不着觉。我一直在想：我扔手榴弹的房间有多少士兵？我杀死了多少人？奇怪的是，我并不‘太’动心。再说一遍，山上一切都不相同……直到攻下索莱达德马尔镇以后我才得知，我们的别动队在那天晚上至少杀死了二十名士兵，受伤的人数也许是死者的一倍。自从下了山，我考虑了很多事情。你知道最糟糕的是哪一件吗？是不能把我的那次行为——我指的是向手中没有武器、毫无防备的士兵扔手榴弹——看成我的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我自告奋勇执行任务是为了向我自己、向别人，尤其是向巴伦西亚证明我不是懦夫，而其代价是几个人的生命。使我惊讶的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以为在杀抽象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这些活生生的人也在保卫另一些抽象的东西：法制、政府、陆军团的荣誉……”

“完全正确！这不太可悲了吗？”

“我们那位妙不可言的米歇尔·米歇尔会说：这就是战争。”

“戈德金，说来好笑。我母亲因为我在甘蔗田里和皮娅干了那种事而大为悲恸，说是我失去了纯贞。其实，男人失去纯贞不是在尝试一个女人时，而是头一次杀人的时

候……”

一个士兵唱起歌来，另一个举起酒杯朝巴勃罗作了个友好的手势，巴勃罗也笑着举举酒杯。

“现在呢？”戈德金问。

“胜利已经在望，只不过是几星期甚至几天的问题。说心里话，我对胜利的恐惧甚于对革命行动本身。我们应当付出巴伦西亚所希望的变革作为代价吗？值得吗？或者更明确地说，真的没有达到社会公正的其它途径吗？”

他望望海湾。一艘汽艇在水面游戈，船头上一盏红灯闪闪闪烁。

“在我们……我是说在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庄园建立总部以后，巴伦西亚和我当着巴里奥斯的面争吵了一次。他指责我犹豫彷徨，是个脚踏两只船、妄图寻找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被一种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虚幻的负罪感迷住了心窍。‘归根到底’，他问，‘你是想把人民从专制制度与贫苦之中解救出来呢，还是仅仅为了安抚自己个人的良心？’听了这番话，我怒发冲冠，因为这个家伙触及了我最敏感的神经。他想让我相信，中间道路是条死胡同，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暴力才能产生伟大的社会变革。我反驳说，如果一种思想意识超出某些道德界限，它必将失去人性，并且它本身也不可能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若不是巴里奥斯用惯有的权威性的话命令停止争吵，我们还要辩论下去。”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干下去，干到底。绝不象大部分知识分子那样，遇到类似情况一怒之下便退缩、游离，进而反对革命。我打算成为罗伯特·巴伦西亚这一翼上的一根刺，但永远忠于这

场革命。”

戈德金悲观地喷了一声：

“我担心，你迟早要被打倒，逃往迈阿密避难，或者……”

“被捕？被枪毙？”

“谁知道呢？”

41

摘自威廉·比尔·戈德金的记录本：

10月22日——现在，我成了革命最高指挥部里受欢迎的人物。巴伦西亚批准了我写的巴里奥斯访问记，连一个逗号也未曾改动。想不到联合通讯社也未经删节，播发了全文。我手头有一份《华盛顿邮报》，上面以三栏篇幅刊登了我的访问记全文，并且附一张巴里奥斯的照片。在文章中，我以褒扬的口气介绍这位大胡子领袖，呼吁美洲各国在道义上支持造反者。总之，我是在忏悔，因为我曾替胡韦蒂诺·卡雷拉掌权尽过绵薄之力。

莱昂纳多·格里斯说得对，所谓“有良心的人”基本上都是永无休止的忏悔者。

10月23日——好消息！埃斯梅拉达港的联邦守军全部起义，参加革命，并奉革命指挥部的命令朝普拉托诺斯市进发。普拉托诺斯市陷落指日可待。

我们正准备（我开始用“我们”这个词了）向塞罗埃莫索发动总攻。正如巴里奥斯所说，“要砸烂魔鬼的头颅”。

今天上午，利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单独占用”了巴伦西亚五分钟的时间，小心翼翼地试探，设法证实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此人机警绝顶，滑得像条鳗鱼，只肯转弯抹角地回答，后来用一句话中断了交谈：

“现在不是讨论意识形态的时候。革命战争尚未结束，真正的革命以后才会到来！”

巴勃罗·奥尔特加忙于根据巴里奥斯的指示撰写通告和宣言，两个人在语法和风格上常常进行激烈的争论。领袖像老师对待用功而又固执的学生一样对待他的秘书，在这儿或那儿宽宏大量地做些小小的让步，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要求别人严格遵照他原来的词句、思想甚至标点符号。巴伦西亚不参加这种斟酌文字的争论，但未经他最后批准任何文件都不能发表。

10月24日——为了运送驻扎在索莱达德马尔的革命部队，征用了全镇及其郊区各庄园和榨糖厂的所有小汽车和大卡车。今天开始向塞罗埃莫索进军。全国各地的叛军将按照巴里奥斯总参谋部制定的计划在首都汇师。

凌晨五点，头一批巡逻队出发，随后是先头部队。我获准随军行动，并尽量靠近巴里奥斯。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巴勃罗·奥尔特加带上文件、打字机和档案钻进一辆吉普，司机仍然是把我们从机场送到司令部的那个和蔼的黑人士兵。

天气晴朗，我觉得年轻了二十岁。我告诉奥尔特加，大概是上帝在众天使帮助下把安蒂利亚山区的天空涂得如此斑斓。我的朋友只是冷漠地望望苍穹，茫然地点了点头。看来他心事重重。我想，这是因为胜利在望的缘故。

米格尔·巴里奥斯坚持上路之前在索莱达德马尔镇沿街游行。他站在汽车上用庄严的手势向群众致意，人们——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窗口、门前或人行道上向他招手，或者挥舞手中的头巾和小旗。这些混血儿和印第安人以奇特的方式表达“热情”，只是怯生生地招手，嘴里不发出任何声音，像是一群骨瘦如柴的人在水下活动，唯有汽车在不规则的石板路上开行发出的声响。我用彩色胶卷拍下了这些群众。阳光强烈，照片一定会非常清晰。我打算写一系列图文并茂的文章报道这次战役，供《生活》和《瞭望》杂志发表。

傍晚，部队在一个叫“天使圣地”的地方宿营。军官们占用了当地唯一一家旅馆的所有房间。营地的篝火旁边，难以理解的印第安人面孔随着火光忽隐忽现。

巴勃罗和我共住一个房间。在这个圆月的夜晚，从北方吹来的微风带着青草的香味。蚊子在耳边飞来飞去，拉着小提琴，叫人防不胜防。

奥尔特加把我叫到窗前，让我看旅馆花园里散步的两个人影。我认出是巴里奥斯和巴伦西亚。在整个时间里，巴伦西亚滔滔不绝地说话，巴里奥斯只是静静地听着。巴勃罗小声说：“政委在雕琢他的神像。”

10月25日——天亮以前又开始行军。所到之处，不论在乡村还是城镇，巴里奥斯都受到极其热情的欢迎。这一带人民似乎有更多的西班牙血统，好像我们行军的无声电影突然增加了配音带。欢呼声不绝于耳。男男女女走过去吻英雄的手，或者摸摸他的衣服。我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摄下了欢迎的人群，彩色胶卷上记录下了五花八门的表情，有的欢乐，有的虔诚，有的自豪，有的满怀希望。女人们则表现出一种对神明的狂热。

我对一些人进行了闪电式采访。一个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巴里奥斯就是耶稣。一位八十岁的老翁告诉我，1914年和1915年，他本人曾在山上和胡安·巴尔萨一起战斗，还说巴里奥斯是胡安·巴尔萨转世。母亲们来到领袖跟前，请他摸摸怀里孩子的头。

米格尔·巴里奥斯脸上一直没有笑容，好像已经进入了预言家的角色。不可否认，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身材硕高，长长的头发，胡须在微风吹拂下轻轻飘动，眼睛注视着远方的地平线，仿佛他所眺望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革命纵队逐渐壮大。不仅年轻人，就连中年人也要求跟队伍一起前进，遭到拒绝的人愁眉苦脸。我采访了一个农民。他深信人民生活会得到改善，因为巴里奥斯不仅给农民以土地，而且将分配农具和种籽：人人将有饭吃。一个在榨糖厂工作的黑白混血儿满有把握地告诉我，革命胜利以后富人们的种植园和糖厂将分配给劳动者。

一路上没有遇到敌人任何抵抗。一些联邦军支队不

战而降。桥梁完好无损，铁路未遭破坏，政府军飞机从天空消失了。

我们离开了被称为“热带”的盛产甘蔗、香蕉和可可的沿海多雨地区，向北进发，到达所谓“温带”高原。共和国首都就位于平均海拔八百米的高原上。气温越来越低，白天温和，晚上凉爽得近乎寒冷。

今天是礼拜天。上午十点，巴里奥斯命令部队在一个叫曼扎纳雷斯的村庄停止前进，他要在当地望弥撒。他由两三名士兵陪同走进小教堂以后，巴伦西亚一直在门前不耐烦地踱来踱去，不时看看手表。

我特别注意观察三个人：巴里奥斯、巴伦西亚和巴勃罗。巴里奥斯似乎一直处于伤感的精神状态之中。一天下午，我们到达“山脉圣母”市，外国记者们拥上来采访他，为他拍照。巴伦西亚像以往一样不与摄影记者和报界人士接触，仍然充当巴里奥斯的影子。不过，影子比映出它的物体充实得多。他像一条乌贼，隐藏在自己喷出的墨汁之中。毫无疑问，他仍然是这场革命的真正设计师，或者更清楚地说，是这场革命的真正“经理”。他寸步不离领袖，必要的时候插手干预，但做法上小心谨慎。他限制记者们采访领袖的时间，检查他们所拍照片的张数，任何有关这场革命及其指挥官们的文字必须接受他毫无留情的审查。

随着我们逐渐逼近塞罗埃莫索，巴勃罗·奥尔特加情绪越来越低落。今天我问他首都是否会顽抗，他回答说不会。“像从这儿到政府大厦散步一样。”他说，“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城里在进行巷战，几营政府军倒戈，

加入了我们的事业。”我知道，奥尔特加担心的是会在塞罗埃莫索遇到他的母亲、他的家、他的朋友们、他的过去……和他父亲的尸体。

10月26日——现在，我们来到距塞罗埃莫索仅三十公里的一块高地。首都一片片房屋像绿色谷地中的白色斑点，隐约可见。上午十点，巴里奥斯接见了一个革命者代表团。胡子拉碴，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代表团成员们告诉领袖，首都已经落入由老百姓和大学生组成的人民力量手中。他们还说，战斗异常残酷，一连持续了两天两夜，双方伤亡惨重。巴里奥斯静静地听着。巴伦西亚问：“卡雷拉呢？”代表团团长回答说：“可惜他从政府大厦逃到了机场，乘一架私人飞机逃往特鲁希略城去了。”巴里奥斯作了个气恼的手势。巴伦西亚打断了他们的话：“各位先生谁也不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事情之一是攻占机场吗？”“我们攻了几次，但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巴伦西亚想了解更多情况：“你们知道谁跟独裁者逃走了吗？”代表团成员们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回答说：“他的家庭成员，也许还有几位将军。”巴伦西亚考虑了片刻。“既然政府大厦被包围，”他问，“他怎么走得呢？”“卡雷拉是乘直升飞机逃跑的。在机场，一支政府军掩护他撤离，一直抵抗到飞机起飞。我们一架飞机也没有，无法追击。”

巴伦西亚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随后问道：“谁指挥保卫机场的部队？是萨帕拉上校吗？”一个学生

摇摇头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在城里顽抗的部队也是由他指挥的。萨帕拉在头一天就投降了。”巴伦西亚又问：“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死了吗？”一个学生回答说：“保卫机场时受了伤，被我们的战士抓获了。”巴伦西亚眼睛一亮：“好好照顾他和萨帕拉！不要虐待他们，不要让他们死掉。我们不想让他们成为烈士。这两个家伙和其他所有罪犯都必须在人民法庭受审。他们将做为匪徒被枪毙，而不是受害者！”

巴勃罗·奥尔特加神情茫然。“难以令人置信！”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原以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到欧洲去了……从来没有想到他竟然干出这种忠于朋友的壮举。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露丝，这如何回答？”）。我大声说：“我是记者，只报道事实。如果苦心孤诣加以解释，上司反而会不高兴……”

米格尔·巴里奥斯把巴勃罗叫去，要口授一项声明，以备他就任萨克拉门托革命政府首脑时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他们在纵队参谋部住的宅院里一连工作了两个小时。像往常一样，巴伦西亚也在场，并且不时插话，行使否决权。“这样写文学气味太浓。”“不，这个问题暂时回避。”“对任何国家和经济集团，我们既不惊动也不安抚，最好让他们都举棋不定……”“在我看来，这项声明不应该超过二百字。”

当天下午，从埃斯梅拉达港、普拉托诺斯和帕拉莫开来围困塞罗埃莫索的各革命部队的军官代表来了。他们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巩固首都的控制

权，建立有效的安全系统并创造有利的气氛，以便巴里奥斯带领部队第二天进城。

当天夜里，罗伯托·巴伦西亚和学生、市民代表以及其他革命部队的军官前往塞罗埃莫索。

10月27日——天亮以前，彻夜未眠的罗伯托·巴伦西亚回来请米格尔·巴里奥斯。他和前者同样疲倦。

解放力量进城仪式定于上午十点举行。纵队七点半开始出发，速度缓慢，但秩序井然。又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天鹅绒似的深绿色使我想起了弗吉尼亚州。）我们看到，公路两旁有些白色的房屋建筑精巧，屋檐形成的门廊上爬满开红花的葛藤。塞罗埃莫索附近的小镇上，居民在新解放者即将经过的路上铺满了树叶、鲜花和树枝。在小小的广场上，我看到一群人一边抬头焦急地张望，一边挥动着手中五颜六色的头巾、鲜花或者小旗。一个人数不多的业余乐队在演奏进行曲，虽然水平欠佳，但其爱国热情之高却非常感人。巴里奥斯站在吉普车上边，不停地向群众招手。烟花“嘶、嘶”冲上天去，在空中噼啪响成一片。有人想发表演说，但欢呼声太大，鞭炮声太响，只好作罢……

进城之前，队伍又停在一个广场上。我看到，在殖民时代留下的砖水槽旁边有一辆锃亮的黑色豪华汽车。车门开了，里面出来一位神父。他走到革命领袖的吉普车前，躬身施礼，说了些什么……巴里奥斯和巴伦西亚交换一下眼色，谈了两句，然后朝神父点了点头。神父转身回到豪华汽车旁边。车门再次打开，从里面走出潘

菲洛·阿朗戈·阿朗贡大主教（我相信，即将目睹一个历史性场面，获得一篇精采的报道的素材！）。巴里奥斯跳下吉普，站在车下，但没有朝教会王子的方向迈出一步，倒是身穿考究教服的大主教笑吟吟地向吉普车走去。人群鸦雀无声，目不转眼地盯着双方的一举一动。潘菲洛大主教手里捧着一个衬绒的金属盒，盒里放着象征本市的钥匙。两个人越来越近。我想亲眼看清这个伟大的时刻，在他们相距五步左右的时候，我一连拍了几张彩色照片。大主教抬起手，看样子是等待米格尔·巴里奥斯吻他的戒指，但革命者只稍稍握了握他的指尖。

他们之间的谈话我一个字也不想漏掉。其他人也拥过来，把这出戏的两个主角团团围住。

大主教虽然年已七十，但面色红润，腰板挺直，风度倜傥。看到巴里奥斯及其部下脸上冰冷的表情，他下车时嘴唇上、眼睛里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这位高级神职人员把金钥匙交给革命领袖：

“将军，我荣幸地向你表示欢迎，把象征我们可爱的首都的钥匙交到你手里。”

巴里奥斯的回答干干巴巴：

“阁下应当承认，你来得稍微晚了一点……我们已经用鲜血和生命撞开了塞罗埃莫索的大门，这把钥匙就毫无用处了。”

潘菲洛手足无措，干咳了几声，环视一下四周。几秒钟之后才打起精神：

“希望你至少应当理解，这是礼貌的表示。”

“我们不是为礼貌而来，是为了替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

大主教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声音也嘶哑了：

“但愿如此！然而，我以基督精神的名义请求你，不要允许以任何借口让这座可怜的城市再次流血，再次生灵涂炭，再次惨遭过火行为和杀戮之害！”

“大主教先生，”巴里奥斯笑着说，“多少年来，本岛国的男女老少一直惨遭不幸，要么饥饿而死，要么患病身亡，要么在独裁者警察的酷刑下丧生。大主教阁下虽然充满基督精神，但似乎对这一切并不过分动情……”

潘菲洛面色苍白。不等他张口，巴里奥斯又说：

“有一件事我可以诚心实意地答应你：公正！”

“指挥官，请不要忘记，在人间的不完美的公正之上，还有上帝的最后的、万无一失的公正。它迟早总会到来！”

“好吧，大主教先生，在上帝万无一失的公正尚未出现之前，不得不满足于我们不完美的公正。祝你顺利！”

两个人对视片刻。潘菲洛把头一点，转过身，看到了巴勃罗·奥尔特加，走到他旁边，两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到第二天我才从奥尔特加本人嘴里得知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迪奥尼西奥先生的临终圣事是我主持的。他咽气之前还呼唤着你的名字。巴勃罗，你用反叛行为害死了父亲。”

奥尔特加盯着大主教，表情严厉：

“阁下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引起我的负疚感吗？你也和我母亲一样，认为我是杀死父亲的罪人吗？”

大主教犹豫了一会儿，但终于忍不住说了句“豪言壮语”：

“孩子，任何反叛现行道德、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人都是在象征性地，甚至在肉体上消灭生身之父。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

显而易见，潘菲洛受了巴里奥斯的污辱，现在往巴勃罗头上发泄怒气。不过，小伙子轻轻一笑，上身微微一躬，讥讽地小声说：

“对阁下这番充满最纯洁的基督教慈善的高论，本人十分感谢……”

大主教抬头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朝黑色豪华汽车走去。

第二天，豪尔赫·莫利纳博士正坐在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办公室里。从当天的一份日报上得知，巴里奥斯及其部队已经胜利地进入塞罗埃莫索。联合通讯社播发了出自威廉·比尔·戈德金之手的报道。文章写得公允客观，绝少形容词，但把当时的场面描绘得活灵活现——群众在街上游行，大声欢呼，无数乐队助兴……（没有一座教堂响起钟声）。巴里奥斯在总统府阳台上露面的时候，聚集在国徽广场的五万群众高呼万岁。戈德金特别指出，由于革命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控制，全城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抢劫、报复或其他群众性暴力行为。从头一个小时起，警察部队严格有效地维持首都治安。

除了胡韦蒂诺·卡雷拉政府成员外，被捕等待受审的还有他的几位将军、亲信、保镖，尤其是他的警察。比尔·戈德金还说，一切迹象表明，既然胡韦蒂诺·卡雷拉逃往国外，那么两个“明星被告”将是凶恶残暴、人人切齿痛恨的警察首脑佩德罗·萨帕拉和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

多——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更能象征其朋友和干亲家胡韦蒂诺·卡雷拉所代表的一切：腐败、专横和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照联合通讯社老记者的看法，对这两个人的审判，革命中央委员会将特别重视。

莫利纳站起身，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大使馆寂无声息。今天上午，他把梅塞迪塔、其他女打字员和下等雇员全都打发回家了。

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撕毁或焚烧文件。决心已经下定，不再等新政府大使来接替他的职务。

把电铃一按，叫克莱尔·奥吉薇前来。他发现女秘书的眼睛通红，面带泪痕，但什么也没有说。

“我可以吸烟吗，博士？”

“随便。请坐吧。”

她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嘴里喷出一团烟雾。因为用力过大，倒像是一声抽咽。临时代办转过身，面对她说：

“奥吉薇小姐，你自然正密切注视着萨克拉门托局势的发展……我想向你提出最后一个请求。从此刻起，我自动脱离外交职务……请你照看大使馆和佣人们……司机、园丁、厨师、清洁工……还有我今天打发回家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不用说，还有大使馆。”

奥吉薇塔只是点了点头。

“不论你相信与否，”莫利纳接着说，“现在，小姐是萨克拉门托共和国驻华盛顿的事实上的代表，如果说不是合法代表的话。”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那么，先生你呢？……到哪里去？我之所以问这个问

题是因为需要转递信件……”

莫利纳淡然一笑：

“我对于通信不感兴趣，无论和谁通信……”

“除非和上帝。”他想，“可是，还没有找到上帝的信箱号码。不过，要说世界上有人没有准确地址，怎么向一个美国人解释得清呢？”

“好，适当的时候我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在哪里。”

想到自己行将死去，他感到一种浑身瘫软的快娱。整个上午，他都用来制定极其重要的行动计划。然而，有个念头使他惶恐不安：躺在床上腐烂，人们闻到了臭味才发现他的死尸。他向来珍视躯体（落到这般下场不正是由于太珍爱纯洁吗），最怕自己身上有什么难闻的气味。

“当然如此！”他明白了，因为父亲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满嘴酒气，并且很少洗澡，身上散发着汗酸臭味，年幼的豪尔赫常常掩鼻躲避。

“好吧，奥吉薇小姐。我还想求你办一件事，一件极为特殊的事。请小姐在明天中午准时到我住所去一趟。”他停住嘴，脸涨得通红，因为这话听起来极像是请对方干那种勾当，“我是说，我不在家，我把钥匙交给你……小姐进去之后，从我的写字台上会发现四五封信（已经贴足邮票），请你投进邮筒。啊！还有一封是写给你本人的……上面有些说明。”

“给我的？”

“完全正确。我再说一遍，重要的是你必须在中午准时到我的住所，打开门。钥匙在这儿。”

奥吉薇小姐接过钥匙。莫利纳想象着女秘书看到他面色

惨白、像个蜡人似地直挺挺躺在床上时该多么惊恐。那时候，她一切都明白了……

“是，公使先生。”

“我已经不是公使了，小姐。”

“好吧，莫利纳先生，你所说的一切我都照办。”克莱尔手足无措，在烟灰缸里碾灭了香烟，“我从报纸上知道，大使先生……”

“前大使。”

“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你认为他们会处决他吗？”

“完全可能。”

“有巴勃罗·奥尔特加的消息吗？”

“直接消息？没有。”

“莫非……？”

莫利纳摇摇头：

“放心吧，他不会有什么不测。在今天刊登的最近一篇报道里，戈德金先生说巴里奥斯在总统府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的时候，他站在奥尔特加身边。”

豪尔赫·莫利纳穿上外套，拿起皮包，抓起礼帽，环视了办公室一下，像是在举行告别仪式。

“再见了，奥吉薇小姐。对于你为我做过的和即将做的一切，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才好。不过，重要的是明天中午准时到我的住所。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相信你像平常日子一样，绝不食言。”

豪尔赫·莫利纳把手伸给克莱尔，女秘书一握，感到像死尸一样冰凉。难道这可怜的人病了吗？他说的“关键时刻”是什么意思？前公使衔参赞很快把手抽回，朝门口走去。女

秘书站在原地，听着这个怪人的脚步声在拱形圆顶墓穴似的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

莫利纳站在大使馆前面，久久望着花园和大使官邸。他先怅然若失地看了看树上的树下跳跃嬉戏的松鼠。其中一只跳到莫利纳跟前，几乎要碰到他擦得锃亮的皮鞋。他很想蹲下来抚摸一下小生灵的毛，但忍住了心头的冲动——这动物会咬伤或抓破他的手指——保持挺直，干咳了几声，感到胸部有一种空虚造成的寒冷。父亲的形象重又浮现在脑际。

“上帝并不存在！”老人大声喊叫，“要是存在的话，地上就该有公正和善良，你母亲也就不会在生你的时候丧命！”这倒是个漂亮的借口，以便常在醉乡，动辄发火，逃避斗争！对，还可以不洗澡，不刷牙，几星期不换衣裳……

走到马萨诸塞大街和三十四号大街的交叉路口，他向一辆空驶的黄色出租汽车招招手。

从中午到下午三点，豪尔赫·莫利纳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关在写字间填写并签署支票（房租、电费、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最后一笔赊购款……），撰写信件。头一封信是给肯金斯殡仪馆的，写信之前他详细查看了该馆的项目介绍。信中说，要简单从事，选择3—A项，包括火化在内。他提出一个特殊要求：“恳请你们不要照惯例为我整容。整容不仅可笑，而且毫无用处。也不要守灵，因为我既无亲戚也无朋友。按照法律规定填了各种表格之后，立即将我的尸体火化，骨灰由持有这封信的我的前女秘书克莱尔·奥吉薇处理。按照贵馆项目介绍中规定的价格，附上支票一张。我在此预致谢意……谨启。”

• 第二封信是给奥吉薇小姐的：

“这样做可能让你大吃一惊，请你原谅。我承认，走进一个房间，在床上发现一具死尸大概不是件很惬意的事。不过，我不相信你对我有什么亲切的情感，所以知道刺激不会过分强烈。这一想法稍稍减轻了我心头的不安。

“我不想向你解释自杀的原因。说起来复杂得让人心烦，并且也显得虚伪。重要的是，必须说明，除了我本人之外，任何人无须对我这一行为负责。我并没有发疯，头脑非常清醒。

“请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吧。对此，用不着向自己或他人提出任何问题。还有，不要因为我给你造成的麻烦过分恼恨我。

“恳求你接受一件小小的礼品——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请你把我放在这张桌子上的信发走，其中一封是寄给华盛顿警察当局的。

“至于葬礼，我在写给肯金斯殡仪馆的信中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请你读过（我授权你这样做）之后亲手交给收信人。现在我们来谈谈我的骨灰问题。我认为，无论在哪里埋葬或者保存都是多余的，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请你想个实际点的办法悄悄处理掉吧。我建议扔进波托马克河或者随便哪个垃圾堆里。丢进你的垃圾桶里有何不可？请相信，我这样说的時候心头没有半点苦涩。活着的时候我一向珍视自己的躯体，但对它的骨灰却完全没有兴趣。

“谢谢你，奥吉薇小姐，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请相信，对你本人，我向来十分尊重和钦佩……”

他又非常仔细地把银行的存折查看了一遍，计算出除未

已经填写和签署的支票后的余额。还剩下三万多美元……他把这笔款项填到一张以卡塔里诺·辛德尔具名的支票上，装进信封，并附上一张纸条：“亲爱的辛德尔神父：先生也许不记得我了。我们只见过两三次面。把这些美元留给你，请用于你的慈善事业。”在签名之前，他拿钢笔的手停住了，苍白的嘴唇上显出一丝苦笑，因为他想加上一句：“我希望你不要在最近用这笔钱资助反对米格尔·巴里奥斯政府的革命运动。”但他终于克制住心头的冲动，只补充了“请为我祈祷”几个字便签了名。

他站起身，环视四周。一切都安排好了。又看了看表：下午三点过几分。只要在四点钟以前服下巴比土酸，奥吉薇小姐第二天十二点准时进来，人们就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洗胃。如果被人救活，那就无异于一个蹩脚演员的拙劣表演了。

他走进浴室，脱光衣服，洗了个温水澡，刮过脸，穿上教服，回到客厅。但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孤身一人，因为有两个人影——他的父亲和辛德尔神父——竞相在头脑中出现。老莫利纳大声吼叫：“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上帝并不存在！”辛德尔不喊不叫，但他的喁喁低语比醉鬼的声音更加清晰：“孩子，我不想要钱，而是想要你的灵魂。”“灵魂？什么他妈的灵魂？”老莫利纳咆哮起来。前公使衙参赞甚至感到了父亲身上的汗臭，闻到了他呼出的酒气和长着肮脏而又残缺不全的牙齿的嘴里的酸腐气味。“什么他妈的灵魂？”——豪尔赫·莫利纳今天才得出结论，他是为了抗议父亲的无知才进神学院的，因为他想向父亲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可怜的老人愚昧到了无法理解别人的程度。不过现在

前公使衙参赞不得不承认，老酒鬼占了上风。“不！”辛德尔神父的影子又说话了，“你父亲的形象赖在你头脑里不肯走就证明上帝确实存在！”

莫利纳又坐到写字台前，从抽屜里拿出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传记的全部原稿，一页一页地撕起来。他一面销毁三年多来的心血，一面考虑大主教的人品。格里斯说得对，潘菲洛是一场大骗局的代表人物。多么无耻！何等卑鄙！堂堂的教会王子竟然低三下四地拜倒在米格尔·巴里奥斯之流脚下！在本应留在大主教议事厅闭门不出、情愿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以保持自己尊严的时刻，他却急不可耐地去投靠革命者！如果那些人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去登门拜访吧，不论是为了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还是要拉出去枪毙。莫利纳一边想一边撕毁文稿，火气越来越大……

毫无疑问，卡塔里诺神父才是靠近人民的心灵，关心人民疾苦的耶稣教会的真正代表。教会只有超然于荣辱沉浮、不趋炎附势才能保持尊严，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去。

脸上的汗水涔涔而下，打湿了他死尸般冰凉的双手。然而，他心中还残留着一缕火苗——莫非是遥远的童军的祭坛下一个蜡烛头的火光吗？

突然，屋里的寂静使他大吃一惊。他看了看表。到吃下两瓶安眠药、躺在床上的时候了。可是……要是克莱尔不来呢？要是克莱尔不来……他就会在床上腐烂，从来不尊重他的邻居们会恨他，这不仅因为他的尸体弄得他们的住室也臭气熏天，人人掩鼻，而且堂堂的男子汉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也会毒化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在几个小时、甚至长达几天的时间里惶惶不安……。不会的，克莱尔是精明干练的化

身，绝不会食言。她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

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手掌上的冷汗，接着又量了量脉搏，感到跳动明显加快，并且喉头发紧，呼吸急促，稍有气喘，四肢无力。害怕吗？可笑！不会受到任何痛苦。他要心平气和地进入长眠。

他检查了一遍近几个小时以来所做的准备，想起了他的藏书，于是在给奥吉薇小姐的信上补充了几行“又及”：

“请把我的所有书籍，包括几套百科全书在内，交给天主教大学图书馆。把我的衣物赠给你选中的某个慈善机构。”

他走进小厨房。卡塔里诺神父跟在后面，躬着腰，教服拖在索莱达德马尔红色的土地上。“孩子，你要三思而后行。你要杀死一个人，而且是谋杀。”“他早已杀死过生身的母亲！”这是老莫利纳的吼叫声。前神学院学生打开小厨房的水龙头，接了一杯水，返回卧室，坐到床上。卡塔里诺神父又开口了：“不要忘记，你母亲怀孕九个月，虽然受苦受难，但一直带着欢乐与希望。她在把你送到世上时候丧了命，这不是你的过错，豪尔赫，而是上帝的意志。你没有权力亲手毁灭你母亲生下并爱怜的这个人。这不仅是简单的杀人，而且是亲兄弟之间的残杀。”

莫利纳站在床边，久久望着母亲的像片，眼泪夺眶而出。有多少年没有哭过了？二十年？三十年？

他拿起像片旁边的两瓶巴比土酸，倒在床头柜上。

“如果上帝存在”，他想，“大概他在嘲笑我。也许在为我难过？可是，要是他感到需要嘲笑我，或者能为我难过，那么他就不是上帝……既然他有个拯救我的念头就能让我活下去，他为什么见死不救呢？”辛德尔神父回答说：

“孩子，上帝赋予你提出这些疑问的能力本身就是他拯救精神的表现。”

莫利纳拿起一片安眠药放到舌头下边，喝了一口水，吞下死神的第一笔赎购款。他想起了头一次吃圣餐的时候囫圇吞下圣饼是多么艰难。耳边响起姑妈的声音：“孩子，不能嚼，那是罪孽，因为圣饼里有耶稣的血和肉。”他还记得吃过头一次圣餐以后心里多么平静，多么纯洁，也没有忘记姑妈给了他一纸袋糖果……

他忽然感到需要祈祷一番，就跪在床边，双手在胸前交叉，眼睛紧闭，低声说道：“慈善的圣母，拯救我们的生命、良知和希望吧！（父亲指手划脚地打断他的祈祷：‘既然上帝不存在，哪里还有什么圣母？为什么要祈祷？向谁祈祷？’）我们，夏娃的不幸子孙，在泪泉愁谷中呻吟、哭泣，向你苦苦哀求，请你保佑，请你用慈悲的眼睛看看我们。啊，请你敞开宽广的胸怀，让我们看看神圣的果实耶稣吧！（‘你就是个腐烂的果实！’）啊！善良慈悲的圣母玛利亚！（‘腐烂的果实！又酸又臭！’）阿门！”

他站起身。两个膝盖很疼。胃也痛。从头一天就没有吃一点东西……头有些晕。他看看钟表。差二十分四点？眼睛模糊。看到了床头柜上的药片……那是通向“另一边”的桥梁……奇怪，他总是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死亡。远方……另一边……为什么不看作是“那个时间”呢？他想，上帝住在永恒世界，自然无须仓促行事。他既然是上帝，就不会着急。而他，豪尔赫·莫利纳，现在仅有几分钟的时间采取最后的行动。他又看了看药片。记得小时候参加过一次野餐，踩着石头穿过了一条小河，脚没有沾湿。那些药片能让他不湿脚

就穿过生与死之间的界河。那些不起眼的药片是制药厂以工业方法批量生产的……他想到了两瓶药的价钱：可笑！在卖药的地方，同时也出售可口可乐、三明治、杂志、玩具、米老鼠小人书——那些五颜六色的、光滑的药片不值几文钱，却能结束他的生命。“孩子，好好想一想。”又响起辛德尔神父的声音，“你不走进教堂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竟然到杂货店去买！”

“这正是生活荒谬的所在！”莫利纳大声说，“上帝抛弃了我。”卡塔里诺神父笑了，“不对。”他小声说，“上帝打发他最低贱的癞皮狗在你脚边狂吠，警告你森林中危机四伏，让你不要过河，留在河这边等待……总有一天上帝会来救你。”

豪尔赫·莫利纳坐到床上。自杀难道不是偏执狂的举动吗？一个人偏要像上帝一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天，父亲说他是“胆小鬼”。也许说得对。他的确是个胆小鬼，从来不敢正视生活。更糟的是他狂妄、虚荣！他不招人喜欢的根源（现在才明白）在于不能喜欢、容忍和热爱他人。对上帝的恼恨不正是对父亲的恼恨吗？对大主教的敬仰与其说是出自对上帝赋予比人的灵魂倒不如说是拜倒在他教会王子的权威和荣誉之下！

对，他是个虚荣之徒！仅此而已。虚荣到近乎认为整个世界、整个生活和所有的人都和他作对的地步。他不懂得（愚蠢！），上帝凝聚在万物之中，不爱上帝最主要的就是不爱上帝创造的一切。笨蛋！傻瓜！白痴！一生苦心孤诣地寻找属于自己独有的上帝，像数学公式一样合乎逻辑的上帝，像太阳一样明亮、站在他眼前随时听他吩咐的上帝……

他心目中，这个上帝应该向他伸出双臂说：“来吧，我最喜欢的孩子，来坐在我身边……”

豪尔赫·莫利纳一面想一面死死盯着药片。从生走到神秘的另一边取决于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任何天真的孩子或智能低下的人都能完成：像做游戏一样，把药片一片片放进嘴里吞下去。

前神学院学生猛地站起来，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继续活下去。他把药片拢在一起，捧在手里，走进浴室，扔进马桶，一按把手，冲了下去……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他六神无主，手足失措，赶紧换上衣服，乘电梯下楼，走进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大使馆的电话。

“奥吉薇小姐吗？我是莫利纳……对，豪尔赫·莫利纳。请你注意听。明天不要照我的要求到我住所来了！懂了吗？不要来了。我改变了计划。现在一切都好了！非常感谢。不要来！非常感谢。愿上帝保佑你！”

说完，他立刻挂上电话，免得女秘书提出什么问题。接着，他回到住所。现在该销毁写好的信件了，仅仅留下银行余款的支票……

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护照以后就开始收拾行李，动作慌乱，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对，去西班牙！记得一天傍晚，他曾在那座黑咕隆咚的教堂逗留。世界上没有比那儿更便于秘密会见上帝了。今天下午就买一张去马德里的飞机票。《贝拉斯克斯的姑娘们》。哲罗姆的珍品。三万多美元是一笔可观的款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萨拉曼卡大学谋到个讲师的职位！西班牙！重新生活！一种完

全不同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他打着口哨，低声哼着小曲，做着怪诞、荒唐的动作……汗顺着脊背往下流，但现在流的是活人的汗水，不再属于死神。他突然感到饥饿。当然啦，差不多二十四小时没有给胃一点东西！

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瓶牛奶，又拿出两叶生菜、一块奶酪、一片火腿，把这些统统夹在两片面包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得那样香甜，那样津津有味。应该往口袋里装点面包屑，扔给遇到的头几只松鼠……马德里的公园里有松鼠吗？

对，离开这里，在世界上闯荡，重新寻找上帝！现在，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到，上帝在宇宙间无处不在，甚至冰箱里也有。

就在这同一时刻，塞罗埃莫索的政府大厦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巴勃罗·奥尔特加正坐在写字台前吃三明治，喝牛奶。不过，他思考的不是上帝，而是罗伯托·巴伦西亚。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场革命中，此人正千方百计扮演一个无处不在、权力无限的角色。

保证他无处不在的是办公桌上的四部电话机和设在政府大厦与全国各地联系的功率强大的电台。通过这些，他下达命令、听取汇报、答复请示。

他的权力无限来自以下事实：完全控制米格尔·巴里奥斯，任命亲信治理各省，自己则担任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关键职务。

在世界各国报刊杂志上，作为革命的象征出头露面的是米格尔·巴里奥斯。罗伯托·巴伦西亚既不发表演说也不会见记者，更不肯让他们拍照，但他却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

他身体的承受能力超群出众，头脑得天独厚地清醒，意

志坚强如钢。每天起码工作十五小时，最多睡四五小时。吃午饭也不离开与巴里奥斯相毗连的房间，在办公桌上随便凑合一顿。每天上午有理发师为他刮脸，他利用这段短短的时间向速记员口授函件，和助手们研究问题或者接电话。是他制定了头一批由米格尔·巴里奥斯签署的法令——解散各政党、封闭报纸、建立调查委员会以处理前政府成员贪污受贿案件和审查本国及外国公司的呈文。一位他绝对信任的金融学家担任了联邦银行巡视员的职务。尽人皆知，联邦银行是胡韦蒂诺·卡雷拉政府进行肮脏交易和营私舞弊的老巢。

巴伦西亚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失时机地建立一个革命人民党作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党。他亲自为新政党起草了纲领和章程，委托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这两个文件的最后定稿（奥尔特加知道，在巴伦西亚看来，只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专家”）。正在研究制定一部萨克拉门托新宪法，担任这项工作的是一个法学家小组——在卡雷拉执政期间，他们几乎全部流亡国外或者在联邦警察潮湿的地牢里发霉。总书记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立即组织职业工会。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农民、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代表团，但断然拒绝会见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对于这些人，他只用一张简短的便条回答：“我们让行动和事实说话。至于将来，我不是预言家。请记者先生们等待吧。”能否在新闻界得人心，他并不介意。

奥尔特加不能不钦佩（“钦佩”一词在这里用得确切吗？）这个俭朴、客观而又固执的男子汉。他不肯多说半个字，不肯多做一个手势，似乎完全不需要音乐、诗歌和爱情。至于他的感情生活，人们仅仅知道，在乌加特任警察首

期间，他的妻子被独裁者的警察施以酷刑，惨遭杀害；以后他再也没有和别的女人结婚。即使有情妇的话，人们也未闻其名，未谋其面。

巴勃罗·奥尔特加吃完三明治，喝下杯子里剩下的牛奶，用餐巾纸擦擦手，来到朝广场的窗前。现在，广场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乱哄哄地朝大厦前拥来。巴勃罗笑了。过不了很久，人越聚越多，他们就会齐声喊叫：“巴——里——奥——斯！”“巴——里——奥——斯！”，“巴——里——奥——斯！”。那时，领袖不得不走上阳台，对着麦克风向群众发表简短的演说（几乎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都出现同样的场面）。麦克风与广场上和附近各条街的几十个扬声器相连。在十月末的阳光下，巴伦西亚以鉴赏家特有的才能精心雕琢的领袖形象比广场中心由高高的棕榈树围绕的西蒙·波利瓦尔骑在马上的青铜雕像显得更加神采奕奕，更加光芒四射。

卡雷拉倒台后的头几天，革命政府严厉禁止被胜利和甜酒灌醉了的武装人群在街上滋事骚扰，烧杀抢掠。为了约束街上的人群，罗伯托·巴伦西亚再次搬出米格尔·巴里奥斯的形象。他在政府大厦阳台上 and 首都其他地方发表雄辩的演说，呼吁人民一举一动要无愧于革命的崇高目的。他说，政府面临的不是复仇，而是建立公正。“当我说‘公正’的时候，所考虑的不仅是惩罚前政府的罪犯，而且想到我们伟大、勇敢的人民应当过上富裕、公正而幸福的生活！”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及其亲信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卓有成效地保证了社会治安，并通过劝说逐步收缴了留在群众手中的武器。“面包加游乐”的公式再次应验。政府组织了露天舞

会、焰火晚会、有乐队伴奏、高举彩旗的游行。在群众集会上，几十个演说者上台讲话，大部分是即兴发言，忘情地畅谈梦想，群众热烈响应，高声欢呼。整整一个星期，全城的电影院、剧院和游乐场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全部敞开大门，免费招待群众。从胜利那天起，罗伯托·巴伦西亚就把全城的供应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整个塞罗埃莫索食品充足。不仅如此。他从当地商界征购了几吨牛肉和蔬菜，临时搭起摊点，在最贫穷阶层居民中免费分配。

这期间，萨克拉门托上层资产阶级人士都闭门不出。巴伦西亚拒绝接见当地商会的代表团，宣称“想见他们的时候”才召见。他还退回了潘菲洛邀他和巴里奥斯到大主教议事厅参加私人午宴的请帖。

巴勃罗·奥尔特加担任新闻宣传部部长助理职务，虽然和总书记在同一座大楼里工作，但没有多少和他直接接触的机会。不过，他怀着既焦虑又茫然的心情注视着这个用火给新政府打上个人烙印的天才人物。

胜利一个星期之后，罗伯托·巴伦西亚得出结论：酷爱斗牛的萨克拉门托人不会长时间满足于中央委员会组织的淡而无味的消遣。得到面包，他们也许高兴一阵，但会要求更有刺激性的娱乐。仇恨之火还在数以千计的人胸中燃烧。多少年来，人民生活在卡雷拉专制政权之下，默默忍受着折磨、蹂躏。现在，他们需要发泄，需要看到暴力和鲜血。于是，巴伦西亚不失时机地组织了革命人民法庭，由一位年老的刑法教授担任庭长，他因不满卡雷拉政权曾被迫在洪都拉斯流亡七年之久。同时还决定，轮流出庭的陪审团将由革命军军官、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

法庭设在能容纳五千观众的体育馆，审判在米格尔·巴里奥斯以革命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担任临时政府首脑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开始进行。由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因伤卧床，等待出院，头一个出庭的被告是佩德罗·萨帕拉上校——他是卡雷拉的最后—任警察头目、全国人人切齿痛恨的人物。和他一起受审的都是些不太重要的角色：他的亲信、警察所长、侦探、狱卒和打手，一共八十四人。米格尔·巴里奥斯出席了法庭首次审判并发表简短的演说，要求陪审团为了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伸张正义。

佩德罗·萨帕拉上校和他的同案犯个个戴着镣铐，由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押送。他们刚一进场，群众中立刻发出一片嘘声和咒骂声，一连十分钟不停。法庭庭长耐心地等听众安静下来才宣布开庭，请检察官发言。

巴勃罗·奥尔特加参加了头几场审判。毫无疑问，被告们有罪，罪恶滔天，这一点非常容易地——简直容易得可怕——得到证明。数以百计的证人一个个来到法官们前面，法官们询问，检查，并且给他们拍照片、拍电影，电视台同时转播。

检察官把革命军接管首都之后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带到法庭作证，使证词更加生动，更加扣人心弦。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仍然淌着血水。

为了防止某些证人因为怯场而唠叨些无用的细节或说不出话来，检察官常常及时提出启发性问题。巴勃罗·奥尔特加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一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可怜女人站在麦克风前——麦克风把她的声音扩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述说了她惨遭蹂躏的经过：士兵

们排成一行，依次趴到她身上。那么，他们指控可怜的女人犯了什么罪呢？说她在家里掩护过一个学生——她的侄子。这年轻人正遭警察的通缉，罪名很笼统：“大学里的煽动分子”。

萨帕拉的刽子手们向女囚犯逼供的最拿手的肉刑让听众们心惊胆战。他们用木棍把一包包芥末捅进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女人的阴道里。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惨绝人寰的刑罚都造成女犯大出血。

一个年纪还轻的男人说，他的睾丸被萨帕拉的打手用皮靴踩碎了。检查官问他凶手是否在这里，苦主举起胳膊，指着被告群里一个紫铜色皮肤、公牛般脖子的大汉说：“就是他！”

几个受害者脱下汗衫，亮出被钢鞭抽打的伤痕。其中一个人说，萨帕拉的最新发明称为“烙笔画”，就是用火红的烙铁在“最顽固”的犯人胸部和脊背上作画。有些刽子手以在犯人的臀部烫上淫秽的句子取乐，逗得联邦警察们哄堂大笑。

一个衣着寒酸但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把两只变了形的手伸给陪审团。他说，警察用钳子拔下了他的所有指甲。一位法官问，他们指控你犯了什么罪。他耸耸肩膀说，也许他的“罪行”是用这两只手在墙壁上写了一句“自由万岁！”还有的受了阉刑，有的受过乌加特发明的电针刑。第二场审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反对派老记者的证词。他身体虚弱、柠檬黄色的皮肤，两只干枯的手不停地哆嗦。一个护士把他领到法庭上。检察官指着他，先看了看听众，才对法官说：

“审判团的先生们，这位证人不能说话。理由很简单，萨帕

拉的警察割掉了他的舌头。用刀割下了他的舌头！”

这时候，佩德罗·萨帕拉——他中等年纪，膀大腰粗，头剃得净光——用戴手铐的手捂住脸，抽泣起来。观众们一齐站起来大声喊：“处死匪徒！”“打死他！打死他！”群众要扑向前警察首脑，警卫不得不举起冲锋枪维持秩序。法庭庭长摇铃要求大家镇静。审判中断十五分钟以后才得以重新开始进行。

审判的第三天，作证继续进行，并且开始对质。为了改善各自的处境，被告们互相揭发，这就大大有助于原告。法庭当众检查了萨帕拉来不及销毁的中央警察局档案中的犯人登记表。这些文件证明，二百多人——其中包括几十个学生——在塞罗埃莫索及其郊区的各监狱被折磨致死或因疾病丧生，尸体埋在乱坟坑里，死者的亲属都没有得到通知。检察官结束控诉之后，庭长请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一位职业律师为被告辩护。律师站起身说，面对这些铁证，他不仅拒绝为被告辩护，而且也不能请求法庭对他们从宽量刑。他的“辩护词”——受到听众的热烈欢呼——用了不到一分钟。

第二天清晨，佩德罗·萨帕拉和他的八十四个走狗在塞罗埃莫索郊区的陆军第二团驻地院子里被枪毙了。几百人来到兵营门前高声呼喊，要求进去亲眼看看处决的情况。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大声咆哮，用石头砸了军营的玻璃窗。

这一事实使罗伯托·巴伦西亚相信，这个国家饱经苦难、渴望报仇雪恨的人民不仅完全有权平复胸中的怒火，而且有权亲眼目睹处决，以便相信伸张革命正义不是一句空话。对，处决罪犯应当成为全国性的精采节目！在哪里？大斗牛场！对，在三万多人的眼前进行……巴勃罗·奥尔特加认为这个

主意太狠毒，太危险，会给革命招来麻烦，并把想法明确地告诉了巴伦西亚。巴伦西亚回答说：

“奥尔特加上尉，你的职责是协助新闻宣传部工作，好好完成自己的任务吧。中央委员会知道该怎样做。”

巴勃罗拒绝出席观看公开处决。他在全中国仅存的报纸上——新政府的喉舌《革命报》——看到了像斗牛一样有乐队和小号伴奏的场面，想到这种表演就感到恶心。执行枪决以后，死尸像被刺死的公牛一样由马拖出场外。这时候，人群笑啊，喊啊，唱啊，欢呼啊。“噢莱！噢莱！噢莱！”据说，有些人大声吼叫着要“公牛的耳朵”。

在以后的几星期里，有近四百人在大斗牛场被处决。每次总是从政治上分量较低的罪犯开始，把“大而凶猛的公牛”留做压轴戏。

有一天，奥尔特加总算有了觐见巴里奥斯的机会：

“领袖，这阴森可怖的滑稽剧应该结束了。我读了外国报纸的评论。它使世界对我们的革命形成错误的看法。”

巴里奥斯久久打量了他一番才说：

“奥尔特加上尉，请你告诉我，对这些判处死刑的人的审判是否无可挑剔？”

“一般来说……是的。”

“他们有没有罪？”

“有罪。”

“那么，上尉先生，其余的就无足轻重了。法国有断头台，英国有绞刑架，美国有电刑和毒气室。这里，公开处决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人民有资格欣赏这种节目。我们的大资产阶级应当受到警诫。”接着，他一改刚才的口气，转

而以慈父般的态度说，“如果我们任凭喧闹的群众用自己的手去伸张正义，在街上杀人，冲进我们高贵的官僚们的家，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那么事情不反而糟得多吗？”

巴勃罗·奥尔特加行了个军礼（他一直觉得这个动作可笑），正要离开，对方却伸手拦住他说：

“昨天助理大主教请求见我。我答应了，但限制在十五分钟以内。他带来一封大主教给我的信。在信中，他强烈请求我下令停止处决。”巴里奥斯停住嘴，把头往后一扬，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据大主教阁下说，革命法庭仓促开庭，受到狂热情绪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公众仇恨的压力，他们在下边高声喊叫，要求处决被告……”

米格尔·巴里奥斯站起来，倒背着手，在办公室大步踱来踱去。

“你知道我怎样回答的吗？我说：‘请转告尊敬的大主教阁下，比起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法庭来，我的革命人民法庭算不上仓促、狂热或者受到压力。我亲爱的主教先生，我们比宗教法庭法官要慈悲得多。我们的行刑队用排枪飞快地处决罪犯，从来不把他们在慢火上烤死’。”

领袖又笑了一声，走近巴勃罗，慈父般地把手搭在他肩上，得意洋洋地说，几分钟以前，他刚刚接待了美国大使。

“那傢伙向我提出了一些蛮横要求。”他说，“我当然拒绝了。他通知我说，明天启程回华盛顿向政府述职。他居然暗示说，如果处决继续进行，如果我们把对美国公司国有化的威胁付诸实施而又不以美元给予合理赔偿的话，他相信美国国务院不会承认新政府。你知道我怎样回答的吗？我

说：‘美国是个自由主权的国家，萨克拉门托也希望如此。祝你顺利，大使先生！’。”

巴勃罗·奥尔特加望着广场，想起了近几天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头痛病又犯了。睡觉很少，并且睡得不好。唯一能坦率交谈的还是比尔·戈德金，他仍然在塞罗埃莫索为联合通讯社写稿。

他不只一次试图见见母亲，但母亲毫不动摇，坚决不允许他迈进家门。有几回和戈德金一起散步在门前经过，他久久望着花园深处奥尔特加·伊穆拉特家族那古老的住宅，房子依然显得严峻、凄凉，墙上爬满了长春藤，窗户全都关着……

来到首都以后，他几次与当年的朋友和熟人相遇——都是同一阶级的同龄人——发现他们都佯装没有看见，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冷漠地看他一眼，仿佛两人从未相识。

有一回，巴勃罗正站在十字路口，一位太太（他家的老朋友，生产人心果、香蕉和剑麻的大家族的族长）下了汽车，冲他走过去，竖起食指，几乎敲着他的鼻子大声说：

“巴勃罗·奥尔特加，你穿着这身军服、跟革命无赖们在一起，应当感到羞耻。你害死了迪奥尼西奥先生还不够，难道想要伊莎贝尔太太的命吗？”说完，不等巴勃罗说一句话，便转身钻进汽车。他，巴勃罗，并没有为高贵的太太这番奚落伤心，反而觉得她粗俗可笑，像是演出了一场票价低廉的闹剧。

一天，他打电话给他家的医生莫拉，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便打听伊莎贝尔太太的消息。博士干巴巴地回答说：

“死去丈夫又遭受这一切不幸之后，她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好！”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听到脚步声，巴勃罗转过身。罗伯托·巴伦西亚的助手走进办公室。

“上尉，领袖要马上见你。”

奥尔特加知道他指的是谁，但对“马上”一词感到恼火，问道：

“哪个领袖？巴里奥斯还是巴伦西亚？”

“巴伦西亚上校。”

“好。告诉他，我很快就去。”

对方走后，巴勃罗摆弄起桌上的文件，装作处理什么重要公务的样子。他知道，不论哪个领袖召见，政府大厦的工作人员都快步前往。巴勃罗讨厌巴伦西亚力图在政府职员中建立的这种普鲁士式的纪律。也许纪律必不可少，但并不因此而不可憎。他看着表，故意磨蹭了五分钟才下楼。走进总书记办公室，发现他正独自一人埋头处理一大摞文件。巴伦西亚没有请他坐下，奥尔特加早就料到，自己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对方还在写着什么，似乎没有发现他进来。一连几分钟，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最后，总书记抬起头：

“奥尔特加上尉，刚才我看过了你在我们的新闻法草案旁边的批注。”

巴勃罗一声不吭地望着对方。巴伦西亚接着说：

“你的意见是错误的，幼稚的，可笑的。”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

“也是巴里奥斯和其他同志的看法。总之，是革命中央

委员会的意见。我告诉你，巴勃罗·奥尔特加，你不适合担任目前的职务。”

“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你迷信自由。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把自由看成可以离开人民的生活和福利的全局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把它看成只供收藏而不能使用的家传珍宝。依我之见，它是毫无用处的赝品。”

“你想过吗，巴伦西亚？也许查莫罗和卡雷拉对自由也持同样看法。”

“太可笑了！你应当学会辩证地思考，如果这对一个文人不是过分苛求的话。”他拿起眼前的文件，举到胸脯的高度，然后又扔到桌子上，这与他惯有的沉稳态度大相径庭，

“这么说，你认为，无需消灭一向是本国寡头和外国公司传声筒的商业报纸也能在这个岛国实现我们的革命纲领吗？你认为，我们会允许这些只服务于富有的特权阶级利益的报纸毒害公众的精神吗？用头脑想一想吧，奥尔特加！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多数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手段。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自由就毫无用处。”

“那么，我们要有自己的《真理报》，作为政府的喉舌、作为至高无尚、颠扑不破的唯一真理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每天去请教联合种植公司和糖业中心，问他们应当写哪些社论、怎样写吗？反动派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我们不小心，围墙上面有隙缝，它就会渗透进来。假若他们卷土重来，控制了国家，你不要存什么幻想，他们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消灭我们。你记得莫雷诺吗？他太天真了，以为在资产阶级新闻机构自由活

动的情况下也能实现他的社会改革纲领，结果从进入政府大厦的头一天起就遭受到他们的恶毒攻击，最后被赶下台。”

他又拿起文件，整理一下递给巴勃罗：

“拿去吧，再好好看看这份草案。希望你融汇到革命精神之中来。我再给你这一次机会。”

“这份文件我已经读过十次以上，巴伦西亚。我对草案的意见完全写在旁边的批注里。这项新闻法具有明显的极权主义味道。”

罗伯托·巴伦西亚笑了。他点上一根粗制雪茄，从鼻孔里喷出烟雾，严肃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自由！”总书记大声说，“自由！你们知识分子爱玩弄这个词，就像孩子们摆弄玩具一样开心。自由！几个世纪以来，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作家一直以这个神话的名义写些完全脱离阶级斗争和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

“有名的‘献身’！”巴勃罗大声说，“艺术家或作家为什么必须‘献身’于共产党并把它当作唯一绝对真理的代表呢？为什么不献身于‘人’呢？为什么不献身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它的双重性以及它无数的大门、道路、迷宫和奥秘呢？你们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自诩，用两个抽象的球——历史和人类——玩辩证法的杂技，意然对‘人’熟视无睹，认为为了拯救人类杀死某个人合理合法。于是，对你们来说，死也就变成了抽象事物。”

罗伯托·巴伦西亚没有立即反驳。他沉思片刻，才平平淡淡地说：

“巴勃罗·奥尔特加，你这类文人只为自己献身。你们是个些不可救药的手淫者，对着镜子自娱。”

“巴伦西亚，像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望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自娱，因为克里姆林宫已经宣布斯大林不应该引起任何名符其实的共产党人的冲动。”

看来总书记对这场争论颇感兴致。一丝微笑飘过他的嘴角，减轻了脸上严峻的表情。

“在山上的时候，”他压低了声音，“有一天你对我说自认为是个人道主义者。当时我太忙，正布置一次军事行动，不能为讨论学术问题浪费时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类的词汇只不过是神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实际上皇帝一丝不挂。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用这些头衔遮盖身体，设法逃避站稳立场、和人民并肩战斗的艰苦责任。”

“你认为我没有采取这种立场吗？”

“采取了，但非常勉强，并且没有坚持到底的必要心理准备。”

“你所说的‘底’是什么意思？指的是杀人合法化吗？以暴力为准则吗？接受极权制政府吗？不，巴伦西亚，不要指望我这样做！”

“坦率地说，奥尔特加，对你我没有任何指望，也从来不曾抱有幻想。你是哪种人，我非常清楚。我已经说过一次，现在重复一遍，你的兴趣在于拯救自身，而不是我们的人民。你可以否认，但教会学校确实在你精神上准备了产生负疚感和补赎罪过的欲望的土壤。你这类人绝不能促进社会幸福。”

巴勃罗·奥尔特加站起来。巴伦西亚接着说：

“你仍然是个不错的文人，继续玩弄词藻。和你的有所

同类一样，看到头一滴血便蜷缩起来，感到胃里难受，于是就逃避斗争。你们都是人类中了不起的含羞草。”他举着胳膊，用手指指着对方，“我敢打赌，在几星期之内，你就要嘀嘀咕咕（如果现在还没有嘀嘀咕咕的话），说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革命。结果是一有机会便逃往迈阿密，在那里的海滩上晒太阳，出入妓院，写文章反对萨克拉门托革命政府，写诗歌揭露我们的人民处于‘共产主义铁蹄奴役’之下。自然，你会小心翼翼地装出一付受害者的面孔，以便得到热心于拯救各‘香蕉共和国’的美国佬们的器重，你那些反对我们的文章也会得到美国报刊的优厚稿酬。”

“你完全错了，巴伦西亚。我不会走，一定要留下来，为的是实现革命向人民所做的许诺。我有这个权利。”

“我不否认你有这个权力，但怀疑你有这个骨气。”

“走着瞧吧。”

巴伦西亚站起身，打开保温瓶，倒了一杯水，从一个金属匣子里拿出一片药，放进嘴里，喝一口水咽了下去。柿色军装腋下两块汗渍越来越大。电扇嗡嗡叫个不停。总书记桌子上的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放到耳边：

“对，我是巴伦西亚……什么事？谁？现在不行。让他五分钟以后再来。”

他放下电话，坐到桌子旁边，双臂交叉。

“巴勃罗·奥尔特加，你的朋友格里斯常说，有一种暴力他同意接受，虽然是满心不愿意地接受，即用来反对匪徒们的暴力的正义暴力。我们面临着极其伟大的任务，不能在鸡毛蒜皮上浪费时间。”

“如果你认为人的生命是鸡毛蒜皮，那么我对这场革命

的前途就没有多大希望了。”

“不用你来操心，我们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如何决定革命的前途，并且对它充满信心。”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奥尔特加正和戈德金在塞罗埃莫索散步。他们刚刚一起吃过晚饭，就听见大街上的扩音器响起来，说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当天已经出院，一星期之内将在革命人民法庭受审。

“你早就知道了吗？”比尔问。

“昨天下午就知道了。消息已经在政府大厦传开了。这件事我想得很多……”

“莫非你想证明你对此人的命运也负有责任吗？”

他们走进一家酒吧间。巴勃罗在售票处买了两张牌，两个人来到咖啡机前面的柜台旁边。

“比尔，我已经下定决心，自愿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辩护。”

戈德金点上烟斗，吐出一口烟，用明亮的眼睛望着朋友问：

“为什么？”

“不知道。一个姿态而已。”

“我明白，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可是，象征什么呢？”

巴勃罗耸耸肩膀。侍者——一个大眼睛、上眼皮染着蓝色胭脂的混血姑娘——朝巴勃罗谄媚地一笑。给柜台桌面上的两个杯子倒上了咖啡。

巴勃罗一口喝下滚烫的咖啡，做了个鬼脸——原来他忘了放糖。

“你以为我的主意如何？”

“很可能意味着自杀，特别是在你和巴伦西亚那次谈话之后。”

“那就自杀吧！喝下这杯咖啡，我们去看场电影。”

第二天上午，巴勃罗见到了巴里奥斯，通知他说决心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辩护。

革命领袖听完他的话，严肃地说：

“上尉想过这样做会对你多么不利吗？”

“想过了。”

“当众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这样的恶棍辩护是个令人厌恶而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你主动承担这肮脏的任务，真让我吃惊。”他沉思片刻，又补充说：“谁也不会理解你的作法。”

“我明白。”

“由于采取这种态度，你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可能大大削弱。”

“我对地位不感兴趣。”

“好。不过我希望你至少对这场革命感兴趣！”

“当然。”

“你以为替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辩护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吗？”

巴勃罗·奥尔特加失去了耐心：

“指挥官，请告诉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有没有要律师辩护的权力？”

“有，尽管这个无赖不配。我们原来想指定一位职业律

师完成这项任务，可是既然你执意要……如果真的执意要为他辩护的话。”

“我执意这样做。”

“希望你以后不要说是我们强迫你担当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那怎么可能？”

“还有一件事。你知道这回谁是公诉人吗？”

“不知道。”

“罗伯托·巴伦西亚亲自担任。你不要抱任何幻想，总书记会铁面无情。你结束辩护词之后，可能他会请求反驳，不仅把被告置于死地，还会把你也一并毁灭。他绝不会留情面！”

“将军，让我直言不讳吗？对罗伯托·巴伦西亚这种人，我可以指望一切：聪明、勇敢、坚韧……唯独不指望他留情面。”

“我应该把这一点看作对我们这位同志的批评吗？”

“我愿意相信，我们还没有到神化革命领袖，不得对他们提出任何批评的地步。”

“你考虑过这种思维方法的危险性吗？”

“考虑过了，但我不会用别人的方法思维。”

米格尔·巴里奥斯把他打量了一番，眼睛里时而流露出爱怜，时而表现出迷惑不解。

“好吧！我告诉法庭庭长，说我同意你为你的朋友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辩护。”

“我想申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是我的朋友。”

米格尔·巴里奥斯不耐烦地把手一扬，

“不论是不是朋友，上尉！你可以走了。”

当天，巴勃罗·奥尔特加获准会见他的被辩护人。他囚禁在陆军第二团的一间屋子里，门口有两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站岗。屋子呈正方形，比巴勃罗想象得要宽敞一些，也明亮一些。天气阴沉、潮湿而炎热。灰濛濛的光线从朝军营操场开的两扇铁窗钻进屋里。

刚一进去，巴勃罗·奥尔特加就听见一个佯装高兴的声音：

“请进，一等秘书先生！”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铁床上躺着。现在，他抬起上身，伸出手。巴勃罗迟疑了十分之一秒才握了握前上司的手。

“不要仔细看，巴勃罗，我脏得浑身发臭。一个星期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理发师三天不来了……”他手掌摸了摸脸上的花白胡子，发出一声短促而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倒象临死前的哀鸣。“还记得四月的那个上午我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国书的事吗？你甚至说我施的花露水太多了……”他摸了摸汗渍斑斑、脏成灰黄色的白汗衫前襟，又指了指满是污痕、皱皱巴巴的柿色麻布裤子，唧唧嚷嚷地说：“看到了吧，世道变了。不过，这算不上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坐下呀，伙计！”

巴勃罗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一边听前大使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监狱里伙食质量不好，不准警卫和他说话，天气太热，鼓声和号声搅得他心里烦躁——一边仔细观察他企图挽救其生命的人。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面目全非了，比原先瘦了许多。眼皮浮肿，眼球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像是一连几夜睡不好觉或完全失眠。声音也失去了金属般的清脆。玛雅印第安人那古铜色脸庞上因为劳累、忧虑和痛苦而长上了斑斑绿锈。最让巴勃罗·奥尔特加吃惊的是他的头发几乎完全白了，看上去像个七十岁的老人。

“巴勃罗，你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最近几个星期我苍老了二十岁。在医院的时候我照过镜子，认不出自己来了。这算不了什么，我会好起来的。等他们给我刮刮胡子，理理发，换上件像样的衣服，我就会变成另一个人。我想抬头挺胸地出席他们那混帐法庭。要是以为我会请求宽恕或放声大哭，他们就完全想错了！”

他坐起来，抬起一条腿，指着膝盖上裹着伤口的肮脏纱布说：

“这条腿险些被截断，现在还疼得厉害呢，不过比先前好多了。啊！问你一件事：什么时候审判？”

“下星期五。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巴勃罗站起来，走到一扇窗前朝外看了一会儿。操场上有几个士兵在踢足球。

“我来这里是为了问问你，同意不同意我作你的辩护律师。”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回过头来看犯人一眼。

“你？”

“你觉得荒唐吗？”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笑了：

“不荒唐。你一直喜欢我，巴勃罗，虽然这违反你的意愿。我也一直很喜欢你，把你当成我想要而上帝拒绝给予我

的儿子一样。最使我伤心的是那天你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辞职时说的一席话……要是别人，我非一脚把他踢出去不可……想不到（这是实话），想不到现在愿意为我辩护……我承认，这使我很高兴……当然，是你的意愿让我高兴。”

一阵沉默。巴勃罗突然想到，这间屋子的某个地方可能装有麦克风在偷录他和犯人的谈话。他仔细检查了一番：看看床底下，蹬上椅子看看电灯插座……在这间几乎没有家俱的屋子里安放麦克风谈何容易！因为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床头柜、两把椅子和一个洗手池——铁架子支着的一个洋铁皮脸盆和一个陶瓷水罐。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巴勃罗。依我看是白白浪费时间，什么也找不到，这件事我早就想到了，并且亲自察看过。恐怕你的同志们对我们现在谈些什么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被判处死刑。”

“同意不同意我作你的律师？”

“巴勃罗，既然这不过是个纯粹的手续问题，我接受你的好意，但仅仅是对你本人的表示而已。我不抱幻想，知道已经完了。他们会把审判变成一场精采的演出。给我支烟好吗？我的已经抽完了。”

巴勃罗递给他一整盒：

“你留着抽吧。回头我再给你送一些来。”

巴勃罗用打火机替对方点着夹在嘴唇上的香烟。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若有所思地抽了几口，才半笑不笑地说：

“多好的主意！在斗牛场上处决犯人！我的干亲家卡雷拉从来不曾想到……”

“我觉得这种演出实在叫人憋气。”巴勃罗重新坐下，

“好，我想告诉你我的打算。我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判处死刑。”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笑了一声，但笑得可怜，与他当年那小瀑布般带有金属响声的开怀畅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怎能饶我的命呢？审判的不仅是我本人，而是整个局势，整个制度……”

“你的罪证无可辩驳。”

“都是些什么罪证？”

“盗用公款、放高利贷、违法肥私、裙带关系、盗窃国库、滥用经济权力……”

“从什么时候开始凭这类‘罪行’可以处以死刑呢？”

“还控告你是绑架并谋杀莱昂纳多·格里斯博士的主谋之一。”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站起来：

“我与这桩事不沾边！大概是萨帕拉那头蠢驴干的。并且，巴勃罗，连苦主的尸体也拿不出来，怎能控告一个杀人罪呢？也许莱昂纳多·格里斯先生还活着呢！”

“还将控告你在乌加特和萨帕拉时期的拷打和杀害犯人之中犯有过失、渎职和同谋罪。”

“除了在战斗和决斗中以外，我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我以索莱达德的圣母起誓，以我妻子、女儿和孙子们的生命起誓！”

他用两只手抓住巴勃罗的肩膀：

“你该相信我！难道不相信吗？”

屋里更热了，汗水顺着他的脸、脖子和脊背往下流。他身上难闻的气味钻进巴勃罗的鼻孔，使他想起父亲庄园里的

农工们顶着太阳干活时的汗臭。

“相信吗？”犯人又问了一遍。

巴勃罗从那双指甲脏得让人恶心的手里挣脱出来，躲开他那黏乎乎的身体。

“我相信，但必须让陪审团也相信。这事难以办到。在那里，会有数以千计的人要求处你死刑……”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像个受伤的猛兽一样，在囚室里一瘸一拐地走起来。最后，他来到窗前，两只手抓住铁栏杆望着外边，累得稍微有点气喘。

“有件事我现在就请你帮忙，奥尔特加。随便你怎么做，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说。但是有一点我要请求你、要求你！不要提起我的母亲，你听清了吗？不要说我是个可怜的妓女的儿子，我不许你这样说，听清了吗？还有一件事。不要向陪审团请求怜悯。不要用这个词。不要让我处于后悔不迭、吓得屁滚尿流的可怜虫的境地，听清了吗？我不希望人们可怜我。既然人们不喜欢我，至少不要让他们讨厌我。答应我吧！答应我吧！答应我吧！”

“好，我答应。”巴勃罗喃喃地说。现在，他感到自己的汗水像胶水一样把柿色汗衫紧紧粘在了脊背上。

加夫列尔一边呻吟，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到洗脸盆旁边，用使用过多次的水洗了洗脸，随后又沾湿了头发、胳膊和胸部，才转过脸望着对方。现在，他似乎精神了一些，不再像刚才那样弯腰驼背，眼睛也稍稍清亮了，甚至声音也恢复了当初的爽朗。

“巴勃罗，你走吧！不要为我辩护了。毫无用处。去救你自己的命吧。否则你会被你的同志们列进黑名单的！”

屋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奥尔特加的头又痛开了。他嘴里干渴，恨不得立刻逃到露天。可以走开，忘掉这一切……记得戈德金头一天说过：“你指责巴伦西亚想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你，巴勃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模仿耶稣。为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不值做出这样的牺牲。你将要演出—场各各地^①上的惨剧，和窃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走吧，巴勃罗！”囚犯又说了一遍，“再也不要想起我。”

奥尔特加解开汗衫钮扣，用手绢擦擦脸、脖颈和胸脯，面对着他说：

“我已经是你的律师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这一点已经决定，我绝不后退。现在我想像个男子汉一样和你谈一谈。我本来有一切理由恨你，希望你死去。”

“不要恨我，巴勃罗，不要恨我。你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吗？因为我的为人和我所做的许多事情你同样会做，之所以不步我的后尘是因为你们所说的‘原则’在作祟。承认吧！你并不知道你的道路是否比我更正确。”

巴勃罗竭力把繁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巴伦西亚已经说明，这是他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交谈，只有在审判的那一天才能再次见面。

犯人似乎累了，喘着粗气直挺挺地躺到铁床上。他仍在抽烟，烟灰飘落在汗水涔涔的胸前，偶尔弄脏他那小小的圣母像章。

“说吧，巴勃罗，随便问吧，我活不了一个星期了。”

① 各各地：即骷髅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问题太多了，从哪儿开始呢……

“你品格中有些方面令我迷惑不解……”

“哪些方面，小伙子？”

囚徒眯缝着眼睛，似乎比刚才沉静了一些。

“你来自下层，本来是个忍饥受饿、衣衫褴褛、连鞋子也穿不起的穷孩子……亲眼见过你的朋友们遭受查莫罗士兵的拷打和残杀。二十一岁那年，你参加了卡雷拉的革命队伍，为了打倒独裁者不惜冒生命危险。你答应为故乡的人民争取正义和改善生活，但后来把这一切统统忘到了脑后，和富人家的女儿结了婚，成了共和国的大人物，肆意妄为，最后变为卡雷拉的挚友！而他则堕落为比查莫罗更残忍的独裁者。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这件事不要问我，去问上帝好了。可惜上帝是个大哑巴，至今谁也没有发现它想干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I 具有一个肉体，肉体对我的要求我从不拒绝……对一个男子汉来说，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比他本人的肉体更加亲近了……从出生的时候起，到死去的一刻为止……”

“你从来没有为背叛了朋友们而感到悔恨吗？”

“背叛？生活本身就是永无休止的背叛。活着的人因其活着正在背叛死者，每个人都在思想上或行动上背叛他人。不论他有意还是无心，从早上起床到晚上躺下都一直在背叛。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唯一的区别是一些人有胆量始终表里如一；另一些人则生性怯懦，整日里怨天尤人，用种种廉价的哲理为其怯懦和无能辩解。对我来说，只有一件重要东西：此刻。我已经驯服了自己的记忆力，使它学会了忘记过去，忘记不应该记住的一切。我所关心的是活着。”

“可是，现在你就要死了。”

“我已经活了十个生命。世界上有多少人有权说这种话？”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巴勃罗说，“你的良心。你从来不受良心的折磨吗？你成了比万科妻子的情夫，使那个可怜的人历尽苦痛，还间接地造成他的死亡……”

“比万科只不过是个蛆虫，本来就不配出生。”他大笑了一声，“我希望他们不要指控我杀死了比万科……”

“不，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你回避了我提出的问题。莫非你的良心从来没有谴责过你任何事情吗？在任何时间——白天或者晚上——，没有谴责过你一分钟、一秒钟……十分之一秒钟吗？你不至于和其他人差别太大吧……”

巴勃罗看着这个日子屈指可数的人，只见他面带微笑，抽着香烟，样子显得很镇静。对此人究竟怀什么感情，巴勃罗也说不清楚。他阴险、自私、粗鲁、暴躁。即使如此，却仍然恨不起他来。

“还有一件事，”他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觉得出人意料。前后矛盾……”

“说吧，小伙子。”

“你知道卡雷拉完蛋了。他把全家人送到了多米尼加。对吧？”

“对。”

“当时你在华盛顿，完全可以向美国政府请求避难，飞往特鲁希略城，或者像乌加特……还有其他人那样，飞往瑞士。为什么你没有那样做呢？”

“这难道还需要我解释吗？”

“当然需要！你如此热爱你的生命，想继续活下去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囚犯沉默了片刻，然后用食指一弹，烟头朝屋顶射去。

“真正爱惜生命的人就不该惧怕死亡。”他回答说，“两者互相依存，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他扭头望着对方，“这句话说得满漂亮，嗯，巴勃罗？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话去说。我不知道是我想出来的呢，还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非常爱惜生命的人在一定意义上也热爱死亡。”

“这不过是一句话而已，加夫列尔·埃略多罗。”

“好。男子汉有男子汉的自豪感。比如你吧，巴勃罗，如果我不回来保卫我的上司和干亲家，而是像乌加特那个老忘八一样逃往瑞士，你会感到更坦然……更心满意足吗？”

“当然不会。可是……”

“对吧？会生活的人也应该会死亡。”

他直起上身，把腿耷拉到床边，又点上一支烟，看了看来访者：

“只有一件事使我……使我心神不宁。就是像头猪似地捆住手脚在斗牛场上处死……当着那么多以我的死取乐的人……”

巴勃罗·奥尔特加固执地摇着头，表示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解释仍不满意。

“巴勃罗，你知道吗？我可能无知，但绝不愚蠢。我了解生活，也了解人们。你以为你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我吗？实际上也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还不知道这场革命是否像它的领袖们所宣称的那样真的能拯救人民脱离灾难。最近几个

星期里，有多少前政府的人被处决了？三百？四百？是啊。屠杀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你已经倒了胃口。在战斗中，你大概亲手杀过人，你称为‘良心’的东西可能因此而感到痛苦。而现在你又设法相信，所有这些暴虐行为、这些屠杀都真的势在必行……因为处决我必将在你的‘良心’上增加一个死者，所以你想救我。”

他又站起身来。

“我住院的时候，”他接着说，“护士们给了我几份报纸……那臭报纸叫什么来着？对，《革命报》！我读它的文章，也看文章的字里行间……米格尔·巴里奥斯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在后面牵线的则是那个什么罗伯托·巴伦西亚。不是吗？”

“当然如此！”

“好，巴勃罗，你注意听我下面的话。谁也没有告诉我，但我敢发誓，你不喜欢巴伦西亚，他也不喜欢你。实际上，你是个反巴伦西亚分子。不过，请记住，有理的是他而不是你！”

巴勃罗猛地抬起头来：

“为什么？”

“请理解我所说的话。尽管这傢伙想要我的脑袋，我还是不能不佩服他。他是个男子汉，知道想干什么，不顾一切牺牲，不择任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这种性格的男子汉们才能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巴勃罗，你永远不要忘记，胜者王侯败者贼！”

“我不同意。”

“不同意也是徒劳，事实俱在。如果你不逃往国外，总

有一天要在斗牛场上被处决。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不同意这种前途。革命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巴伦西亚和他的共产党的私有财产。它属于我们，属于人民。”

巴勃罗紧紧抱着疼痛的头。军营的操场上响起尖利刺耳的号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又拖着那只受伤的腿在屋里踱起步来。

奥尔特加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莱昂纳多·格里斯的形象。

“我希望你坦率地告诉我，”他说，“以满足我的好奇心，驱散心中的疑团……关于那个‘悲剧之夜’发生的事情。你们让全世界相信了莫雷诺总统朝头上开了一枪、自杀身亡的消息。这里边有多少真实的成份？”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拿起陶罐，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顺着他的嘴角、脖子和前胸流下来，接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唇，望着巴勃罗说：

“莫雷诺博士没有自杀。”

“啊！格里斯说得对。那么，是你们把他杀死了？”

对方摇了摇头：

“对我来说，法官们是否相信我的证词无关紧要。但我想让你，巴勃罗，了解事实真相。既然我知道自己完了，无论如何也完了，何必再向你撒谎呢？”

他停了一会儿，深深吸了口气，又说：

“胡里奥·莫雷诺博士是心脏病发作而死的。接管政府之后，他曾两次患心肌梗塞。你大概还记得，各报都刊登了消息……在悲剧之夜，我是头一个冲进他的办公室的，发现

他独自一个人趴在办公桌上，已经死了……我以索莱达德圣母发誓，我说的完全是实话。后来，一个医生做了检查，确定了死因。其它的都是我的干亲家卡雷拉和他的警察首脑……背着我编造的。”

奥尔特加走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指着 he 脖子上挂的圣母像说：

“这枚像章……你相信圣母。一种荒唐的、自相矛盾的宗教，我无法理解……”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那些神父们不是亲口说吗？宗教不是逻辑问题，而是虔诚的问题。”

“就算是虔诚吧……”巴勃罗刚要说什么，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打断了他的话：

“你相信上帝吗？”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它的存在。”

“而我相信万能的上帝。奇怪！我是个信徒，可行为举止像个俗民。你是个俗民，却又讲究伦理道德。巴勃罗·奥尔特加·伊穆拉特，生活就是这样，毫无一致可言。”

巴勃罗准备去了。他目光模糊，头痛得越来越厉害。

“我们说好了，对吧？我来为你辩护，目的是阻止他们判处你死刑。”

“白费口舌。不过，既然这能使你良心稍安……我不反对。我重复一遍刚才说过的话：不要请求怜悯，不要提起我的母亲。让我带着男子汉的尊严度过这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吧。请注意，巴勃罗，我说的是‘男子汉的尊严’，而不是天使或者圣徒的尊严。”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胳膊伸给巴勃罗：

“不要怕跟我握手。‘坏人’并不是传染病。如果是的话，世界早就被瘟疫毁灭了……”

奥尔特加握了握他的手：

“法庭上再见。”

“啊！我要求你几件事。设法送几件像样的衣服来，让他们允许我洗个澡，审判那天打发个理发师来给我刮刮脸。还有一件，巴勃罗。不要太费力气，不要拿脖子冒险。记住我说的关于罗伯托·巴伦西亚的话。他是个危险人物。对我的审判很可能也是对你的审判……”

“我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非为我辩护不可呢？”

巴勃罗·奥尔特加没有回答，转身朝门口走去。

“布道的时候，”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声音近乎兴高采烈，“你们的卡塔里诺神父常引用《圣经》里的一首小诗，

‘驯顺者交好运，因为大地将归他们所有。’我从来不相信这句话。驯顺者可以继承天堂，而大地必定属凶猛者所有。”

奥尔特加敲敲门。一个警卫把门打开了。他最后又看了前大使一眼，来到楼道，气急败坏地嚼了一片阿斯匹林。

44

尽管明明知道联合通讯社肯定会删去他关于审判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报道的三分之二，比尔·戈德金仍然决定详尽记录担任公诉人的罗伯托·巴伦西亚和担任辩护人的巴勃罗·奥尔特加之间即将进行的唇枪舌战的精采场面。

现在，他坐在新闻界代表专席上，开始描写法庭的气氛。

五千多个炽热的人体挤在一间大厅里。太阳升起来，几乎把锌皮屋顶烤红了。其闷热程度，读者们可想而知。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种语言比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语能使大型群众集会更加喧声震天。

数以百计的人上午七点便进了大厅，为的是抢个好座位。他们带来了旅行袋，里面装着鸡肉、烤牛肉、三明治、馅饼、香肠、火腿、奶酪……当局担心群众动武，严禁携带玻璃瓶等硬物入场，以防他们在认为口头交锋需要实际行动补充的时候当火箭投出去。没有座位

的人站在走廊里，或者坐在墙边——男人、女人，甚至孩子，大部分是黑白混血种人，一个个汗流满面，黑眼睛里闪着兴奋、激动的光芒。“演出”尚未开始，他们交谈、吃东西、唱歌、抽烟、吐痰、嚼口香糖、吹口哨、高呼万岁或大喊“该死！”不时突然出现一阵嘘声或欢呼声，我并非每次都能发现他们反对或赞扬的目标。他们用力跺脚，要求赶快开庭。炎热似乎使空气变得浓密而油腻了，大厅里许多嗡嗡转动的电扇只能把各种各样的气味——汗臭味、油炸食品味、大蒜味、洋葱和烟草味——混合成一股奇特的大杂烩的怪味。

外面，大约有一千人因为不能进入大厅而愤怒地喊叫、吹口哨。大厅由大批手持冲锋枪、装备催泪弹的革命民兵把守。看来这些人只能通过装在四周的扩音器旁听审判了。人们告诉我，尽管扩音器宣布体育馆里“连一根大头针也放不下了”，仍然有一群人试图冲进去，引起一场小小的骚乱。

据塞罗埃莫索气象台预告，当天（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温度为摄氏三十三度，空气相对湿度为百分之八十。进入体育馆以前，比尔·戈德金望了望雾濛濛的天空，肉体 and 头脑里同时感到闷热的煎熬。他想起了一句话，但绝对不能写进报道。即使写上了华盛顿的编辑大人也肯定删掉：“在这种拉痢疾似的日子，最乐观的人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自杀的念头。”

唯一的一家电视台已经收归国有，置于革命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事先在大厅各有利地点安放了摄像机和全光

反射灯。灯光亮起来，照射着主席台一张长桌后面的审判团时，大厅里的炎热达到了极点。陪审团成员们被照得头晕目眩，不停地眨眼。法庭庭长——一个外表和善的长者——眉头一皱，用手遮住了眼睛。坐在审判团荣誉位置上的米格尔·巴里奥斯却毫无反应。他肯定意识到，此时他的形象被摄入镜头，出现在本市及其郊区数以千计的电视机屏幕上。摄影记者、电影摄影师忙来忙去。陪审团成员们有的不住晃动身子，有的用扇子或装有控诉书复制件的硬纸夹驱赶苍蝇。记者席上，四十多位外国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的代表有的在作记录，有的打专线电话，有的互相交谈，一杯接一杯地喝冰镇柠檬汁，个个都不停地用湿透了的手绢擦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庭长摇铃请大家肃静。扩音器里也传出响亮而庄重的声音，宣布庭长阁下要求公众特别注意举止，在审判过程中保持最大限度的安静。尽管如此，人群过了几分钟才停止喧哗。

九点二十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被四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押进场内。他戴着手铐，没有穿外衣，但汗衫和裤子还算干净，刚刚刮过的脸显出病态的苍白，眼睛因为发烧而目光炯炯，还不时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不过走路的时候仍然挺胸抬头，望着前方。比尔·戈德金发现前大使一瘸一拐，不免顿生恻隐之心，只是没有把这个细节写进报道，因为记者不应当带任何个人感情。

看到被告进来，人群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和咒骂声（使很多人联想起全市足球锦标赛的场面）。庭长不停地摇铃，扩音器要求大家安静，告诫说再不安静的话庭长就不

得不下令把人们赶出大厅，但呼喊声仍然持续了好几分钟。

比尔·戈德金看到，大部分观众脸上的表情痴呆、愤怒。叫骂声仍在继续：窃贼！杀人犯！流氓！土匪！无耻！猪猡！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坐在无背板凳上，胸脯挺直，眼睛似乎尽量不注视任何地方。从观众席前排飞出一个臭鸡蛋，正好打在他的额头上开了花，又臭又黏的汁液顺着脸流下来，滴在汗衫上，染出一块块芥末色的污渍。一个上士冲过去，企图找到肇事者。一阵短暂的骚动。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仍然一动不动，甚至不肯擦擦脸上的脏东西。比鸡蛋更脏的咒骂劈头盖脑落到他的身上。被告依然无动于衷。但是，当一个响亮的男声压过众人，吼叫“妓女的儿子！”时，比尔·戈德金发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脸猛地一阵抽搐，额头上的伤疤也突然象电火花一样闪了一下。

从此刻起，联合通讯社记者决心抛开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用疯狂的速记法写下一切：不仅大厅里人们说什么、做什么，而且还有自己的感受。他相信，将来用所有这些素材写一本书，通讯社的编辑老爷们就无权置喙，无权用蓝铅笔大删大砍了：

庭长请罗伯托·巴伦西亚发言。他没有在客套或致意上花费时间，而是开门见山地发动攻击：“我们聚集在这里不仅仅为了审判一个人，而是审判一个制度、一个历史时期，审判一个多少年来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流血呻吟、破坏我国经济、摧残我国人民的黑暗局面！”他条理清楚地历数了被告的罪行：滥用经济权

力、违法肥私、黑市交易、盗用公款、放高利贷、与联帮警察合谋干下种种暴行、积极直接参与建造新政府大厦的巨额肮脏交易、非法享受有损国库的特权和优惠。随后，他又着重分析了被告在离塞罗埃莫索几公里的臭名昭著的乡间别墅的骄奢淫荡行为。在整整两个小时里，他提出大量证据说明控诉属实（有些在我看来比较笼统，另一些则不可辩驳），请几十个人出庭作证，并提请法官注意文件夹里的控诉证明材料。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完了！”我想，“巴伦西亚可以住口了，因为他已经赢了。”然而，他继续说下去，证明这个“人类的脓包”是制造所谓共产党人将进行暴动的“天方夜谭式的谎言”的主谋之一，并向胡韦蒂诺·卡雷拉提供借口，使暴君能继续执政。在那次所谓“救国运动”事件中，许多无辜的人被捕、受到拷打甚至惨遭杀害。他又说：“1951年，窃国大盗在两家美国公司——联合种植公司和糖业中心——帮助下，从流亡地返回萨克拉门托的时候，在首都指挥第五纵队的正是这个家伙！带领雇佣军冲进政府大厦、枪杀胡里奥·莫雷诺总统的也是这个匪徒！”

这时候，人群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最后变成有节奏的大合唱：“拉到斗牛场！拉到斗牛场！拉到斗牛场！”呼喊声一直持续了几分钟。坐在桌子后面的巴勃罗·奥尔特加一会儿记录点什么，一会儿局促不安地摆弄手中的铅笔或用手绢擦擦脸上和脖子上淋漓的汗水。我觉得“看见”他头痛得厉害，“看见”血液拍击着他的太阳穴。

场内终于恢复了平静。巴伦西亚接着说：“我不仅控告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是窃贼和杀人犯。除了亲手杀害胡里奥·莫雷诺博士之外，他还是绑架并谋杀莱昂纳多·格里斯教授的间接凶手。卡雷拉在华盛顿的间谍奉大使馆的命令把教授麻醉以后装进一架私人飞机，扔进了大海。此事和令人义愤填膺的赫苏斯·卡林德斯教授案件如出一辙！”这时候，被告眉头一皱，用目光寻找他的律师，但发现巴勃罗·奥尔特加正低着头看自己的记录。“还是这个寡廉鲜耻、骄奢淫荡、丧尽天良的傢伙，”公诉人接着说，“杀害了萨克拉门托驻华盛顿大使馆秘书弗朗西斯科·比万科——顺便说一句，比万科的妻子是他的情妇。从肉体上消灭了被他欺骗、折磨的男人还不够，他竟然还破坏死者的名声，造谣说他参与了一个所谓叛乱阴谋，为胡韦蒂诺·卡雷拉发动最后一次政变提供了所需的借口。”这时候，几乎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重新开始齐声喊叫：“拉到斗牛场！拉到斗牛场！”庭长再次摇铃，但无济于事。几个士兵冲向前排，与观众发生了争执，互相辱骂、推搡。一个上等兵头上挨了一拳。最后，负责在大厅维持秩序的队长命令士兵朝空中开枪示警。全场一阵惊慌，十五分或二十分钟以后这小小的地狱才恢复平静。罗伯托·巴伦西亚又开始讲话：“法官先生们，我的话完了，只想以革命正义的名义——它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正义——给予独裁政权和腐败的象征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以应有的惩罚：判处死刑！”顿时，叫喊声夹杂着对被告的嘘声和咒骂声响成一片。我觉得，这强有力的狂热声音使整个大厅难以容纳，恐怕要冲倒墙壁，掀翻屋顶……

法庭庭长请辩护律师发言。巴勃罗·奥尔特加慢慢站起来，柿色汗衫已经完全被汗水沾湿了。他离开桌子，朝前走了两步、向庭长和米格尔·巴里奥斯点头致意之后来到麦克风前。头几句话便被公众的嘘声打断了——据我看所有的人都在嘘他。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勉强听到几声喊叫：“住嘴，叛徒！”，“和法西斯一道见鬼去吧！”，“把他也拉到斗牛场去！”士兵们不得不再次干预，以恢复秩序。庭长站起来提醒群众注意，按法律规定，“任何一个”被告都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巴勃罗·奥尔特加倒背着手，两腿呈军人稍息的姿势，耐心地等待着。我觉得他比我预料的要镇静，似乎群众的疯狂并没有吓得他心惊胆战，反而鼓起了他的勇气。

他以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开始为被告辩护。他首先声明，对公诉人提出的有关被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行为的指控和证据无话可说，但必须反驳公诉人所指控的谋杀罪。在这一点上，公诉人激情多于逻辑，仇恨多于令人信服的证据。

“甚至没有一个目击者证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瓦尔拉多是杀害胡里奥·莫雷诺博士的现场或幕后主使人。”他说，

“至于莱昂纳多·格里斯教授，既然还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杀人罪又从何谈起呢？谁见到了他的尸首？”

这时候，坐在头一排的一个唇上长着浓密绒须的黑白混血胖女人冲上通往主席台的三级台阶，不等士兵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走到巴勃罗·奥尔特加跟前，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引起全场一片欢呼。两名士兵马上赶来抓住她，在观众的骚乱之中把她推出大厅。巴勃罗·奥尔特加利用这段时间擦了擦脸，表面看来，还沉得住气。从开庭以来，我头一次发现被告脸上出现恼怒的表情。他在凳子上动了几动，企图站起来，但被两个看守他的士兵按住了。

观众中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清晰但因为愤怒而颤抖：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格里斯博士曾是你的老师和朋友！”我注意到，巴勃罗·奥尔特加在回答这个指责的时候毫不生气，脸上出现凄楚的表情：“我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格里斯博士。如果我相信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对他的死有一点点责任，那么我就不会在这里为他辩护，而是要控告他了。”这句简单的话又引起观众一阵咒骂。安静下来以后，巴勃罗又说了几分钟，设法证明在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身上审判卡雷拉、乌加特·萨帕拉和被推翻的政府中的其他匪徒的罪恶是荒谬的。被告不是一个“象征”，而是一个人。一个人必须根据他本人所犯过失来审判。他无法再说下去，因为人群又开始有节奏地唱起来：“拉到斗牛场！拉到斗牛场！拉到斗牛场！”巴勃罗·奥尔特加猛地转向法庭庭长，大声喊：“庭长先生，我建议本次审判改期易

地举行，因为审判团受到群众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的压力，无法作出冷静的判决！”

巴伦西亚站起来大声说：“我抗议！我们不能为拜占庭式的无止无休的法学讨论浪费时间。人民有权表示他们的意见和感情，因为我们在民主制度之中，而不再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另外，陪审团由有勇气、有尊严的人组成，所以完全有能力根据公诉书提出的铁一般的证据清醒地对被告进行审判！”

又一阵疯狂的欢呼声。一架摄像机对准辩护律师，拍摄他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巴勃罗·奥尔特加冲着罗伯托·巴伦西亚大声吼叫：“进行革命的目的是在这个国家建立社会公正，建立纯正的社会公正，而不是为了个人报复！似乎公诉人先生和中央委员会对于在斗牛场上向人民提供另一个流血演出比真正伸张正义更感兴趣。我声明，我的被辩护人犯有一系列罪行，理应判处徒刑，让他做为一个危险分子、有害于社会的分子永远与世隔绝。请判处他终身监禁吧，不要杀死他！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大斗牛场野蛮的处决表演正在使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革命产生误解！”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剪报，转身面对着米格尔·巴里奥斯说：“前天，几个外国记者想了解还有多少人要被枪毙，巴里奥斯回答说（现在，我引用他的原话）：‘你们用不着惶惶不安，我们的清除行动即将结束。已经消灭了四百九十九个匪徒。本星期日枪毙前政府首犯之一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之后，处决即将结束。如果记者先生们对数字感兴趣，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们，阿尔瓦拉多将是第五百个被枪毙的人。’”

这时候，我发现巴里奥斯神情有些慌乱。他朝巴伦西亚那边看了一眼，仿佛是请求支援。巴勃罗·奥尔特加又转向听众：“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读的革命领袖的谈话分明是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的未审先判，它使我们现在进行的审判成了一场可悲的闹剧！”他把剪报放进口袋，朝桌子那边点点头说：“革命法庭庭长先生，我的话完了。”随后，在一片怪里怪气的叫骂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罗伯托·巴伦西亚站起来要求发言。庭长点点头。公诉人走到麦克风前，笑眯眯地举起双手，请大家停止欢呼。在近二十分钟的讲话中，他只是对巴勃罗·奥尔特加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他说：“从这个年轻人到卡拉维拉山营地，要求参加我们部队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最感兴趣的是解决个人的问题，而不是把我们的人民从独裁政权和灾难中解救出来。有些知识分子脚踩两只船，迷信抽象的空话，既要革命又不想革命，既希望又惧怕祖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三代庄园主的后代巴勃罗·奥尔特加正是他们之中最典型的人物。”巴勃罗一面低着头听论敌的讲话，一面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巴勃罗·奥尔特加这种人在哪一次革命中必然都有。”巴伦西亚接着说，“他们是革命肌体中的细菌。这些人迟早会变成逃兵、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巴勃罗抬起头来，双臂在胸前交叉，严厉地注视着对方。巴伦西亚指着我的朋友接着说：“这小子细皮嫩肉，举止文雅。感情丰富（一阵笑声）。多少年来（请记住这一点），多少年来，在受良心的驱使爬上卡拉维拉山以前，他先是在巴黎后来在华盛顿的萨克拉门托大使馆里担任秘书，每月从胡韦蒂诺·

卡雷拉手里接受一千美元的薪俸。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乌加特和萨帕拉的监狱里忍受折磨、遭受毒刑拷打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残遭独裁政权警察虐待、强奸、杀害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却开着巨鸟牌汽车在美国首都的大街上兜风，在招待会和晚宴上寻欢作乐、在无所事事地写诗……显然，他写了不少诗……现在我要问：他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耻从而寻求解脱呢？正因为这一切，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巴勃罗·奥尔特加无权批评我们的领袖和本法庭。我再次向法官们请求：判处罪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死刑！请不要为这个文质彬彬的诗人所感动。他看见血就吓得要死，而现在他头一次亲自看到他本人对流血负有责任。”

说完以后，罗伯托·巴伦西亚在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声中回到座位上。巴勃罗·奥尔特加飞快地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庭长一再摇铃，大声喊：“辩论现在结束，暂时休庭，由审判团做最后决定。”

奥尔特加转向老法官说：“庭长先生，我刚刚受到严厉的指控，所以有权为自己辩护。我请求再给我仅仅十分钟的发言时间！”

法官伏身凑到米格尔·巴里奥斯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领袖点头同意。

“好吧。”法官高声说，“给巴勃罗·奥尔特加十分钟时间——一秒钟也不能多——照他的说法，是为自己辩护。”

罗伯托·巴伦西亚坐在那里，双臂交叉，一丝难以描绘的笑容使他的脸更像一尊古代的雕像。奥尔特加看了他一

眼；

“总书记实现了他的夙愿，选择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时机，当着大厅里六千多人、当着几十万电台听众和电视观众把我也放到了被告席上。”

他停顿了片刻，又扫了总书记一眼，大声说：

“那么，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当众指出他篡改我们革命的目标！我还来不及详细计算在反对卡雷拉独裁政权的斗争中死亡、负伤和残废的萨克拉门托人一共多少。无论如何，我们担负着所有这些英雄和烈士们的嘱托，有义务根除许多年来使我们受苦受难的半封建寡头制度。总有一天要在这个岛国彻底建立社会公正。我们的人民应当真正得到扶持，摆脱贫困、疾病和文盲状态，摆脱牛马不如的生活，得到幸福、繁荣和尊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处于几个特权家族和两个外国公司的专横统治之下都是荒唐的，可耻的！”

巴勃罗讲话的时候，大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寂静。他的每次停顿中，连苍蝇的嗡嗡声也能听清。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一点十五分。我已经饥肠辘辘了。“在我们与之战斗过的独裁政权的弊病当中，最令有头脑的人气愤的是没有言论和自由交流想法的自由。”巴勃罗·奥尔特加又举起手，指着总书记，提高了语调，一字一板地说：“我控告罗伯托·巴伦西亚上校为新政权制定旨在消灭对话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巴伦西亚半站起身子，我断定他要抽出手枪，朝奥尔特加射去了。但是，他马上又重新坐好，露出打从对手开始讲话以来一直挂在脸上的那难以描绘的笑容。

“是这样，”奥尔特加接着说，“罗伯托·巴伦西亚正

在组织极权国家的基础。在这个极权制度下，我们大家都要冒失去做人的资格的危险，成为官僚统计学上的数码，成为抽象的物品！”

巴伦西亚忍不住大声吼叫：

“白痴！给我住嘴！”

巴勃罗·奥尔特加笑了。他立刻把脸转向群众，反驳说：

“正如我所说的，总书记喜欢咒骂胜于对话。”

庭长摇摇铃。奥尔特加转向他，看了看手表说：

“阁下，我还有七分钟。”

巴伦西亚站起来大声说：

“如果奥尔特加上尉真的要对话，那么现在我就给他个应得的回答：不能依靠惧怕流血和暴力的诗人、艺术家和文学家进行革命；不能依靠天真的空想家们建设国家。进行革命、建设国家有赖于在必要的时候先开枪然后再问为什么的男子汉。我们面临着凶恶的敌人，他们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如果说我有什么可‘指控’，那就是我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有明确的思想意识。”

说完，他坐下来。紧接着全场暴发出一片欢呼声。

“思想意识！”奥尔特加说，“勇敢的上校用了这个词，很好……在我看来，‘思想意识’是个弹性很强的词汇，它可以随着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我们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现实需要而膨胀或收缩。如果一种思想意识不严格保持在某些道德和伦理限度之内，它必将失去人性，那么专制制度必将以它的名义建立起来。巴伦西亚上校说要靠先开枪然后再问为什么的人进行革命。我给这类人送个雅号：

‘狂热分子’。这样的狂热分子我见过不少，有的穿黑色教服，有的穿饰以绶带的军装……还有那些穿便服的斗牛场观众，他们高声吼叫，要看到公牛或斗牛士或者两者同时流血！”

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声。巴勃罗看了看手表，记下了它持续的时间。恢复安静以后，他接着说：

“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告诉巴伦西亚上校和所有听众，我不想开小差，也不想进行破坏活动，更不想参加反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既不属于华盛顿也不属于莫斯科所有，而是属于所有的人，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人民。”他又转向总书记，“今天在这里说了这一切之后，我不知道革命中央委员会对我的自然人和法人资格如何处置。然而，不管怎么样，希望我的最后几句话能引起注意。如果我们认为，要建设的新萨克拉门托必须以我们的敌人或与我们有意见分歧的人的血肉作为最好的水泥来打根基，那么就有重演拉丁美洲各独裁政权悲剧的危险。这是因为，如果祖国的明天这座美丽的大厦的基础之中除了我们的劳动、智慧、正直和坚持不懈的警惕性之外没有容忍和爱，那么我们的房子就是建在沙滩之上！”

在聚光灯照射下，巴勃罗·奥尔特加的脸色显得苍白，嘴唇带点黑紫的色调。他回到座位上以后，法庭庭长宣布休庭，审判团将做出判决。

巴伦西亚仍然双臂交叉，但脸上古板的笑容消失了。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以“前驻华盛顿大使被判处死刑”为通栏标题刊登了以下消息:

塞罗埃莫索十四日电(联合通讯社记者威廉·比尔·戈德金)直到今年九月还任萨克拉门托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昨天在革命力量设立的人民法庭受审并被判处死刑。革命力量在不久前赶走了独裁者胡韦蒂诺·卡雷拉,夺取了政权。

公诉人是临时政府总书记罗伯托·巴伦西亚上校,被告辩护人由巴勃罗·奥尔特加上尉担任。上尉曾在萨克拉门托驻白宫和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馆任一等秘书近两年的时间。

明天上午十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将在本首都大斗牛场被枪毙。

“在斗牛场处决,真让人恶心!”克莱尔·奥吉薇大声

说着，把报纸扔到桌子上。奥尔兰多·贡萨加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喝了一口曼哈顿鸡尾酒。他几分钟以前来到康涅狄格大街这座经常和戈德金与奥尔特加见面的酒馆。两个人已经喝下三杯酒。从坐到桌边起，他们一直怀着思念和亲切的感情谈论巴勃罗。

克莱尔使劲哼了一声，把整个脸歪向一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到报纸上。“这是大使馆和大使办公室的钥匙……”她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脸颊，嘟嘟囔囔地说。

“你看，贡萨加，生活多么反复无常……，我，克莱尔·奥吉薇，美国公民，在新政府大使到来之前担任萨克拉门托共和国临时代办。”

贡萨加摇摇头：

“不会很快到来。我敢打赌，美国国务院要让那个米格尔·巴里奥斯坐坐冷板凳。”

“有时候我到大使馆去看看，”奥吉薇说，“打开窗户，见见阳光，通通空气。我一个人冻得哆里哆嗦地在楼道里、房间里走着（暖气停了），想起熟悉的面孔、声音和气味……就像在访问一座坟墓……（寒冷更加重了这种感觉）。那儿是豪尔赫·莫利纳博士的墓穴，再远一点是乌加特将军的长眠之地。走进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先生办公室的时候，我还能闻到哈瓦那雪茄的呛人气味，稍一想象，还能发现他施得过多的香水味……我突然看见画像上阿丰索·布斯塔曼特那张严肃的面孔，老人似乎正要我汇报他祖国的情况……在楼道里，我又碰见中尉、上尉和少校们的幽灵，他们那贼亮的眼睛最爱看女打字员们的胸脯、大腿和臀部……当然，梅塞

迪塔是个例外。忽然，蒂蒂托像风神似地飘过来……比万科的纸鸟常常从我前面飞过，像鸟怪一样……也许——谁知道呢？——像是那可怜的人从另一个世界给我送来的便条……啊，走进巴勃罗的办公室，我的心里一阵发紧，竟像个可笑的老太婆一样大哭起来，接着又抽抽咽咽，吐几口痰。看来这陵墓里太冷，着了凉。于是，我关上门窗，返回家里。喂，侍者，再来一杯曼哈顿鸡尾酒！噢，贡萨加，你怎么啦！事情也不顺心吗？”

不顺心，当然不顺心。尽管大使馆向巴西政府提供了关于那家美国公司的完整的情报，不同意国营进出口公司向它购买大豆，但买卖终于成交。后来发现（报纸报道了这一丑闻），大豆是发了霉的！

侍者端来了鸡尾酒。

“现在呢……会怎么样？”克莱尔问。

“不会怎么样。”贡萨加喝了一口酒，“发霉的大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官员和政治家们腐败的象征。克莱尔，巴西是个遭受掠夺的国家——从外到里，从里到外……没有任何人对任何事故负责，谁也不会进监狱。啊，不仅如此！我们有黄金般的心灵，招人喜欢！我们编造的笑话让世人笑破肚皮！我们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喜欢我们——难道巴西人不是个个好客、健谈吗？我们嘲笑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在内。我们有治疗各国弊病的灵丹妙药，唯独不能治疗自己的国家。巴西的和气可亲就是一剂了不起的灵丹妙药。克莱尔，这和气可亲，这无忧无虑（由于它，与巴西人相处才那么愉快）正是巴西作为一个国家的不幸所在！在巴西，只要和气可亲，他就会事事顺利。由于和气可亲（同时也轻浮、不负

责任)，我们才指望好事从天而降。由于和气可亲，我们才投票选举无能之辈和居心不良之徒担任公职。如果我们当上了官员和政治家，那么由于和气可亲就答应别人的一切请求，尽管事后并不履行诺言。由于和气可亲，我们把肥缺送给（并不总是合法地）亲戚、朋友、干亲家、干儿子、手下的亲信……活见鬼！由于和气可亲，我们向自己做最大的让步，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由于和气可亲，有糖一样的心灵，我们拒不遵守法律，使匪徒和窃贼们逍遥法外，甚至飞黄腾达，成为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直至共和国总统！由于和气可亲，我们以为世界上人人都应当援助我们并且永远不该过问援助的用途。由于和气可亲（啊，还有聪明、伶俐、善于临时凑合），我们不做任何计划，生产的东西很少，消费远在生产之上，总是相信会出现奇迹。是啊，在巴西，人们甚至相信，无所不能的上帝是巴西人！啊，克莱尔，我们是多么和气可亲呀！你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对吧？我们太和气可亲了，达到了对全国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习以为常的地步……在我国东北部，贫穷的程度不亚于亚洲，甚至更糟……由于我们和气可亲，心地善良，有的礼拜天还去教堂望弥撒，遥遥向上帝招手（大概上帝也是个和气可亲的人），偶尔还向乞丐施舍，模模糊糊地相信这样做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贡萨加，你言过其实了。巴西的逆差不算太大。”

“这我知道。不过今天我心情不好，已经有点醉了。”

“再过几年，巴西将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我不说不会，只是这种老调我已经听腻了。前途无量的国家……活见鬼！”贡萨加一口把杯子里的鸡尾酒喝光，

“啊！不要以为我在这一系列的肮脏故事里清白无辜。我也是个混帐东西，不过我父亲比我混帐得多。那位尊贵的先生是个婊子养的！”

“啊，贡萨加，不该对你父亲骂出这种话来！”

“我的祖母是个品德上无可挑剔的贵妇——我仅仅在借用人们奉承一位政界头面人物的话。塞维里诺·贡萨加博士是共和国参议员。他的政党像几乎所有其他各党一样，是由投机分子和有求于他的人组成的畸形团体，根本没有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纲领。下边的人付出选票、在群众集会上欢呼、高喊万岁，购买的是职位和实惠；上边的人则利用权位进行交易（合法和非法并行，视情况而定，只是个机会、语义学的问题），满足做官和名声的虚荣心……例外者少得屈指可数。贡萨加参议员——愿上帝祝福他——从事养良种马……还算说得过去，别人养的东西更下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者别的什么负责救济世界上穷苦儿童的国际机构给巴西运来几批奶粉，要求在东北部贫困居民当中免费发放。嗯，运送当中，不知道在哪一站有一伙匪徒插手了，转而发往别的地方卖掉了。请注意，是在黑市上卖掉的！我的父亲贡萨加参议员——他是个和气可亲的人——买了几百袋，用来喂他的良种马！好极了！在巴西，每天有多少儿童夭折？谁知道呢！我在统计学上是个低能儿。大概几百、上千吧……你想想，一匹骏马在赛马场上疾驰，看客们兴高采烈，贵妇们打扮得高雅绝伦，身穿昂贵的衣服，头戴价值连城的帽子，个个渴望在报纸的社会专栏和画报上露面……你不以为这些贵妇人和骏马比起巴西东北部和其他地区骨瘦如柴、疾病缠身、营养不良的儿童们来要漂亮得多、高贵得多吗？当然！”

只有他们才配我们的奶粉，只有他们才配我们的和气可亲！”

“贡萨加，不要再喝了！”

“好，不喝了，但不能不说。在巴西，有多少吨奶粉走了这条路？谁也不知道。没有任何人检查。我们都是些非常和气可亲的人。生活在继续。贡萨加参议员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是年利率为百分之四十八的一家银行的股东。克莱尔，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在你们这个令人敬佩的国家，肮脏事也不少……”

“贡萨加，亲爱的，并非我们美国人发明了人类本性。”

奥尔兰多·贡萨加死死盯着酒杯底。

“克莱尔，不要以为我乐于在这里告诉你这些事。再说一遍，我是个混帐东西。巴勃罗的作为才像个人呢。他做出了男子汉的决定，而我却像父亲一样，是个寄生虫。我的父亲又像巴西大部分商人和工业家一样，偷税漏税，用这样得来的钱购买美元，存入瑞士或曼哈顿银行。喂，侍者！再来一杯瑞士银行！……不，我是说，再来一杯曼哈顿鸡尾酒！”

克莱尔向侍者打了个拒绝的手势，并让他送来帐单。

“我们走吧，奥尔兰多。”

“由我付钱！我是个了不起的和气可亲的人。”

侍者回来了，他一把抢过帐单。

克莱尔看看手表，叹了口气：

“快七点了。你想到了吗？这是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最后一夜了。你能想象出来，他坐在牢房里等待死亡的时刻是个什么滋味吗？”

“又是一个例证！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一个和气可亲的家伙。那混帐东西太和气可亲了，甚至巴勃罗这个白痴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他辩护……”他并拢拇指和食指，举到额头一拧，像是上锁的样子，“好，我把思想机器给停了。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吗？不行？还有约会？好吧，我独自一个人去吃，然后钻进一家电影院，看一场宽银幕立体声电影——好莱坞制造的彩色骗局。也许看不完就心里烦躁，走出影院，开着汽车在街上游逛，找个女人过夜……”

“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同意，但也不失为解决另一种问题的办法，至少这一夜……”

两个人站起身，贡萨加付了帐，往侍者盘子里放了丰厚的小费，乐得他咧开嘴，露出了平常看不见的一颗金牙。

朝酒馆门口走的路上，巴西人问：

“克莱尔，对于这一切，答案在哪里？伟大的答案在哪里？”

奥吉薇塔挽起朋友的胳膊，给他讲了个故事作为回答：

“据说，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①咽气之前几分钟躺在病榻上，转过脸问她殷勤的女伴托克拉斯小姐：‘答案在哪里？’不等对方张口，她又问了一句：‘可是，问题又在哪里呢？’”

两个人朝十一月寒冷的夜幕走去。

① 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作家，著有《托克拉斯自传》等。

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巴勃罗·奥尔特加和比尔·戈德金一起吃完晚饭，肩并肩在塞罗埃莫索的玻利瓦尔大街上散步。所有的霓虹灯都已熄灭，因为新政府决定电力定量供应。但是，道路两旁和街心花园四周电线杆顶上，殖民时代风格的路灯依然亮着，足以使首都这条主要街道呈现一派节日气氛。人行道上人群熙攘，咖啡馆、电影院、饭馆和酒吧间都挤满了人。不少男子身着革命民兵制服。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漾着轻松、愉快、充满希望的表情。有些士兵和姑娘们手挽手，谈着，唱着，笑着，出入于公共场所。街心花园的排椅上坐着一对恋人，小伙子和姑娘身贴身、嘴对嘴，一动不动地亲吻，像是一双雕像。巴勃罗·奥尔特加笑了，想起了格伦达·多列玛斯，接着想起了广田喜美子，随后又想到皮娅……皮娅姓什么？记不得了。也许从来不曾知道伊甸园女伴的姓……

由于在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辩护中精神紧张，力气用尽，身体疲劳，昨天晚上用交欢轻松了一下，他把在他办公

室工作的女打字员带到他住的那家三等旅馆，请她一起过夜。那混血姑娘长一对杏核眼睛，和广田喜美子有点相像。巴勃罗一生中从来不曾如此需要女人。

“我搂着她睡着了。”现在，他对戈德金讲起昨天晚上的事，“凌晨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一扭头，看见那姑娘正翻写字台里的文件，接着打开衣柜的抽屉，后来又掏我的衣服口袋……我佯装没有睡醒，什么也没有看到。最后，她回到床上，又搂住我……”

“巴伦西亚的密探吗？”

“可能。”

“你看看那个穿白衣服、戴巴拿马草帽的傢伙。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也在饭馆，一直盯着我们的桌子。我们出来以后，他一直跟着……”

戈德金和奥尔特加离开中心大街——照老记者的看法，由于建起了摩天大楼、饮食店和咖啡馆，这里已经渐渐美国化，失去了民族特点——朝老区走去。巴勃罗也喜欢老区，那里街道狭窄，碎石铺路，家家户户门口都有瓷砖镶嵌，房顶、大门和屋檐都保留着殖民时代的风格。几个宅院里飘出当年油炸食品、熬糊了的蔗糖、薰衣草、贮藏室的潮气、炭火和神龛前燃烧蜡烛的气味。

两个朋友偶尔停住脚步，看看这个或那个塞维利亚式的院落。比尔·戈德金跟巴勃罗走着，很快便发现他要到哪里去。二十分钟以后，他们来到奥尔特加·伊穆拉特住宅前面。巴勃罗走近铁门，两只手握住栏杆，长时间默默望着他的家（“多么奇怪的囚犯！”戈德金想）。花园深处的住宅仍然门窗紧闭。戈德金知道，伊莎贝尔太太虽然有病在身，

但她以西班牙人特有的高傲拒绝会见自己的儿子，也不肯接他打来的电话。

两个人开始朝回走。比尔在一盏路灯下停下来装烟斗的时候，巴勃罗用眼睛的余光发现，戴巴拿马草帽的人还跟在他们后面。

“比尔，你认为我母亲通过电视看了审判的现场转播吗？”

“也许吧。你希望她看过吗？”

“不知道。也许希望她看到吧。不知道。现在，一切都混乱不堪……”

两个朋友来到一条灯光暗淡的街道，突然发现夜色纯净，广阔无垠的天空黑得发蓝，群星闪闪烁烁。

已经回到了市中心。老记者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低声说：

“啊！忘了告诉你，我买了明天飞往纽约的机票。我想，在萨克拉门托的采访任务已经结束了。”

“几点钟启程？”

对方摇了摇头：

“你不要去机场。我不喜欢告别，情愿在我或你住的旅馆门口说声‘回头见’。好吧？”

“好”。

“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我做吗？”

“告诉贡萨加和克莱尔，说我经常怀念他们。你要有时间，给我写几行字来。”

巴勃罗把朋友拉进了路边的一家咖啡馆。

“喝点冷饮吧。利用这个时间我写个便条，请你交给喜

美子小姐。”

两人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要了两份冰激凌。空气中腾腾的香烟烟雾被电视照成了紫红色。咖啡馆里几乎坐满了人，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上的播音员，他正在评论头一天对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审判。戈德金发现巴勃罗局促不安，肯定是因为担心被人认出是为匪徒辩护的那个“坏蛋”。好在谁也没有留意刚刚进来的这两个人。奥尔特加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撕下一页，用圆珠笔在纸上写道：

糊涂园丁

生命已終了
耕耘一世哪知晓，
种下死神花。

巴伦西亚面带轻蔑的笑容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巴勃罗一时火起，把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

“我改变了主意。”他开始吃侍者端来的冰激凌，“比尔，给喜美子小姐打个电话，说我有时候想念她。不，什么也不要说。现在，对我来说华盛顿已经是个虚幻的世界，像我以前生活过的其他地方一样……”

电视台评论员正在描绘明天处决“臭名昭著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的“盛况”，说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处决“卡雷拉的同谋”之后，革命的惩罚阶段即告结束。他还说，这场“大联欢”的入场券已全部发完，可是，有“我们功率强大的电视台的摄像机”，公众可以在家

里或者公共场所观看处决的全部过程。

“走吧。”巴勃罗把五个卢纳放在大理石桌面上，小声说，“这种事让我胃里难受。”

离开热气腾腾、烟雾弥漫的咖啡馆，来到街上，重新呼吸夜里清凉的空气，心中一下子畅快了。戴巴拿马草帽的人站在附近的拐角处。

“巴勃罗，现在你怎么办？”

“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比尔，要留下来。我不会胆怯。一定设法影响中央委员会。我并不孤立。今天上午，许多战友去找我，说他们的想法跟我一样，不准备接受巴伦西亚的独裁。”

“他们不会是巴伦西亚本人派的奸细吧？”

“就算是吧！我并没有策划反革命活动，而是在力图建立对话……我只不过想让巴里奥斯和其他领导人履行他们在声明和演说中许下的诺言：社会公正、民主政府、享有一切自由……当然，剥夺他人自由的自由除外……因为这个可怜的民族不能、也不应该再次受骗了！”

一连几分钟，两个人默默地走着。穿白衣服的人仍然在跟踪，距离他们三十公尺左右。

“看到了吧。”巴勃罗笑着说，“巴伦西亚非让我意识到在受监视不可。他想吓倒我。这太可笑了。”

“巴勃罗，不要低估巴伦西亚，他是个心毒手狠的人。”

“但也是个人。我不怕心毒手狠，决心对付他。我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投资’于这场革命了，今后一定向债务人讨还——不要地位和个人好处，而是要这个饱经苦难的人民

的大多数可以分享的利益。我不打算流亡。不想朝脑袋上开一枪，而是要留下来。我比我本人原先想象的要固执得多。如果说这场革命白搞了，至少它使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我承认，‘昨天’我度过的‘病态时光’并不完全令人不快……”

戈德金点点头。两个人来到塞罗埃莫索——希尔顿饭店前面，默默相视了很长时间才握手告别。

“再见了，巴勃罗。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比尔，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不说‘再见’，而是说‘回头见’。”巴勃罗笑了，“扔掉你这条难看的胆汁色领带吧，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

美国人又点点头（露丝！露丝！露丝！），转身走进饭店。巴勃罗·奥尔特加点上一支烟，想起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马上又尽量忘掉他。为了拯救这个人，他尽了一切努力。现在，良心平静了，感到头脑干净、清醒。头痛消失了。

他朝自己的旅馆走去，穿白衣服的人跟在后面。

审判之后，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离开陆军第二团监狱，被押解到中央警察局那座古旧建筑的地牢里等待处决的时刻。

那个星期六凌晨，他拖着那条一阵阵疼得钻心的伤腿踱来踱去。地牢里没有电灯，只有插在粗糙的桌子上那洋铁皮烛座顶端的蜡烛摇摇曳曳。一位老人坐在蜡烛旁边，双手交叉，须发皆白的头垂在胸前。他就是卡塔里诺·辛德尔神父，是专程从索莱达德马尔镇赶来在这最后时刻帮助囚犯的。在烛光下，他那凹陷的、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更加惨黄。

“不要走来走去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老人微弱的声音由于不停地咳嗽变得嘶哑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犯人大声说，“有绝对把握！整整三十六年以前，我在这间地牢里关了两个月！一共五个小伙子，大家年龄都差不多。我们是在大街上刷革命标语时被查莫罗的警察抓住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在这间地牢的墙上……在哪儿来着？……写了一句话‘打倒独

裁！自由万岁！’，并且在下面签上了我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日期……日期大概是1923年12月，当时我以为肯定要被枪毙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

“牢房里既没有铅笔又没有炭笔，只好用指甲在墙上刻……”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前面，端起洋铁皮烛座，开始沿着潮湿得发霉的墙壁寻找当年写下的口号，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在一个角落跪着找了几分钟以后又站起来，呻吟了一声。正发着高烧，他浑身疼痛，不停地哆嗦。

“神父，请把你的眼镜借我用用，我什么也看不清……”

神父站起来，从皮眼镜盒里掏出眼镜，递给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度数不尽合适，他戴上以后又接着寻找当年的字迹。神父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开始祈祷。他很伤心，因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拒绝忏悔：“上帝认识我，了解我的长处和缺点。他是个无党派法官，善于主持正义。如果我确实有罪，他就会判处我死刑。别坚持了，神父，我不忏悔，对一切我都不后悔。”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把蜡烛举到墙边，艰难地读着世代罪人和无辜者留下的痕迹。其中有些淫秽的图画：男性和女人的生殖器，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话：“啊，玛丽埃塔，我想你的……”、“警察局长是懦夫”、“查莫罗是个忘八”、“祖国万岁”、“永别了，小妞儿，我至死想着你”、“男子汉站着死”、“我以上帝发誓：我无罪……”、“我叫安东尼奥·佩雷斯，我的命运是地狱”。

“我记着是跪着在一个角落写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想，“也许在另一边。”

他爬到另一边，坐在墙角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融化了的蜡汁滴在手指上。腿上的伤口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摸摸滚烫的前额，随后又把蜡烛举到墙边。记得是用大写字母写的。写完年份的最后一个数字指甲已经断了，流出了鲜血。啊！对！沾着鲜血在名字下面画了一颗心！

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站起来继续寻找，从这一边找到那一边，像个梦游症患者。神父走过去，用干瘦的胳膊搂住他的腰，把他拉回桌边坐下。

“镇静！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在这期间，这墙壁大概刷过许多次……”

“不，神父，不会的！任何一届政府的警察局长都不会想到粉刷这种地牢。这里面总是关满了游民无赖，有一回，这间屋子里关了五十个人。他们在这里拉，在这里尿，弄得臭气熏天。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政治犯、小偷、流氓、醉鬼。我得找到我写的……一定得找到！”

“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孩子？”

“我想回忆起当年的我——另一个人、二十岁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革命者、独裁政权的对头。”

“好，我懂了。可是，那两句话即便找到了，它们也不能归还你的青春年华。”

“我知道，知道。神父，这是我仅有的东西了。仅有的一件了！”

神父伸手摸着死囚的前额。

“你大概在发高烧。我不止一次请监狱长派个医生，可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来。”

“医生？既然明天就要杀死我，还要医生干什么？病菌的行动比行刑队慢得多。”

加夫列尔盯着烛光，突然大声喊起来：

“这混帐地牢，连个窗户也没有！看不见是黑夜还是白天。神父，你从来不戴手表。我那块让这里的狱卒偷走了……不知道天快亮了没有。”

“为什么不给家里写封信呢？我这儿有笔和纸……”

“不写，免得流露出什么怨恨，或者说出句烈士的豪言壮语。神父，晚些时候你给他们写封信吧。告诉他们，在最后一夜，我很想念他们。请他们原谅……我是个不好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不像样的外祖父……告诉他们，不要为我担心。对一个男子汉来说，死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卡塔里诺神父用胳膊顶住胃部。

“胃溃疡还疼吧？”

“有点疼。不要紧，已经习惯了。”

“走吧，神父。你是个病人，不能这样一夜不合眼。”

“让我看看你腿上的伤口。发这么高的烧……要是你能出点汗……吃一片阿斯匹林……一片止痛药……”

“放心吧。不管什么疼痛，我一向能忍受。神父，你为什么要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呢？”

神父耸耸肩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想，在这个孤独的夜晚，可以对你有点帮助。”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从烛座旁边拿起陶罐，送到嘴边，喝了一大口，随后站起身，又端着烛架走起来。

“勇敢，那小伙子……”他嘟嘟囔囔地说。

“谁？”

“巴勃罗·奥尔特加。他面对巴伦西亚和数以千计想打死我的人毫无惧色，履行了诺言。没有请求宽恕，没有贬低我，没有提我的母亲。如果有什么事情我难以忍受的话，那就是别人可怜我。怜悯比仇恨更使我痛苦。”他像是顿生疑心，看了神父一眼，“神父，你是因为怜悯才来帮助我的吗？”

对方摇了摇头：

“怜悯？不，孩子。确切的词应当是‘爱’。”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躺到铁帆布床上。

“我原来以为，我要像胡安·巴尔萨一样，在凌晨五点面对公墓的墙壁死去，胸部中五颗子弹。”

他用颤抖的手理了理头发。

“在斗牛场……上午十点。还有乐队，进行曲……像个联欢……上午十点，神父，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

索莱达德马尔教区长摇了摇头。

“不，朋友。我这样岁数的人不爱睡。倒是你该睡一会儿。闭上眼睛，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可不是孩子……”

“是孩子，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我眼里，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索莱达德马尔教堂给我当小执事的那个孩子。快，睡觉吧。”

“几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让我永远睡觉了。”

“永远？”乡村神父使劲摇头，“孩子，当你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地方了。”

“在地狱？”

“永远不应当对上帝的慈爱失去希望。”

卡塔里诺·辛德尔拿起放在椅子旁边的牛奶瓶，往纸杯子倒了一点。

“该喂喂我的溃疡了。请稍等……”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眼睛却没有离开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死囚。

长时间的沉默。蜡烛越来越短。一声隐隐约约的狗叫声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来自索莱达德马尔一个温暖的夜晚，年幼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在街上游荡，羞于回家。

“神父，你自然会记得我的母亲……”

“哪能不记得呢？”

“她向你忏悔……”

“忏悔过，但非常不幸，次数很少。”

“她说过谁是我的父亲吗？”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即便说了，我也不能透露忏悔者的秘密。”

“好，不管是谁吧，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又一阵沉默。辛德尔神父以为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睡着了，就站起身，把散发着淋湿了的狗身上的那种臊臭味的军用毯盖在他身上。

“应该在什么地方？”囚犯嘟囔了一句。

“孩子，你在说什么？”

“说我用指甲抠的那句话。那时候我二十岁。还记得吗？有一天你把我领到山上。我对你说，我愿意为自由而死。现在我为什么而死呢？什么也不为，白白死去。”

“这是上帝的笔误。孩子，有时候上帝的手指也会流

血。”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闭上眼睛，全身从头到脚抖成一团。昏迷之中——昏迷了多长时间？——他又在山上游荡：年轻力壮、自由自在的他靠近天空、秃鹰在身边翱翔……后来，他躬起身子：

“几点钟他们来叫我？”

“朋友，我不知道。也许九点……或九点半。”

“神父，我求你一件事。先生很受巴里奥斯敬重……以你的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听清了吧？）请求他们不要捆住我的手，也不要蒙上我的眼睛。我希望像个男子汉一样死去，不想跟牲畜似地被宰杀。我要亲眼看看死神的脸。”

“你的愿望一定能得到满足，我向你保证。”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似乎镇静了一些，用拇指和食指摆弄起挂在脖子上的圣母像来，就像孩子必须拿着件玩具才能睡觉一样。

据《革命报》政治评论员说，1959年11月15日（星期日）上午处决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令人难忘的精彩场面。”头一天，联邦气象台预报说，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天气晴朗，气温在二十三至二十八摄氏度之间，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百分之六十，有微弱、凉爽的东风。

人们异口同声，说大斗牛场有史以来不曾容纳过这么多观众——也许1943年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马诺莱特前来献技的那个难忘的星期天除外。

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与其说像黄金倒不如说更像白银的太阳照耀着绿天鹅绒似的山丘和花园，照耀着萨克拉门托古老首都的屋顶。

数以百计的人担心找不到座位——虽然他们都有入场券，但只有大人物和新闻记者才对号入座——从上午七点就陆续来到大斗牛场。

九点钟左右，当局看到整个斗牛场已经完全挤满，就命

令关闭各个大门。围在场外的人群高喊有权观看，向警戒线和大门冲击。警察突击队被迫一再采取行动，有两次不得不施放催泪弹。

《革命报》评论员写道：

观看这种场面是一种享受。社会各界的人民（当然，没落的寡头阶层成员和所谓“上等阶级”的代表除外）坐在大斗牛场的长凳上进行激动人心的联欢。技艺高超的消防队乐团演奏着两步舞曲、西班牙斗牛舞曲和进行曲，人们又唱又跳。朝观众席望去，尤其是朝阳光照耀下的那一边望去，可以看到由汗衫、旗帜、头巾和各式各样的裙子组成的浪涛滚滚的海洋，仿佛置身于瞬息万变、五彩缤纷的巨大万花筒之中……

革命中央委员会主席米格尔·巴里奥斯将军在政府其他成员陪同下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三万人一齐起立，向领袖欢呼达十分钟之久。接着，全体高唱国歌。

电视节目主持人头一天就预告说，要现场直播这一精彩场面，“生动逼真地报道处决情形。”他将把电视屏幕一分为二，让观众先生们同时看到两架带远距离镜头的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一架播送行刑队开枪射击时刻的动作，另一架则映出罪犯中弹一瞬间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

上午十点十二分，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进斗牛场。他一瘸一拐，行动艰难。腿上伤口疼得厉害，只好紧咬着嘴唇，免得喊出声来。但是，他

尽量抬着头，挺起胸。

群众中爆发出一阵口哨声和叫喊声，但气势没有体育馆审判时凶狠。今天，天气晴朗，几百名观众八点钟到教堂望过弥撒，那么这个有音乐伴奏的群众联欢就带有观看体育比赛的意味了。

辛德尔神父走在罪犯身边。事前，当局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关键时刻”，不捆绑罪犯，不蒙住眼睛。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扬着头。太阳照得他头昏眼花，看不清观众席上的人群。冷汗顺着被高烧折磨得疲软不堪的身体往下滚。他看不见，但意识到身边有个黑影，知道那是神父正用握着黑色十字架的手挤压着胃部，那十字架上有个耶稣铜像。

“立定！”走到斗牛场中间，行刑队少尉队长一声口令。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没有听见口令，仍然朝前走了两三步。卡塔里诺神父揪住他的汗衫袖子，他才停下来。两名士兵拧住罪犯的胳膊，把他推到一块大铁板前头，铁板就竖在牛栏门前——有斗牛表演的下午，凶猛的公牛就是从这里冲出来的。

扩音器响起来，声音巨大而庄严，仿佛来自天上，像上帝亲口宣布世界末日到来。它慢条斯理、抑扬顿挫地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死刑。群众静静地听着来自天上的声音历数这个祖国的敌人犯下的种种罪行。

少尉即将向行刑队下达开火命令。他走到巴里奥斯前面，后脚跟一碰，行了个军礼。领袖站起来点了点头。这时，

鼓声响起来。

卡塔里诺·辛德尔神父走近罪犯，像个上帝的间谍似地在他耳边低声说：“孩子，鼓气勇气！几分钟之内你就到了慈父般上帝的怀里。”接着，把十字架送到加夫列尔·埃略多罗唇边让他吻了吻。罪犯自己又拿起带索莱达德圣母像的徽章，送到嘴边久久亲吻。现在，单等死神到来了。

行刑队长刚刚喊了一声：“准备！”他就感到一阵怒气涌上心头。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现在孤独无依！人们夺走了他的一切，一切！只剩下烧得浑身疼痛的躯壳、恶臭、化脓的伤腿……而这些胆小鬼还要用子弹在他身上穿无数个窟窿。“瞄准！”少尉的声音响彻静悄悄的晴空。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环视一下斗牛场，把一只手伸进两腿中间，使尽仅剩的力气，对着所有即将观赏他死亡的人们，用嘶哑的声音咆哮：

“把我这玩艺儿留给国家博物馆吧！”

大概由于行刑队长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又高傲地、近乎洋洋得意地喊：

“快开枪，婊子养……”

枪声打断了他的话。弹孔累累鲜血喷涌的身体转了一圈，倒在地上。乐队奏起进行曲。观众们高声呼喊：“噢莱！噢莱！噢莱！”

少尉从枪套里抽出手枪，绷着脸走近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还在抽动的躯体，朝他的头颅打了一枪。这颗子弹像是在一段历史的最后画了个句号。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主要人物表

加夫列尔·埃略多罗·阿尔瓦拉多：萨克拉门

托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即“大使先生”。

巴勃罗·奥尔特加·伊穆拉特：萨克拉门托共

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

豪尔赫·莫利纳：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弗朗西斯科·比万科（潘乔）：大使馆领事。

罗萨莉娅：潘乔的妻子、大使的情妇。

弗朗西丝·安德森：大使的美国情妇。

乌戈·乌加特：大使馆武官。胡韦蒂诺政府的前警察头子。

埃内斯托·比拉巴（蒂蒂托）：大使馆二等秘书，同性恋者。

米歇尔·米歇尔：大使馆总管。

克莱尔·奥吉薇（奥吉薇塔）：大使美籍女雇员。

威廉·比尔·戈德金：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拉美问题专家。

奥尔兰多·贵萨加：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

广田喜美子：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女秘书。

格伦达·多列玛斯：美国女大学生。

安东尼奥·马丽亚·查莫罗：萨克拉门托共和国老独裁者。

胡韦蒂诺·卡雷拉：萨克拉门托共和国总统，独裁者。

佩德罗·萨帕拉：萨克拉门托共和国警察头目。

迪奥尼西奥：大使馆一等秘书奥尔特加之父。

伊沙贝尔：大使馆一等秘书奥尔特加之母。

莱昂纳多·格里斯：教授，萨克拉门托政治流亡者。曾在胡韦蒂诺政府中任教育部长。

卡塔里诺·辛德尔：神父，索莱达德马尔镇教区长。

潘菲洛·阿朗戈·阿朗贡：萨克拉门托大主教。

米格尔·巴里奥斯：起义军领袖。

罗伯托·巴伦西亚：起义军政治领袖。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大使先生

作者 = (巴西) 埃里科 · 维利希莫著 范维信译

页数 = 5 4 2

S S 号 = 1 0 8 7 1 4 2 5

出版日期 = 1 9 8 8 年 0 8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江志方]	
第一部分	递交国书
第二部分	招待会
第三部分	外交圈
第四部分	山上
附录页	